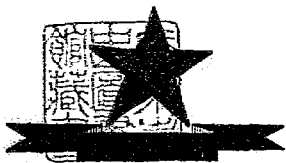


文 参 学 幹 件 究 習 部



印編校黨委市海上共中

月七年九四九一

幹部學習參攷文件

中共上海市委黨校教育處編印

目 錄

論人民民主專政	毛澤東	一
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	毛澤東	一一
在晉綏幹部會上的講話	毛澤東	二三
毛主席在新政協籌備會上的講話	毛澤東	三一
將革命進行到底	新華社社論	三四
一		
工業問題	毛澤東	四〇
工商業政策	任弼時	四三
堅持職工運動的正途路線反對左傾冒險主義	新華社社論	四五
關於中國職工運動當前任務的決議	新華社社論	五〇
中共中央關於建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決議	新華社社論	六一
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團章	新華社社論	六五
把我們城市的組織形式和工作方式適應城市的特點	新華社社論	七〇
消滅腐敗傾向撲滅特務匪徒	新華社社論	七二
保護人民祖國的財產	新華社社論	七四

論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劉少奇（七六）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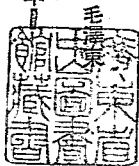
「共產黨人」發刊詞.....毛澤東（九八）
中共中央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一〇六）
作一個好的黨員建設一個好的黨.....劉少奇（一〇九）
組織上的和紀律上的修養.....劉少奇（一一九）
論忠誠與老實.....斯波列夫（一四九）
論經濟工作者在工作中的黨性.....左爾雷（一五四）
斯大林論平均主義.....（一五七）
論自我批評.....毛澤東（一六〇）
反對經驗主義.....艾思奇（一六一）

四

中共中央關於領導方法的決定.....（一二二）
中共中央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一七六）
斯大林論領導與檢查.....（一七九）
關於黨的羣衆路線問題.....劉少奇（一八四）
有事和無事商榷.....陳伯達（一九五）

論人民民主專政

紀念中國共產黨二十八週年



一九四九年的七月一日這一個日子表示，中國共產黨已經走過了二十八年了。像一個人一樣，有他的幼年，青年，壯年和老年。中國共產黨已經不是小孩子，也不是十幾歲的年青小夥子，而是一個大人了。人到老年就要死亡，黨也是這樣。階級消滅了，作為階級鬥爭的工具的一切東西，政黨和國家機器，將因其喪失作用，沒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結自己的歷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級的人類社會。我們和資產階級政黨相反，他們怕說階級的消滅，國家的消滅，和黨的消滅。我們則公開聲明，恰是為着促使這些東西的消滅而創設條件，而努力奮鬥。共產黨和人民專政的國家權力，就是這樣的條件。不承認這一條真理，就不是共產主義者，沒有超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剛才進軍的青年同志們，也許還不懂得這一條真理。他們必須懂得這一條真理，才有正確的宇宙觀。他們必須懂得，消滅階級，消滅國家權力，消滅黨，全人類都要走這一條路的，問題只是時間和條件。全世界共產主義者比資產階級高明，他們懂得事物的生存和發展的規律，他們懂得辯證法，他們看得遠些，資產階級所以不敢承認這一條真理，是因為他們不願意被人們推翻，被推翻，例如眼前國民黨反動派被我們推翻，過去日本帝國主義被我們及各國人民所推翻，對於被推翻者來說，這是痛苦的，不堪設想的。工人階級，勞動人民和共產黨人，則不是什麼被推翻的問題，而是努力工作，創設條件，使階級，國家權力和政黨很自然地歸於消滅，使人類進到大同境界。為着說清我們在下面所要說的問題，在這裏順便提一下這個人類進步的遠景的問題。

我們爲走過二十八年了，大家知道，不是和平地走過的，而是在困難的環境中走過的，我們要和國內外黨內外的敵人作戰。聽馬克思，恩格斯，列甫和斯大林，他們給了我們以武器，這武器不是棍頭，而是馬克思列甫主義。

列甫在一九二〇年在左派幼稚病一書中描寫過俄國人尋找革命理論的經過。俄國人曾經在幾十年頭內，經歷艱難困苦，方才找到了馬克思主義。中國有許多事情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國相同，或者近似。封建主義的壓迫，這是相同的。經濟和文化落後，這是近似的。兩個國家都落後，中國則更落後。先進的人們，爲了使國家復興，不惜艱苦奮鬥，尋找革命真理，這是相同的。

自從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失敗那時起，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洪秀全，康有爲，嚴復，和孫中山，代表了在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那時，求進步的中國人，只要是兩方的新道，什麼也看。向日本，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派遣留學生之多，達到了驚人的程度。國內廢科舉，興學校，好像雨後春筍，努力學習西方。我自己也在青年時期，學的也是這些東西。這些是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文化，即所謂新學，包括那時的社會學和自然科學，和中國封建主義的文化即所謂舊學是對立的。學了這些新學的人們在很長的時期內產生了一種信心，認爲這些學可以救中國，除了舊學派，新學派自己表示懷疑的很少。要救國，只有革新，要革新，只有學外國。那時的外國只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是進步的，他們成功地建設了資產階級的現代國家。日本向西方學習有成效，中國人也想向日本人學。在那時的中國人看來，俄國是落後的，很少人想學俄國。這就是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紀初期中國人學習外國的情形。

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很奇怪，先生爲什麼老是說學生呢？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國家的情況一天一天壞，環境迫使人們活不下去。憤慨產生了，增長了，發怒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震盪了全世界，俄國人舉行了十月革命，創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過去苦悶在地下爲外國人所看不見的偉大的俄國無產階級及勞動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甫斯大林領導之下，像火山一樣地突然爆發出來了，中國人和全人類對俄國人都另眼相看了。這時，也只是在這時，中國人從思想到生活，才出現了一個嶄新的時期。中國人找到了馬克思列

帝主義這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中國的面目就起了變化了。

中國人找到馬克思主義，是經過俄國人介紹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國人不但不知道列寧，斯大林，也不知道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舉魂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估定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一九一九年，中國發生了一五四運動，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孫中山在絕望裏，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孫中山歡迎十月革命，歡迎俄國人對中國人的幫助，歡迎中國共產黨和他合作。孫中山死了，蔣介石起來。在二十二年的長時間中，蔣介石把中國拖到了絕境。在這個時期中，以蔣介石為主力軍的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打倒了三個帝國主義領導之下，在驅逐日本帝國主義之後，進行了三年的人民解放戰爭，取得了基本的勝利。就是這樣，西方資產階級的文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一齊破了產。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給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給人民共和國。這樣就造成了一種可能性：經過人民共和國到達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到達階級的消滅和世界的大同。更有甚者「一大同書」，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達大同的道路。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外國有過的，中國不能有，因為中國是受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唯一的出路是經過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到達階級的消滅和世界的平等。

一切別的東西都試過了，都失敗了。曾經留戀過別的東西的人們，有些倒下去了，有些覺悟過來了，有些正在覺悟中，有些是覺悟得還很快，以至使很多人感到突然，感到要重新學習，人們的這種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們歡迎這種善良的要求重新學習的態度。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在十月革命以後學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建立了中國共產黨。接着就進入政治鬥爭，經過曲折的道路，走了二十八年，方才取得了基本的勝利。這二十八年的經驗，如同孫中山在其臨終遺囑裏所說「積四十年之經驗」一樣，得到了一個共同的結論，即是：「深知欲達到勝利，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對待

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孫中山和我們具有各不相同的宇宙觀，從不同的階級立場出發去觀察和處理問題，但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在怎樣和帝國主義作鬥爭的問題上，却和我們達到了這樣一個基本上一致的結論。

孫中山死去二十四年了。中國革命的理論和實踐，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都大大地向前發展了，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的面目。到現在為止，中國人民已經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經驗，就是這兩件事：（一）在國內喚起民眾。這就是團結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組成國內的統一戰線，並由此發展到建立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二）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對待我之民族及各國人民共同奮鬥。這就是聯合蘇聯，聯合各新民主國家，聯合其他各國的無產階級及廣大人民，組成國際的統一戰線。

「你們一邊倒」。正是這樣。一邊倒，是孫中山的四十年經驗和共產黨的二十八年經驗教給我們們的，深知欲達到勝利和鞏固勝利，必須一邊倒。預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經驗，中國人民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窮途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我們反對倒向帝國主義一邊的蔣介石反動派，我們也反對第三條道路的幻想。不但中國，全世界也一樣，不是倒向帝國主義，就是倒向社會主義，絕無例外。中立是偽裝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

「你們太刺激了」。我們講的是對付國內外反動派即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們，不是講對付任何別的人。對於這些人，並不發生刺激與否的問題，刺激也是那樣，不刺激也是那樣，因為他們是反動派。對付反動派和革命派的界限，揭露反動派的陰謀詭計，引起革命派內部的警惕和注意，長自己的志氣，滅敵人的威風，才能孤立反動派，戰而勝之或取而代之。在野獸面前，不可以表示慈愛的怯懦。我們要學景陽岡的武松，在武松看來，景陽岡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樣，不刺激它也是那樣，總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我們要做生意」。完全正確，做生意總是要做的。我們只反對妨礙我們做生意的內外反動派，此外，並不反對任何人。大家須知，妨礙我們和外國做生意以至妨礙我們和外國建立外交關係的，不是別人，正是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蔣介石反動派。團結國內國際的一切力量環攻內外反動派，我們就有

生意可做了，我們就有可能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之上和一切國家建立外交關係了。「不要國際援助也可以勝利」。這是錯誤的想法。在帝國主義存在的時代，任何國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沒有國際革命力量在各種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勝利了，要鞏固，也是不可能的。偉大的十月革命的勝利和鞏固，就是這樣的，斯大林早已告訴我們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打倒三個帝國主義國家，並解放東歐各國，也是這樣。人民中國的現在和將來，也是這樣。諸大家想一想，假如沒有蘇聯的存在，假如沒有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對於我們來說，特別是打倒了日本帝國主義，假如沒有各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出現，假如沒有東方各被壓迫民族正在起來鬥爭，假如沒有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等等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人民大眾和統治他們的反動派之間的鬥爭，假如沒有這一切的勝利，那麼，堆在我們頭上的國際反動勢力必定比現在不知要多幾多倍，在這種情形下，我們能夠勝利麼？顯然是不能的。勝利了，要鞏固，也不可能。這件事，中國人民的經驗是太多了，孫中山臨終時講的那句聯合國際革命力量的話，早已反映了這一種經驗。

「我們需要英美政府的援助」。在現時，這也是幼稚的想法。現時英美的統治者還是帝國主義者，他們會給人民國家以援助嗎？我們同這些國家做生意，以及假設這些國家在將來願意在互利的條件之下借錢給我們，並不是因為什麼呢？這是因為這些國家的資本家要賺錢，銀行家要賺利息，藉以解救他們自己的危機，並不是什麼對中國人民的援助。這些國家的共產黨和進步黨派，正在促成和我們做生意以至建立外交關係。這就是援助，這和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的行為，不能相提並論。孫中山的一生中，曾經無數次地向資本主義國家呼籲過援助，結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了無情的打擊。在那英諷語囑咐人們的，不是叫人們把眼光向帝國主義國家的援助，而是叫人們「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孫先生有了經驗了，他吃過虧上過當。我們要記得他的話，不要再上當。我們在國際是屬於以蘇聯為首的反帝國主義戰線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誼的援助只能向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國主義戰線一方面去找。

「你們獨裁」。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講對了，我們正是這樣。中國人民在幾十年中積累起來的一切經驗，都叫我們實行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總之是一樣，就是對等反動派的發言權，只歸人民有發言權。

人民是什麼？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些階級在工人階級及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團結起來，組成自己的國家，選舉自己的政府，向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兇們實行專政，實行獨裁，壓迫這些人，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如要亂說亂動，立即取締，予以制裁。對於人民內部，則實行民主制度，給予言論集會結社等項的自由權，選舉權，只給人民，不給反動派。這兩方面，即是說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這兩方面，為什麼理由要這樣做，大家已清楚。不這樣，革命就要失敗，人民就要遭殃，國家就要滅亡。

「你們不是要消滅國家權力嗎？」我們要，但是我們現在還不要，我們現在還不能要。為什麼？帝國主義還存在，國內反動派還存在，國內階級還存在。我們現在的任務是要強化人民的國家機器，這主要是指人民的軍隊，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藉以保護國防和保護人民利益，以此作為條件，使中國有可能在工人階級及共產黨的領導之下穩步地由農業國進到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進到社會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消滅階級和實現大同。軍隊警察法庭等項國家機器，是階級壓迫階級的工具，對於敵對的階級，它是壓迫的工具，它是暴力，並不是什麼「仁慈」的東西。「你們不仁」，正是這樣，我們對於反動派和反動階級的反動行為，決不施仁政。我們僅僅施仁政於人民內部，而不施於人民外部的反動派和反動階級的反動行為。

人民的國家是保護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國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國範圍內和全體規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脫離內外反動派的影響（這個影響現在還是很大的，並將在長時期內存在著，不能很快地消滅），改造自己從舊社會得來的壞習慣和壞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動派指引的錯誤路上去，並穩步前進，向着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發展，完成消滅階級和進入大同的歷史任務。

· 我們在這方面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威服的方法，而不是強迫的方法。人民犯了法，也要處罰，也要坐班房，也有死刑。但這是個別的情形，和對於反動階級當作一個階級的專政來說，有原則的區別。

對於反動階級和反動派的人們，在他們的政權被推翻以後，只要他們不造反，不破壞，不搗亂，也給工作，讓他們活下去，讓他們在勞動中改造自己，成為新人。他們如果不願勞動，人民的國家就要強迫他們勞動。也對他們做政治工作，做宣傳教育工作，並且做的很用心，很充分，像我們對俘虜軍官們已經做過的那樣。這也是施仁政，但我們決不寬恕他們的反動行為，決不讓他們的反動行為有自由發教的 가능성。

這種對於反動階級的改造工作，只有人民民主專政才能做到。這件工作做好了，中國的主要的剝削階級——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在現階段就可以向他們中間的許多人進行許多適當的教育工作。等到實行社會主義，即實行私人企業國有化的時候，再進一步對他們進行教育，和改造的工作。人民手裏有強大的國家機器，不怕民族資產階級造反。

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農民的經濟是分散的，根據蘇聯的經驗，需要很長的時間和細心的工作才能做到農業的社會化。沒有農業的社會化，就沒有全部的業農的社會主義。而欲農業社會化，必須發展以國有企業為主體的強大的工業。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必須有步驟地解決這個問題。本文不打算多談經濟問題，這裏暫不詳說。

一九二四年，孫中山親自指導的共產黨人參加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一個著名的宣言。這個宣言上說：「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蓋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公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除了黨領導這一問題以外，當作政治領導一點來說，這裏所說的民權主義，是和我们現在所實行的人民民主專政相符合的。蔣介石背叛孫中山，拿了官僚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的專政作為壓迫中國平民的工具。這個反革命專政，實施了二十二年，到現在才為我們領導的中國平民所推翻。

罵我們實行「獨裁」或「極權主義」的外國反動派，就是實行獨裁或極權主義的人們。他們實行

了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及其他人民的一個階級的獨裁制度，一個階級的極權主義。孫中山所說壓迫平民的近世各國的資產階級，正是指的這些人。蔣介石的反革命獨裁，就是從這些反動傢伙學來的。

宋弱的哲學家宋慈，寫了許多書，說了許多話。大家都忘記了，但有一句話還沒有忘記：「即以

其人之遺，還治其人之身。」我們就是這樣做的，即以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反動派之遺，還治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反動派之身。如此而已，豈有他哉！

革命的專政和反革命的專政，性質是相反的，而前者是從後者學來的。這個學習很要緊，革命的專政，內外反動派就會這一項對待反革命的統治方法，他們就不能維持政權，他們的政權就會被內外反動派所推翻，內外反動派就會在中國復辟，革命的人民就會獲救。

人民民主專政的基礎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聯盟，而主要是工人和農民的聯盟，因為這兩個階級佔了中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測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反動派，主要是這兩個階級的力量。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主要依靠這兩個階級的聯盟。

人民民主專政需要工人階級的領導。因為只有工人階級最有遠見，大公無私，最富於革命的徹底性。整個革命歷史證明，沒有工人階級的領導，革命就要失敗，有了工人階級的領導，革命就勝利了。在帝國主義時代，任何國家的任何別的階級，都不能領導任何真正的革命達到勝利。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曾經多次領導過革命，都失敗了，就是明證。

民族資產階級在現階段上，有其很大的重要性。我們還有帝國主義在旁邊，這個敵人是很兇惡的。中國在經濟上要實現真正的獨立，完全不倚賴帝國主義國家，還需要經過很長的時間。只有中國的工業發展了，中國在經濟上不倚賴外國了，才有真正的獨立。中國的現代工業在每個國民經濟的比重上是很小的。現在還沒有可靠的數目字，根據某些材料來估計，現代工業不過只佔全國國民經濟總生產的百分之十左右。為了對付帝國主義的壓迫，為了使落後的經濟地位提高一步，中國必須利用一切於國計民生有利而無害的城鄉資本主義因素，團結民族資產階級，共同奮鬥。我們現在的方向是限制資本主義，而不是消滅資本主義。但是民族資產階級不能充當革命的領導者，也不能在國家政權中佔主要的地位。民族資產階級之所以不能充當革命的領導者，所以不應當在國家政權機關中佔主

要地位，是因為民族資產階級的社會經濟地位規定了他們的軟弱性，他們缺乏遠見，缺乏足夠的勇氣，並且有不少的人害怕民族。

孫中山主張「喚起民眾」或「扶助農工」。誰去「喚起」和「扶助」呢？孫中山的意思是說小資產階級及民族資產階級。但這在實質上是辦不到的。孫中山的四十年革命是失敗了，這是什麼原因呢？在帝國主義時代，資產階級不可能領導任何真正的革命到勝利，原因就在於此。

我們的二十八年，就大不相同。我們有許多寶貴的經驗。一個有紀律的有馬、恩、列、斯的理論武裝的採取自我批評方法的聯系人民羣衆的黨。一個由這樣的黨領導的軍隊。一個由這樣的黨領導的各革命階級各革命派別的統一戰線。這三件是主要的經驗。這些都是我們區別於前人的。依靠這三件，使我們取得了基本的勝利。我們走過了曲折的道路。這些都是我們區別於前人的。依靠這三件，左的。凡在這三件事上犯了嚴重的錯誤的時候，革命就受挫折。錯誤和挫折教訓了我們，使我們比較地聰明起來了，我們的事情就辦得好一些。任何政黨，任何個人，錯誤總是難免的，我們要求犯的少一點。犯了錯誤則要求改正，越迅速越徹底，越好。

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就是我們的公式，這就是我們的主要經驗，這就是我們的主要綱領。

黨的二十八年是一個長時期，我們僅僅做了一件大事，這就是取得了基本的勝利。這是值得慶祝的，因為這是人民的勝利，因為這是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的勝利。但是我們的事情還很多，譬如走路，過去的工作只不過像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殘餘的敵人尚待我們掃蕩。嚴重的經濟建設任務擺在我們面前。我們熟習的東西有些快要關起來了，我們不熟習的東西正在強迫我們去做。這就是困難。帝國主義者算定我們辦不好經濟。他們站在一旁看，等待我們的失敗。

我們必須克服困難，我們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我們必須向一切內行的人們（不管什麼人）學經濟工作。拜他們做老師，恭恭敬敬地學，老老實實地學。不識就是不識，不要裝腔。不要擺官樣架子。鑽進去，一年兩年，三年五年，總可以學會的。蘇聯共產黨人開頭也不大會辦經濟，帝國主義者也等待過他們的失敗。但是蘇共是勝利了，在列寧和斯大林領導之下，他們不但會革命，也會建

設。他們已經建設起來了一個偉大的光輝燦爛的社會主義國家。聯共是我們最好的先生，我們必須向聯共學習。我們完全可以依靠人民軍政這個武器，團結全國除了反動派以外的一切人，穩步地走到目的地。

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

毛澤東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中央會議上的報告——

中國人民的革命戰爭，現在已經達到了一個轉折點。這即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經打退了美國走狗蔣介石的數百萬反動軍隊的進攻，並使自己轉入了進攻。這在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七年六月戰爭第一個年頭內，人民解放軍即已在幾個戰場上打退了蔣介石的進攻，迫使蔣介石轉入防禦地位。而從戰爭第二年的第一季，即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九月間，人民解放軍即已轉入了全國規模的進攻，破壞了蔣介石將戰爭繼續引向解放區整個解放區底破壞解放區的反革命計劃。現在，戰爭主要地已經不是在解放區裏進行，而是在國民黨統治區裏進行了，人民解放軍的主力已經打到國民黨統治區域裏去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經在中國這一塊土地上扭轉了美國帝國主義及蔣介石匪幫的反革命車輪，使之走向覆滅的道路，推進了自己的革命車輪，使之走向勝利和解放的道路。這是一個偉大的轉折點。這是一百多年以來帝國主義在中國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這是一個偉大的事變。這個事變所以帶着偉大性，是因為這個事變發生在一個具有四萬萬五千萬人口的國家內，這個事變一經發生，它就將必然地走向全國的勝利。這個事變所以帶着偉大性，還因為這個事變發生在世界的東方，在這裏，共有十萬萬以上人口（佔人類的一半）遭受帝國主義的壓迫，中國人民的解放戰爭由防禦轉到進攻，不能不引起這些被壓迫民族的歡欣鼓舞。同時對於正在鬥爭的歐洲與美洲各國的被壓迫人民也是一種援助。

從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戰爭的一天起，我們就說，我們不但必須打敗蔣介石，而且能夠打敗他。我

們必須打敗蔣介石，是因為蔣介石發動的戰爭，是一個在美帝國主義指撥之下的反對中國民族獨立與中國人民解放的反革命的戰爭。中國人民的任務，是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帝國主義被打倒以後，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完成新民主主義的改革，實現民族的統一與獨立，由農業國變成工業國。然而恰在這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地結束以後，美國帝國主義及其在各國的走狗代替德國與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地位，組成反動陣營，反對蘇聯，反對歐洲各新民主國家，反對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運動，反對各種殖民地半殖民的民族運動，反對中國人民的解放。在這種時候，以蔣介石為首的中國反動派，和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汪精衛一模一樣，充當美國帝國主義的走狗，將中國出賣給美國，發動戰爭，反對中國人民，阻止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前進。在這種時候，如果我們表示軟弱，表示退讓，不敢堅決地起來用革命戰爭反對反革命戰爭，中國就將變成黑暗世界，我們民族的前途就將被斷送。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解放軍堅決地進行了愛國的正義的革命的戰爭，反對蔣介石的進攻。中國共產黨依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清醒地估計了國際與國內的形勢，知道一切內外反動派的進攻不但是必須打敗的，而且是能夠打敗的。當赤天空中似乎是黑暗的時候，我們就指出，這不過是暫時的現象，暴風雨即將過去，曙光即在頭前。當第一九四六年七月，蔣介石匪幫發動全國規模的反革命戰爭的時候，蔣介石匪幫認為，只須三個月至六個月，就可以打敗人民解放軍。他們認為他們有正規軍二百萬，非正規軍一百餘萬，後方軍事機關及部隊一百餘萬，共有軍事力量四百餘萬人；他們已經利用時間完成了進攻的準備；他們重新控制了大城市；他們擁有三萬萬以上的人口；他們擊敗了日本侵華軍隊一百萬人的全部裝備；他們取得了美國政府在軍事上與財政上的絕大援助。他們又認為，中國華軍在八年抗日戰爭中已經打得很疲憊，而且在數量上與裝備上遠不及國民黨軍隊；中國解放區還只有一萬萬多一點的人口，其中大部分地區的反抗封建勢力還沒有被肅清，土地改革還不曾過與不徹底，人民解放軍的後方還不是鞏固的。在這些基礎上，蔣介石匪幫不顧中國人民的和平願望，最後地撕毀在一九四六年一月間簽訂的國共兩黨的停戰協定及各簽字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發動了冒險的戰爭。那時我們說，我們敵人軍事力量的優勢，這只是暫時的現象，這只是臨時起作用的因素；美國帝國主義的援助，也只是臨時起作用的因素；而蔣介石戰爭的反人民的性質，人心的

向背，則是經常起作用的因素；而在這方面，人民解放軍則佔優劣。人民解放軍的戰爭所具有的愛國的正義的革命性質，必然要獲得全國人民的擁護。這就是戰勝蔣介石的政治基礎。十八個月戰爭的經驗，充分地證明了我們的論斷。

三

十七個月（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七年十一月爲止，十二月尚未計入）作戰，共殲滅了蔣介石正規軍及非正規軍一百六十九萬人，其中被打死打傷的六十四萬人，被俘擄的一百零五萬人。這樣，就使我軍打退了蔣介石的進攻，保存了解放區的基本區域，並使自己轉入了進攻。我們所以能夠如此，在軍事方面來說，是因為實行了正確的戰略方針。我們的軍事原則是：（一）先打分散孤立之敵，後打集中強大之敵。（二）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及廣大鄉村，後取大城市。（三）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爲主要目標，不以保守或奪取城市及地方爲主要目標。保守或奪取城市及地方，是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的結果，往往需要反覆多次才能最後地保守或奪取之。（四）每戰集中絕對優勢兵力（兩倍、三倍、四倍、有時甚至五倍或六倍於敵之兵力），四面包圍敵人，力求全殲，不使漏網。在特殊情況下，則採用捨敵以殲滅性打擊之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敵正面及其一翼、或全翼，求達殲滅其一部，殲滅其另一部之目的，以使我軍能夠迅速轉移兵力殲擊他部敵軍。力求避免打那種得不償失的、或得失相當的消耗戰。這樣，在全體上，我們是劣勢（就數量來說），但在每一個局部上，在每一個具體戰役上，我們是絕對的優勢，保證了戰役的勝利。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就將在全體上轉變爲優勢，直到殲滅一切敵人。（五）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每戰都應力求有準備，力求在敵我條件對比下有勝利之把握。（六）發動勇敢戰鬥，不怕犧牲。不怕疲勞與連續作戰（即短期內不休息的接戰打幾仗）的作風。（七）力求在運動中殲滅敵人。同時，注重陣地攻擊戰術，奪取敵人的據點及城市。（八）在攻城問題上，一切敵人守備薄弱的據點及城市則堅決奪取之。一切敵人有中等程度之守備而又爲環境所許可之據點及城市，則相機奪取之。一切敵人守備強固之據點及城市，則等候條件成熟時然後奪取之。（九）以俘擄敵人的全部武器及大批人員，補充自己。我軍人力物力的來源，主要在

前線。(十) 善於利用兩個戰役之間的間隙休息與整頓部隊。休整的時間一般的不要過長，儘可能不使敵人獲得喘息時間。以上這些，就是人民解放軍打敗蔣介石的主導的方法。這些方法，是人民解放軍在華軍事人員，熟知我們的這些軍事方法，蔣介石曾經多次召集他的將校受訓，將我們的軍事書籍及從戰爭中獲得的文件發給他們研究，企圖尋找對付的方法。美國軍事人員則向蔣介石建議這樣那樣的消滅人民解放軍的戰略戰術；並替蔣介石直接訓練軍隊，接濟軍事裝備。但是所有這些努力，都不能挽救蔣介石的經常的失敗。這是因為我們的戰略戰術是建立在人民戰爭這個基礎上的，任何反人民的軍隊都不能利用我們的戰略戰術。在人民戰爭的基礎上，在軍隊與人民團結一致，當黨員與戰鬥員團結一致下及瓦解敵軍等項目標的基礎上，建立起人民解放軍的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這是戰勝敵人的重大因素。當著我們避開優勢敵人的致命打擊，並轉移力求得在運動中環繞敵人，而去動地放棄許多城市的時候，我們的敵人是與高形了。他們認為這就是他們的勝利和我們的失敗。他們被一時的所謂勝利沖昏了頭腦。張家口被佔領的第二天，蔣介石即下令召集他的反動的國民黨大會，似乎他的反動統治從此可以安如泰山了。美國帝國主義分子也手舞足蹈，似乎他們將中國變為美國殖民地危在旦夕計，從此可以毫無阻礙地實現了。但是，隨着時間的推移，蔣介石及其美國主子的空調也發生了變化。現在是一切內外敵人都被他們的悲觀情緒所統治的時候。他們吱吱嘎嘎，大叫危機，一點政策的影子也看不見了。十八個月中，蔣介石的前線高級指揮官，大部分因為戰敗被撤換。這裏有鄭洞國的劉峙，徐州的薛岳，蘇北的吳奇偉，魯南的湯恩伯，豫北的王仲廉，濟陽的杜聿明、龍式輝，北平的前線指揮官。吳指授全部作戰責任的蔣介石的參謀總長陳誠，亦被取消此種指揮權，降為東北一個戰場的指揮官。而在蔣介石自己代替陳誠擔任全局指揮的期間，却發生了蔣軍由進攻轉入防禦，人民解放軍由防禦轉入進攻這樣一個局勢。蔣介石反動集團及其美國主子，現在應當感覺到他們自己的錯誤了。他們將日本投降以後一個長時間內，中國共產黨代表中國人民的願望，力爭和平反對內戰的一切努力，看作是阻撓與力氣薄弱表現。他們過高估計了自己力量，過低估計了革命力量，盲目地發動戰爭，反而落在他們自己佈置的陷阱裏。我們敵人的戰略打算是徹底地輸了。

現在，比較十八個月以前，人民解放軍的後方也鞏固得多了。這是由於我黨堅決地站在農民方面實行改革土地的结果。在抗日戰爭時期，爲着和國民黨建立抗日統一戰綫及團結當時尚能反對日本的人們起見，我黨主動地由抗日以前的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農民的政策，改變爲減租減息的政策，這是完全必需的。日本投降以後，農民迫切要求土地，我們就及時地作出決定，改變土地政策，由減租減息改爲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分配給農民。我黨中央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發出的指示，就是表現這種改變。一九四七年九月，我黨召集了全國土地會議，製定了中國土地法大綱，並立即在各地普遍實行。這個步驟，不但肯定了去年五四指示的方針，而且對於去年五四指示中的某些不徹底性（地主得到較農民爲多的土地財產，富農的土地財產原則上不動）作了明確的改正。中國土地法大綱規定，在消滅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的原則下，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這是消滅封建制度的最徹底的方法，這是完全適合於中國廣大農民羣衆的要求的。爲着堅決地消滅地進行土地改革，鄉村中不但必須組織包括貧農農工中農在內的最廣泛羣衆性的農會及其選出的委員會，而且必須首先組織包括貧農農工農羣衆的貧農團及其選出的委員會，以爲執行土地改革的合法機關，而貧農團則應當成爲一切農村鬥爭的領導骨幹。我們的方針是依靠貧農，鞏固地聯合中農，消滅地主階級及舊式富農的封建的及半封建的剝削制度。地主富農應得的土地及財產，不能超過農民羣衆。但是，曾經在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四年期間實行過的所謂「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過左的錯誤的政策，也不應重複。地主富農在鄉村人口中所佔的比例，雖然各地有多有少，但按一般情況來說，大約只佔百分之八左右（以戶爲單位計算），而他們佔有的土地，按照一般情況，則達全部土地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因此，我們土地改革所反對的對象，人數甚少，而鄉村且能夠參加與應當參加土地改革統一戰綫的人數（戶數），則有大約百分之九十以上這樣多，這裏必須注意兩條基本原則。第一，必須滿足貧農與雇農的要求，這是土地改革的最基本的任務。第二，必須堅決團結中農，不要損害中農的利益。只要我們掌握了這兩條基本原則，我們的土地改革任務就一定能夠勝利地完成。舊式富農按照

平分原則所多餘的土地及其一部分財產之所以應當拿出來分配，是因為中國的富農一般地帶着很重的封建與半封建剝削的性質，富農大部領收地租及放高利貸，其雇傭勞動的條件亦是半封建的。這因為他們所佔的土地數就很大質量很好，如不平均則不能滿足貧雇農的要求。但是按照土地法大綱的規定，對待富農與對待地主一般地應當有所區別。土地改革中，中農表現贊成平分，這是因為平分並不損害中農。在平時，中農中一部分土地不種，一部分增加了土地，只有一部分富裕中農有少數多餘的土地，他們也願意拿出來平分，這是因為在平分後土地稅的負擔他們也減輕了。雖然如此，各地在平分土地時，仍須注意中農的意見，如果中農不同意，則應向中農讓步。在沒收分配封建階級的土地財產時，應當注意某些中農的需要。在劃分階級成份時，必須注意不要把本來是中農成份的人，錯誤地將他們劃到富農圈子裏去，在農會委員會中，在政府中，必須吸收中農積極分子參加工作。在土地稅及支援戰爭的負擔上，採取公平合理的原則。這些，就是我在執行鞏固地聯合中農這一戰略任務時所必須採取的具體政策。全黨必須明白，土地制度的徹底改革，是現階段中國革命的基本任務，如果我們能夠普遍地徹底地解決土地問題，我們就獲得了足以戰勝一切敵人的最基本條件。

五

爲了擊決地徹底實行土地改革，鞏固人民解放軍的後方，必須整頓黨的隊伍。抗日戰爭時期我黨內部的整風運動，是一般地收到了成效的。這種成效，主要地是在於使我們的領導機關及許多幹部進一步地掌握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之統一這樣一個基本的方向，在這點上我們黨是比抗日以前的幾個歷史時期，大進一步了。但是，在黨的地方組織方面，特別是在黨的農村基層組織方面，所存在的成份不純與作風不純的問題，則沒有獲得解決。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七年，十一年時間內，我們黨的組織，由幾萬黨員，發展到了二百七十萬黨員，這是一個極大的躍進。這使我們的黨成了一個空前強大的黨。這使我們有可能打敗日本帝國主義，並打退了蔣介石的進攻，領導了一萬萬以上人口的解放區與二億萬人民解放軍。但是缺點也就跟着來了。這即是有許多地主分子、富農分子及流氓分子乘機混進了我們的黨。他們在農村中把持許多黨的政府的與民衆團體的組織，

作威作福，欺壓人民，至曲寔的政策，使這些組織脫離羣衆，使土地改革不能徹底。好容易組織起來，就在我們面前提出了鬆弛腐敗的隊伍的任務。這個任務如果不解決，我們在農村中就不能前進。全國土地會議徹底地討論了這個問題，並規定了適當的步驟與方法。這些步驟與方法，我並再和全分土地一道在各地堅決實施。其中首先重要的，是在黨內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徹底揭發黨內腐敗的階級關係的錯誤的錯誤思想與嚴重現象。全黨同志必須明白解決這個黨內不純的問題，整頓黨的隊伍，使黨能夠和羣衆大的勞動羣衆完全站在一個方向，並領導他們前進，是解決土地問題與發展生產的一個決定性的環節。

六

沒收封建階級的土地歸農民所有；沒收蔣介石、宋子文、孔祥麟、陳立夫爲首的壟斷資本階級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所有；保護民族工商業；這就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三大經濟綱領。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在他們當權的二十年中，已經集中了價值達一百萬萬至二百萬萬美元的壟斷資本，壟斷全國的經濟命脈。這個壟斷資本，與國家政權結合在一起，成爲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這個壟斷資本主義，與外國帝國主義、與本國地主階級及舊式富農，密切的結合着，成爲買辦的封建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這就是蔣介石反動政權的經濟基礎。這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不但壓迫工人農民，而且壓迫小資產階級，損害中等資產階級。這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在抗日戰爭期間及日本投降以後，達到了最惡劣，它替新民主主義革命準備了充分的物質條件。這個資本，在中國通俗名稱，叫做官僚資本。這個資產階級，叫做官僚資產階級，即是中國的大資產階級。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對象，除了取消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特權以外，在國內，就是要消滅地主階級與官僚資產階級（大資產階級）的剝削與壓迫，改變買辦的封建的生產關係，解放一切被束縛的生產力。按這些階級及其國家政權所壓迫與損害的小資產階級及中等資產階級，雖然也是資產階級，却是可以參加新民主主義革命，或者保守中立的。他們和帝國主義沒有聯系，或者聯系較少，他們是真正的民族資產階級。在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權力到達的地方，對於這些階級，必須堅決地毫不猶豫的給以保護。蔣介石統治區域的上層小資產階級及中等資產



階級，其中有為數不多的一部分人，即這些階級的右翼分子，存在着反動的政治傾向，他們替美國帝國主義與蔣介石反動集團散佈幻想，他們反對人民民主革命。當着他們的反動傾向能影響羣衆時，我們應當向着接受他們影響的羣衆進行揭露工作，打擊他們在羣衆中的政治影響，使羣衆從他們的影響之下解放出來。但是，政治上的打擊與經濟上的消滅是兩件事，如果說這兩件事，我們就要犯錯誤。新民主主義革命主要消滅的對象，只是封建主義與壟斷資本主義，只是地主階級與官僚資產階級（大資產階級），而不是一般的消滅資本主義，不是消滅小資產階級與中等資產階級。由於中國經濟的落後性，廣大的小資產階級與中等資產階級所代表的資本主義經濟，即使革命在全國勝利以後，在一個長時期內，還是必須允許他們存在；並且按照國民經濟的分工，還需要他們中一切有益於國民經濟的部分有一個發展；他們在整個國民經濟中，還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這裏所說的小資產階級，是指僱傭工人或店員的小規模的工商業資本家。此外還有不僱傭工人或店員的廣大的獨立的小工商業者，對於這些小工商業者，不待說是應當堅決保護的。革命在全國勝利以後，由於新民主主義國家手裏有着官僚資產階級接收過來的控制全國經濟命脈的巨大的國家資本，又有從封建制度解放出來、雖則在一個長時期內在基本上仍然是分散的個體的，但是在將來可以逐步地引向合作社方向發展的農業經濟，在這些條件下，這種小的及中等的資本主義成份，其存在及發展，並沒有什麼危險。對於土地革命後農村中必然發生的新的富農經濟，也是如此。對於小資產階級及中等資產階級經濟成份採取適宜的鞏固的政策，如像我們曾在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四年期間所犯過的那樣；過高的勞動條件、過高的所得稅率，在土地改革中侵犯工商業者，不以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為目標，而以近視的片面的所謂「勞動者福利為目標」，是絕對不許重複的。這種錯誤如果重犯，必然要損害勞動羣衆的利益及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利益。中國土地法大綱上有一條規定：「保護工商業者的財產及其合法的營業，不受侵犯」。這裏所說的工商業者，就是指的一切獨立的小工商業者及一切小的與中等的資本主義成份。總起來說，新中國的經濟構成是：（一）國家經濟，這是領導的成份；（二）由個體逐步地向壟斷體方向發展的農業經濟；（三）獨立小工商業者的經濟及小的與中等的私人資本經濟；這些，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全部國民經濟。而新民主主義國民經濟的指導方針，必須緊緊的追隨着

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尊重兩利這個總目標。一切離開這個總目標的方針、政策、辦法，都是錯誤的。

七

一九四七年十月，人民解放軍發表宣言，其中說：「聯合工農兵學商各被壓迫階級，各人民團體，各民主黨派，各少數民族，各地華僑及其他愛國分子，組成民族統一戰線，打倒蔣介石獨裁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這就是人民解放軍的、也是中國共產黨的作戰的政治綱領。從表面上看來，現在時期，比較抗日時期，我們的革命的民族統一戰線，似乎是縮小了。但在實際上，只是在現在時期，只是在蔣介石出賣民族利益給美國帝國主義，發出反人民的全國規模的國內戰爭之後，只是在美國帝國主義及蔣介石反動統治集團的罪惡已經在中國人民面前暴露無遺之後，我們的民族統一戰線才是真正的擴大了。在抗日時期，蔣介石及國民黨在中國人民中間還沒有完全喪失威信，他們還有許多救國作用。現在不同了，他們的一切伎倆都已被他們自己的行為所揭穿，他們已經沒有什麼羣衆，他們已經完全孤立了。和國民黨相反，中國共產黨不但在解放區得到最廣大人民羣衆的信任；在國民黨統治區，在國民黨控制的大城市也得到了廣大人民羣衆的擁護。如果說，在一九四六年，在蔣介石統治下的上層小資產階級及中等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中，還有一部分人懷着所謂「第三條道路」的想法，那麼，在現在，這種想法已經破產了。由於我黨採取了澈底的土地政策，使我黨獲得了比較抗日時期廣大的多的農民羣衆的衷心擁護。由於美國帝國主義的侵略，蔣介石的壓迫及我黨堅決保護羣衆利益的正確方針，我黨獲得了蔣介石統治區域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及中等資產階級廣大羣衆的同情。這些羣衆，因為換敵，因為政治上受壓迫，因為蔣介石的反人民的內戰奪取了人民的一切出路，他們就不斷的掀起了反對美國帝國主義與蔣介石反動政府的鬥爭，他們的根本口號是反饑餓，反壓迫，反內戰及反對美國干涉中國內政。而在抗日以前，在抗日時期，乃至日本投降後一個時期，都沒有達到這樣的高度。因此我們說，我們的新民主主義的革命的統一戰線，現在比過去任何時期都要廣大，也比過去任何時期都要鞏固。這件事，不但與我們的土地政策及城市政策相連系，而且與人民解放

軍的勝利，吳蔣介石由進攻轉入防禦，人民解放軍由防禦轉入進攻，中國革命已經進入新的高潮時期這一總的政治形勢，密切地連系着。現在人們看到了蔣介石統治的滅亡已經不可避免，因而將希望寄託在中國共產黨與人民解放軍身上，這是很自然的道理。中國新民主主義的革命要勝利，沒有一個包括全民族絕大多數人口的最廣泛的統一戰線，是不可能的。不但如此，這個統一戰線還必須是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的領導之下。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堅強的領導，任何革命統一戰線也是不能勝利的。在一九二七年北伐戰爭達到高潮的時期，我黨領導益顯的投降主義分子，自願放棄對於農民羣衆、小資產階級及中等資產階級的領導權，尤其是放棄對於武裝力量的領導權，使那次革命遭到了失敗。抗日戰爭時期，我黨反對了和這種投降主義思想相類似的思想，即是對於國民黨的反人民政策讓步，信任國民黨超過信任羣衆，不敢放手發動羣衆鬥爭，不敢在日本佔領地區擴大解放區與擴大人民的軍隊，將抗日戰爭的領導權送給國民黨。我黨對於這樣一種軟弱無能的腐朽的違背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的思想，進行了堅決的鬥爭，堅決地執行了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政治路線，堅決地擴大了解放區與人民解放軍。這樣，就不但保證了我黨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時期能夠戰勝日本帝國主義，而且保證了我黨在日本投降以後蔣介石舉行反革命戰爭的時候，能夠順利地不受損失地轉變到用人民革命戰爭反對蔣介石反革命戰爭的軌道上，並在短時期內取得了偉大的勝利。這些歷史教訓，全黨同志都要牢記。

八

蔣介石反動集團在一九四六年發動全國規模的反人民的國內戰爭的時候，他們之所以敢於冒險，不但依靠他們自己的優勢的軍事力量，而且主要地依靠他們認爲是異常強大的、舉世無敵的、手裏拿着原子彈的美國帝國主義，一方面，能夠像流水一樣地供給他們以軍事上與財政上的需要，另一方面，狂妄地設想所謂「美蘇必戰」、所謂「第三次世界大戰必然爆發」。這種對於美國帝國主義的依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全世界各國反動勢力的共同特點。這種對於美國帝國主義的依賴，世界資本主義的打擊的嚴重性，各國反動派力量的薄弱及其心理的恐慌與喪失信心，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命力量的強大，使得各國反動派除了依靠美國帝國主義的援助就感到毫無出路。但是，在實際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美國帝國主義，是否其如蔣介石及各國反動派所設想的那麼強大呢？是否真能像洪水一樣的從美國經濟蔣介石及各國反動派呢？並不如此。美國帝國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所增強起來的經濟力量，遇着了不穩定的日趨縮小的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這種市場的進一步縮小，就要引起經濟危機的爆發。美國的戰爭景氣，僅僅是一時的現象。它的強大，只是表面的與暫時的。危機就像一座火山，每天都在威脅美國帝國主義，美國帝國主義就是坐在這座火山口上。這種情況，迫使美國帝國主義分子建立了奴役世界的計劃，像野獸一樣，向歐、亞兩洲及其他地方亂竄，集合各國的反動勢力，那些被人民唾棄的渣滓，組成帝國主義及反民主的陣營，反對以蘇聯為首的一切民主勢力，準備戰爭，企圖在將來，在遙遠的時間內，有一天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打敗民主力量。這是一個狂妄的計劃。全世界民主勢力必須打破這個計劃，也完全能夠打破它。全世界反帝國主義陣營的力量，業已形成。沒有危機的、向上發展的、受到全世界廣大人民羣衆愛護的社會主義的蘇聯，它的力量，超過了帝國主義陣營的力量。優勢是在我們方面，不專在敵人方面。以蘇聯為首的反帝國主義陣營，現在業已超過了被危機嚴重威脅着的、向下衰落的、受到全世界廣大人民羣衆反對的帝國主義陣營。歐洲各新民主國家，正在發展。美國內部，並互相團結起來。以法登為首的歐洲各資本主義國家人民的反帝國主義力量，正在發展。美國內部，存在着日益強大的人民民主勢力。拉丁美洲的人民，並不是順從美國帝國主義的奴隸。整個亞洲，興起了偉大的民族解放運動。反帝國主義陣營的一切力量，正在團結起來，並正在向前發展。歐洲九個國家的共產黨，業已組成了情報局，發表了號召全世界人民起來反對帝國主義奴役計劃的檄文。這篇檄文，振奮了全世界被壓迫人民的精神，指示了他們的鬥爭方向，鞏固了他們的勝利信心。全世界反動派，在這篇檄文面前驚慌失措。東方各國一切反帝國主義的力量，也應當團結起來，反對帝國主義及各國內部反動派的壓迫，以東方十萬萬以上被壓迫人民獲得解放為奮鬥的目標。我們自己的命運完全應當由我們自己來掌握。我們應當在 ourselves 內部樹起一切敵弱無能的思想。一切過高估計敵人力量的觀點，都是錯誤的。我們和全世界民主力量一道，只要大家努力，一定能夠打破帝國主義的奴役計劃，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戰，使之不能發

生，推翻一切反動派的壓迫，奪取人類永久和平的勝利。我們清醒地知道，在我們的前進道路上，還會有種種障礙、種種困難，我們應當準備對付一切內外敵人的最大限度的抵抗與掙扎。但是，只要我們能夠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信任羣衆，緊密地和羣衆一道，並領導他們前進，我們是完全可以超越任何障礙與克服任何困難的，我們的力量是無敵的。現在，在全世界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走向滅亡，全世界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走向勝利的歷史時代，曙光就在前面，我們應當努力。

在晉綏幹部會議上的講話

毛澤東

(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

同志們！今天我想講的，主要的是一些和晉綏工作有關的問題，然後講到一些和全國工作有關的問題。

(一)我認爲過去一年內，在晉綏分局領導區域內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黨工作是成功的。

這是從兩方面來看的。一方面，晉綏黨反對了右的偏向，發動了羣衆鬥爭，在全區三百多萬人口的二百幾十萬人口中，完成了或者正在完成着土地改革工作和整黨工作。另一方面，晉綏黨又糾正了在運動中發生的殘酷的偏向，因而使全部工作走上了健全發展的軌道。從這兩方面來看，晉綏解放區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黨工作，我認爲是成功的。

「從此以後，再也不敢封建了，再也不敢厲害了，再也不敢貪污了」。這是晉綏人民的話。這是晉綏人民對於我們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黨工作所做的結論。他們說：「再也不敢封建了」，就是說，我們領導他們發動了鬥爭，消滅了或者正在消滅着新區的封建剝削制度和老區半老區的封建剝削制度的殘餘。他們說：「再也不敢厲害了，再也不敢貪污了」，就是說，在我們的黨和政府的組織內，過去存在着某種程度上的成份不純或者作風不純的嚴重現象，許多壞份子混入了黨和政府的組織內，許多人發展了官僚主義作風，仗勢欺人，用強迫命令的方法去完成工作任務，因而引起羣衆不滿；或者犯了貪污罪；或者侵佔了羣衆的利益。這些情況，經過過去一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黨工作，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

或者說：「過去對於我們是致命的東西，現在去掉了；過去沒有的東西，現在有了」。這是在座同志們中有一位同志對我說的。他所說的致命的東西，就是指的存在於黨和政府組織內的成份不純或

作風不純並因而引起羣衆不滿的嚴重現象。這種現象，現在是根本上去掉了。他所說的過去沒有實現了的東西，就是指的貧農團、新農會、區村人民代表會議，以及由於土地改革工作和整黨工作所造成的農村中面目一新的氣象。

這些反映，我以為是合乎實際的。

這就是晉綏解放區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黨工作的偉大的成功。這是成功的第一個方面。在這個基礎上，使得晉綏黨能夠在過去一年內完成了鉅大的軍事任務，支援了偉大的人民革命戰爭。假使沒有成功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黨工作，要完成這樣大的軍事任務，那是困難的。

另一方面，晉綏黨糾正了在工作中發生的幾個左的偏向。這主要是三個偏向。第一，在劃分階級成份中，在許多地方把許多並無封建剝削或者只有輕微剝削的勞動人民錯誤地劃到地主富農階級裏去，錯誤地擴大了打擊面，忘記了我們在土地改革工作中可能和必須團結農村中戶數百分之九十二左右，人數百分之九十左右，即全體農村勞動人民，建立反對封建制度的統一戰線這樣一個極端重要的戰略方針。現在，這項偏向已經糾正了。這樣，就大大地安定了人心，鞏固了革命統一戰線。第二，是在土地改革工作中侵犯了屬於地主富農所有的工商業；在清查經濟反革命的鬥爭中，超出了應當清查的範圍；以及在稅收政策中，打擊了工商業。這些，都是屬於對待工商業方面的左的偏向，現在也已糾正，使工商業獲得了恢復和發展的可能。第三，在過去一年的激烈的土地改革鬥爭中，晉綏黨沒有能夠明確地堅持我黨嚴禁亂打亂殺的方針，以致於在某些地方的土地改革中不必要地處死了一些地主富農分子；並給農村中的壞分子以乘機報復的可能，由他們罪惡地殺死了若干勞動人民。我們認為經過人民法庭和民主政府，對於那些積極地並嚴厲地反對人民民主革命和破壞土地改革工作的重要的犯罪分子，即那些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和惡霸分子，判處死刑，是完全必要和正常的，不如此，就不能建立民主秩序。但是，對於一切站在國民黨方面的普通人員，一般的地主富農分子，或犯罪較輕的分子，則必須禁止亂殺。同時，在人民法庭及民主政府進行對於犯罪分子的審訊工作時，必須禁止使用肉刑。過去一年中，晉綏在這方面曾經發生過偏向，現在也已糾正了。

在認真糾正了上述一切偏向之後，使得我們有根據的來說，晉綏中央分局領導下面的全部工作，

現在已經走上了健全發展的道路。

按照實際情況決定工作方針，這是一切共產黨員所必須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方法。我們所犯的錯誤，研究其發生的原因，都是由於我們離開了當時當地的實際情況，主觀地決定自己的工作方針。這一點，應當引為全體同志的教訓。

關於整理黨的基層組織的工作，你們已經根據中央關於在老區半老區進行土地改革工作與整黨工作的指示，採用督察黨解散區平山縣的整黨經驗，即是徵集黨外羣衆參加黨的支部會議，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藉以改變黨的組織的成分不純或者作風不純的現象，使黨和人民羣衆密切地聯系起來。你們這樣做，將使你們有可能地完全完成對於黨的組織的全部整理工作。

對於那些犯了錯誤，但是還可以教育的，和那些不可救藥的分子有區別的黨員和幹部，不論其出身如何，都應當加以教育，而不是拋棄他們。你們已經執行了或者正在執行着這個方針，這也是對的。在反對封建制度的鬥爭中，在貧農團和農會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區村（鄉）兩級人民代表會議，是一項極可寶貴的經驗。只有基於真正廣大羣衆的意志建立起來的人民代表會議，才是真正的人民代表會議。這樣的人民代表會議，現在已經在執行着這個方針，這也是對的。就應當成為當地的最高權力機關，一切權力應當歸於代表會議及其選出的政府委員會。到了那時，貧農團和農會就成為它們的助手。我們曾經打算在各地農村中，在其土地改革任務大致完成以後再去建立人民代表會議。現在你們的經驗以及華北某些解放區的經驗，既已證明就在土地改革鬥爭當中建立區村兩級人民代表會議及其選出的政府委員會，是可能的和必要的，那麼，你們就應當這樣做。在一切解放區，也就應當這樣做。在區村兩級人民代表會議普遍地建立起來的時候，就可以建立縣一級的人民代表會議。有了縣和縣以下的各級的人民代表會議，縣以上的各級人民代表會議就容易建立起來了。在各級人民代表會議中，必須使一切民主階層，包括工人、農民、獨立勞動者、自由職業者、知識分子、自由工商業者及開明紳士，盡可能地都有他們的代表參加進去。當然不是勉強湊數，而是要分別有市鎮的農村和沒有市鎮的農村，分別市鎮的大小，分別城市和農村，自然地而不是勉強地實現這個聯合一切民主階層的任务。

在土地改革和整黨的工作中，教育和生產了成萬的積極分子和工作幹部。他們是羣衆的，他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極可寶貴的財富。今後應當加強對於他們的教育，使他們在工作中不斷地獲得進步。同時，應當向他們提出警告，決不可以因為成功，因為受到獎勵而驕傲自滿。由於這一切，由於上述各方面的成功，應當說，晉綏解放區現在是比過去任何時候更加鞏固了。在其他解放區，凡是這樣做了的，也就同樣地鞏固了。

(二)晉綏解放區獲得上述成功的原因，就領導方面來說，主要的是：(甲)在去年春季劉少奇同志的當面指示和去年春夏康生在臨縣縣黨委行政村的工作的幫助之下，晉綏中央分局在去年六月召開了地委登記會議。在這個會議上，批判了過去工作中存在的右的偏向，徹底地揭發了各種離開黨的路線的嚴重現象，決定了認真地發動土地改革工作和整黨工作的方針。這個會議是基本上成功的。假如沒有這個會議，這樣大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黨工作的成功是不可能的。這個會議的缺點是：沒有按照老區半老區和新區的不同情況決定不同的工作方針；在劃分階級成份的問題上採取了過左的方針；在如何消滅封建制度的問題上太注重了清查地主的財財；以及在對待羣衆要求的問題上缺乏清醒的分析，籠統地提出了一羣衆要怎樣辦就怎樣辦的口號，囑咐以後一個問題，即黨和羣衆的關係的問題，應當是：凡屬人民羣衆的正確的意見，必須依據情況領導羣衆予以實現；而對於人民羣衆中發生的不正確的意見，則必須教育羣衆予以改正。地委會議僅僅強調了黨應當執行羣衆意見的方面，而忽視了黨應當教育羣衆和領導羣衆的方面，以致給了後來某些地區的黨步趨，這個步驟是在分局同志參加中央十二月會議回來以後實行的。分局爲此發出了五項指示。這一糾正偏向的步驟，如何適合羣衆的要求，又如此迅速和貫徹，在短時期內，幾乎一切左的偏向都已經正過來了。

(三)晉綏黨在抗日時期的領導路線，是基本上正確的。這表現在實行了減租減息，相當地恢復和發展了農業生產和家庭紡織業，軍事工業和一部分輕工業，建立了黨的基礎，建立了民主政府，建立了近十萬人的人民軍隊，因而就能依據這些工作作基礎，進行了勝利的抗日戰爭，並打退了閻錫山、傅作義等反動派的進攻。當然，這個時期的黨和政府是有缺點的，這就是現在我們已經完全明白的

它們的在某種程度上的成份不純或者作風不純，以及由此產生的許多工作上的不良現象。但是，就總的情形說來，抗日時期的工作是有成績的。這就給我們在日本投降以後能夠按以打敗蔣介石的反革命進攻的有利條件。抗日時期，晉綏黨的領導方面的缺點或錯誤，主要地是未能依靠最廣大的羣衆克服黨內和政府內在某種程度上的成份不純、或者作風不純，以及由此產生的工作中的不良現象，而將這個任務留給了你們到現在來完成。那時的晉綏黨的某些領導同志，缺乏對於黨和羣衆的許多真實情況的了解，是造成上述現象的原因之一。這一點，也是同志們應當引為教訓的。

(四)今後晉綏黨的任務，是用極大努力，積極完成土地改革工作和整黨工作，繼續發展和支援人民革命戰爭，不再加重農民負擔，並酌量減輕農民負擔，恢復和發展生產。你們現在正在開生產會議。恢復和發展生產是我們一切革命工作的終極目的。在目前數年內，恢復和發展生產的目的是一方面改善人民的生活，同時，支援人民的革命戰爭。你們有廣大的農業和手工業，也有一部分使用機器的手工業和重工業。希望你們好好地領導這些生產事業，否則就不能算作一個好的馬克思主義者。在農業方面，過去被官僚主義分子所把持的、對於人民羣衆有害無益的那些墾工隊和合作社都垮台了，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並且是毫不可惜的。你們的任務，是在於細心地保存和發展那些爲人民羣衆所擁護的墾工隊、合作社和其他必要的經濟組織，並推廣這樣的組織於各地。

(五)全國形勢，是同志們所關心的。自從去年黨的全國土地會議決定採取新方針，展開土地改革工作和整黨工作以後，差不多在一切解放區都召開了有關整黨和土地改革的大的幹部會議，批判了存在於黨內的右傾思想，揭發了黨內在某種程度上存在着的成份不純或者作風不純的嚴重現象。而在以後，在許多地區，又採取步驟，糾正了或者正在糾正着左的偏向。這樣，就使黨在全國的工作，在新的政治形勢和政治任務之下，走上了健全發展的軌道。差不多一切人民解放軍，在最近幾個月內，都利用了戰爭的空隙，實行了大規模的整訓。這種整訓，是完全有領導地和有秩序地採用民主方法進行的。由此，激發了廣大的指揮員和戰鬥員羣衆的革命熱情，明確地認識了戰爭目的，清除了一切在軍隊中的若干不正確的思想上的偏向和不良現象，教育了幹部和戰士，極大地提高了戰鬥力。這種民主的羣衆性的新式的整軍運動，今後必須繼續進行。你們可以清楚地看見，我們所實行的具有偉大

歷史意義的整黨、整軍和土地改革工作，我們的敵人國民黨是一樣也不能實行的。在我們方面，是如此認真地糾正自己的缺點，把我們的全體全軍團結的差不多像一個人一樣，使全黨全軍和人民羣衆密切地結合起來，有效地執行着黨中央所規定的一切政策和策略，勝利地進行着人民的革命戰爭。在我們的敵人方面，則一切相反。他們是那樣腐化，那樣日益增多的無法解決的內部爭吵，那樣被人民唾棄而陷於完全的孤立，打了那樣的敗仗，因此他們就是必不可免地走向滅亡。這就是中國革命和反革命的兩軍兩軍互相對比的全部形勢。

在這種形勢下面，全體同志必須緊緊地掌握黨的總路線，這就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總路線。新民主主義的革命的，不是任何別的革命的，它只能是和必須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的。這就是說，這個革命不能由任何別的階級和任何別的政黨充當領導者；只能和必須由無產階級和中國共產黨充當領導者。這就是說，由參加這個革命的人們所組成的唯一戰線是十分廣大的，這裏包括了工人、農民、獨立勞動者、自由職業者、知識分子、自由資產階級以及從地主階級分裂出來的開明紳士，這就是我們所說的人民大眾。由這個人民大眾所建立的國家及政府，就是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及代表各民主階級聯合專政的人民聯合政府。這個革命所要推翻的敵人，只是和必須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這些敵人的集中表現，就是蔣介石國民黨的反動統治。

封建主義是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同盟者及其統治的基礎。因此，土地制度的改革，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主要內容。土地改革的總路線，是依靠貧農，團結中農，有步驟地、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發展農業生產。土地改革所依靠的力量，只能和必須是貧農。這個貧農階級，和僱農在一起，佔了中國農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左右。土地改革的主要任務，就是滿足貧僱農羣衆的要求。土地改革必須團結中農，貧僱農必須和佔農村人口百分之二十左右的中農結成鞏固的統一戰線。不這樣做，貧僱農就會陷於孤立，土地改革就會失敗。土地改革的一個任務，是滿足某些中農的要求。必須容許一部分中農保有比較一般貧農所得土地的平均水平為高的土地量。我們贊助農民平分土地的要求，是爲了便於發動廣大的農民羣衆迅速地消滅封建地主階級的土產所有制度，並非提倡絕對平均主

論。誰要是提倡絕對平均主義，那就是錯誤的。現在農村中流行的一種破壞工商業，在分配土地問題上主張絕對平均主義的思想，是一種農業社會主義的思想。這種思想的性質是反動的，最後的，倒退的，我們必須批判這種思想。土地改革的對象，只是和必須是地主階級和舊式富農的封建剝削制度，不能侵犯自由資產階級，也不要侵犯地主富農所經營的工商業，特別注意不要侵犯沒有剝削或者只有輕微剝削的中農、獨立勞動者、自由職業者和新式富農。土地改革的目的是消滅封建剝削制度，即消滅封建地主之爲階級，參加國民經濟生活的行列。除了可以和應當懲辦那些爲廣大人民羣衆所痛恨的查有實據的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和惡霸分子以外，必須實行對一切人的寬大政策，禁止任何的亂打亂殺。消滅封建剝削制度應當是有步驟的，即是說，有策略的。必須依據環境所許可的情況，農民羣衆的覺悟程度和組織程度，決定發動鬥爭的策略，不要企圖在一個早上消滅全部的封建剝削制度。土地改革的總的打擊面，根據中國農村封建剝削制度的實際情況，一般地不能超過農村戶數百分之八左右，人數百分之十左右的數目。而在老的及半老的解放區內，此項數目還要減少。雖聞實際情況，錯誤地擴大打擊面，是危險的。在新區，還必番分地區，分階段。分地區，是說應當集中力量在那些可以鞏固地佔領的區域進行適當的合乎當地羣衆要求的土地改革工作；而在那些暫時向羣衆圍地佔領的區域，則不要忙於進行土地改革工作，而只做一些可以做的、按照當前情況有利於羣衆的工作，以待情況之變化。分階段，是說在人民解放軍剛才佔領的區域，應當提出和實行中立富農和中小地主的策略，將打擊面縮小到只消滅國民黨的反動武裝，打擊惡紳惡霸分子，集中一切力量去完成這個任務，作爲新區工作的第一個階段。然後，依據羣衆的覺悟程度和組織程度的被提高的情況，逐步地發展到消滅全部封建剝削制度的階段。在新區，分浮財和分土地，均必須在環境比較安定和絕大多數羣衆充分發動之後，否則就是冒險的，靠不住的，有害無益的。在新區，必須充分利用抗日時期的經驗。所謂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就是說必須分別地主和富農，分別地主的大中小，分別地主富農中的惡霸分子和非惡霸分子，在平分土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的大原則下面，不是一律地而是有所分別地決定和實行給予這些不同情況的人們以不同程度的待遇。在我們這樣做了的時候，人們就會感覺，我們的工作是完全合

乎情理的。發展農業生產，是土地改革的直接目的。只有消滅封建制度，才能取得發展農業生產的條件。在任何地區，一經消滅了封建制度，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務，黨和民主政府就必須立即提出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的任務，將農村中的一切可能的力量轉移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的方面去，組織合作互助，改良農業技術，改良種子，興辦水利，務使增產成爲可能。農村黨的精力的最大部分，必須放在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及市鎮上的工業生產上面。爲了迅速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及市鎮上的工業生產，在消滅封建制度的鬥爭中，必須注意盡一切努力最大限度地保存一切可用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採取辦法解決地反對任何人對於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破壞和浪費，反對大吃大喝，注意節約。爲了發展農業生產，必須勸告農民在自願原則下逐步地組織爲現時經濟條件所許可的以私有制爲基礎的各種生產的和消費的合作團體。消滅封建制度，發展農業生產，就給發展工業生產，變農業國爲工業國的任务奠定了基礎，這就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最後目的。

同志們知道，我黨規定了中國革命的總路線和總政策，又規定了各項具體的工作路線和各項具體的政策。但是許多同志往往記住了我黨的具體的個別的工作路線和政策，忘記了我黨的總路線和總政策。而如果真忘記了我黨的總路線和總政策，我們就將是一個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們執行具體工作路線和具體政策的時候，就會迷失方向，就會發生左右搖擺，就會遺誤我們的工作。

讓我再說一遍：

「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這就是中國的「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在當前歷史階段的總路線和總政策。

「依靠貧農、團結中農、有步驟地、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發展農業生產」，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總路線和總政策。

毛主席在新政協籌備會上的講話

諸位代表先生們：

我們的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會，今天開幕了。這個籌備會的任務，就是：完成各項必要的準備工作，迅速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以便領導全國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肅清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餘力量，統一全中國，有系統地和有步驟地在全國範圍內進行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和國防的建設工作。全國人民希望我們這樣做，我們就應當這樣做。

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在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向全國人民提議的。這個提議，迅速地得到了全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界民主人士、國內少數民族和海外華僑的響應。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界民主人士、國內少數民族和海外華僑都認為：必須打倒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必須召集一個包含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界民主人士、國內少數民族和海外華僑的代表人物的政治協商會議，宣告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的成立，並選舉代表這個共和國的民主聯合政府，才能使我們的偉大的祖國脫離半殖民地和不平等命運，走上獨立、自由、和平、統一和繁榮的道路。這是一個共同的政治基礎。這是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界民主人士、國內少數民族和海外華僑團結奮鬥的共同的政治基礎，這也是全國人民團結奮鬥的共同的政治基礎。這個政治基礎是如此鞏固，以至於沒有一個認真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民主人士提出任何不同的意見，大家認為只有這一條道路，才是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正確的方向。

全國人民擁護自己人民解放軍，取得了戰爭的勝利。這一次偉大的人民解放戰爭，從一九四六年七月開始，到現在，業已整整三年了。這一次戰爭是由國民黨反動派在獲得外國帝國主義的援助之下發動的。國民黨反動派背信棄義，搗毀了一九四六年一月的停戰協定和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竄動

了這一次反人民的國內戰爭。可是，僅僅三年時間，即已被英勇的人民解放軍所打敗。不久以前，在國民黨反動派的和平陰謀被揭穿以後，人民解放軍即已奮勇前進，橫渡長江，國民黨反動派的都城南寧，已被奪取。上海、杭州、南昌、武漢、西安，已被解放。現在，人民解放軍的各路野戰軍正在向南方和西北各省，執行着自有中國歷史以來未曾有過的大進軍。三年年頭中國人民解放軍共已消滅反動的國民黨軍五百五十九萬人。截至現時為止，殘餘的國民黨軍，包括它的正規部隊、非正規部隊及後方軍事機關、軍事學校等在內，只有一百五十萬人左右了。肅清這一部份殘餘敵軍，還需要一些時間，但已為期不遠了。

這是全中國人民的勝利，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勝利。整個世界，除了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對於中國人民的這個偉大的勝利，沒有不歡欣鼓舞的。中國人民反對自己的敵人的鬥爭和世界人民反對自己的敵人的鬥爭，其意義是相同的。全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一齊看見了這樣的事實：帝國主義者指揮中國反動派用反革命戰爭殘酷地反對中國人民，中國人民用革命戰爭勝利地打倒了反動派。

在這裏，我認為有必要喚起人們的注意，這即是：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中國反動派對於他們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的失敗，是不會甘心的。他們還會互相勾結在一起，用各種可能的方法反對中國人民。例如，派遣他們的走狗鑽進中國內部來進行分化工作和搗亂工作。這是必然的，他們決不會忘記這一項工作。例如，唆使中國反動派，甚至加上他們自己的力量，對鎮中國的滬港。只要他們還有可能，他們就會這樣做。再則，假如他們還想冒險的話，派出一部分兵力侵擾中國的邊境，也不是不可能的。所有這些，我們均必須充分地估計到。我們決不可因為勝利，而放鬆對於帝國主義分子及其走狗們的瘋狂的報復陰謀的警惕性。誰要是放鬆這一項警惕性，誰就將在政治上掃除武裝，而使自已處於被動的地位。在這種情況下，全國人民必須團結起來，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粉碎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中國反動派的任何一項反對中國人民的陰謀計劃。中國必須獨立，中國必須解放，中國的事務必須由中國人民自己作主，自己來處理，不容許任何帝國主義國家再有一絲一毫的干涉。

中國的革命是全民族人民的革命，除了帝國主義者、封建主義者、官僚資產階級、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兇們而外，其餘的一切人都是我們的朋友，我們是一個廣大的和鞏固的革命統一戰線。這

個統一戰線是如此廣大，它包含了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個統一戰線是如此鞏固，它具備了戰勝任何敵人和克服任何困難的堅強的意志和取之不竭的能力。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是帝國主義制度走向全部崩潰的時代，帝國主義者業已陷入不可解脫的危機之中，不論他們如何還要繼續反對中國人民，中國人民總是有辦法取得最後勝利的。

同時，我們向全世界聲明：我們所反對的只是帝國主義制度及其反對中國人民的陰謀計劃。任何外國政府只要它願意斷絕對於中國反動派的關係，不再勾結或援助中國反動派，並向人民的中國採取建立外交關係的問題。中國人民願意與世界各國人民實行友好合作，恢復和發展國際間的通商事業，以利發展生產和繁榮經濟。

諸位代表先生們：我們召集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一切條件，均已成熟。全中國人民是如此熱烈地盼望我們召開會議和成立政府。我相信，我們現在開始的工作，是能夠滿足這個希望的，並且不需要多久的時間就能滿足這個希望。

中國民主聯合政府一經成立，它的工作重點將是：（一）肅清反動派的殘餘，鎮壓反動派的搗亂。 （二）盡一切可能用極大力量從事人民經濟事業的恢復和發展，同時恢復和發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業。

中國人民將會看到，中國的命運一經操在人民自己的手裏，中國就將如太陽升起在東方那樣，以自己的輝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之盪蕩反動政府留下來的污泥濁水，治平戰爭的創傷，建設起一個嶄新的強盛的名符其實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

民主聯合政府萬歲！

全中國人民大團結萬歲！

將革命進行到底

新華社社論

——一九四九年新年獻詞

中國人民將要在偉大的解放戰爭中獲得最後勝利，這一點，現在甚至在我們的敵人方面也不懷疑了。

戰爭是走過了曲折的道路的。國民黨反動政府在發動反革命戰爭的時候，他們軍隊的數量約等於人民解放軍的三倍半，他們軍隊的裝備和人力物力的資源更是遠遠地超過了人民解放軍，他們擁有人民解放軍所缺乏的現代工業和現代交通工具，他們獲得美國帝國主義在軍事上、經濟上的大量援助，並且他們是經過了長期的準備的。就是因為這樣，戰爭的第一年（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七年六月）表現為國民黨的進攻和人民解放軍的防禦。國民黨在一九四六年，在東北佔領了瀋陽、四平、長春、吉林、安東等城市和遼甯、遼北、安東等省的大部，在黃河以南佔領了淮陰、青澤等城市和鄂豫皖、蘇皖、豫皖蘇、魯西南等解放區的大部，在長城以北佔領了承德、集甯、張家口等城市和熱河、綏遠、察哈爾的大部，聲勢洶湧，不可一世。人民解放軍採取了以殲滅國民黨有生力量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為主的正確的確切方針，每個月平均殲滅國民黨正規軍的數目約為八個旅（等於現在的師），終於迫使國民黨放棄其全面進攻計劃，而於一九四七年上半年將進攻的重點限制在兩綫的兩翼，即山東和陝北，戰爭在第二年（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一九四八年六月）發生了一個根本的變化。已經消滅了大批國民黨正規軍的人民解放軍，在南綫和北綫都自防禦轉入了進攻，國民黨方面則不得不由進攻轉入防禦。人民解放軍不但在東北、山東和陝北都恢復了絕大部分的失地，而且把戰線伸到了長江和渭水以北的國民黨統治區。同時，在攻克石家莊、運城、四平、洛陽、宜川、黃鵝、韓縣、臨汾、開封等城市的作戰中學會了攻堅戰術。人民解放軍組成了自己的炮兵和工兵。不要忘記，人民解放軍是該

有飛機和坦克的，但是自從人民解放軍形成了超過國民黨軍的炮兵和工兵以後，國民黨的防禦體系，連同他的飛機和坦克就顯得渺小了。人民解放軍已經不但能打運動戰，而且能打陣地戰。戰爭第三年的頭半年（一九四八年七月至十二月）發生了另一個根本的變化。人民解放軍在數量上由長期的劣勢轉入了優勢。人民解放軍不但已經能夠攻克國民黨堅固設防的城市，而且能夠一次包圍和殲滅成十萬人甚至幾十萬人的國民黨的強大精銳兵團。人民解放軍殲滅國民黨兵力的速度大為增加了。試看殲敵營以上正規軍的統計（包括起義的敵軍在內）：第一年，九十七個旅，內有四十六個整旅；第二年，九十四個旅，內有五十個整旅；第三年的頭半年，根據不完全的統計，一百四十七個師，內有一百一十一個整師，半年殲敵整師的數目比過去兩年殲敵整師的總數多了十五個。敵人的戰線上的戰線已經全部瓦解。東北的敵人已經完全消滅，華北的敵人即將完全消滅，華東和中原的敵人只剩下少數。國民黨的主力在長江以北被消滅的結果，大大地便利了人民解放軍今後渡江南進解放全中國的作戰。與軍事戰線上的勝利同時，中國人民在政治戰線上和經濟戰線上也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因為這樣，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在全國範圍內的勝利，現在就是在全世界的輿論界，包括一切帝國主義的報紙，都完全沒有爭論了。

敵人是不會自行消滅的。無論是中國的反動派，或是美國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反動勢力，都不會自行退出歷史舞台。正是因為他們看到了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在全國範圍內的勝利已經不能用單純的軍事鬥爭的方法加以阻止，他們就一天比一天地重視政治鬥爭的方法。中國反動派和美國侵略者現在一方面正在利用現存的國民政府來進行「和平」陰謀，另一方面則正在設計使用某些既與中國反動派和美國侵略者有聯系，又與革命陣營中的所謂反對派，以便保存反動勢力，破壞革命勢力的工作，力求混入革命陣營，構成革命陣營中的所謂反對派，並已經開始在中國進行這項工作。美國政府的政策，已經由單純地支持國民黨的反革命戰爭轉變為兩種方式的鬥爭：第一種，組織國民黨殘餘軍事力量及所謂地方勢力在長江以南及邊遠省份繼續抵抗人民解放軍；第二種，在革命陣營內部組織反對派，極力使革命政體此止步；如果非要前進，務必不要太多地侵犯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利益。

英國和法國的帝國主義者，則是美國這一政策的受害者。這種情形，現在許多人們還沒有看清楚，但是大約不要很久人們就可以看得清楚了。

現在擺在中國人民、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面前的問題，是將革命進行到底呢？還是使革命半途而廢呢？如果要使革命進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堅決徹底地消滅一切反動勢力，不動搖地堅持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封建主義，打倒官僚資本主義，在全國範圍內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在全國範圍內建立無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主體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使中華民族來一個大翻身，由半殖民地變為真正的獨立國，使中國人民來一個大解放，將自己頭上的封建的壓迫和官僚資本（即中國的壟斷資本）的壓迫一起抵掉，並由此造成統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農工與變為工業國的先決條件，造成由人剝削人的社會向非社會發展的可能性。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廢，那就是違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國侵略者和中國反動派的意志，使中國回到黑暗世界。現在的問題就是：一個這樣明白地這樣失統地擺弄的問題。這條路究竟選擇那一條呢？中國每一個民主黨派，每一個人民團體，都必須考慮這個問題，都必須選擇自己要走的路，都必須表明自己的態度。中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是否能夠真誠地合作，而不致半途而廢，就是要看他們在這個問題上是否採取一致的意見，是否能夠為着推翻中國人民的共同敵人而採取一致的步驟。這就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麼「反對派」，也不是什麼「中間路線」。

中國人民今天所反對的敵人是什麼敵人呢？大家知道不是別人，正是以蔣介石、李宗仁、陳誠、白崇禧、何應欽、顧祝同、陳果夫、陳立夫、孔祥熙、宋子文、張羣、翁文灝、孫科、吳鐵城、王雲五、戴傳賢、吳鼎昌、熊式輝、張厲生、朱家驊、王世杰、顧維鈞、宋美齡、吳國楨、劉峙、程潛、薛岳、衛立煌、余漢謀、胡宗南、傅作義、關錫山、周至柔、王叔銘、桂永清、杜聿明、湯恩伯、孫立人、馬步芳、陶希聖、曾琦、張君勱等為首的反動派，這些人都是頭等戰爭罪犯，中國人民的公敵。以蔣介石等人為首的中國反動派，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反革命政變至現在的二十多年的漫長歲月中，難道還沒有證明他們是一夥滿手鮮血的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嗎？難道還沒有證明他

們是一夥職業的帝國主義走狗和買國賊嗎？請大家想一想，從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變以來，從一九四五年十月重慶談判和一九四六年一月政治協商會議以來，中國人民對於這些盜匪曾經做過何等仁慈義舉，希望與他們建立變方的和平。但是一切善良的願望改成了他們的階級本性的「一分一釐一毫一絲沒有呢？這些盜匪的歷史，沒有那一個是可以和美國帝國主義分得開的。他們依靠美國帝國主義把四萬萬七千五百萬同胞投入空前殘酷的大內戰，他們用美國帝國主義所供給的轟炸機、戰鬥機、大砲、坦克、火箭、自動步槍、汽油彈、毒氣彈等等殺人武器屠殺了成百萬的男女老少，而美國帝國主義則依靠他們掠奪中國的領土權、領海權、領空權、內河航行權、商業特權、內政外交特權，直至打死壓死人強姦婦女而不受任何處罰的特權。難道被迫進行了如此長期血戰的中國人民，還應該對於這些窮兇極惡的敵人表示親愛溫柔，而不加以激民的消滅和驅逐嗎？只有澈底地消滅了中國反動派，驅逐了美國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出中國，中國才能有獨立，才能有民主，才能有和平，這個真理，難道還不明白嗎？

值得注意的是現在中國人民的敵人忽然竭力裝作無害而且可憐的樣子了（請讀者記著，這種可憐相，今後還要裝的）。最近做了國民黨行政院的孫科，在去年六月間，不是曾經宣佈「在軍事方面，只要打到底，終歸可以解決」嗎？這次一上台却大談其「光榮的和平」，說什麼「政府曾努力追求和平，由於和平不能實現，不得已而用兵，用兵的最後目的仍在求得和平的恢復。」合衆社上海十二月二十一日電訊，馬上就預料孫科的聲明在美國官方人士及國民黨自由主義人士中，將遇到最廣泛的譏諷。「美國官方人士」現在不但熱心於中國的「和平」，而且一再表示從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蘇美英三國外長會議以來美國就遵守着「不干涉中國內政的政策」。應該怎樣來對付這些管子的先生們呢？這裏用得着古代希臘的一段寓言：「一個農夫在冬天看見一條野獾獵奇。他很可憐它，便拿來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氣就甦醒了，等到回復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傷。農夫臨死的時候說：我憐惜惡人，應該受這個噩報！」外國和中國的毒蛇們希望中國人民還像這個農夫一樣地死去，希望中國共產黨，中國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這個農夫一樣地懷有對於毒蛇的好心腸，但是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却看見了並且記住了這個

勞動者的遺囑。況且盤踞在大部分中國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雖然牠們已經感覺到冬天的威脅，但是還沒有凍僵呢！

中國人民決不憐惜蛇一樣的惡人，而且老老實實地認為：凡是耍着花腔，說什麼要憐惜一下這類惡人呀，不然就不合國情，也不夠偉大呀等等的人們，決不是中國人民的忠實朋友。像蛇一樣的惡人爲什麼要憐惜呢？究竟是那一個工人，那一個農民，那一個兵士主張憐惜這類惡人呢？確是有這麼一種「國民黨的自由主義人士」或非國民黨的「自由主義人士」，他們勸告中國人民應該接受美國和國民黨的「和平」，就是說，應該把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殘餘當作障碍物供養起來，以免這幾種寶貝在世界上絕了種。但是他們決不是工人、農民、兵士，也不是工人、農民、兵士的鬥友。

我們認爲中國人民革命陣營必須擴大，必須容納一切願意參加目前的革命事業的人們。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需要有自己的軍隊，也需要有同盟軍，沒有同盟軍的軍隊是打不勝敵人的。正處在革命高潮中的中國人民需要有自己的朋友，應當記住自己的朋友，而不要忘記他們。忠實於人民革命事業的朋友，努力保護人民利益而反對保護敵人利益的朋友，在中國無疑是不少，無疑是一個也不讓被忘記和被冷淡的。我們又認爲中國人民革命陣營必須鞏固，必須不容許壞人侵入，必須不容許錯誤的主張獲得勝利。處在革命高潮中的中國人民除了記住自己的朋友以外，還應當牢牢地記住自己的敵人和敵人的陣地。如上所說，既然敵人正在陰謀地用「和平」的方法和混入革命陣營的方法以求保存和加強自己的陣地，而人民的根本利益則要求徹底消滅一切反動勢力並驅逐美國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出中國，那麼，凡是勸說人民憐惜敵人、保存反動勢力的人們，就不是人民的朋友，而是敵人的朋友了。

中國革命的怒潮正在迫使各社會階層決定自己的態度。中國階級力量的對比正在發生着新的變化，大羣大羣的人民正在脫離國民黨的影響和控制而站到革命陣營一方面來，中國反動派完全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人民解放戰爭愈接近於最後勝利，一切革命的人民和一切人民的朋友將愈加鞏固地團結一致，在中國共黨的領導之下，堅決地主張徹底消滅反動勢力，徹底發展革命勢力，一直達到在全中國範圍內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國，實現統一的民主的和平。與此相反，美國帝國主義者、中國反動派和

他們的朋友，雖然不能夠緊固地團結一致，雖然會發生無窮的互相爭吵，互相惡罵，互相埋怨，互相拋棄，但是在有一點上却會互相合作，這就是用各種方法力圖破壞革命勢力而保存反動勢力。他們將要用各種方法，公開的和秘密的，直接的和迂迴的。但是可以斷定：他們的政治陰謀將要和他們的軍事進攻遭遇同樣的失敗。已經有了充分的經驗的中國人民及其總參謀部中國共產黨，一定會像粉碎敵人的軍事進攻一樣，粉碎敵人的政治陰謀，把偉大的人民解放戰爭進行到底。

一九四九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將向長江以南進軍，將要獲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偉大的勝利。

一九四九年我們在經濟戰線上將獲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偉大的成就，我們的農業生產和工業生產將要比過去提高一步，鐵路公路交通將要全部恢復，人民解放軍主力兵團的作戰將要擺脫現在還存在的某些游擊性，進入更高程度的正規化。

一九四九年將要召集沒有反動份子參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務為目標的政治協商會議，宣告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的成立，並組成共和國的中央政府，這個政府將是一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的有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適當的代表人物參加的民主聯合政府。

這些就是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中國一切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在一九四九年所應努力求其實現的主要的具體的任務。我們將不怕任何困難團結一致地去實現這些任務。

幾千年以來的封建壓迫，一百年以來的帝國主義壓迫，將在我們的鬥爭中徹底地推翻掉。一九四九年是極其重要的一年，我們應當加緊努力。

工業問題

毛澤東

(摘「論聯合政府」)

爲着打敗日本侵略者與建設新中國，必須發展工業。但是，在國民黨政府領導之下，一切依賴外國，自己的可憐經濟政策是破壞一切經濟生活的，國民黨統治區內僅有一點小型工業，也不能不處於大部分破產的狀態中。政治不改革，一切生產力都遇着破滅的命運，農業如此，工業也是如此。就整個來說，沒有一個獨立、自由、民主與統一的中國，不能有工業的中國。消滅日本侵略者，這是謀獨立。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民主的聯合政府，實現人民的自由，人民的統一，不可能有軍隊，實現土地改革，解放農民，這是謀自由、民主與統一。沒有獨立、自由、民主與統一，不可能有真正大規模的全國性的工業。沒有工業，便沒有鞏固的國防，沒有人民的福利，沒有國家的富強。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以來一百零五年的歷史，特別是國民黨當政以來十八年的歷史，清楚地把這些要點告訴了中國人民。一個不是貧弱的而是富強的中國，是和一個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而是獨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統一的中國，相聯結的。在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國裏，要想發展工業，建設國防，福利人民，招致國家的富強，多少年來多少人做過這種夢，但是一概幻滅了。許多好心的夢青家、科學家、學生們不問政治，自以爲可以所學爲國家服務，結果也化成了夢，一概幻滅了。這是好消息，這種幼稚的夢的幻滅，正是中國富強的起點，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中學得了許多東西，知道在日本侵略者被消滅之後，有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中國之必要，而這些條件是互相關聯的，不可缺一的。果然如此，中國就有希望了。解放中國人民的生產力，使之獲得充分發展的可能性，有待於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條件全在中國境內的實現。這一點，懂得的人是一天一天的多起來了。

在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條件獲得之後，中國人民及其政府必須採取切實的步驟，在若干年內逐步地建立輕重工業，使中國由農業國地位升到工業國地位上去。中國的輕民主主義的獨立、自由、民主與統一，如無鞏固的經濟做它們的基礎，如無進步的比較現時發達得多倍的農業，如無大規模的在全國經濟比重上佔絕大優勢的工業以及與此相適應的交通、貿易、金融等事業做它們的基礎，所謂新民主主義的獨立、自由、民主與統一，是不能鞏固的。

我們共產黨人願意協同全國一切抗日民主黨派，各部分產業界，為上述目標而奮鬥。中國工人階級在這個任務中將起偉大的作用。

中國工人階級，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就開始以自覺的姿態，為中國的獨立、解放而鬥爭。一九二一年，產生了它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從此以後，使中國的解放鬥爭進入了新階段。在北伐戰爭、土地革命與抗日戰爭三個時期中，中國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對於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作了極大的努力與極有價值的貢獻，在最後消滅日本侵略者的鬥爭中，特別是在收復大城市與交通要道的鬥爭中，中國工人階級將起絕大的作用。在抗日結束以後，可以預斷，中國工人階級的努力與貢獻將會是更大的。中國工人階級的任務，不但是為着中國的獨立、自由、民主與統一而鬥爭，而且是為着中國的工業化與農業近代化而鬥爭。

在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下，將採取調節勞資間利害關係的政策。一方面，保護工人利益，根據情況之不同，而實行八小時到十小時的工作制以及適當的失業救濟，社會保險，工會的權利等；另一方面，保護國家企業、私人企業與合作社企業在合理經營下的正常贏利。總之，使勞資雙方共同為發展工業生產而努力。

為着發展工業，需要大批資本。從什麼地方來呢？不外兩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國人民自己積累資本，同時借助於外投。在根據中國法令，有益中國經濟的條件之下，外國投資是我們所歡迎的。對於中國人民與外國人民都有利的事業，是中國在得到一個鞏固的國內和平與國際和平，得到一個徹底的、政治改革與土地改革之後，能夠藉藉物地發展大規模的輕重工業與近代化的農業。在這個基礎上，外國投資的容納量將是非常廣大的。一個政治上倒退與經濟上貧困的中國，則不但對於中國人民常非

不利，對於外國人民也是不利的。

日本侵略者被消滅之後，日本侵略者及重要漢奸分子的企業及財產，應當沒收，歸政府處理。

工商業政策

任弼時

(摘「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

對工商業不要採取冒險政策。各地已發生有破壞工商業的現象，例如陝北碑木地區的高家堡，當被我軍收復時，連小商販也沒收了。這是一種自殺政策。中國土地法大綱上規定「保護工商業者的財產及其合法的營業，不受侵犯」，一般工商業是應當受到保護的，就是地主官僚所經營的工商業，也不應當沒收，同樣是應當受到民主政府的保護。不要以為這些工商業是地主富農所把持而加以歧視，這是不對的，而應當看到這些工商業的存在，有益於今天的社會經濟。黨的政策是僅僅沒收官僚資本與真正大票霸反革命份子的工商業歸國家或人民所有，並且確定這些應當沒收的工商業，凡是為國民經濟所需要者，必須使之能夠繼續營業，不使停閉，更不得破壞和任意分散。這些政策不僅適用於原解有放區，也適用於將來解放的新區域。你們不久就要打出去，必須嚴格遵守這種政策，絕對不能重複如像高家堡一類的錯誤。那麼地主在過去減租減息時期將土地變賣而投資工商業者，現在是否可以沒收呢？不可以的。我們過去和現在都是保護和鼓勵這些工商業，因為這樣對於繁榮中國的經濟是有利的，是當理的。在鬥地主地財時，必須規定不許地主破壞已有的工商業，否則要受處罰。

毛主席說：「由於中國經濟的落後性，廣大的小資產階級與中等資產階級所代表的資本主義經濟，即使革命在全國勝利之後，在一個長時期內，還是必須允許他們存在；並且按照國民經濟的分工，還需要他們中一切有益於國民經濟的部份有一個發展；他們在整個國民經濟中，這是不可以缺少的一部份。」我們要把握毛主席這道符號，向工人農民和士兵羣衆解釋清楚，使他們懂得為何要有工商業，教育一切勞動人民懂得，局部的暫時的利益，要服從整個的長遠的利益。譬如地主開座探密，農民從目前局部利益出發，是可以舉手擁護沒收分配的，因為將探密的工具和物資大家分到一份，可以暫時解決自己的問題。如果我們批准這樣做，形式上看來是走羣衆路線，實質上是犯了尾巴主義的錯誤。在

這種情形下，我們要說農民懂得煤窰完整存在的利益，分散了就會把煤窰弄垮，結果自己也會無煤燒，這就妨礙了解放區的經濟發展。

我們說解放區經濟要獨立自主，我們不能作殖民地的殖民地。只有經濟上不依靠別人，軍事上政治上才有力量。我們要經濟上能獨立自主，就要使公營的、私營的、人民合作經營的手工業、工業，以及農村的農業都有一個發展；生產人民與軍隊大量的必需品和糧食；使我們對外貿易能保持平衡，以至出超，不去買蔣區的貨物和美國貨。

有了工業農業生產品，就需要有商業，例如公私商店、消費合作社等作為橋樑，使生產者能賣出他們所生產的商品，使消費者能夠得到這些商品，經過這樣的流轉，才能使工業農業進行生產與擴大再生產。現在解放區內政府的貿易公司還沒有力量開設商店，（現在許多機關部隊所設的公營商店，往往為着解決本單位困難，沒有負起應有的任務，甚至有違反政策的現象發生。）合作社也發展得不普遍而且往往辦得不好。因此，私商的存在是需要的。商人當然有剝削；商人的商業行為本身不生任何價值，他們或者是分享資本家一部份利潤，或者是直接對生產者消費者實行剝削。有時因積居奇，作投機事業，為害更大。但問題不是要去破壞商業，而是要去領導商業。要能掌握整個商業的發展，要商人為我們所用，而不要我們為商人所用。這種政策對於人民固然是有利的，對於正常商人也是有利的。至於小商小販，大部份是貧苦的，他們的生活只相當於貧農中戶或富裕中農，更不應該去打擊他們，如在陝北高家壩所發生的破壞商業的情形，是絕對錯誤的。那裏的商業搞垮了，老百姓買東西就要到榆林、神木或鎮川堡，那就很不方便。因此，我們對工商業，應採保護和領導的政策，絕對不能破壞，破壞是一種自殺政策。對工商業必須收稅，但必須訂出恰當的稅率，不要收得太重。這種稅率，以不致影響他們的經營與發展為原則；否則，就犯犯錯誤。

堅持職工運動的正確路線

新華社社論

反對『左』傾冒險主義

——紀念『二七』二十五週年——

中國工人階級第一次偉大的反對帝國主義走狗軍閥的罷工運動——京漢鐵路（即平漢鐵路）大罷工，到現在已經整整的二十五年了。二十五年來，中國工人階級與中國人民年年紀念二月七日這個意義重大的日子，因為京漢鐵路大罷工顯示了中國工人階級的政治覺悟和組織性，顯示了工人階級是中國人民的先進階級、最革命的階級。

二十五年過去了，『二七』烈士施洋、林祥謙等同志所遺下的事業將要完成，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將要在全中國被掃除，工人階級、農民、小資產階級、中等資產階級、知識份子與其他愛國份子的民主政權，已經在一萬萬六千萬人口的解放區中建立起來，並將要在全國建立起來；『二七』烈士的光榮業績是永垂不朽的。

京漢鐵路大罷工，在我國革命的職工運動歷史中是光榮的一頁。現在的情況是我國的一部份大城市、鐵路、礦山已經解放了，更多的大城市、鐵路、礦山將被解放；另一方面，各解放區，首先是東北解放區，工業和鐵路的建設已在積極進行，這種建設在今後必須更大規模地進行。因此，解放區域職工運動將被提到更加重要的地位；職工運動的方針是否正確，對於革命戰爭的發展和民主主義建設的發展，必將發生較之以往更加巨大的影響。我們順趁紀念『二七』二十五週年的機會，對於解放區職工運動的方針加以說明。

解放區的革命的職工運動與將管區的革命的職工運動，有同一的總目標，這個總目標就是爭取工

人階級和一切被壓迫人民的民主解放，建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但是在同一的總目標之下，革命的職工運動在兩個不同地區的具體方針則是不同的，在許多方面甚至是截然相反的。這是因為在這兩個不同的地區裏，工人在政治上、社會上的地位和企業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在許多方面是截然相反的。

在蔣管區，工人在社會上是最低微的奴隸，他們的勞動是替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生產利潤，他們的生命被帝國主義與國民黨看得像螻蟻一樣不值錢，他們沒有人權和自由；在這樣悲慘的環境中，工人階級必須爲了活命而作敢死求生的鬥爭，並且爲了解放自己與解放一切被壓迫的人民起見，必須爲推翻帝國主義與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國家政權而鬥爭，如像「二七」的罷工鬥爭一樣。但是，在解放區，工人的政治、社會地位是根本改變和截然不同了。工人與農民、小資產階級、中等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和其他愛國份子一樣，都做了國家和社會的主人翁；工人階級被一切人民特別尊敬，因為它是先進的階級，最革命的階級。在這樣的環境中，工人階級必須擁護自己與人民的民主政治，爲爭取革命戰爭的勝利，爲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建設起先鋒帶頭的領導作用與模範作用。

工人在企業中的地位也是不同的。在蔣管區，有官僚資本的企業和民族資本的企業，在官僚資本的企業中，工人的地位是官僚資本家的奴隸，他們敢死求生的鬥爭，常常與反抗統治者的壓迫聯繫起來；在民族資本的企業中，受到資本家的剝削，同時又與民族資本家一同受到官僚資本、蔣介石匪幫政府與帝國主義的壓迫。他們一方面爲了生活，須向資本家提出改善生活的要求，另一方面爲了反抗官僚資本及統治者的壓迫，又應與民族資本家聯合起來進行共同鬥爭；在解放區情形就截然不同了，在解放區的公營企業與合作社經營的企業中，企業的主人是解放了的人民組織起來的政權與合作社，因而，在這些企業中的工人，本身就是企業的主人，這裏沒有剝削者與被剝削者，沒有壓迫者與被壓迫者！因而沒有而且不可能有所謂「資方」與「勞方」的對立，所謂「企業主」與「非企業主的對立。在解放區的私營企業中，工人有兩重地位：一是被剝削者的地位（「勞方的地位」），一是社會主人翁的地位（國家政權的領導者的地位），因爲是被剝削者，工人在自己的日常利益上與私人資本家有矛盾，但因爲又是社會的主人翁、國家政權的領導者，工人便應該爲了自己的長遠的利益，忍受一定限度的剝削，使這些私人企業能夠進行生產，並適當的發展生產，以繁榮解放區的經濟，支援前線的勝利。

，並使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因生產力的大大提高，而逐步地發展到將來的社會主義社會的方向去。應當知道：新民主主義社會與社會主義社會不同之點，就是在新民主主義社會裏，私人資本的企業在生產中還是不可缺少的成份，破壞這部份企業，對於工人階級和全體人民及其國家政權是非常不利的。正因爲如此，工人應當堅決反對那些進行怠工、進行鬧廠、進行破壞的私人資本家，同時對於願意繼續生產下去的私人資本家，則應當與之共同工作，發展生產，繁榮解放區的經濟，並在這個基礎上，一方面確定保證工人的適當生活，另一方面保證私人資本家的適當利潤，這種勞資關係與在蔣管區所應進行的勞資鬥爭，是截然不同的。

從以上的基本分析裏，就可以看到在蔣管區與解放區工人在社會上的地位和在企业中的地位是怎樣的截然不同。從此就可以明白：解放區的革命的職工運動的方針，爲什麼要與蔣管區的革命的職工運動的方針截然不同。

在蔣管區的革命的職工運動的方針，是用一切方法來保障工作不致於餓死，和用一切方法來推翻反動政府。在解放區革命的職工運動就沒有這些任務了，因爲在解放區工人沒有餓死的威脅，反動政府早已推翻；在解放區革命的職工運動的方針因此應當徹底改變，改變到耐心的說服工人來實行毛主席所說的『增加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經濟政策。

應當向工人說明：振興工業是爭取戰爭勝利的最首要的任務，也是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最首要的任務；而破壞或降低生產是危害解放區的，危害戰爭勝利的，危害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建設的，其可怕的程度，與蔣介石匪幫的『三光政策』是一樣的。

應當向工人說明：解放區的工業生產，不是由別人負責，而是由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中國共產黨負責的，解放區的農民對農業生產大量的公糧，段繁重的戰爭勤務，是盡力負責的，工人應當把工業生產的責任同樣負擔。公營企業與合作社經營的企業裏，工人對於生產要擔負完全全的責任，而且在私營企業裏，工人對生產也負了大部份責任，雖然私人資本家也要負責。

應當向工人說明：工人所以受到解放區人民的尊敬，不是爲了別的原因，僅是爲了工人階級在人民中是先進的階級，最革命的階級，工人應該以自己對革命的無限忠誠與偉大貢獻來做人民的榜樣，

領導人民前進。爲了爭取革命戰爭的勝利與新民主主義建設的成功，工人應該吃得苦，做得多，應該學習許多模範工人如趙占魁同志等的榜樣。在戰爭的情況下，不是做八小時工作，而是做十小時工作，其他勞動條件亦不可定得太高，不可違背經濟情況所許可的限度，不可違背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總原則。

應當領導工人去學習管理生產，在公營企業與合作社經營的企業中，在廠長的領導下，組織工廠管理委員會，吸收工人代表參加，討論如何減輕成本、提高生產的數量和質量，如何解決與改善由購進原料、製造成品與推銷成品過程中的各種複雜問題。這種管理方法亦應在私人企業中設廠私人資本家試辦，在私人企業的管理委員會中，除了討論上述問題外，並可規定私人資本家一定的利潤和工人的一定的待遇，以實現勞資兩利。

毛主席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中指出：「對於小資產階級及中等資產階級經濟成份採取過左的錯誤政策，如像我們黨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期間所犯過的那樣（過高的勞動條件、過高的所得稅率、在土地改革中侵犯工商業者、不以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爲目標，而以近視的、片面的所謂勞動者福利爲目標），是絕對不許重複的。這種錯誤如果重犯，必然要損害勞動羣衆的利益及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利益。」毛主席這個指示對於解放區職工運動是非常重要的，解放區職工運動的方針，應當嚴格的符合於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政策，這就是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一切與此符合的應該發展，一切與此違背的應當改正過來。

必須指出：直到現在，中國共產黨內還有不少的黨員、不少的工會工作人員，甚至有不少的擔負高級領導地位的領導人員，並不了解黨的工業政策與職工運動的路線；他們只看見樹木不見見森林，他們只知道片面的、狹隘的、近視的所謂「工人利益」，而不能稍微看遠一點；他們忘記了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四年時期內實行過的那種左傾冒險主義的工業政策與職工運動路線，曾經給予工人階級、勞動人民與革命政府以何等重大的損害；他們完全不研究一九三七年以來十一年內中共中央歷次發佈的正確的工業政策與職工運動方針，他們固執地抵抗黨的路線。許多黨的地方領導機關，

在長時期內甚至沒有正式討論與宣傳經過中央的路線，以致於使得工運工作同志完全不瞭解中央的路線，他們竟達到如此麻木不仁的地步，這種情況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黨的一切地方領導機關必須嚴肅地討論中央的路線及全部工業政策與工運方針，堅決地糾正一切危害工人階級、勞動人民及革命政府的左傾冒險主義的思想、政策與辦法，迅速地使工業建設與工人運動走入正軌。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聚積一切力量打倒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反動統治，解放中華民族與中國人民，建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

關於中國職工運動當前任務的決議

(一九四八年八月中國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通過)

第一章：中國職工運動的總任務

第一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由於美國帝國主義代替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實行橫暴侵略，和國民黨反動政府實行內戰、獨裁與賣國的政策，已經把全國人民陷入長期戰爭的痛苦之中；而中國的工人階級，除開在解放區者業已得到民主解放以外，其所受的壓迫和痛苦，則又更為嚴重。在這種情形下，全國人民，除團結一致，堅決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取消美國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特權，並從而建立各民主階級聯合的新民主主義的政權而外，就不能有任何其他的出路。而中國的工人階級，如果不盡一切努力去完成現在反對美帝和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就不能使它自己目前所處的悲慘狀況有所改善。因此，徹底推翻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在中國的統治，建立新民主主義的人民共和國，乃是改善工人階級及其他民主階級人民目前狀況的總前提，乃是工人階級及其他民主階級人民當前的最高利益與最高任務。在這個偉大鬥爭中，中國的工人階級應該而且必須站在最前列，並使自己成為各民主階級人民革命的領導者，只有中國的工人階級在目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鬥爭中及其緊張的年頭，自己完全團結一致，並充分表現了自己的革命能力和自我犧牲的奮鬥精神，因而對於這個革命給以決定的貢獻，成為人民公認的毫無愧色的領袖時，工人階級才能保持和鞏固在這個革命中所取得的勝利，並在這種勝利的基礎上，去希望和準備較遠的社會主義的前途。而社會主義則是能夠徹底解放工人階級和一切勞動人民的。

第二節：

由於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同志英明而正確的領導，由於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英勇奮戰，由於解放區

全國民眾及國民黨統治區廣大人民羣衆不顧犧牲的努力和奮鬥，已經使中國人民的革命戰爭取得了極其偉大的勝利。人民解放軍在兩年空前規模和空前激烈的戰爭中，已經消滅蔣介石的反動軍隊二百六十餘萬，連同在抗日時期被解放者在內共解放了一萬萬六千八百萬人民。人民解放軍不獨是完全打退了美國援助的國民黨反動政府向解放區的進攻，而且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向國民黨統治區舉行了強大的進攻，使敵人完全處於被動，使國民黨反動政府的統治走到了搖搖欲墜和土崩瓦解的邊緣。在這種形勢下，爲着保存美國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政府在中國的統治，爲着保存現有的反動軍隊及地盤，獲得喘息時間，休整補充，以利再戰，並消滅人民解放軍及中國一切民主力量之目的，美國帝國主義者正在準備策動和組織一個救國中國人民的「和平」陰謀，策動某些反動的軍人、政客以及所謂中間派的右翼分子準備發動虛偽的和平運動，甚至不惜在表面上去掉蔣介石，以表示他們求「和平」的「誠意」。目前中國工人階級的首要任務，就是要盡一切的努力，緊密的團結全國人民，在各方面堅決的支持人民解放軍，儘可能迅速地在全國範圍內戰勝美國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政府，解放全中國的人民，統一全中國。當着美國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們發動虛偽的和平陰謀時，必須向人民揭發其欺騙性，擊破任何假和平運動，將其轉變爲爭取真正和平的運動。本屆勞動大會完全相信：經過中國工人階級與全國人民團結一致的努力和人民解放軍的繼續奮戰，這一偉大目標的實現，已經是不很遠了。

第三節

大會在聽了中共東北中央局代表報告之後，完全同意中共中央在目前革命中所採取的總路線和各種政策。這就是說：中國目前階段的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這就是說：中國工人階級必須首先團結自己，並團結農民、獨立勞動者、自由職業者、知識分子、自由資產階級及開明士紳，建立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民族統一戰線，建立所有各民主階級聯合專政的人民民主共和國。這就是說：中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無黨派的民主人士，應在適當時機召開沒有反動派參加的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政府的革命的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民主聯合政府

，支援人民解放戰爭，揭破敵人和平陰謀，爭取戰爭的最後勝利，爭取全國人民的真正的永久的和平。這就是：在農村中實行土地改革，平分地主階級與封建性富農的土地，在城市中改收官僚資本，保護民族工商業，並實行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政策。大會號召全國一切職工及職工團體積極參加共產黨所提議的這些革命活動、革命組織、革命政權和革命政策，並遵照上述路線和主張去進行工作。

第二章：關於國民黨統治區職工運動的任務

第一節：

爲了實現上述目的，在國民黨統治區的職工運動，應比以往任何時期都要更加善於聯繫羣衆，廣泛地爭取大隊伍，以便迎接人民解放軍的到來。同時，應盡一切可能，謹慎地支援和參加國民黨統治區一切人民羣衆的革命運動，對蔣介石的軍火製造與軍事運糧，給以可能的阻礙。

第二節：

國民黨統治區職工們的生活狀況及其所受壓迫，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加惡化和黑暗，這就逼得職工們不能不經常進行救死求生的鬥爭。應該有更加堅固和更加廣泛的團結，並在策略上有高度的靈活性，才能使這種鬥爭獲得更多的效果，使自己的生活得到更多一點出路。這是國民黨統治區一切革命職工組織所必須講求的。國民黨統治區職工們在進行這種鬥爭時必須用不同的態度對待官僚資本家與民族資本家。因爲國民黨統治區的民族工商業，大多數也是處於帝國主義與官僚資本的壓迫、損害或限制的情況之下，職工們首先應該主動地去聯合這種受壓迫、損害或限制的民族資本家，使他們和工人階級一道共同反對帝國主義與官僚資本，保護這些民族工商業；然後，要求這些資本家適當地改善職工生活待遇，以達到勞資兩利的目的。而在官僚資本及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帝國主義資本的企業中，則不應採取這種態度，因爲官僚資本與美帝國主義資本，就是美帝及國民黨藉以侵略中國和實行獨裁內戰政策的重要工具。職工們在這些企業中爲改善自己生活的鬥爭常常和反抗統治者壓迫的鬥爭聯繫起來。

第三節：

由於解放區的工商業正在發展和擴大中，國民黨統治區的職工們和革命的職工團體應該注意黨的熱練人員到解放區來參加新式工商業的建設。同時，國民黨統治區職工們和革命職工團體應該十分注意保護一切公私企業的機器和設備，反對破壞、遷移和分散這些機器與設備，因為在不久的將來，一切官僚資本的企業都要轉入人民手中，而原屬民族工商業家所有者，則將被認為他們所有。特別在人民解放軍到來時，職工們應當盡力保護一切公私企業及其工廠、機器和物資不受破壞和損毀，並應聯合各界人民，監視反革命分子，維持社會秩序，以待新的秩序之建立。

第四節：

國民黨統治區職工們在進行上述各種活動時，應十分注意方式和方法的適當，注意保護自己的團體和領袖，適當處理職工內部的關係，嚴防敵人的挑撥與離間。

第三章：關於解放區職工運動的任務

第一節：

在解放區的職工運動，則是在一種完全新的條件之下進行。在這裏，工人階級已經在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鬥爭中獲得了解放，並已成為國家政權的領導階級。在這裏，已經沒有官僚資本，但有了新的國家企業與合作社企業的資本，這些企業是屬於全體人民或部分人民所有。也是屬於工人階級所有；在這些企業中，沒有勞資對抗，只有公私關係，職工們已經是企業的主人。在這裏，工業和農業的發展，是直接加強人民革命戰爭與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質基礎，首先是改善職工生活的物質基礎。在這裏，私人企業中仍然有勞資對抗，職工們仍然處於被剝削地位，但職工們既是在政治上、社會上和國家政權中居於領導的主人的地位，就保證了職工們可以不致受到壓迫和過份剝削，而一切有益於國民生計的私人資本生產事業的存在和發展，就加強了整個解放區的經濟，因而也就有益於工人階級。由於解放區這一切新的條件，所以解放區的職工運動，就是在完全新的方針和政策之下來進行。

第二節：

首先，解放區的職工們必須很好地組織起來，並很好地進行學習，提高自己的覺悟，完全理解目前目前的形勢及解放區上述一切新的條件，以便很有組織地很自覺地去積極參加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政權、軍隊、經濟、文化各方面的建設工作，並選派自己優秀的代表到國家的各種領導機關去，在這些機關中和各民主階級的代表聯合一致進行工作，並堅持無產階級的、代表全體人民長遠利益的方針和政策，反對各種自私自利的錯誤的方針和政策。

第三節：

發展解放區工業生產的任務，已被提到空前重要的地位，這是解放區職工們特別重要的任務。必須發展解放區的工業，才能保證革命戰爭的最後勝利，才能滿足土地改革後農民的要求，特別是農業技術改進的要求，才能逐漸改善職工及其他勞動人民的生活。解放區工業，亦即新民主主義的工業，它的發展前途是無限的，因為這裏有被解放了的廣大的勞動力，有通力合作的人民大眾，有解放了的商品市場，有豐富的資源，而人民解放軍又將要解放更多的城市、工廠和機器，並逐步地將各解放區聯成一片。這些發展工業的重要條件，都在逐日增多和增強。尤其重要的，是毛澤東同志提出了「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經濟建設的總方針，這個方針正指引着我們的工業日益走上健全和廣大發展的道路。由於解放區的工人階級不但在政治上社會上居於主人地位，而且在國家政權中，首先在國家企業中，是居於領導地位，因此，解放區職工們就應當以領導階級地位担負起發展工業的責任，就應當以主人翁的新的勞動態度對待自己所參加的勞動。在國營和公營企業中，職工既有權利參加工廠的管理，便有責任積極勞動，完成以至超過國家所要求於他們的生產任務。合作社企業中的職工地位和責任，也大體與這相同。在私人企業中的職工亦有責任完成資方的生產計劃，遵守勞資雙方所訂立的契約，遵守政府保護私人工商業的政策，但同時有權利要求資方履行勞資兩利原則，督促資方執行政府法令。這就是解放區的職工們在發展工業中所應採取的基本方針和基本態度。

第四節

為使解放區的工業能夠健全的發展，以下各項問題必須系統的加以解決：

第一項：關於工業的計劃性，這是今天首要提出並且可能解決的問題。首先從基本解放區做起，從國營、公營企業做起，經過調查研究，通盤籌劃，使軍火工業、重工業、輕工業之間的比重，機器調劑、廠址選擇、動力分配、技術提高之間的關係，原料來源、成品推銷、資金週轉之間的結合，工業、農業、金融、貿易、交通各部門之間的合作，各工廠、企業之間的配合，都應有適當的計劃，同時照顧到對合營、私營企業的調劑作用與領導作用。這種地方性和局部性的計劃經濟，在今天，能夠發展社會生產力，特別是工業生產力，適應戰爭需要；對將來，則能夠為逐步實現的全國性和全面性的計劃經濟取得經驗和創造若干前提條件。必須肅清公營企業中某些缺乏計劃、缺乏領導的無政府狀態，使一切公營企業都能在統一領導統一計劃之下進行生產，然後才能對私營與合營的企業實行有計劃的領導與調劑。

第二項：國營、公營企業必須切實改善經營和管理工作，才能達到原料足、成本低、質量好、數量多、銷路廣的目的。這個任務的解決，主要在於貫徹企業化原則和實行管理民主化。為了貫徹企業化原則，就要製定周密的生產計劃，實行從原料、生產到推銷的全過程中的經濟核算制度，就要以經營能力、勞動技術及盡忠職責為用人標準，推行考工制度，保證合理的勞動條件，做到機構合理，職工精幹，各盡其職；就要實行嚴格的個人負責制度，勞動紀律與賞罰制度，實行勞動檢查與成品檢驗，做到人盡其責，功過分明，賞罰適當。為了實行管理民主化，需要在各企業各工廠中建立統一領導的工廠或企業管理委員會，由經理或廠長、工程師及生產中其他負責人和工人在工人代表大會上所選出的代表（相當於其他委員的數目）組成之。工廠或企業管理委員會在上級國家企業機關領導之下為工廠或企業中的統一領導機關，由經理或廠長任主席，討論並決定有關工廠或企業管理和生產中的各種問題。在工廠或企業管理委員會多數通過的決議，如經理或廠長認為與該廠或該企業利益抵觸或與上級指示不合時，經理或廠長有停止執行之權，並報告上級，請求指示；如工廠管理委員會多數委員認為經理或廠長的這種措施不適合或對其報告有異議的，亦可將自己的意見同時報告上級，一併請求指示，但在未得上級指示前，應執行經理或廠長的決定；如工廠管理委員會少數委員對多數通過的決議有不同意見時，亦可將自己的意見報告上級，在有緊急問題不及等待管理委員會開會時，經理或廠

長有積慮之，但事後須將經過報告管理委員會，請求追認。此外在五百人以上的大工廠還可由各部門職工（包括學徒）代表組成工廠代表會議，在工廠管理委員會領導之下，傳達和討論工廠決定、生產計劃與經驗的總結，以便更多地吸收羣衆建議與批評。現在黨已在許多工廠中通行的生產小組會議，亦應發揮其應有作用。只有經過這些集中領導下的民主形式和民主方法，才能培養職工管理能力，發揮廠內批評與自我批評，克服官僚主義作風，提高職工的責任感、勞動積極性與紀律自覺性，並發展正確的勞動競賽和勞動英雄運動。

在私人企業和工廠中，實行管理的民主化，實行工廠或企業管理委員會制與工廠職工代表會議制，對於保證勞資協力提高生產，保證勞資兩利，公私兼顧及保證國家工商業政策和法令的執行，都有極大好處，應說取資本家並在資木家同意之下採用這種制度。私人企業和工廠中如組織工廠或企業管理委員會，廠長或經理有最後決定權。如職工代表認為該廠廠長或經理的決定與國民生計或勞資兩利的方針有抵觸時，職工代表得將不同的意見提交政府機關與勞動局請求仲裁。

第三項：目前在工業中的技術幹部很不夠，管理幹部更感缺乏，對於這個工業骨幹問題必須有切實的解決辦法。應從現任幹部中提拔優秀分子逐步昇級，幫助一切現任幹部提高其智能。在工廠較多的地方，則開辦職工學校。在工業以外的許多工作崗位上，有不少職工出身、或受過工業專門教育、或有過工業管理經驗的幹部，應徵調一批來參加工業管理工作。對新解放企業中願意繼續服務的舊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除查有證據的破壞分子外，必須儘量任用，必須很好地團結他們並幫助他們改變舊的勞動態度和管理方法，尤其是對待工人的態度。對自動來解放區服務的工業人材，應一律歡迎，使他們參加適當工作。此外，還須徵調有相當文化水平的普通知識分子到工廠中學習管理工作。在學生、師資和設備等條件相當具備的地方，開辦工業專門學校，以訓練新的工業幹部，也是很必要的。

第四項：由於目前空前規模的戰爭環境，解放區農民們大基地出兵，出糧，出戰勤，公教人員則堅持辛勤的工作，解放區職工們更應當吃得苦，做得多。對於工時、工資、勞動保護和福利事業等，應當自覺地避免超過戰時經濟條件所許可的過高的要求。關於勞動時間，我們主張工廠工人一般實行八小時至十小時制度。對特殊企業或特殊情況，經當地政府批准，得延長或縮短之。但除戰爭緊急需

要外，每日勞動時間連加工在內，最高不得超過十二小時。加工遲誤不得超過四天，全月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農業工人、手藝工人及店員的勞動時間，可以按照習慣行之。

第五項：關於工資的規定，必須保障任何普通職工最低生活水準，即職工最低工資，連本人在內要夠維持兩個人的生活；同時，又必須保障職工的勞動熱忱及技術的進步，而採取等級工資制及計時、計件工資制，但職時物價不可避免地會有波動，為保障職工最低生活水準，最低工資不能不因物價高漲而增加，而等級工資則因職時經濟條件所限制却不能照此比例增加；因此，在規定職時工資時，不能不照顧這兩者間的關係，並相當縮小等級工資各級間的距離。本此原則，我們主張依下列規定來調整職工的工資：

第一點：工廠工人的工資，應採取交叉累進的等級制度。在此制度內，依據職工在生產過程中的分工與技術程度，規定等級，等級不限於三等，級數宜多，同級工資仍保留若干差別。評議工資時，對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依其職責能力及學識經驗，對工匠，依其技術；對熟練工人，依其熟練程度；對單純體力勞動者，依其勞動程度；同時，照顧他們的工齡。應由各解放區地方政府，在工會同意之下，給同種企業規定相對統一的工資標準，但不可對不同企業規定同一工資標準。再由各工廠根據政府頒佈的工資標準，評議每個職工的具體工資（可在工廠或企業管理委員會之下組織工資評議委員會）。學徒待遇，不應列入工資系統，學徒亦不應參加工資評議。合理工資制度實行之後，個別有特殊技能的職工，需要給予特別優待者，須經高級管理機關批准。現時工資制度中存在的過高或過低的偏向，本質上是一種平均主義。平均主義的發生，是受了供給制度及其他錯誤思想的影響。平均主義的實質，則在於不了解上述工資原則和等級制度的必要性和嚴重性，而或多或少地將被養人口、生活好壞、家庭出身、政治積極性、工人高於職員、學徒當作普通工人、不熟練工人當作學徒等等，作為固定工資的根據，並將各種工資等級排成非交叉、非累進、等級少、最高最低相距甚近的單一梯形，甚至對各種不同企業規定同一工資標準。這種平均主義嚴重地妨害了職工的生產積極性，尤其是努力提高技術的積極性，必須迅速糾正之。

第二點：工資形式，計時或計件及其運用，應依勞動具體情況決定。計件制有剝蝕生產作用，應

當推行；但在成品標準和成品檢驗方面還沒有確切把握時，不可冒險採用，同時還要防止原料浪費、工具損壞及損壞健康的過度勞動。

第三點：在物價波動太大而工資調整發生困難的地方，還可採用職工生活補貼的辦法，來調劑這種困難。生活補貼應也應分為若干等級，但其差額不宜太大。

第四點：工資計算應以幾種必需品實物為工資計算基礎（例如華北之「飯」，東北之「分」），並採用貨幣和實物混合的支付形式。為了進一步保證職工的實際工資，應採用新的實物配給制度。這可在國營、公營工廠中試行，取得經驗後，再加以推廣。

第五點：農業工人、手藝工人及店員的工資制度，得從其習慣，但要以必需品實物為計算基礎，並在支付時保證實際工資與名義工資一致。

第六點：國營、公營工廠，除工資外，還可採用定時獎金辦法，由政府規定或批准之。作坊、商店、私人企業中的分紅、贖賸及其他獎賞習慣，凡對提高職工勞動積極性及技術進步有益者，均須予以保存，並須普及於全體職工。

第六項：關於女工、青工、童工、學徒，應實行下列各點規定：

第一點：男、女、青、童工，同工同酬。

第二點：女工產前產後共休息四十五天；小產在三個月以內，共休息十五天；三個月以外，共休息三十天，均照給工資。

第三點：禁用童工、女工的產業，及禁止女工、童工作夜工的勞動，由各解放區地方政府以法律定之。妨害身體發育的勞動，不得使用未滿十四歲的童工。

第四點：學徒最高學習期限，不得超過三年。學徒待遇，依其進度，逐步增加，最低夠吃，最高除夠吃夠穿外給予相當津貼。師徒關係，應遵守尊師愛徒原則；學徒必須盡心學習、努力生產，師傅不得虐待徒弟，尤須盡心傳授技術。

第七項：關於勞動保護和職工福利事業，因在中國從無基礎，又處在戰爭時期，我們要來辦理全國有系統的社會保險，沒有困難，暫時應依下列各點辦理：

第一點：儘可能改善工廠健康設備和安全設備，政府定期派人檢查。
第二點：傷亡、疾病、老殘等等的醫藥、津貼、撫卹，概由工廠負責辦理，或由工廠和工會共同負責辦理，其辦法由政府規定或批准，並監督實行。在工廠集中的城市或條件具備的地方，可以創辦勞動的社會保險。

第三點：職工福利事業（文教、合作及貧困的救濟等），由工廠和工會共同負責或分別負責辦理。

第四點：以上辦法適用於工廠職工，其他非工廠職工勞動保護和福利事業，由工會參照固有習慣與業主協定之。

第五點：工業救濟，主要為幫助就業、組織生產，由政府負責辦理。

第八點：國營公營企業中的勞動競賽和勞動英雄運動，對發展生產起了積極作用，今後仍要提倡這種運動，並給以正確領導，使之成為以降低成本、提高生產質量、增加生產數量為目標的功利主義，成為互相學習、幫助少數、帶頭推動集體英雄主義；而對那種粗製濫造的形式主義和脫離羣衆的個人錦標主義的傾向，則須加以堅決的糾正。在採用了工廠或企業管理委員會和職工代表會議制度的私人工廠和企業中，勞動競賽和勞動英雄運動，也可以推行。

第九點：勞動契約與勞動爭議，應依下列各點辦理。

第一點：勞動須有契約，並儘可能採用集體契約形式，以便雙方履行。集體契約應包含勞動條件、職工之任用、解僱與獎勵、勞動保護與職工福利、廠規要點等內容。

第二點：勞動爭議的處理方法，為協商、調解及仲裁，仲裁為最後程序，仲裁不服得向法院上訴。

第三點：各解放區地方政府，須頒佈集體契約條例及勞動爭議處理辦法，並須設立掌管有關勞動問題的部門。

第五節：

在解放區工會工作的任務，是在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總方針下，團結全

整職工，積極勞動，遵守紀律，保護職工的日常利益，教育職工提高他們的文化水平，尤其是提高他們的技術能力和業務水平。在國營、公營、合營企業中，發揮管理能力；在私營企業中，實現監督作用；在保證勞動中，促進技術改良和生產合作。高級的工會機關，有責任協助政府的勞動立法，並採取具體辦法，以保證前節各項規定的合理實施。一切依法取得職工成分的男女職工，均有加入工會的權利；但會員徵收，必須自願原則。工會不僅為會員服務，而且同樣要為非會員服務，吸收他們參加活動，方能實際上代表全體職工，爭取所有職工加入工會。工會內部須有充分的真正能集中羣眾意見的民主生活，須有切實的真正能夠解決羣眾需要的經常工作，並須徹底整頓現在工會工作中的官僚主義作風和形式主義作風，做到工會名符其實地成為職工自己的組織。

第四章：關於恢復全國總工會

爲了保障這個決議的實行，保障中國工人階級在目前大革命中能夠到處充分發揮其應有的先鋒隊的作用，必須成立中國工人階級的統一的全國組織，以便在迅速發展的革命運動中能夠經常指導各地職工羣衆的行動。爲此，大會決定恢復第一次大革命時期的中華全國總工會，並命令全國總工會新的執行委員會：繼續第一次大革命時期全國總工會的革命傳統，在當前新的時期和新的條件之下，迅速組織全國的職工羣衆，並和全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少數民族聯合一致，爲迅速推翻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政府在中國的主權，爲建立統一的新民主主義的人民民主共和國而奮鬥到底。

中共中央關於建立

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決議

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

(一) 中國青年，在中國人民的長期的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鬥爭中，特別是在抗日期間及抗日勝利以後的反對美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反動政府的鬥爭中，在中國解放區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種建設中，都起了偉大的積極的作用；經過了長期的各種鬥爭的鍛鍊和中國共產黨的教育，他們的政治覺悟已經普遍地提高，湧現出了大批先進的積極份子，因此，僅有青年救國會、青年抗日先鋒隊、青年讀書會等類形式的組織與活動，已經不能滿足這些先進青年積極份子的要求；而黨在解放區青年羣衆中的工作，也因為缺少先進青年有組織有系統的推動，常常流於鬆懈，不能發揮應有的力量。一九四六年十月，我黨中央即已發出建立先進青年積極份子的組織——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提議，並責成各中央局、各分局擇地試辦；兩年以來，在東北、華東、華北、西北（包括晉察）各解放區，都已在若干地區建立了有組織的組織。各地區試辦青年團的結果證明：凡是根據中央提議的精神所建立起來的青年團，都受到廣大青年羣衆與成年人民羣衆的愛護，它在領導和團結廣大青年參軍、參戰、發展生產、土地改革、民主建設和文化事業中表現了極大的作用。事實證明，建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是完全可能的與必要的。根據此種需要，並為鞏固精教育青年的一代，以及更大地發揮青年羣衆在人民解放戰爭中與新民主主義國家建設中的積極性與創造性，中央正式決定在中國普遍建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組織。

(二) 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是在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領導之下堅決地為新民主主義而鬥爭的先

進青年們的羣衆性的組織，是黨去團結與領導廣大青年羣衆的核心，是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青年的學校。它的任務，就是首先要團結和組織先進青年的積極份子，再經過這種青年積極份子的組織去團結和教育廣大的青年羣衆，和中國人民一道，爲了徹底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與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統治，爲了建立新民主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爲了全中國和全人類的徹底解放事業而奮鬥到底，並在這種實踐的奮鬥中不斷地教育中國的青年。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應當吸收一切堅決擁護中國共產黨的主張，願爲新民主主義的事業而積極奮鬥，願爲勞動人民忠誠服務的男女青年爲團員，其年齡一般地應爲十五歲至二十五歲。正因爲它是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就應該比較過去的共產主義青年團，更爲廣泛地吸收各民主階層中的青年積極份子入團，以擴大自己的羣衆性，但是它仍然是中國青年羣衆中的先進積極份子的組織。而不是普通的一般的青年團體。只有很好地組織中國青年中的積極份子，才能使中國廣大的青年羣衆有一個鞏固的核心，在全國青年羣衆中進行堅決不移的工作。否則，就不能很好地團結全中國的青年羣衆。團員成份應以青年工人、青年農民和一般勞動青年中的積極份子和其階層出身的革命的青年知識份子爲基礎，同時也應當吸收其他階層中的進步的覺悟的願爲新民主主義而積極奮鬥的青年人參加。團內生活，應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充分地發揮民主的與羣衆化的生動活潑的作風，培養團員的積極性與創造性，並訓練他們的組織性與紀律性。應當特別注意防止在青年團的工作中和作風上產生狹隘的關門主義、青年先鋒主義或宗派主義的偏向。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在政治上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但在組織上應當保持自己的獨立系統，黨無權直接命令青年團。青年團內的黨員，必須服從黨的一切決議，並以不疲倦的說服教育工作和自己的模範行動，來鞏固黨在青年團中的領導。

(三)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基本任務，在於有系統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從革命實踐中不斷地教育自己的團員和青年羣衆，同時應當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精神組織廣大青年羣衆積極地參加我黨和人民民主政府所號召的各種運動。因此，應在爲人民大眾與青年服務的基礎上，創造適合環境特點與青年興趣的各種方法，團結和領導廣大青年羣衆去實現下列各項工作：

第一、當前中國人民的兩大戰略任務爲爭取人民解放戰爭的徹底勝利，和恢復與發展一切解放區

的生產事業，青年團必須引導青年羣衆積極參軍、參戰、支前以及發展農業與工業生產，作爲自己一切工作的中心。

第二、青年團應在大多數人民的最大利益的基礎上，經常地注意和努力爲青年羣衆的特殊利益與切身需要而服務，並在這種努力中逐步地引導廣大青年羣衆去參加人民民主國家的軍事的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各種建設工作，和國際青年的反帝國主義的民主和平運動。

第三、在青年團員與團外青年羣衆中，廣泛地有系統地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教育工作，使他們逐步地學會使用馬列主義的辯證唯物觀點，去認識社會發展過程，認識中國革命發展的規律和學習文化、科學、生產與軍事知識，學習業務與技能，使每個團員在思想上、政治上、文化上與工作上，不斷地提高自己。一切青年團員應該把宣傳馬列主義思想和新民主主義的各種政策作爲自己的光榮責任。青年團並應幫助政府教育機關，去改進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

第四、領導少年兒童工作，吸收七歲到十二歲的兒童參加兒童團，吸收十三歲到十七歲的少年參加少年先鋒隊，較小農村則合組爲少年兒童團。青年團應選派最好的幹部領導這一工作，並在各級團委之下設立少年兒童部，或少年兒童委員會，作爲兒童團和少年先鋒隊的領導機關。

(四)新民主主義青年團要建立在青年羣衆的自願的和自覺的基礎之上，要在羣衆運動與各種工作中公開地進行建團，因此，應在人民羣衆和青年羣衆中進行經常的關於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宣傳工作，在人民羣衆和青年羣衆中樹立對於青年團的正確的認識。在開始建團時，尤須深入宣傳與充分醞釀，然後根據本人自願，經過入團手續正式入團。應當絕對防止在發展團員的工作中採用強迫辦法，隨便拉人入團的辦法和簡單地追求團員人數衆多等項錯誤的作法與急性病。在建團工作中，一方面必須保持團在政治上的純潔性，同時也要防止狹隘性，將一些先進青年拒絕於團的大門之外，妨礙團與廣大羣衆的聯繫。各地黨的組織必須將現有青年工作幹部加以審查，並積極與迅速提拔，抽調一批思想正確、聯繫羣衆的青年男女黨員幹部，經過短期訓練，使他們能夠正確地掌握建團的方針。各級團委負責人應由相當於同級黨委委員與下一級黨委書記的幹部兼任。兩年來建團的經驗證明，掌握中央建團方針，訓練和配備足夠數量的青年工作幹部，乃是建團所必須的基本條件。

建團的步驟，應當是有重點地逐步地向前推進，首先從城市、工廠、學校、部隊及人口較集中、黨的工作基礎較好的村鎮開始，然後再求普遍的發展。在上述地方，尚無團的組織時，黨必須養成這些地方黨的組織，劃出一部份年青而優秀的黨員充當團員，作為建團的基礎與骨幹。區以上得設青年團籌備委員會，在一個工廠、學校、街道或農村中，有五個團員，應即成立團的支部，一個區內有三個支部以上，即應正式成立團的區委，一縣或一市，有三個區委以上，即應正式成立團的縣委或市委的組織，使團的組織與工作能迅速地得到發展，然後召集各地方各省及各解放區的青年團的代表大會，選舉各地方各省及各解放區青年團的領導機關。新解放的城市與地區，因無工作基礎，建團時則須較老區半老區有更充分的宣傳鼓動與準備工作。

(五)中央決定在一九四九年夏季召開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製定青年團的工作綱領、團章，並選舉青年團的中央委員會，目前應即由地方青年團建立全國青年團的籌備委員會，籌備青年團代表大會的召集。並提議於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前後，召開全國青年代表大會，成立全國青年的聯合會。

爲了有計劃地訓練青年團的幹部，除中央已經負責中央青年工作委員會舉辦團校外，各中央局、區黨委、省委、地委、縣委和市委並應在各該地區舉辦團的學校或訓練班。爲了指導全國青年團的工作和組織廣大青年學習，中央決定由中央青年工作委員會負責出版「中國青年」的定期刊物。

(六)建立全國性的和各地方的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是當前青年運動的中心環節，是黨在目前革命形勢勝利發展下的極重要工作之一，各地黨委必須予以重視。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區黨委、縣委和市委，（人民解放軍的各級黨委關於在軍隊中如何建團另行規定通告）接到此項決議以後，應即召開會議，定出具體工作計劃，並切實監督執行。（新華社一月二日電）

中國新民民主主義青年團團章

(中國新民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團定名為中國新民民主主義青年團。

第二條：本團為一切願為新民主主義的徹底實現而奮鬥的先進青年的羣衆性的組織。它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毛澤東思想教育團員，並團結全國一切民主青年羣衆，同全國人民一道，為徹底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與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政治；為獨立、和平、民主、富強、統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设與新民主主義的徹底勝利而奮鬥；並聯合世界一切革命的和民主的青年團體，為全世界持久的和平與人民的民主，為全人類的徹底解放而奮鬥。

第二章 團員

第三條：凡年在十四歲以上，二十五歲以下（均按實足年齡計算）的男女青年，擁護中國共產黨的主張，願為新民主主義的革命事業積極奮鬥，願為勞動人民忠誠服務，承認團章，服從決議，參加本團工作者，皆可申請入團，其手續暫定為以下兩種：

甲、凡本人志願申請入團，有一個正式團員或一個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的介紹，填寫入團志願書，經團支部委員會審查，與支部團員大會通過，團區委（或相當於團區委的團委）批准，舉行入團儀式。

乙、凡少年先鋒隊員已達入團年齡，志願申請入團者，得由少年先鋒隊的基層組織的負責介紹，由本人填寫志願書，經團支部委員會審查，與支部團員大會通過，團區委（或相當於團區委的團委）批准，舉行入團儀式。

第四條：勞動青年，革命青年軍人，革命知識青年，和革命職員入團，在經過前條所規定的入團手續後，即可正式入團，無候補期。凡上述青年按照前條所規定的入團手續申請加入本團，但其有某些條件尚不夠為正式團員者（特別在新發展區域中），得加入本團為候補團員，候補期為三個月。其他社會成份的青年入團，在經過前條所規定的入團手續後，必須經過三個月至半年的候補期，才能通過為正式團員。脫離反動黨、派、社、團的一般人員入團，其手續則須有正式團員三人或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兩人介紹，半年至一年的候補期，經團縣委批准；其在反動組織較為負責的人員，則應經省級以上團委特別審查批准，方得入團為團員。

第五條：當候補團員候補期滿，如其準備程度尚不夠為正式團員時，得由團支部委員會延長其候補期限或取消其候補資格。如候補團員在候補期內，表現在學習與工作上特別有成績者，亦得由團支部委員會縮短其候補期。

第六條：超過二十五歲之團員，仍可留在團內，有發言權與被選舉權，而在被選入領導機關時，則仍有選舉權與表決權。

第七條：本團團員的義務如下：

(一) 努力學習和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毛澤東思想。努力精通所從事的業務，掌握科學技術，不斷提高自己政治文化水平及實際工作能力。

(二) 努力學習軍事，鍛鍊體格，隨時準備以無限忠誠，獻身祖國，保衛人民利益。

(三) 積極參加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各種建設工作，努力生產勞動，反對遊手好閒，歧視婦女，封建迷信以及其他一切腐化墮落行為。

(四) 愛護人民與國家財富，自覺地遵守各種革命秩序與紀律，與一切損害人民及國家財產及破壞公共秩序的行為作鬥爭。

(五) 積極參加工作，經常出席本團的會議，繳納團費，確實執行本團所給予的任務，在實際生活中，密切聯繫羣衆，作青年的模範。

第八條：本團團員的權利如下：

(一) 在本團內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二) 按照本團所規定的一定的秩序，自由並確實地討論本團的一切工作問題，並可越級向上申訴自己的意見，批評本團的任何工作人員，提出任何建議。

(三) 提出自己不能解決的問題，要求團的組織給他必要和可能的幫助。

第九條：候補團員除無表決權，選舉權及被選舉權外，其他權利和義務，皆同於正式團員。

第十條：本團團員有隨時退出本團組織的完全自由。

第十一條：凡團員沒有正當理由，在四個月內不參加團的工作者，即認為自行脫團。

第三章 組織

第十二條：本團以民主集中制為組織原則。本團各級領導機關皆經選舉產生，各種重大問題應經過民主的方式來決定。本團的秩序是：少數須服從多數，下級必須服從上級，個人必須服從組織。

第十三條：本團的團員大會及各級代表大會，是團的各級組織的最高權力機關，必須定期舉行，團的代表大會兩年舉行一次，由團員大會及各級代表大會選舉團的各級委員會，並審查與確定團的工作。在大會閉幕期間，團的各級委員會，是為該級的最高權力機關。

第十四條：按照生產、職業和行政區域的劃分，建立本團的各級組織機構：

(一) 每一工廠、企業、運隊、學校、機關、街道、農村（或鄉），有團員五人以上，即成立團的支部。支部下劃分若干小組，每組三至十人，百人以上即成立總支，下設分支。五百人以上設該單位的團委員會。

(二) 在一個區內，有三個以上的支部，即應成立團的區委員會。在一個縣或市，有三個以上的區委，則應成立團的縣委員會或市委員會。

(三) 在各區域（如東北區、西北區、華北區、華東區、中原區等）、各省、各專區、各縣（市）、各區，各設團的區域委員會、省委員會、地方委員會、縣委員會（市委員會）、區委員會。

(四) 各級團委員會中設常委會書記及副書記，由委員會推選產生之。並根據實際需要，分設組織、宣傳教育、青年工人、青年農民、學生、婦女、少年兒童等部門（或委員會）。

(五)各級團的領導機關，均實行委員會制與集體領導制。

第十五條：本團承認團外青年羣衆和一般人民羣衆對於本團的工作和組織有批評和建議之權，團的基層組織的會議，和各級代表大會，可以邀請團外青年羣衆和人民羣衆或其代表列席。

第十六條：人民解放軍中的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組織和工作，由團中央委員會與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另行規定之。

第四章 支部的日常工作

第十七條：本團的基層組織，是團的支部，支部是團的工作和活動的基本單位。支部的經常工作，主要的有如下各項：

(一)推動和組織青年積極完成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民主政府、本團的上級組織和本支部所確定的各種重大工作任务。

(二)組織和推動團內外青年的政治文化科學技術的學習，不斷提高政治覺悟和業務知識。

(三)時刻注意密切地聯繫青年羣衆，經常了解並向本團領導機關反映青年羣衆的情緒和要求，適當解決當青年羣衆的需要，進行青年的文化、娛樂、體育活動。

(四)討論與執行團的上級組織的指示和決議，定期向團員大會及上級做工作報告。

(五)檢查團員的日常活動和學習，發揚切合實際的批評與自我批評。

第五章 紀律、獎勵與處分

第十八條：本團一切團員和一切組織均應自覺地遵守以下紀律：

(一)不違背、不損害人民羣衆的根本利益。

(二)確切、迅速而完滿地執行團的決議。

(三)以身作則地服從政府法令。

(四)遵守團的章程，履行團的義務。

第十九條：凡在人民事業中表現出高度的忠心，並有特別功績和貢獻者，應給予適當獎勵。獎勵的目的是爲了教育團員，建立團的優良作風。

第二十條：凡是嚴重違犯團章。團紀的行爲者，應按照具體情況給予適當的處分。處分分爲勸告、警告、嚴重警告、撤職、定期停止團籍、開除團籍。對團員的處分，須經過團支部討論，和上級批准。被處分的團員，有申辯之權。團對犯錯誤同志的批評或處分是爲了教育團員，爲了懲前毖後，治病救人。

第六章 經費

第二十一條：本團經費來源如下：

- (一) 團員定期繳納團費。
- (二) 由本團所舉辦的各種事業的收入。
- (三) 由社會各界人士與團體的捐助。

第七章 附則

第二十二條：本團章由團的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產生之，修正之權屬於團的全國代表大會。團的中央委員會有解釋之權。

把我們在城市中的組織形式

和工作方式適應城市的特點

本社今天發表了天津市改組區政府和街公所組織的新聞。這是使我們人民城市的工作方式和組織形式適合於城市特點的一個顯著的例子。現在在解放區的許多城市中，政權機構分為市、區、街三級。區、街政府成了城市政權機構中的一級，負責處理勞資糾紛、經濟工作、教育工作、治安工作等。這完全是把農村中的工作方式和組織形式搬到城市中來的錯誤作法。縣、區、村三級的政權機構，在農村中是完全必要的，因為那裏的經濟是分散的，人口是分散的，村莊是分散的，必須有這樣的組織機構，才能使我們的政權緊密地和農民羣衆聯系，進行各項工作。但是，城市的情形則完全不同，這裏的經濟是集中的，人口是集中的，地區也是集中的，而且又有着現代的交通工具，人民政權的組織機構和工作方式也必須是集中的，一切工作的決定權應集中到市政府，由市政府及其各個工作部門直接出面來處理和解決事情。事實證明，城市中各區、街內的工廠、銀行、機關、學校等是區、街政府管不了的，而且也不應由區、街政府去管理，否則，區、街政府就難免各自為政，必然形成無政府、無組織狀態，市政府的政策、決定很難迅速貫徹下去，有時甚至被歪曲。同時，這種將城市政權工作分散和割裂的作法，必然會削弱市政府和廣大市民的聯系，脫離羣衆，助長工作中的官僚主義和文牘主義的作風。城市中區的組織（可稱區公所）只能是市政府的代理機關，執行市政府所指定的某些民政工作，並協助市政府了解各區的情況，其原有的工商、合作、文教、戶政等工作，應交由市政府的工商局、勞力局、合作社總社、教育局、公安局等集中處理。街政府或街公所則應一律取消。城市的戶政和治安的管理工作應集中於公安局。公安局可按實際情況在全市設立若干派出所，指派忠實可靠，積極負責的人員去做這一工作，使派出所成爲人民城市公安工作的可靠的基點。這種組織形式的改

變，目的是使城市中的一切經濟、政治、文化等項工作集中於市政府，使市政府的一切工作決定能迅速貫徹實施，並加強市政府直接與市民羣衆的聯系。這也就是使我們的政權工作適應於城市的特點。目前在我們的城市中工作，還存在着不少不適用於城市的農行的工作方式，和組織形式，這些組織形式和工作方式，是我們在長期農村工作中所習慣了的，必須以最大的努力模範城市的特點，迅速地加以改變。否則我們就不能很好的管理城市，迅速而正確地實現我們的城市政策。天津黎區府政府組織之值得我們重視，其原因就在這裏。（新華社北平二十二日電）

消滅麻痺傾向

撲滅特務匪徒

毛主席在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開幕典禮的講話中，向全國人民指出中國民主聯合政府一經成立，它的第一項重要任務將是「肅清反動派的殘餘，鎮壓反動派的搗亂。」毛主席說：「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中國反動派對於他們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的失敗，是不會甘心的。他們還會要互相勾結在一起，用各種可能的方法，反對中國人民。例如，派遣他們的走狗鑽進中國內部來進行分化工作和搗亂工作。這是必然的，他們決不會忘記這一項工作。例如，唆使中國反動派，甚至加上他們自己的力量，封鎖中國的海港。只要他們還有可能，他們就會這樣做。再則，假如他們還想冒險的話，派出一部分兵力侵擾中國的邊境，也不是不可能的。所有這些，我們均必須充分地估計到。我們決不可因為勝利，而放鬆對於帝國主義分子及其走狗們的瘋狂的報復陰謀的警惕性。誰要是放鬆這一項警惕性，誰就將在政治上解除武裝，而使自己處於被動的地位。在這種情況下，全國人民必須團結起來，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粉碎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中國反動派的任何一項反對中國人民的陰謀計劃。」

外國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中國反動派的搗亂陰謀，正在一天比一天更多地暴露了出來。這是因為反動派對於中國人民的公開的武裝的鬥爭已經失敗，正在一天比一天更多地讓位於隱蔽的鬥爭。在城中，國民黨區黨在潰逃或被殲以前，在帝國主義者的指使和幫助之下，預先有計劃地佈置好了潛伏的特務活動。解放以後，特務匪徒們便施放謊言，偵察情報，組織搶劫暗殺，擾亂社會治安；印製假鈔，擾亂金融，歪曲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挑撥勞資糾紛，阻礙生產的迅速恢復；他們用縱火、爆炸和其他暗害方法，破壞國家的工廠、礦山、倉庫及其各種設備和物資。滯留的美國間諜案，北平國民黨特務匪徒的縱火和暗殺暴行，以及中外破壞分子在上海所進行的形形色色的搗亂工作，顯示帝國主

黨者和國民黨匪幫，正在大規模地利用特務活動，對於人民民主統治進行反抗和破壞。在農村，尤其是解放不久的河南、安徽、湖北和江蘇廣大農村，國民黨匪幫正大批派遣特務，勾結當地反革命的惡霸分子，利用封建會門，組織土匪，燒殺淫掠，陷害人民，甚至襲擊區村政府機關和地方人民武裝，搗亂人民解放軍後方。事實告訴我們：不徹底肅清這些特務匪徒，社會秩序和人民生活將無法安定，各項革命工作將很難推進，毛主席所提出的另一重要任務，即恢復和發展人民經濟事業和文化教育事業，也將不能順利地實現。

當然，帝國主義者和國民黨匪幫要想以特務匪徒的搗亂破壞，來推翻獨立民主富強的新中國的建立，那只是做夢。但如果我們輕視這些敵人，以為革命勝利，萬事大吉，只要多喊幾句「萬歲」，就可安心睡覺，那就是極大的錯誤了。敵人雖然已經失敗，但是還沒有完全消滅。在拿槍的敵人被消滅以後，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他們必然地要和我们做拚死的鬥爭。而且敵人越是接近死亡，便越是瘋狂和殘暴。如果我們不牢牢記住毫不放鬆警惕，那麼我們真會吃大虧，就會使人民民主運動受許多可以避開的損失。過去若干地方特務匪徒之所以能夠達到破壞的目的，正無一不是由於我們的幹部在政治上或多或少有的麻痺所致。現在和將來，特別是目前新中國剛剛在建立的時機，敵人是一定會利用我們的困難，對人民的國家進行反抗和破壞的，問題在於我們自己是否經常地保持戒備狀態、組織力量、和敵人的這種搗亂活動進行鬥爭。

無數的事實已經給予我們足夠的教訓，要求我們共產黨員、人民政府和民衆團體的工作人員和各界民主階級的人民，高度警覺起來，共同展開除奸防特的鬥爭，撲滅帝國主義走狗國民黨特務匪徒的陰謀活動，保衛人民的祖國。我們要採取堅決而又靈敏的步驟，進行周密細緻的組織工作，來鎮壓這些反革命分子的搗亂。因此，一方面要克服驕傲自大，麻木不仁；另一方面也要防止捕風捉影，打草驚蛇。對於查獲的特務匪徒，應按情節輕重採取分別對待的辦法，對那些被迫參加，真心悔悟的分子，可寬大處理，給以自新之路；對那些作惡多端，不知改悔的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分子，應該發掘人民民主政權的威權，嚴加懲辦，為民除害。（新華社北平廿五日電）

保護人民祖國的財產

最近不少地方的國家工廠企業接連發生失火和被毀事件。以北平一地為例，不久以前鎗車廠會特務縱火焚燬電車五十餘輛，五月二十五日又發生石景山鋼鐵廠化驗室失火案，使國家財富遭受重大損失。對於這樣嚴重危害人民祖國的事件，決不應讓它繼續發生，而必須迅速地採取必要的步驟，予以根絕！

誰都知道，由於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長期的統治，中國的工業基礎十分薄弱，經濟處於落後狀態。在人民民主革命即將取得全國範圍的勝利的時候，放在中國人民面前的一個最艱巨而偉大的任務，就是恢復和發展生產，使中國由落後的農業國變成先進的工業國，走向獨立、民主、富強的道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經過全國人民的勤勞努力，加上其他有利因素，這一切近百年來許多優秀人士所懷抱的理想，是有把握在相當時期內實現的。但要建設工業，就必需有大量的資金。我們不能像帝國主義國家那樣從掠奪和剝削殖民地和其他原始積蓄的野蠻方法來取得它，只有充分地利用現有的薄弱的產業基礎，用雙手辛勤地寫作，一點一滴地積聚起來。因此，現有的國家財產，就是一柄鐵錘，一個螺絲釘，對於我們都是十分寶貴的。如果我們不能嚴肅地負責保護自己人民祖國的財產，那麼我們的經濟建設事業將會受到絕大的困難。所以，對於所有一切國家財產，每個有愛祖國的中國人，首先是共產黨人和工人階級，應該像保護自己的生命那樣地來愛護它。

檢查各地工廠企業的被毀事件，主要地不外兩個原因：一是國民黨匪幫和特務匪徒的破壞。帝國主義走狗國民黨反動派是從來不要祖國的，現在由於他們的統治已經滅亡，國家成爲人民的了，便更加窮兇極惡地進行破壞和搶劫。他們知道，中國人民正在兢兢業業地從事恢復和發展生產，醫治戰爭的創傷，建設國家經濟，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便處心積慮地進行破壞，企圖毀滅國家經濟，使人

民生命陷於絕境，從而動搖人民民主政權的統治。國民黨匪幫在潰逃的時候，大肆洗劫和破壞許多城市和鄉村；而在這些城市和鄉村被解放後，又以預備的特務匪徒繼續執行暗害勾當。北平電車廠電車的被焚火焚燬，便是特務匪徒們所做的千百種這種罪惡的暗害勾當之一。二是我們某些經濟管理人員的對於國家財產的不負責任的態度。他們中間目前存在着一種極端有害的思想，就是僅僅知道貪污可恥，而對於自己玩忽職守，失於檢點所招致的國家和人民財產的鉅大損失，則錯誤地認為偶然不憤，燕不在乎。正因如此，所以在某些國家企業內部，依然存在着官僚主義的作風，管理組織和制度鬆弛，紀律弛廢，防火安全設備不週，平時疏於防範檢查，一旦發生事故，大則滿足於檢討，小則根本不向上級報告。如果不向這種官僚主義惡習氣作堅決的進攻，要想保護國家財產完全免於損壞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們爲了制止破壞，以便恢復和發展生產，建設國家經濟，便必須：（一）在工人、職員和經濟管理人員中，經常地進行關於重視和愛護國家財產的教育，使大家認識保護國家財產是每個人的神聖職責。在工廠企業內部開展反對浪費和破壞國家財產的思想鬥爭，堅決地打擊那種對於國家財產的漠不關心的錯誤態度。號召提高警惕，防止特務匪徒的破壞，組織工人糾察隊，保衛工廠、礦山、森林、倉庫、製訂和實施獎懲辦法，嚴明賞罰，保護國家財產者獎，損害國家財產者罰。（二）建立嚴格的檢查制度，經常地檢查和改進工廠企業的管理、組織、紀律、消防安全設備。如因怠於職守或管理不善，以致發生失火或其他災害，其肇事者和主管人員應該受到國家法律的制裁，像這次華北人民政府和北平軍管會在處理石炭山鋼鐵廠化驗室失火案中那樣，嚴格追究責任，扣押追訊當事人，按情節輕重分別處分，是完全必要的，否則，便不能嚴懲國家紀律，並教育我們的經濟管理工人和廣大職工，保障國家財產不受損害。（三）對於那些破壞國家工廠企業和人民財產的特務匪徒，務必將獲案，對於首惡分子查有實據，便應施行嚴厲的鎮壓，使這輩宵小醜類不敢繼續爲非作惡。（新華社北平廿五日電）

論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

劉少奇

目 錄

- 一 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民族觀
 - 二 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民族觀
 - 三 世界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的現狀
 - 四 目前世界的兩大陣營與民族解放運動的道路
 - 五 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的進步性與馬克思列寧主義對於這種民族主義的態度
 - 六 結論：真正的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互相結合
- 保、羅、匈、波、蘇、法、捷、意各國共產黨所參加的情報局會議關於南共問題的決議，斥責了無產階級叛徒鐵托集團的反蘇立場，指出鐵托集團的這種反蘇立場，乃是從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的綱領出發，是走上了叛變勞動者的國際團結事業及轉向民族主義立場的道路。在這個決議上說：「這種民族主義的立場，可能使南斯拉夫變化為一般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喪失南斯拉夫的獨立，使南斯拉夫為帝國主義國家的殖民地。」我們中共中央關於南共問題的決議，也指出：鐵托集團由於違反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一系列的基本觀點，因而陷入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和資產階級政策的泥坑；同時，又說明了情報局作出上述決議，乃是「為保衛世界和平民主事業，保衛南斯拉夫人民免受美國主義的愚弄和侵略，所應盡的職責」。那末，什麼是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與民族問題的關係是怎樣的？為什麼鐵托集團的反蘇立場會使南斯拉夫受美國帝國主義的愚弄和侵略，而喪失南斯拉夫的獨立，使南斯拉夫為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本文打算說明這些問題。同時，為着使問題清楚起見，本文不得不涉及目前世界的一些根本的狀況。

一、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民族觀

民族問題是與階級問題相聯繫的。民族的鬥爭是階級的鬥爭相聯繫的。正如斯大林所說：「在各個不同的時期，各個不同的階級出現在鬥爭舞台上，而每個階級都按照它自己來了解一民族問題」。因此，「民族問題」在各個不同的時期服務於各種不同的利益，具有各種不同的色彩，而這是以那一個階級和在什麼時候提出這個問題為依據。

因此，我們要了解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就必須首先了解資產階級這一個階級。

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即英文「NATIONALISM」或譯為國家主義）的民族觀，即資產階級對於民族的看法及其處理民族問題的綱領和政策，是根據它的階級基礎，從資產階級一階級的狹隘利益出發的。

大家知道：資產階級這一個階級的利益，是建立在資本主義剝削的基礎上，追求利潤又利潤，有高的利潤，還要更高的利潤。資產階級又分裂有幾種不同的階層，即便在同一階層之中，也還分裂有幾個不同的集團。而為着追求自己的利潤，除開不顧一切地剝削無產階級而外，即便在資產階級同一階級之中，他們也是不曾在尖銳的競爭中，互相吞併，大魚吃小魚，大資產階級吞併小資產階級與中等資產階級，以及這一集團排擠或吞併另一集團。資產階級要佔有國內生產資料與國內市場，但因為它的利潤貪慾並沒有滿足的界限，它還要向國外擴大，在國外佔有市場、原料生產地與投資場所，使其他民族為本國資產階級服役，從而剝削其他民族，同時擠掉他國的資產階級或它的競爭者。剝削僱傭勞動，又在資產階級內部互相競爭、排擠、壓迫、吞併、戰爭，以致世界大戰——經過一切方法以求達到國內的獨佔與世界的獨佔，這就是資產階級追求利潤的天性。這就是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階級基礎，也是資產階級一切思想形態的階級基礎。

從這樣的階級基礎出發，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關於民族問題的綱領和政策，就是：在自己國內，要使整個人民的利益服從於它這一階級的利益，把它這一階級或其中某一上層階層的利益，放在全國人民的利益之上，並企圖由他們壟斷「民族」這個名義，宣佈自己是本民族的代表或本民族利益的保護人，以作為欺騙人民的工具；同時，在國外，則把自己民族（實質上是指它的上層階級）和其他民族的利益對立起來，企圖把自己民族放在其他民族之上，在可能的時候，就去壓迫和剝削其他民族，

以其他民族的利益爲犧牲，並從國外的掠奪中分出一部份以收買國內一部份人，去和緩與分裂本國人民對於它的反對。這種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發展的最高形式，就是各帝國主義國家對於殖民地半殖民地

的統治，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軍閥的侵略戰爭，就是現在以美國帝國主義爲首的世界帝國主義陣營所正在進行的奴役全世界的計劃。

當着一個民族被其他民族壓迫，或在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之下，資產階級爲了自己階級的利益而和這類壓迫發生矛盾的時候，它是可以在一定條件之下，和人民一起，對這類壓迫進行一定程度的鬥爭的。例如：美國獨立戰爭與南北戰爭時代的資產階級，法國大革命時代的資產階級，意大利統一運動時代的資產階級，近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中參加民族革命的資產階級。但是，當着資產階級在得勢以後，能夠壓迫其他民族的時候，它就馬上變成這種情形的反面，去壓迫其他民族，成爲其他民族的壓迫者。正如英、美、法、德、意、日等國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一樣，在它們得勢以後，就轉而壓迫其他民族的利益，壓迫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在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的階段以後，資本主義國家的統治者變成更小的數目，這類極小數目的大銀行家、財政大王、財政貴族，一方面，把本國轉化爲財政帝國，對本國人民實行殘酷的剝削和壓迫；另一方面，把全世界許多民族分別加以征服，瓜分爲幾個財政帝國的殖民地或附屬國，用更殘酷的手段剝削和壓迫它們。資產階級掠奪的財富愈多，他們的貪慾和吞併爭奪的野心就愈加無底止地擴大，就愈加要加強對本國人民的壓迫和對全世界各民族實行侵略，並且愈加要在民族主義這個口號之下來實行這種對內的壓迫與對外的侵略，甚至要完全武斷地把自己民族說成是「優良人種」，因而就有橫統治世界的其他部分，有橫壓迫其他「劣等民族」。

由於幾個帝國主義列強都要爭搶奪世界的弱小民族，就發生帝國主義爲重新瓜分殖民地的世界大戰。這一切世界歷史上最大的罪惡，都是資產階級在「民族主義」這一個口號之下幹出來的。

各國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如上所述，當它在得勢的時候，就要毫不猶豫地去侵略其他民族，但在另外的一定條件之下，即在本國民族受到帝國主義強大進攻的時候，或在資產階級一階級或其中某一上層階級的利益是和本國人民的根本利益發生尖銳矛盾的時候，或本國人民起來威脅它的統治的時候，異民族的統治者或其他帝國主義者對它施以威脅利誘，它就可以出賣自己的民族，而幫助異民族

的統治者或其他帝國主義者來壓迫本國的人民，以本國的人民為犧牲，來達到它保護其財產、維持其政治地位或統治的目的。稍遠的例子，如大家所熟知的，巴黎公社時代法國資產階級的魏也耳（出賣法國給德國）；較近的例子，如半殖民地中國大資產階級的蔣介石和汪精衛，在希特勒面前的法國達拉第和貝當，波蘭的比爾斯斯基和貝克，捷克的哈柴，挪威的吉斯林等等。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由於資本主義的危急情況，英國、法國、意大利以及歐洲其他各國的反動派，就與不惜顛倒在美國帝國主義面前，而供其驅使。資產階級只有在對它有利的時候，它才拿出一「民族主義」這個口號去煽動人民，而對它不利的時候，它就毫無民族的氣節，成為民族的叛徒。

這就是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民族觀念及其形成的階級基礎。這就是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處理世界民族問題的基本原則或基本綱領。

一、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民族觀

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民族觀，與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民族觀，是在根本上相反的。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對於民族的看法，及其處理世界民族問題的基本原則，是從本國人民羣衆的根本利益出發，同時也是從全世界各民族的人民羣衆——即全人類的共同的根本利益出發。民族的侵略，既然是階級剝削制度的一種產物，無產階級不剝削任何人，而且為追求一個人不剝削人的社會制度而鬥爭，它就必須反對一個民族去壓迫另一個民族。無產階級不能在人類社會上保存任何人壓迫人的制度，否則，就不能使自己得到解放。因此，無產階級堅決反對任何的民族壓迫。它既反對任何民族壓迫自己的民族，同時，又堅決反對自己的民族去壓迫任何其他民族，而主張一切民族（不論大小強弱）在國際與國內的完全平等與自由聯合及自由分立，並經過這種自由分立（目的是要打破目前各帝國主義國家對於世界大多數民族的壓迫和束縛）與自由聯合（即在打破帝國主義的壓迫之後由各民族實行在完全自願的基礎上的聯合）的不同具體道路，逐步地走到世界的大同。這就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民族觀及其形成的階級基礎。這就是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處理世界民

族問題的基本原則或基本綱領。

根據上述原則，所以，在一切被壓迫民族中的共產黨人，從來就成爲最堅定的領導被壓迫民族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的先鋒戰士。例如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是徹底的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者，同時又是最堅決地反對一切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民族、保衛祖國獨立自由、反對一切賣國賊的革命的愛國主義者與革命的民族戰士。在我們中國，第一個提出反對帝國主義、主張民族獨立的明確綱領的，並不是資產階級的政黨或小資產階級的政黨，而是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我們中國共產黨，既是中國人民反帝的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者與組織者，而這種民族統一戰線的規模，包括了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而且一直包括了開明士紳。這種革命的民族解放運動與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並不相矛盾，而且完全一致，成爲無產階級國際主義運動的一個極重要的組成部分，成爲它的最廣大的直接的同盟軍。這種民族解放運動的勝利，就是向著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事業的道路上前進一大步，就給予世界上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以極大的援助和推動。

因此，很明顯，在被壓迫民族中，共產黨人如果不去具體地進行反對帝國主義的壓迫，爲民族解放而鬥爭，而只把「國際主義」當成裝飾的空談，那就是背叛了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幫助了帝國主義，結果，就會墮落到像卑劣下賤的托洛茨基派一樣，成爲帝國主義的忠實的走狗。共產黨人如果在自己民族擺脫了帝國主義的壓迫之後，又墮落到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的立場，又去實行民族利己主義，又去爲了一個民族上層階級的利益，而犧牲全世界各民族勞動人民與無產階級羣衆共同的國際利益，甚至不但不反對帝國主義，反而併吞帝國主義的幫助去侵略與壓迫其他民族，或者以民族保守和排外的思想去反對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去拒絕無產階級與勞動人民的國際團結，去反對社會主義的蘇聯，那也就是背叛了無產階級和共產主義，援助了國際帝國主義者，並使自己變成帝國主義陣營內的一個小卒。南斯拉夫的鐵托集團，則正是走着這樣的道路。

根據上述原則，所以，在一切被壓迫民族中，即在一切帝國主義國家中的共產黨人，從來就是最堅定地、無條件地反對本國民族中的統治者——帝國主義集團去侵略和壓迫殖民地與半殖民地民族，並用一切方法無條件地去援助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主張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脫離本國帝

國主義的統治，而完全獨立與完全解放。例如：蘇俄帝國、英、美、法、德、意、日、荷、比等國的共產黨人，他們是堅定的國際主義者，所以他們堅決地反對本國的帝國主義者去壓迫與侵略印度、馬來亞、菲律賓、印尼、越南、中國、中南美洲、非洲和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而堅決主張和援助被壓迫民族的獨立和解放。因為共產黨人深深了解馬克思的名言：『壓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夠自由的』。因為如果沒有這種民族運動去消解、削弱和破壞帝國主義統治的基礎，資本主義宗主國的無產階級就很難在反對獨佔資本的鬥爭中得到勝利，就很難解放自己，所以援助殖民地民族半殖民地的無產階級運動，同時就是援助了各國無產階級自己的解放。

根據上述原則，所以，共產黨人在自己國內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取得政權以後，就必須馬上取消本國帝國主義對於國內及國外一切民族的壓迫。例如：列寧、斯大林在俄國十月革命推翻俄皇及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取得政權之後，即在人類歷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地馬上宣佈取消帝俄時代對於中國和其他國家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取消帝俄對於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一切奴役制度，宣佈國內民族一律完全平等，這就是偉大的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原則的實施。

因此，在壓迫民族的國家中，在無產階級的隊伍內，如果有人把『國際主義』作為裝飾的空談，或者墮落到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的立場，不去援助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而去援助本國帝國主義者壓迫殖民地半殖民地和落後國家，這就是背叛了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事業，而成為帝國主義的代理人。例如：被帝國主義所收買的工人階級上層貴族的代表！——各國社會民主黨的右派和英國工黨的右派，就是屬於這類無產階級的叛徒。又如果共產黨人在自己國內推翻了帝國主義的統治，取得了政權之後，而不馬上取消帝國主義對於國外一切民族的壓迫，並宣佈國內一切民族完全平等，而去繼續這種民族壓迫，而去對其他民族實行侵略，那也就是背叛了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事業，而把『國際主義』當作了裝飾的空談，墮落到了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的立場。

但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之下，壓迫民族也可能變成被壓迫民族。例如：在希特勒侵吞法國、比利時、荷蘭等國這樣的時候，這些國家內的共產黨人和那些資產階級的民族叛賣者相反，他們根據上述

原則，英粵地站在民族鬥爭的最前線，爲反對法西斯侵略者而戰。又例如，在美國帝國主義馬歇爾計劃奴役下的歐洲各國，而同時其中一些國家內的資產階級反動派又在美國帝國主義的援助之下，繼續鎮壓殖民地的民族革命，像法國在安南，英國在馬來亞及其他殖民地，荷蘭在印尼所作的，在這接時候，這些國內的共產黨人，根據上述原則，就一方面，必須堅決抵抗美國帝國主義者對於自己民族的奴役與侵略，反對本國資產階級對於美國的投降和對於自己民族的叛賣，保衛自己民族的獨立；而在另一方面，又必須堅決反對自己民族中的資產階級的統治者對於殖民地的帝國主義政策，反對它們去壓迫和掠奪殖民地民族，無條件地擁護殖民地民族反對本國帝國主義的解放運動。而在這種情況下的歐洲各國社會黨的右派與英國工黨的右派，則是：一方面，他們繼續對殖民地施行帝國主義的政策，另一方面，則是擁護奴役自己民族的馬歇爾計劃。共產黨對於這些叛徒們，則是毫不留情地加以反對的。這些，就是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在各種不同民族與不同情況中，關於民族問題所採取的不同的具體綱領與具體政策。這些綱領和政策，都是根據本民族人民羣衆，又根據全世界各民族人民羣衆，即全人類共同的根本利益出發來決定的，同時，也完全符合於無產階級利益。這就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世界觀在不同歷史條件下的具體應用。

我們知道了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民族觀，又知道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民族觀，我們就可以懂得：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和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乃是代表兩個不同階級、互相敵視的兩種世界觀、思想和口號。列寧說：「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和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這是兩個不可調和——互相敵視的口號，它們是和整個資本主義世界之兩大階級陣營相適應，而表現了民族問題的兩種政策（尤其是兩種世界觀）。」

這樣，我們也就可以懂得：爲什麼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及其關於民族問題的立場與理論，必須與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嚴格區別出來，任何共產黨人，如果墮落到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立場，就是背叛了共產主義。

這樣，我們也就可以懂得：根據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民族觀及其處理民族問題的綱領和政策，任何帝國主義，在可能的時候，就一定要去侵略和壓迫其他民族，就一定不會有任何忠心去幫助其他民

族爭求獨立和解放，有時，這個帝國主義國家也去援助被壓迫民族反對另一個帝國主義國家，但它也不是爲了被壓迫民族的獨立與解放，而是爲了利用被壓迫民族去反對自己的競爭者，避免自己的災難，企圖在擠掉它的競爭者以後，去建立它自己對於被壓迫民族的統治。這樣，我們也就可以懂得：希特勒要建立所謂「歐洲新秩序」，日本軍閥要建立所謂「大東亞共榮圈」及「中日共存共榮」，美國帝國主義的所謂「馬歇爾援歐復興計劃」與「援助中國經濟建設」及「援助朝鮮獨立」、「援助菲律賓獨立」，英國「援助印度、緬甸獨立」等等，其目的，都不是爲了援助其他民族復興，不是爲了援助被壓迫民族求獨立與解放，而是爲了要建立或者要保持它自己對於這些民族的侵略和統治。任何被壓迫民族，都不能從這些帝國主義的好意賜予或虛心援助的。這樣，我們也就可以懂得：幻想美國帝國主義會有任何好意給予中國民族真正的獨立、和平、民主以援助，乃是極端錯誤的和有害的。

這樣，我們也就可以懂得：根據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民族觀及其處理民族問題的綱領和政策，共產黨人一定要成爲一切被壓迫民族的獨立解放運動中最堅定、最可靠和最能幹的領袖，一定要成爲自己民族的正當利益的最堅定的保護者，一定要無條件地去援助世界上一切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一定不能去侵略任何其他民族及壓迫國內的少數民族。這樣，我們也就可以懂得：所謂「共產黨人既是國際主義者，就不能成爲民族獨立和解放運動的領袖，就不能成爲自己民族、自己祖國利益的保護者」等等說法，以及所謂「蘇聯是赤色帝國主義者」、「蘇聯侵略中國、朝鮮及其他民族」、「蘇聯實行擴張政策」等等說法，都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毫無根據的武斷宣傳和惡意誣蔑。只有共產黨人和世界無產階級，只有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的蘇聯及新民主國家，才是一切被壓迫民族爭求解放及保護民族獨立的可靠的援助，一切民族，要從帝國主義壓迫下爭求解放和保護民族獨立，取得蘇聯及世界無產階級和共產黨人的援助，乃是勝利的最重要的條件。這樣，我們也就可以懂得：對共產黨領導下的蘇聯及新民主國家懷抱一種不信任、不友好的態度，甚至認爲資本主義國家對南斯拉夫的危險，比蘇聯對南斯拉夫的危險還要少些。如鐵托集團所作的那樣，乃是極端錯誤的和有害的。

這樣，我們也就可以懂得：把共產黨領導下的蘇聯的對外政策與帝國主義國家的對外政策，混爲

一談或同等看待，用對待帝國主義國家的同樣態度去對待共產黨領導的蘇聯及新民主國家，如鐵托集團所作的那樣，乃是極端錯誤的和有害的，乃是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根本原則，背叛無產階級的國策主義，墮落到了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立場的結果。

三、世界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的現狀

帝國主義的侵略，把全世界各民族分爲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兩類。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列強關於這兩類民族的狀況，有下列的分析：

『帝國主義大戰後所形成的世界圖畫，其基本輪廓，大致是這樣的，十二萬萬五千萬人，乃是被壓迫的殖民地——是活生生地按瓜分的國度，如波斯、土耳其、中國；是被戰敗而披投於殖民地地位的國度。不到二萬萬五千萬人，這是這樣的一些國度，這些國度雖保存了它們原有的地位，但它們已陷入對美國的經濟的依賴地位，並在戰爭期間是處於軍事的依賴地位，因為戰爭包括了全世界，戰爭不許任何一個國家保持真正的中立。最後，還有不到二萬萬五千萬人口，是在這些國度裏，在這些國度裏，不消說只有上層分子、只有資本家，才享受了瓜分世界的利益。共計十七萬萬五千萬人。這就是地球上的全部人口。』（在一九二〇年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上關於國際形勢與共產國際基本任務的報告）

這就是近代世界上的民族問題。這就是少數國家的帝國主義者（上層分子、資本家）兇惡地壓迫與掠奪全世界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問題。這種民族問題的情況，又是反映了世界資本主義矛盾的尖銳化，反映了各國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在帝國主義的時代尖銳化。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不能不引起各帝國主義國家互相爭奪殖民地的尖銳鬥爭；另一方面，又不能不發生一切被壓迫民族反對帝國主義尋求解放的世界範圍的民族解放運動。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後期，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地面上，俄國的無產階級突破了帝國主義的陣線，成就了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世界遂分裂爲兩個不同的經濟體系。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就開始了資本主義的總危機。在這種總危機下面，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就變得更加偏激、殘

暴，財富侵略性。以奴役世界各民族為目標的德、意、日等國的法西斯主義，便是在這資本主義總危機尖銳矛盾中的最朽腐、最反動的佔估資本的產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意、日、法西斯被以蘇聯為首的世界各國反法西斯力量所打敗；東歐各國人民在蘇聯援助之下，奮起突破了帝國主義的陣線，建立了新民主國家；世界各國共產黨，由於在反法西斯大戰中成為保衛自己祖國最英勇的領導者與最堅強的力量，因而在人民中有極高的威信，各國共產黨都空前地強大了；東方的民族革命鬥爭，在中國、越南、印尼、緬甸、馬來亞等等，正如燎原之火。這樣，世界的情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又已起了新的根本變化，表現了資本主義總危機比第一次大戰後有新的更尖銳化的發展。在這個時候美國帝國主義就代替希特勒和日本軍閥，製定了統治世界各民族的更兇惡的奴役計劃及其對全球的擴張政策。不消說，這又一個在這資本主義總危機新的更尖銳化的發展過程中最朽腐最反動的佔估資本的產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各民族鬥爭的基本輪廓，大致是這樣的：

一方面：是社會主義的蘇聯，這是世界各民族反帝國主義反法西斯主義的領導者，在打敗德、意、日法西斯主義之後，正在繼續向無限的繁榮前途前進，並繼續為保衛世界的和平、民主與各民族獨立而奮鬥。這個國家擁有二萬萬人口。其次蒙古人民共和國有人口一百萬。這是老早解放了的。再其次，是東南歐的各新民主國家，捷克斯拉夫、波蘭、保加利亞、匈牙利、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共有八千五百萬人口，從德、意法西斯奴役下解放出來以後，已經在共產黨領導之下，走向社會主義。其中，只有南斯拉夫，由於鐵托集團的背叛，無產階級正在進行反對其背叛者的鬥爭。又其次，解放了的北朝鮮和德國東部，人口約近三千萬。此外，今天還在繼續直接和外國帝國主義及本國買國賊戰鬥着的民族，如我們中國的解放區，擁有一萬萬六千八百萬人口，業已完全擺脫了帝國主義的壓迫，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正在進行新民主主義的建設。如果再加越南、印尼、希臘等國業已解放了的人口，這樣，直到今天為止，全世界約二十萬萬人口當中，約有五萬萬以上的人口業已從帝國主義的壓迫之下解放出來了。人民在這些國家中，真正獲得了獨立自由的主人翁的地位。這些業已解放了的人口，已超過了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這是表現着世界的再生，表現着世界人

類在爭求解放的鬥爭中所業已達到的範圍和水準。無疑的，這些解放人口的數目，在今後將要一天一天地增加起來，世界全部人類都將在不久的將來要從帝國主義的統治下解放出來的，不管鬥爭可能還有各種曲折，這個解放的總方向，乃是歷史必然的不可抵抗的規律。這在我們中國，由於偉大的人民解放軍的節節勝利，全中國四萬萬七千萬人口完全解放的前途，乃是特別明顯地可以看得到的。

這是一方面。

在另一方面，在德、意、日法西斯被打敗之後，世界上六個大帝國主義國家（美、英、法、德、意、日）已有三個被打倒。現在世界上擁有多少大小不一的殖民地的帝國主義國家，還有，美、英、法、荷、比、葡等國，帝國主義國家的數目減少了，但是，由一個帝國主義國家——即美國帝國主義奴役世界各民族的模式，却是空前的。荷、比、葡之類的國家不消說了，即使像英、法這樣的國家，也因在大戰中受了極大的損傷而變為軟弱無力了。雖然這些國家的反動派還在想採用殘暴的帝國主義的流血方法去屠殺殖民地民族的解放運動，但由於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出賣自己民族，與社會黨及工黨的右派的叛賣本國人民的政策，已把自己國家貶為美國帝國主義統治下的附屬國與保護國了。所以除了上述業已解放的五萬萬以上的人口之外，全世界各民族（不包括美國在內）有十三萬萬幾千萬的人口，或是直接地、或是間接地處在一個美國帝國主義的統治之下，而英、法、荷等國的反動派，則實際上變成了美國帝國主義的幫兇和賣國賊。美國只擁有一萬萬四千萬人口，而站在美國人民頭上的，又只是摩根、洛克菲勒、杜邦、梅隆等著名的八大財團，其反動運動的代表人物，只不過是一小撮，約一千個人而已。

八大財團，一千個人，一方面，在國內統治了一萬萬四千萬的美國人民；另一方面，又在美國這個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的基礎上，在國外，直接與間接地奴役世界上除蘇聯及其他業已解放的民族以外的一切民族。如果把美國人民這個數目也包括在內，那末，這就是說，美國八大財團直接或間接地統治佔地球將近四分之三、即十四萬萬幾千萬的人口，而且它們還在千方百計地妄想：有一天在蘇聯及其他解放了的地方建立起美國帝國主義的奴役制度。

這就是目前世界民族問題的基本狀況。

四、目前世界的兩大陣營與民族解放運動的道路

如上所述，目前世界上的民族問題，主要的就是美國帝國主義者壓迫和掠奪、或者企圖要去壓迫和掠奪全世界各民族的的問題，就是全世界各民族反抗美國帝國主義的壓迫和掠奪，以爭取民族解放、或保衛民族獨立的問題。

美國帝國主義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就製定了他們掠奪和壓迫全世界各民族的計劃。大戰結束後，他們實行了杜魯門主義、馬歇爾計劃，就一步接一步地把世界上許多國家和民族置於自己的控制和統治之下，在全世界佈置軍事基地網及插足一切國家和干涉一切國家的內政，這些都是他們的野心侵略計劃的產物。而他們這種侵略計劃，正如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軍閥一樣，是在所謂「防蘇防共」的口號之下進行的。

美國帝國主義者，爲了要實現自己奴役世界的計劃，它就不能不用盡一切力量動員本國的人民來支持它的計劃，就不能不嚴厲壓迫本國人民中反對它的計劃的一切力量。因此，它就要向美國人民宣傳所謂「美國世紀，及白人種優越」的一理論，說美國應該「領導世界」，全世界各民族都應歸它統治。因此，它就要壓迫美國共產黨、美國進步的工會及華萊士領導的進步運動，并在美國建立法西斯式的統治，否則，它就不能實現自己的計劃。

美國帝國主義者，爲了要實現自己奴役世界的計劃，它就不能不拚命反對世界上一切反抗它實行這種計劃的力量，它就要反對蘇聯，反對東歐各新民主國家，反對中國共產黨及中國人民解放運動，反對希臘、越南、印尼、馬來亞、緬甸、菲律賓各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反對世界各國的共產黨及人民民主力量；因爲這一切國家和這一切力量，結成了以蘇聯爲首的反帝國主義陣營，堅決反對美國帝國主義者奴役世界的計劃。因此，它就要在鐵托集團表示了反蘇立場、脫離共產黨情報局，并在國內實行撥真正進步的有生力量之後，表示了情不自禁的歡呼；它就要準備着在將來的什麼時候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妄想去征服世界上一切反抗它的力量。

美國帝國主義者，爲了要實現自己奴役世界的計劃，它就不能不在世界各國尋找能夠執行與贊助

它實行這種計劃的走狗和代理人，尋找各國的民族叛徒和賣國賊，並且投助各國的民族叛徒和賣國賊去鎮壓各國人民的反抗運動與反對蘇聯。它就要援助世界各國的反動派，援助德國、日本、意大利的法西斯殘餘勢力，使其復活，因為這許多國家的資產階級的反動黨派和法西斯殘餘勢力作了美國帝國主義的代理人而走狗，在美國援助之下，去鎮壓本國的人民和殖民地民族的反抗運動，去反對蘇聯和各國人民主力軍。

然而，也由於美國帝國主義者奴役世界的計劃與歐洲各國反動派的出賣民族，民族問題比起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就成為更大多數人口的問題，反帝國主義的陣營在民族問題上是更加擴大了，而帝國主義國家的數目則已更少，也更加孤立了。帝國主義的基礎已經更加動搖，它們的整個力量已經並正在大大地削弱，被它們所壓迫的人民，已經並正在日益廣大的加入反對它們的鬥爭，最後推翻它們的統治的日子，已經更加接近了。歐洲資本主義宗主國的無產階級的階級敵人，同時就是這些國家的賣國賊，即全民族的敵人；而歐洲各國無產階級要贏得社會主義，就必須反對美帝國主義的奴役，又反對本國的賣國賊。階級問題和民族問題是這樣明顯地聯結起來，這就有利於歐洲各國無產階級，一方面，團結國內更廣大的人民，而把保衛自己民族獨立爭取與社會主義的事業聯合起來；另一方面，又團結殖民地與半殖民地更廣大的人民，而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與自己爭取社會主義的事業聯合起來。美國帝國主義奴役世界的計劃與歐洲各國反動派的出賣自己民族，既是反映世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發展，反映資本主義各種矛盾的極端尖銳化，反映美國及其他帝國主義正坐在新的猛烈危機的火山口上，而企圖作瘋狂的垂死的掙扎；同時美國帝國主義這種奴役計劃，又正是加強了資本主義的總危機的發展，加強了資本主義世界各種基本矛盾——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帝國主義之間爭奪殖民地與市場的矛盾，帝國主義與被壓迫民族的矛盾——的尖銳化，而促進全世界最大多數的人口不得不為自己的解放而實行全世界的大聯合，並以此促進帝國主義的死亡。

現在美國帝國主義者加緊進行奴役世界各民族的活動，英、法、荷等帝國主義者在美國援助下對於殖民地民族的加緊鎮壓，以及各國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和其他帝國主義的人民民主運動和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已使目前世界上的民族問題空前的緊張起來。現在世界上已分為這樣兩個互

相敵對的陣營：一方面，是美國帝國主義及其在世界各國的走狗——各國反動派。這就是世界的帝國主義陣營；另一方面，是蘇聯和東歐各新民主國家、中國和東南亞各國與希臘的民族解放運動及世界各國的人民民主力量。這就是世界的反帝國主義陣營。美國帝國主義成爲世界一切反動力量、階級、階層與黨派。在這兩個陣營處在這樣相互緊張鬥爭的時候，人們不站在一邊，就要站在那一邊，即是說，你不站在帝國主義陣營幫助美國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去奴役世界或奴役自己民族，你就強站在反帝國主義陣營去幫助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爭取解放或爲自己民族的解放而鬥爭，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及其在各國的走狗——各國反動派；而同時，這也就幫助了蘇聯及東歐各新民主國家，幫助了美國及世界各國的人民民主力量，幫助了世界各國的無產階級和共產黨。不站在一邊又不站在那一邊，而實行中立，則是不可能的。在目前世界這種緊張形勢下，正如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所早已指出：所謂『中立』，只是一種騙人的鬼話，不管你主觀上是否有意去騙人。

由此可見，在目前世界這種形勢下，一切被壓迫民族要求得解放，就不能不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及其在本國的走狗——本國的賣國賊，就不能不反對世界各國的反動派，就不能不聯合蘇聯及東歐各新民主國家，就不能不聯合各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及人民民主力量，就不能不聯合世界各國的無產階級和共產黨，就是說，不能不站在世界反帝國主義陣營，向美帝國主義及其在本國的和在世界上的走狗進行堅決的鬥爭。否則，任何民族的真正解放，都是不可能的。

由此可見，美、英、法、荷等國，特別是美國的共產黨與無產階級和這些國家的人民民主力量，如果能夠起來推翻這些國家的獨佔資本家的統治，廢棄其帝國主義的內外政策，實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國內政策與民族政策，那末，它將造成的結果，就不只是要澈底解放這些國家的人民，而且要澈底解放全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所以，這些國家的無產階級和人民在國內的澈底勝利，以及他們對於獨佔資產階級統治的每一個打擊，都是對於世界被壓迫民族的最好的直接的幫助，因此，世界各國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就必須十分注意地去取得這些帝國主義國家內的無產階級和人民的援助，和他們建立共同的反對帝國主義統治的聯盟；因爲彼此的敵人原來是共同的，而一個方面的勝利，也就

援助了另一方面的勝利。

由此可見，世界被壓迫民族的民族獨立解放運動反抗美、英、法、荷等帝國主義的勝利，使這些國家的帝國主義者失去殖民地，即失去它們統治世界的基礎，因而就要大大削弱這些帝國主義者對於國內的統治力量，因而就使這些國家內的無產階級和人民能夠比較容易地從帝國主義的統治下解放出來。所以，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壓迫民族的民族獨立解放運動的勝利，以及他們對於帝國主義的每一個打擊，都是對於帝國主義國家內的無產階級和人民的最好的直接的幫助。世界各國的、特別各帝國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與共產黨及人民民主力量，就必須更加努力地支援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民族獨立解放運動，更加進一步地去和他們建立共同的反對帝國主義統治的聯盟；因為彼此的敵人原來是共同的，而又同樣地；一個方面的勝利，也就援助了另一方面的勝利。

這此可見，反帝國主義的社會主義的蘇聯的存在及其強盛，東歐各新民主國家的存在及其發展，都是對於美國帝國主義及其在各國的走狗——各國反動派，對於世界帝國主義統治的極大的打擊，都是表示與加強世界資本主義的總危機，都是促進資本主義世界走向最後崩潰，都是加強世界各國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及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的陣營，都是促進世界各國社會主義的及新民主主義的革命走向勝利。一九二五年春天，中國偉大的愛國者孫中山臨終時致蘇聯遺書說過：「此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是不朽的列爾遺與被壓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遺產，帝國主義下的雜民，將藉此以保衛其自由，從以古代奴役、戰爭、偏私為基礎的國際制度中謀解放」。這個真理是常新的。這個真理在世界反法西斯的大戰中更進一步地被證明出來了，而在現在與今後世界人類類的解放鬥爭中，又將更進一步地加以證明。正如毛澤東同志在其「新民主主義論」中所闡釋的，或者聯合蘇聯，或者聯合帝國主義，二者必居其一。這與愛國與賣國的界限，這是革命與反革命的界限，這是世界上不論那個民族是走向進步或是走向倒退的界限，而反對蘇聯，必然只符合帝國主義的利益，背發自己民族的利益。所有上述種種，都說明了一個根本的問題，就是：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一切國家的無產階級與人民民主力量，都必須互相聯合起來，都必須和蘇聯聯合起來，都必須和東歐各新民主國家聯合起來，才能戰勝美國帝國主義奴役世界的計劃及其他國家的帝國主義對殖民地的統治，解決目前世界上的

民族問題，即解放世界上一切被壓迫民族，並從而掃除作爲帝國主義侵略根源的獨佔資本在其本國的統治。

這就是說：各國共產黨人與各國人民必須按照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按照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民族觀及其對於民族問題的綱領和政策，聯合世界各國一切勞動人民及一切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力量，聯合蘇聯與東歐各新民主國家，共同奮鬥，互相幫助，互相支援，才能解放世界上一切被壓迫民族，才能解決目前世界上的民族問題。

這就是說：如果實行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民族觀及其對於民族問題的綱領和政策，不去聯合蘇聯，而去反對蘇聯，不去聯合東歐各新民主國家，而去反對東歐各新民主國家，不去聯合世界各國的共產黨與無產階級及人民主力量，而去反對各國共產黨與無產階級及人民主力量，不去聯合一切被壓迫民族，而去反對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如鐵托集團在南斯拉夫所作的那樣，那就必然要去聯合美國帝國主義及其他帝國主義，就必然要站在帝國主義陣營，聯合世界各國的反動勢力，就必然不能成功任何民族解放事業，更不能成功任何社會主義事業，就必然要使自己民族受美國帝國主義及其他帝國主義所愚弄和侵略，以至喪失自己民族的獨立，使自己國家變爲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因此，正如中共中央所說，共產黨報局在自己的決議中向全世界及南斯拉夫人民指出這種危險前途，以便南斯拉夫人民覺醒起「糾正鐵托集團的錯誤，乃是一爲保衛世界和平民主事業，保衛南斯拉夫人民免受美帝國主義的愚弄和侵略所誑惑的號召」。

這就是說：各國共產黨人與各國人民必須根據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而不是反對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必須廢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而不是根據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去指導目前世界的民族解放運動及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運動，並使這種被壓迫民族的民族民主革命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密切地結合起來，才能使這兩種革命都得到勝利，才能解放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才能解決目前世界上的一切民族問題。否則，不獨不能取得任何社會主義的勝利，也不能取得任何民族解放運動的正確勝利。

這就是說：目前世界上的民族問題，應該和世界上整個革命問題聯系起來看，應該從歷史全局與

世界全島來看，而不應該孤立的從局部的觀點上去看，不應該從任何超現實的抽象的觀點上去看。正如列寧和斯大林所說：民族問題不應該孤立地去估量，而應該在世界範圍內去估量。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及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以後，依據新的世界歷史全島，民族問題應該從反對帝國主義階級革命的範圍內去估量。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及俄國十月革命以前，民族問題乃是世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部分，而在這以後，民族問題乃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了。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一書中所詳盡地發揮了的斯大林關於這個問題的理論，以及在本書中所詳盡地分析了的中國革命由舊民主主義轉到新民主主義的理論，乃是完全正確的。只有根據這個正確理論去指導民族解放運動，才能解放世界上的被壓迫民族，才能解決目前世界上的民族問題。在中國從事反對帝國主義階級、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反對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壓迫的一切人們，首先是共產黨人，但是不獨共產黨人，任何一個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只要他們是真心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反對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而不是表面上講革命、實際上想破壞革命的人們，他們就應當這樣去做，而不應當有另外的想法和做法。如果他們有另外的想法和做法，那麼，他們就將誤入歧途，而為革命隊伍所拋棄。

毫無疑義：把民族問題從階級問題分開來看，把民族的鬥爭從階級的鬥爭分開來看，乃是完全錯誤的，有害的，乃是地主資產階級反動派的一種欺騙。反動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與近代帝國主義侵略，既然是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發展所形成的一種政策，而目前美國帝國主義企圖實現世界霸權的夢想，乃是其最後的產物，美國帝國主義這種奴役世界的反革命政策，就更加空前明確地把資本主義宗主國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運動和被壓迫民族的民族解放運動聯繫起來，也更加空前明確地指出了要消滅帝國主義侵略的根源，就必須推翻資本主義宗主國的獨佔資本的統治。

人類解放鬥爭的總前途，乃是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恰如莫洛托夫的名言：『我們所處的時代，正是條條道路都通向共產主義的時代』。各民族的人民，都將經過自己具體鬥爭的道路，到達這一點，而在被壓迫民族中，民族解放的鬥爭，則是一種必須經過的道路。只有社會主義廢除了人剝削人的

制度，像在蘇聯那裏一樣，才能完全消滅侵略的可能性。社會主義的蘇聯廢除了一切的階級剝削制度，社會生產力在蘇聯有無限發展的前途，它既不允許別人去侵略它，也絕不允許、更完全不需要去侵略別人，所以它就成為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堡壘，成為世界被壓迫民族的最可靠的和最好的朋友，當社會主義制度逐步在各國實現之後，那時「侵略」的字眼，便只能在世界人類頭腦的歷史回憶中成為古怪的字眼而存在了。

這就是全人類最後解放、也就是全世界各民族最後解放所必須經過的道路。

五、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的進步性

與馬克思列寧主義對於這種民族主義的態度

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從歷史看任何問題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區別了在不同歷史條件下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區別了它的客觀作用的不同。並決定了無產階級對它的不同的態度。

當資本主義初起時代，資產階級所進行的民族運動，是為反對異民族壓迫，建立民族國家。這是具有歷史的進步意義的，無產階級曾經擁護了這樣的民族運動。在近代，則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也是有其客觀歷史上的的一定的進步意義。

歐美和日本的資產階級在許多落後民族中，建立了帝國主義奴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制度，在這種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制度中，例如在中國、印度、朝鮮、印尼、菲律賓、越南、緬甸、埃及等等，又不可免地生長起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因為這些地方的民族資產階級，第一和帝國主義有矛盾，第二和這些國家的落後封建勢力有矛盾，而這種封建勢力又與帝國主義相結合，限制和損害民族資產階級的發展，因此，這些地方的民族資產階級在一定歷史時期和一定程度上就有其革命性，這些地方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在其動員羣衆起來反對帝國主義異封建勢力的時候，就有其一定的進步意義。正如列寧所說：「這種民族主義有着歷史的正常性」（在東方人民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因此，無產階級對於這種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就應當在同盟者「不阻礙我們以革命的精神去教育和組織農民

和廣大被剝削羣衆（列階）的條件之下，與這種有一定反帝反對建作用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合作，以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統治。這種合作的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和孫中山的合作。

孫中山的民族主義，也是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的一種。但正如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上的分析：孫中山三民主義，在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前及十月革命以後兩個不同的歷史時期，發生了分別爲舊三民主義與新三民主義的重大變化；在前一個時期，是屬於舊民主主義，即屬於舊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範疇，是舊的資產階級與資本主義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但在後一個時期，則是屬於新民主主義，即屬於新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範疇，而成爲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

孫中山的民族主義，在舊民主主義時代的兩重性質，就是：他反對當時中國的統治者滿族朝廷，有進步的性質；但是，提倡大漢族主義，就是反動的性質。但在十月革命之後，中國革命進入新民主主義時代，由於他接受了蘇聯與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的幫助，把那種大漢族主義的民族主義加以修改，轉到主張反對帝國主義侵略與聯蘇、聯共、援助工農三大政策的革命的民族主義的時候，轉到主張「中國民族自救解放」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的時候，這就是轉回到新民主主義，而我們共產黨人也就採取和他合作的政策。這種合作，對於民族解放和當時無產階級的利益，都是完全正確的、必要的，即使這種合作是不可靠的、暫時的、動搖不定的，在後來又被中山的無恥叛徒所破壞。

雖然，即使在這種時候，孫中山的世界觀仍然是資產階級的或小資產階級的世界觀，他的民族主義還是一種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還帶有反動性質的一面：（例如：所謂「血統」、「國族」的觀點，所謂「大亞細亞主義」等）可是在這時，他主張「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的民族革命主義，實行聯蘇、聯共、援助工農三大政策，這就是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新時代中，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進步性的高度表現，這就是很大的革命意義。

但是，隨着孫中山逝世不久，孫中山的無恥叛徒——大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蔣介石汪精衛等國民

黨反動派，就把孫中山的民族革命主義拖到了另一種極端相反的反革命道路，由反帝轉到降帝，由聯蘇轉到反蘇，由聯共轉到反共，由擁護工農轉到屠殺工農，並利用了孫中山的民族主義裏面屬於保守性質和反動性質的東西，變成他們反民族的旗幟。因此，共產黨也就必須極力採取堅決的政策去反對以蔣汪兩逆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以保衛民族的利益。

當然，在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國度中，像在印度、緬甸、暹羅、菲律賓、印尼、越南、朝鮮南部及其他地方，共產黨人對於那一部分已投降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反動派（主要是大資產階級反動派），也同樣地必須採取反對他們叛賣民族的堅定政策，以保衛自己民族的利益。否則，就是極大的錯誤。而對於尚在反對帝國主義，並不反對人民羣衆起來進行反帝鬥爭的民族資產階級，共產黨人就應當和他們建立反對帝國主義的合作；而如果不認真地去建立這種合作，或者反對、或者拒絕這種合作，那也就是極大的錯誤，及使這種合作是不可靠的、暫時的、動搖不定的，都必須認真地去建立。

世界各國革命的經驗和中國革命的經驗，都充分地證明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民族問題是與階級問題相聯繫、民族的鬥爭是與階級的鬥爭相聯繫的科學分析，是完全正確的。根據階級的歷史分析，我們就可以知道：為什麼一個民族在某種時候會被另一個民族所壓迫，而變成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為什麼這樣的民族不但不從封建階級中而且可以從一部分資產階級（例如中國的買辦官僚資產階級）中出現賣國賊；又在什麼條件下，必須依靠什麼階級的領導，才能獲得民族的解放；等等。根據階級的歷史分析，同樣地可以告訴我們：雖然在我們中國的小資產階級或民族資產階級中出現過像孫中山這樣傑出的民族革命家，但一般說來，這裏的資產階級也只是只按照他自己一階級的狹隘利益去看民族問題，並根據此一階級的利益或這樣變化、或那樣變化的。而同樣地，只有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才是真正地和全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完全一致；同時，又是和全世界各民族人民！即全人類共同的國際利益完全一致。當無產階級在被壓迫民族中出現在鬥爭舞臺上，成為全民族反帝鬥爭的領袖、成為全民族的救星的時候，例如在中國，任何階級、黨派或個人，如果是真正的愛國者，像孫中山一樣，就必然要和共產黨合作（與聯蘇及擁護工農利益相聯繫）；反之，如果他反共（與反蘇及反對工農利益相聯繫），像蔣介石汪精衛一樣，結果就必然成為帝國主義的狗奴才，成為萬惡不赦的頑奸賣國

險。

同時，這種階級的歷史分析，也告訴了我們；由於帝國主義的威脅、利誘與國內階級鬥爭的存在，當國際國內的階級鬥爭尖銳化的新場合或新時期，革命隊伍中也可能出現像中國的陳獨秀、張國燾與斯諾夫的幾托這類人物，他們投降反動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而背叛世界各國勞動人民的共同利益，並將本民族的人民解放事業，置於極端危險的地位。他們是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在無產階級隊伍中的代言人。他們不惜把任何民族解放事業半途而廢，使自己的國家變為帝國主義的殖民地。這是一切國家的共產黨和每一個共產黨員都必須加以警惕的。

六、結論：真正的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互相結合

前述一切，就是我們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共產黨人關於民族問題的觀點和原則，即是關於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相結合的觀點和原則。

顯然，各國人民大眾的真正的愛國主義與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並不矛盾，而是互相結合的。毛澤東同志在抗日戰爭時期曾經寫道：「對於我們，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密切結合時，我們的口號，是為保衛祖國，反對侵略者而戰。」「愛國主義就是國際主義在民族革命戰爭中的實施。」不消說，這些話也完全適合於我們今天的愛國革命戰爭。

列寧把愛國主義形容為「許多世紀與數千年來分隔的國家所鞏固起來的最深切的情感之一」。真正的愛國主義乃是對於數千年來世代相傳的自己祖國、自己人民、自己語言文字以及自己民族的優秀傳統之熱愛，這種愛國主義是和那種自大自私的、排外主義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以及反映那種落後的家長制的、小農的狹隘閉關主義、孤立思想、宗派主義、地方主義民族偏見，是完全沒有關係的。真正的愛國主義尊重其他民族的平等，同時希望世界人類優秀的理想在自己國內實現，主張各國人民的親愛團結。至於反動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則煽惑各國人民的互相敵視與仇恨，而落後的家長制的民族偏見，則把自己民族和世界隔絕起來，糾纏於坐井觀天和不自覺的過程之中。所有這些，我們都必須堅決地加以反對。

以上，就是我們關於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與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的大略解釋。現在不論在我們黨內和在黨外，對於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與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都有甚多的誤解和模糊的觀點。此外，法西斯份子還有關於這個問題的極端反動的武斷宣傳。這些誤解與模糊的觀點，如果不加以清除，這些法西斯主義的宣傳，如果不加以揭露，對於目前中國的人民解放運動，將是極端有害的。本文的發表，希望能在清除這些誤解與模糊的觀點及揭露法西斯主義宣傳的努力中有所幫助。這就是我們的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

「共產黨人」發刊詞

毛澤東

中央很早計劃出版一個黨內的刊物，現在算是實現了。為了建設一個全國範圍的廣大羣衆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的中國共產黨，這樣一個刊物是必要的。在當前的時機中，這種必要性更加明顯。當前時機中的特點：一方面，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投降危險，分裂危險與倒退危險日益發展着；另一方面，是我們黨已經走出了狹隘的圈子，變成了全國性的大黨。而黨的任務是動員羣衆克服投降危險，分裂危險與倒退危險；並準備對付可能的突然事變，而在正確的定案事變中不使黨與革命遭受出乎意料的損失。在這種時機，這樣一個黨內刊物的出版，實在是十分必要的了。

這個黨內刊物定名為「共產黨人」，它的任務是甚麼呢？它將寫些甚麼東西呢？它和別的黨報有些甚麼不同呢？

他的任務就是：幫助建設一個全國範圍的、廣大羣衆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的中國共產黨。爲了中國革命的勝利，迫切的需要建設這樣一個黨，我們現在也正在建設這樣一個黨，建設這樣一個黨的主客觀條件也已經大體具備，這件偉大的工程也正在創作之中。爲了這件事，不是一般黨報所能勝任的，必需有專門的黨報，這就是「共產黨人」出版的原因。

在某種程度上說來，我們的黨已經是一個全國性的黨，也已經是一個羣衆性的黨；而且就其領導骨幹說來，就其黨員的某些成份說來，就其總路線說來，就其革命工作說來，也已經是一個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都鞏固的布爾什維克的黨。

那末，還有甚麼新的任務呢？現在提出新的任務的理由何在呢？

理由就在：我們現在有大批的新黨員，很多的新組織，對於他們，還不能說是廣大羣衆性的，還不是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都鞏固的，還不是布爾什維克化的，同時，對於老党员，老組織，也發生了

提高水平的問題，發生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進一步鞏固與進一步布爾什維克化的問題，黨所處的環境，黨所負的任務，現在和過去內戰時期有很大的不同，現在的環境是複雜得多，現在的任務是艱鉅得多了。

現在是民族統一戰線的時期，我們同資產階級建立了統一戰線；現在是抗日戰爭的時期，我們黨的武裝在前線上配合友軍同敵人進行殘酷的戰爭；現在是我們的黨發展成為全國黨的時期，已經不是從前的樣子了。如果把這些情況聯繫起來看，就應該我們提出「建設一個全國範圍的廣大政策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的中國共產黨」，是怎樣一個光榮而又艱重的任務了。

我們現在要建設這樣一個黨，究竟應該怎樣進行呢？我們現在一定要建設這樣一個黨，究竟應該怎麼辦才能達到目的呢？解決這個問題，是向我們黨的歷史，是向我們黨的十八年鬥爭史，不能分離的。

我們黨的歷史，從一九二一年六月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那個時候起，到現在，已經整整十八年了。十八年中，黨經歷了許多偉大的鬥爭，黨員，黨的幹部，黨的組織，在這些偉大鬥爭中，鍛鍊了自己，他們經歷過極大的革命勝利，也經歷過嚴重的革命失敗。經歷過同資產階級建立民族統一戰線，又經歷過這戰線一戰線遭受分裂，並同資產階級進行嚴重的武裝鬥爭。最近三年，則又處於同資產階級建立民族統一戰線的時期中。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的發展道路，是在這樣同中國資產階級的複雜關係中走過的。這是一個歷史的特點，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過程中的特點，而為任何資本主義國家的革命史所沒有的。再則，由於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發展不平衡的國家，半封建經濟佔優勢而又土地廣大的國家，這就不但規定了：中國現在階段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革命的主要對象是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革命的動力基本的的是無產階級，農民階級與城市小資產階級，而在一定的時期中，一定的程度上，還有民族資產階級等等這樣許多的東西；而且規定了：中國革命鬥爭的主要形式是武裝鬥爭，我們黨十八年的歷史，可以說就是武裝鬥爭的歷史。斯大林同志說過：「中國革命的特點是武裝的人民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是說得非常之對。這一特點，這一半殖民地的中國的特點，也是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所沒有的或不相同的。這樣，

(一) 同資產階級建立或被迫分裂革命的民族統一戰線；(二) 革命形式主要的是武裝鬥爭；(三) 就說中國無產階級與中國共產黨在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程中的兩個基本特點。這裏我們沒有把黨同農民階級與黨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關係作為基本特點，這是因為：第一、這種關係，世界各國的共產黨原則上都是一樣的；第二、在中國，只要一提到武裝鬥爭，實質上即是農民戰爭，黨同農民戰爭的密切關係即是黨同農民的關係。

由於這些基本特點，恰是由於這些基本特點使我們黨的建設過程，我們黨的布爾什維克化的過程，處在特殊的情況中。它的失敗與勝利，它的後退與前進，它的縮小與擴大，它的發展與鞏固，不能不聯系於黨同資產階級的關係與黨同武裝鬥爭的關係。當我們黨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處理同資產階級建立統一戰線或被迫分裂統一戰線時，我們黨的發展鞏固與布爾什維克化就前進一步；而如果是正確的處理同資產階級的關係時，我們黨的發展鞏固與布爾什維克化就合要後退一步。同樣，當我們黨正確的處理革命武裝鬥爭問題時，我們黨的發展鞏固與布爾什維克化就前進一步，而如果是正確的處理問題時，那末我們黨的發展鞏固與布爾什維克化就合要後退一步。十八年來，黨的建設過程，黨的布爾什維克化的過程，是這樣同黨的政治路線密切聯繫着，是這樣同黨對於統一戰線問題，武裝鬥爭問題之正確處理或正確處理密切聯繫着。這一論斷，很明顯的，已經被十八年來的歷史所證明了，倒轉來說，黨愈趨於布爾什維克化，黨就愈能，愈益正確的處理黨的政治路線，愈益正確的處理關於統一戰線問題與武裝鬥爭問題。這一論斷，也是很明顯的被十八年來黨的歷史所證明了。

所以，統一戰線問題，武裝鬥爭問題，黨的建設問題，是我們黨在中國革命的三個基本問題。正確的理解了這三個問題及其相互之間的關係，就等於正確的領導了全部中國革命。而在十八年來的歷史中，憑藉我們豐富的經驗，失敗與成功，後退與前進，踏小與發展的深刻的與豐富的經驗，我們已經能夠做出正確的結論來了。就是說，我們已經能夠正確的處理統一戰線問題，又正確的處理武裝鬥爭問題，又正確的處理黨的建設問題，也就是說，十八年的經驗，已使我們懂得：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三個主要的法寶。這是中國共產黨

的偉大成績，也是中國革命的巨大成績。

在這裏，讓我們對於這三個法實，三個問題，分別的大略的說一下吧。

十八年中，中國無產階級同中國資產階級及其他階級的統一戰線，是在三種不同的情況，三個不同的階段中間發展着的，這就是第一次革命的階段，十年內戰的階段與今天抗日戰爭的階段。三個階段中，證明了下列的規律：(一)由於中國最大的壓迫是民族壓迫，在一定的時期中，一定的程度上，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是能夠參加反帝國主義與反對封建軍閥的鬥爭的。因此，無產階級在這種一定的時期內，應該同民族資產階級建立統一戰線，並盡可能的保持之。(二)又由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經濟上政治上軟弱性，在另一種歷史環境下，它就會動搖變節。因此，中國革命統一戰線的內容不能始終一致，而是要發生變化的。在某一時期有資產階級參加在內，而在另一時期則資產階級並不參加在內。(三)由於資產階級的動搖性，就是在資產階級參加統一戰線並和無產階級一道向共同敵人進行鬥爭的時候，他們也把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發展，看做是不利於他們，而要加以限制，而要採取欺騙，誘惑，消解與打擊等等破壞政策，並即拿這個政策作為他們投降敵人與分裂統一戰線的準備的。(四)無產階級的堅固的同盟者是農民。(五)城市小資產階級也是可靠的同盟者。這些規律，不但在第一次大革命時期與在十年內戰時期證明了，而且在三年的抗戰中也在證明着。因此，無產階級的政策在同資產階級組織統一戰線的問題上，必須實行堅決的嚴肅的兩條戰線鬥爭。一方面，反對對於資產階級在一定時期一定程度的革命可能性的忽視，把中國的資產階級與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看做一樣，因而忽視同資產階級建立統一戰線並盡可能保持這統一戰線的政策，這就是左傾閉門主義。另一方面，則要反對把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革命性以革命的綱領、政策、思想與農民，而且還在極力影響無產階級與共產黨，力求消滅無產階級與共產黨在思想，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性，而把無產階級與共產黨變成資產階級及其政黨的尾巴；力求使革命果實歸於資產階級的一羣一黨；而一到革命對於他們一羣一黨的私利相衝突時，他們就實行叛變革命。如果我們忽視了這一方面，這就是右傾機會主義。過去陳獨秀主義的特點，就是引導無產階級適合資產階級一羣一黨的私

利的右傾機會主義，也就是第一次大革命失敗的主觀原因。中國資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這種二重性，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與黨的建設的影響是非常大的，不了解中國資產階級的這種二重性，就不能了解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與黨的建設。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的重要一部份就是在同資產階級聯合，同資產階級聯合又同它鬥爭的政治路線。中國共產黨的黨的重要一部份就是在同資產階級聯合，又同它鬥爭的中間發展與變質出來的。這裏所謂聯合，就是統一戰線，所謂鬥爭就是在聯合時，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一和平的一不流血」的鬥爭；而在被迫向資產階級分裂時，就轉變為武裝鬥爭。如果我們不知道在一定時期中間資產階級聯合，黨就不能前進，革命就不能發展；如果我們不知道在聯合資產階級時又同資產階級進行堅決的嚴酷的「一和平」鬥爭，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就會瓦解，革命就會失敗；又如果我們黨在被迫向資產階級分裂時不同資產階級進行堅決的嚴酷的武裝鬥爭，同樣黨也會瓦解，革命就會失敗。所有這些，都是在過去十八年的歷史中證明了的。

中國共產黨的武裝鬥爭，就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鬥爭。它的歷史，也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參加資產階級的北伐戰爭。這時，我們雖然開始得武裝鬥爭的重要地位，但還沒有了解其重要性，還沒有了解武裝鬥爭是中國革命的主要鬥爭形式。第二階段，是十年內戰。我們已經建立了獨立的武裝隊伍，已經學會了獨立的戰爭藝術，已經建立了人民政權的根據地並且已經能夠把武裝鬥爭這個主要鬥爭形式與其他的必要的鬥爭形式直接或間接的配合起來，就是說，同工人的鬥爭，同農民的鬥爭（這是主要的），同青年的鬥爭，同婦女的鬥爭，同政權的鬥爭，同經濟戰線上的鬥爭，同好戰線上的鬥爭，思想戰線上的鬥爭，等等鬥爭形式，都在全國範圍內或者直接的或者間接的配合起來。而這種武裝鬥爭，就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土地革命，這就是我們黨的武裝鬥爭史的第二個階段。第三個階段，就是現在的抗日戰爭階段。在這個階段中，我們能夠運用過去第一階段中，尤其是第二階段中的武裝鬥爭的經驗，能夠運用武裝鬥爭形式與其他各種必要的鬥爭形式互相配合的經驗。這種鬥爭的總概念就是游擊戰爭。游擊戰爭是甚麼呢？它就是在落後的國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國中，在長時期內，人民武裝隊伍戰勝武裝的敵人，創造自己的陣地的不可避免的因而也是最好的鬥爭形式。十八年來，我們黨的政治路線與黨的建設，是密切聯繫於這一鬥爭形式的

離開了武裝鬥爭，離開了游擊戰爭，就不能了解我們的政治路線，也就不能了解我們的黨的建設。我們的政治路線的重要一部份就是武裝鬥爭。十八年來，我們黨是日益學會了並堅持了武裝鬥爭這條路線，我們懂得，在中國，離開了武裝鬥爭，就沒有無產階級的地位，就沒有人民的地位，就沒有革命的勝利。十八年來，我們的發展鞏固與布爾塞維克化。是在革命戰爭中進行的，是與游擊戰爭不能分離的。沒有武裝鬥爭，沒有游擊戰爭，就不會有今天的共產黨。這個拿血換來的經驗，全黨同志都不要忘記。

黨的建設的過程，黨的發展、鞏固與布爾塞維克化的過程，也同樣是有三個階段的特點的。第一階段是幼年的黨。在這個階段的初期與中期，黨的路線是正確的，黨員羣衆與黨的幹部的革命積極性非常之高的，因此獲得了第一次大革命的勝利。然而過時的黨終究是幼年的黨，是在統一戰線，武裝鬥爭與黨的建設三個基本問題上都沒有經驗的黨，是對於中國革命的特點，中國革命的規律，中國的歷史知識與社會知識都不懂得或不豐富的黨，是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間還沒有完整的、統一的了解的黨。因此，黨的領導機關中佔統治地位的成份，在這一階段的末期，在這一階段的緊要關頭中，沒有能夠領導全黨鞏固革命的勝利；接受了資產階級的欺騙，而使革命遭受了失敗。在這一階段中，黨的組織是發展了；但是沒有鞏固，沒有能夠使黨員、黨的幹部、黨的組織，在思想上，政治上鞏固起來。新黨員非常多，但是沒有給與必要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工作經驗也不少，但是不能夠很好的總結起來。黨內混入了大批的投機份子，但是沒有清洗出去，敵人與同盟者都在陰謀陷害我們的黨，但是沒有覺悟性。黨內湧出了很多的活動份子，但是沒有獲得及造成黨的中堅骨幹。黨的手裏有一批革命武裝，但是不能掌握住。所有這些情形，都是由於沒有經驗，缺乏深刻的革命認識，缺乏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理解而來的，這就是黨的建設的第一階段。第二階段，即十年內戰的階段。由於有了第一階段的經驗，由於對於中國革命的特點，中國革命的規律，中國的歷史知識與社會知識的進一步的了解，由於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間有了進一步的聯系，就使得我們黨能夠進行了勝利的十年蘇維埃鬥爭。資產階級雖然叛變了，但是黨能夠緊緊的依靠游擊農民。黨的組織不但重新發展了，而且得到了鞏固。敵人難

然天天在暗害我們的黨，但是黨驅逐了暗害份子，黨內不但重新湧出了大批的幹部，而且使這些幹部變成了黨的中心骨幹。黨開闢了人民政權的道路，因此也就學會了治國安民的藝術，黨創造了堅強的武裝部隊，因此也就學會了戰爭的藝術。所有這些，都是黨的重大進步與重大成功，然而，一部份黨員是在這個偉大鬥爭中跌下了或跌下過機會主義的泥坑，這仍然是因為他們不去虛心領會過去的經驗，對於中國革命的特點，中國革命的規律不了解，對於中國的歷史知識與社會知識太缺乏，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間，沒有統一的理解而來的。因此，就使黨的領導機關的一部份人，沒有能夠在這一整個階段的一切時間中都完全的掌握住正確的政治路線與組織路線。黨與革命在一個時間中是遭受過李立三左傾機會主義的危害，而在另一個時間中，又遭受過革命戰爭中的左傾機會主義與白區工作中的左傾機會主義的危害。然而這一切，是什麼的四中全會與黨的邊區會議這兩個歷史的會議中所先後戰勝了。及至邊區會議（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貴州遵義開會）以後，黨就澈底的走上了布爾塞維克的道路，奠定了後來戰勝蔣匪國泰右傾機會主義與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礎。這就是黨的發展過程的第二個階段。黨的發展過程的第三個階段，就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階段。這個階段，已經過去了三年，這三年的鬥爭，是有非常偉大的意義的。黨憑藉着過去兩個革命階段中的經驗，憑藉着黨的組織功績與武裝力量，憑藉着黨在全國人民中間很高的政治信仰，憑藉着黨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更加深入的理解，就不但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且進行了偉大的抗日戰爭。黨的組織已經從狹小的圈子中走了出來，變成了全國的大黨。黨的力量、武裝也在同日寇的鬥爭中重新壯大起來與進一步堅強起來了。黨在全國人民中的影響，更加擴大了。這些都是偉大的成功。然而，黨是發展了，但有大批新黨員與很多的新組織並沒有入黨，它們對於中國革命的特點，中國革命的規律，中國的歷史知識與社會知識，還不懂得或不豐富。它們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完全的理解，還相距很遠。在過去發展黨的組織中間，雖然中央黨重提出了「大大發展黨，但不讓一個壞份子侵入」的口號。但實際上是混進了許多投機份子與敵人的暗害分子在內。統一戰線雖然建立了並堅持了三年之久，可是資產階級特別是大資產階級却時時刻刻在企圖破壞我們的黨，大資產階級投降派與頑固派所指揮的嚴重的磨擦鬥爭在全國進行

着，反共之聲過於各地，大資產階級投降派與頑固派並想以此作為投降日本帝國主義，分裂統一戰線和拉了中國向後倒退的準備。資產階級在思想上企圖溶解共產主義，在政治上、組織上企圖取消共產黨，取消邊區，取消黨的武裝力量。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的任務，無非是克服這種投降，分裂與倒退的危險，盡可能的保持民族統一戰線，保持國共合作，而爭取繼續抗日的團結與繼續進步；同時，準備對付可能的突然事變中不使黨與革命遭受意外的損失。爲達此目的，就要鞏固黨的組織，鞏固黨的武裝力量，並動員全國人民，進行反投降，反分裂，反倒退的堅決的鬥爭。這種任務的完成，依靠全黨的努力，依靠全體黨員，黨的幹部，黨的各地各級組織，實行不屈不撓再接再厲的鬥爭。而我們相信，在有了十八年經驗的中國共產黨，在它經歷過風浪的布爾塞維克的中央與地方組織相互協力之下，在它的黨員，新幹部相互協力之下，在它經歷過風浪的布爾塞維克的中央與地方組織相互協力之下，在它的堅強的武裝力量與進步的人民羣衆相互協力之下，這些目的是可能達到的。

這就是我們黨在十八個年頭與三個階段中的主要的經歷與主要問題。

十八年的經驗告訴我們，統一戰線與武裝鬥爭，是戰勝敵人的一個最基本的武器。

統一戰線，是實行武裝鬥爭的統一戰線，而黨的組織，則是掌握統一戰線與武裝鬥爭這兩個武器以實行對敵衝鋒陷陣的英勇戰士。這就是三者的相互關係。

我們今天要怎樣建設我們的黨，要怎樣才能建設一個「全國範圍的，廣大羣衆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塞維克的中國共產黨」，考察一下我們黨的歷史，就會懂得，把黨的建設問題，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問題，同武裝鬥爭問題聯繫起來看，把黨的建設問題同聯合資產階級又和它作鬥爭的問題，同八路軍新四軍堅持抗日游擊戰爭與建立抗日根據地問題聯繫起來看，就會懂得。

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理解，集中十八年的經驗與當前的新鮮經驗傳達到全黨，使全黨一樣的鞏固起來，而避免歷史上曾經犯過的錯誤——這就是我們的任務。

（一九四〇年十月四日）

中央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

(中華民國三十年七月一日中共二十週年紀念日中央政治局通過)

(甲)中國共產黨經過三十年的革命鍛鍊，現在已經成爲全國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的決定的因素，然而放在我們面前的仍然是偉大而艱難的革命事業。這樣，就要求我們的黨更進一步的成爲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的黨，要求全黨黨員和黨的各個組成部份都在統一意志、統一行動和統一紀律下面，即結起來，成爲有組織的整體。沒有這樣堅強的統一集中的黨，便不能應付革命過程中長期複雜的鬥爭，便不能實現我們所負的偉大歷史任務。因此今天鞏固黨的主要工作是要求全黨黨員，尤其是幹部黨員，更加增強自己黨性的鍛鍊，把個人利益服從於全黨的利益，把個別黨的組成部份的利益服從於全黨的利益，使全黨能夠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

(乙)我們的黨，雖然已有二十年英勇奮鬥的歷史，雖然已經是和廣大羣衆密切聯系的布爾什維克化的黨；但是必須指出：我們的環境，是廣大農村的環境，是長期分散的獨立活動的游擊戰爭的環境，黨內小生產及知識份子的成份佔據很大的比重。因此，容易產生某些黨員的「個人主義」、「英雄主義」、「無組織的狀態」、「獨立主義」與「反集中的分散主義」等等違犯黨性的傾向。這些傾向，假如聽其發展，便會破壞黨的統一意志、統一行動和統一紀律，可能發展到小組織活動與派別鬥爭，一直到公開反黨，使黨與革命受到極大損害。而有這些傾向的個人如不改正，亦會身敗名裂，叛徒張國燾的結局，便是明期的歷史教訓。這些缺乏黨性的傾向，今天在黨內雖然還不是一個普遍的現象，但在某些個別部份中，在某些同志中是確實存在着的。上述的這些傾向，具體的表現在下列各方面：

(一)在政治上自由行動，不請示中央或上級意見，不尊重中央及上級的決定，隨便發言，橫新立異，以感想代替政策，獨斷獨行。或借故推脫，兩面態度，陽奉陰違，對黨隱瞞。

(二) 在組織上自成系統，自成局面，強調獨立活動，反對集中領導。本位主義，護不顧人，目無組織，只有個人。實行家長統治，只要下面服從紀律，而自己可以不遵守，反抗中央，輕視上級，超越直接領導機關去解決問題。多數決議，以少數決定，打擊別人，抬高自己。在幹部政策上毫無原則，隨便提拔，隨便打擊，感情拉攏，互相包庇，秘密勾結，派別活動。

(三) 在思想意識上，是發展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來反對無產階級的集體主義。一切從個人出發，一切都表現個人，個人利益高於一切，自高自大，自命不凡，個人突出，提高自己，喜人奉承，吹牛誇大，風頭主義。不實事求是的了解具體情況，不嚴肅慎重對待問題，鋪張求表面，不肯埋頭苦幹，不與羣衆真正密切聯系。

(丙) 爲了糾正上述違反黨性的傾向，必須採取以下辦法：

(一) 應當在黨內更加強調全黨的統一性、集中性和服從中央領導的重要性。不允許任何黨員與任何地方黨部，有標新立異，自成系統及對全國性問題任意對外發表主張的現象。要求各個獨立工作區域領導人員，特別注意在今天任何時候更需相信與服從中央的領導。應當在黨內開展反對「分散主義」、「獨立主義」、「個人主義」的鬥爭。

(二) 更嚴格的檢查一切決議決定之執行，堅決肅清陽奉陰違的兩面性的現象。

(三) 即時發現，即時糾正，不容容錯繼續發展，才更能挽救幹部和不使工作受到損失，反對當面客氣，背後指斥，一切批評應當是正面坦白的誠懇的提出，目的是爲了挽救，而不是爲了打擊。應當強調黨內的團結互助，愛護幹部，幫助幹部在政治上的進步。但對於屢說不改者，必須及時預防，加以紀律制裁。

(四) 要在全黨加強紀律教育，因爲統一紀律，是革命勝利的必要條件。要嚴格遵守：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基本原則。無論是普通黨員和幹部黨員，都必須如此。

(五) 要用自我批評的武器和加強學習的方法，來改造自己，使適合於黨與革命的需要。要求每個黨員，特別是每個負責領導的幹部，都深刻反省自己的弱點。把黨的利益看得高於一切，任何人都

不應有自滿自足、自私自利的觀念。要提倡大公無私，忠實樸素，埋頭苦幹，眼睛向下，實事求是，力戒驕傲，力戒膚淺的作風。要改造那些把理論與實踐、學習與工作完全脫節的現象，這樣來更加堅定自己的階級立場，黨的立場與黨性。

(六)最後決定從中央委員以至每個黨部的負責領導者，都必須參加支部組織，過一定的黨的組織生活，虛心聽取黨員羣衆對於自己的批評，增強自己黨性的鍛鍊。

作一個好的黨員，建設一個好的黨

劉少奇

本年七月一日爲中國共產黨成立的十九週年紀念日，抗敵報、前鋒報及邁進報均要我寫篇文章。我想，我們的黨已成立十九年了，在這十九年中，它經過了「二七」運動，經過了第一次國共合作與大革命，又經過了十年蘇維埃運動與土地革命及十年的秘密工作，今天再經歷着第二次國共合作與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就是說，在這十九年中所有中國歷史上一切偉大的事變與羣衆的革命運動，我們的黨都是站在羣衆鬥爭的最前線，每一次都表現着我們的黨和無數的黨員是具備着無產階級政黨之革命的英勇氣概，犧牲精神和堅忍卓絕的模範，表現着我們黨在中國政治生活與歷史事變中的偉大作用，表現着我們黨是有能力繼承并忠實于馬克思、恩格斯、列甫、斯大林事業的布爾塞維克的黨；同時也表現着我們的黨是最堅決最徹底最能爲中國民族獨立解放事業而奮鬥，最能與壓迫中國民族的帝國主義戰鬥的黨。

我們最大多數的黨員，他們那類爲公共事業而犧牲奮鬥的精神，那種爲民族獨立與社會解放而艱苦工作的精神，那種既不想升官發財，又不爲名爲利，而一心爲了勞苦大眾與人類解放事業而不疲倦的埋頭苦幹精神，表現了他們有人類中最崇高的道德，他們是中華民族最優秀的子孫，因此也就吸引了並且吸引着無數千百萬的誠實的人們對於我們的黨，對於我們那些最好的黨員的敬仰，不論我們的敵人是如何造謠誣毀我們的黨，如何說我們是「洪水猛獸」，「共產共妻」不近人情的人，如何用一切殘暴手段對待我們及對待接近我們的人，然而無數千百萬的人們還是把他們最大的也是最後的希望寄托在我們黨的身上，他們在無形中對我們的黨下了這樣一道委任令：你們共產黨人，是真正能夠犧牲自己爲中國民族與勞苦大眾的解放而戰鬥的人們，中國之所以能得救，中國之所以必能走上富強、

獨立與自由的光明前途，就賴有你們這樣一批人的努力，因此，齊給你們以救中國，創造獨立、自由與幸福的新中國之任務。這就是說，我們的黨在十九年來賴有無數先烈的英勇犧牲與無數黨員最好的努力，已經使我們的黨大大的發展了，它已成為全中國的羣衆的黨，它已與中國廣大的羣衆建立了密切的聯系，它已在廣大的羣衆中有了極高的威信，而且他在十九年來經過了比世界任何一國的共產黨都更多的重大事變，有更豐富的革命鬥爭的經驗，不論公開的與秘密的，武裝的與非武裝的，國內戰爭的與國際戰爭的，經濟的與政治的，思想的與黨衆的，黨外的與黨內的……各種複雜形式的革命鬥爭，我們的黨都經驗過了，都有豐富的經驗。我們有許多黨員十餘年來一直就沒有放下過武器。這是十九年來爲世界任何一國革命政黨所不及的。所以我們中國的共產黨雖然只有短短的十九年，即已成為共產國際中最好的支部之一。這是我們偉大的黨在偉大的十九年中在偉大的中國所已獲得的成績。這些成績，不獨是對中國一個國家有它極重大的意義，對於世界，特別對於世界各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國家，亦有其重大的國際意義。中國革命已成為世界革命中的偉大的因素，中國共產黨已站在世界各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國家革命的領袖的地位。這是共產國際在很早以前對我們黨的評語。

然而，這些成績，並不是那樣容易得來的，而是經過了整整十九年的苦戰與艱苦工作，犧牲了數十萬最好的共產黨員與非黨革命者的頭顱和熱血，克服了黨內各種錯誤和機會主義的思想，淘汰了黨內各種腐爛的渣滓，並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原則武裝我們許多黨員的頭腦，才能鍛鍊出如我們今天這樣的鮮艷之花。不久，它將結成爲中華民族與勞動人們賴以得救賴以自由的無價之果。從我們黨過去十年的歷史證明：不啻我們黨的一切敵人如何痛恨、咒罵、壓榨、搶奪、陷害、毒害、毒罵與圍剿我們，如何採用一切人類之殘暴的手段來對待我們，他們終究是不獨不能消滅我們的黨，甚至連阻止我們黨的發展亦是不可可能的。我們的黨，就是在和這些敵人的這些殘暴手段之鬥爭中，生長，壯大與堅強起來的。因爲我們黨，是馬克思主義的布爾什維克黨，是與羣衆有密切聯系的黨，是代表着歷史最進步的無產階級的黨，因此，我們是永遠不會被消滅的，我們是不可被戰勝的，世界上已經沒有任何一種力量能戰勝我們的黨，相反，我們將戰勝世界上一切的反動勢力，將把世界改造造成最進步

最美好最合於我們理想的共產主義世界。

因此，在紀念我們偉大的黨之十九週年的今天，我們無數的新老黨員，應該是如何來估量我們黨所已獲得的成績及我們黨在中國與世界的革命運動中所已取得的要地位？應該是如何來看清與篤信我們黨的光明前途？應該是如何來保護我們的黨，爲了黨的每一個利益（就是爲了中華民族與人類解放的利益）而犧牲奮鬥，盡我們最善的努力？黨的建設，達到今天我們中國黨這樣的程度，已經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今天我們的新老黨員，接受了我們先烈遺留下來的這份無價的遺產，應該是如何的負責他！如何在我們黨已有的成績和陣地之基礎上推動我們的黨再向前進！建設它、加強它、發展它、以及至於達到最高級最完善的程度。這就是我們今天一切新老黨員的責任，這也是我們一切的一切。我們要建設一個最好的黨！要達到這個目的，固然須要我們各方面的努力，須要中央與各級領導機關正確的領導，但最最基本的還須要我們有很多很好的黨員。因此，我們黨員在此黨的十九週年之偉大節日，應該如何誠心的來檢查一下自己，應該問問自己，你是否曾經有過違反黨的利益的行為，曾經盡了你何種努力？並且你預備怎樣在今後來盡你的努力？你是否曾經有過違反黨的利益的行為，曾經盡了你何種努力？以及怎樣才能在今後不再再有違反黨的利益的行為，言論與行動？我想，黨員向自己提出這樣的問題，是使自己在進步的出發點。我們每一個黨員都應該在黨內作一個好黨員，而不應該作一個不好的黨員，作一個有毛病、有錯誤、思想意識不正確的黨員，尤其不應該作一個半途的黨員。我們怎樣才能作一個好的黨員？這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來作我們的模範，這在「論共產黨的修養」一篇文章上已說了許多，這裏不來詳說他。但我最近在黨內某些同志中發現了一些不正確的思想與行動，有了這些思想和行動，就決不能使我們成爲一個好的黨員，並且還要影響其他的黨員及阻礙我們黨的進步，今特利用黨的十九週年紀念之便，略論之如下：

第一、要忠心負責的爲黨工作，愛護黨的每一個事物，如自己的事物一樣。

我們共產黨人，是今天世界上有一種特殊的人物，我們是爲了公共事業，即共產主義與人類謀解放事業而奮鬥的一種人物，爲了大家的利益與解放，爲了我們大家的長遠的幸福，我們有時不能不暫時有所犧牲，不能不犧牲自己。我們共產黨人就是決心犧牲自己（當爲了整個黨的利益而不得不犧牲

自己的時候）爲了大家解放的公共事業而奮鬥的一種人物。這是我們黨員大家所知道的，也是我們大多數黨員所能身體力行的，然而在我們的某些黨員中，在一些最平常的事物上，常常發覺出他們並不能這樣作。

這些同志常常用了兩種不同的態度來對待屬於他自己個人的事物和屬於黨的公共事物。就是說，當某種事物如果是個人的，他把這一事物看作是自己的，他對於這種事物就是愛惜的、節省的、盡心的、負責的，但是當某種事物並不屬於他個人，而是屬於黨的公共的事物，他把這一事物看作是自己的、不是他自己的，如是他對於這種事物就是不愛惜的、不節省的、不盡心的、不負責的，或者甚至把黨的事物暗中竊取作爲私有。就是說，他對自己的私人事物的態度，是與公共事物的態度不同的。他對黨的公共事物，認爲這不是他自己的東西，所以他不要惜、浪費、不盡心、不負責的去照顧。爲什麼？因爲這不是他自己的，因爲這不是公共的。他不把公共事物當作他自己的事物一樣盡心負責的去照顧與努力。這類現象，在我們某些黨員的日常生活中是經常可以看到的。

比如說：某件東西如果是他自己的，他是愛惜的，某種事情，如果是爲他自己作的，他是盡心的、努力的、負責的，但是如果某件東西是公家的，他就可以不要惜，這種事情，如果是爲黨爲公家作的，他就可以不要心、不努力、不負責。這種情形，常常成爲我們中浪費現象及各種不負責任現象的產生之根源。

這種觀念，很顯明，是與共產主義不相容的，是一種舊社會的私有觀念的殘餘，他不了解黨員自己的事物與黨的公共的事物之間的矛盾一致的關係。他認爲黨的公共的事物，不是他自己的事物，所以對黨的公共的事物之態度，不同於對自己的事物之態度。很明白，這對於一個黨員來說，是一種根本上錯誤的觀念。我們的黨員必須改正。

我們應該說：只有屬於黨的屬於勞動者全體所有的公共的事物，才是我們自己的事物。否則，對於我們黨員來說，對於勞動者來說，都不是我們自己的。

當着工人在資本家的工廠中工作，工人自己覺得這是爲他自己，爲他自己的家庭的生活而工作的時候，列寧曾經說：這些工人都不是爲他們自己工作，而是爲資本家的利權而工作。只有當着工廠已

因革命的勝利而屬於工人階級國家所有，成爲社會勞動階級全體所有的公共財產的時候，列甯才說，只有在這時候，工人才是有史以來頭一次的爲他們自己工作，爲他們自己生產。

當着農民們在地主的或『自己的』土地上工作，農民們自己覺得這是爲他們自己，爲他們自己的家庭生活而勞動的時候，列甯曾經說：這些農民不是爲他們自己勞動，而是爲了地主的地租，爲了高利貸者的利息，爲了政府的稅收而勞動。只有當着土地已經收歸國有，當着國家已是社會主義的國家，當着地主，富農及私人商業已經消滅，當着農民已成爲國家農場與集體農場即公共農場上的勞動者時，只有在這時候，農民們才是爲他們自己勞動。

列甯說：蘇聯是工人自己的國家。但這個國家是工人階級所共有的，而不是任何個人所私有的。當着俄國的工人們在十月革命後，爲自己的國家在公共的工廠中自動努力工作，提高生產，節省材料，而表現出工人們爲公共事業而努力生產的勞動熱忱時，列甯曾經對着這種情形說，這就是真正的共產主義。因爲工人們已經不是爲資本公司，而是爲他們自己而勞動了。他們用了新的態度，來對待他們新的勞動。

由此看來，自己的事物，常常不是我們自己的，而是別人的。黨的、公共的、爲工人階級與勞動者全體所共有的事物，就恰恰是我們自己的事物。公共的與自己的，在這裏表現其一致性。所以我們共產黨人及一切愛國的勞動者，應該把屬於黨的公共的事物，當作自己的事物，應把公家的東西當作自己的東西一做來愛惜它，把黨的公共的工作當作自己的工作一樣盡心努力負責的去作。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有爲公共事業而犧牲專門的高尚的精神，才成爲可靠的黨的工作者與負責者，才成爲一個好的黨員。

從這裏看來，某些同志的本位主義，也是一種根本上錯誤的觀念。這種本位主義不了解他自己負責的一部份工作與黨的整個工作之矛盾一致的關係。他只認爲他那部份工作是他自己的，而不認爲別人負責的工作及黨的整個工作都是我們自己的。他對自己負責的工作與對別人負責的工作根本上用了不同的態度，所以也形成他只顧自己而不顧別人而不顧整體的錯誤。這種本位主義的發展，對黨的工作是很有害的，他爲了部份的個別的利益而犧牲妨害整個的全體的利益，他違背着部份的利益要脫離全

體的利益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所以要不得。好的共產黨員是不應該有本位主義的。

固然，沒有部份，也就沒有全體，部份的利益，常常與全體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我們不主張完全不要部份，而只主張部份服從全體，即是當部份的利益與全體的利益發生衝突時，我們應該犧牲部份的利益，而不應該犧牲全體。所以我們有時爲了更大、更長遠的全體的利益，而主張犧牲某一份那，這是應該的。

第二、爲黨的與勞苦大眾的公共事業而犧牲，是最值得的。

在某些同志中說到犧牲，就提出了所謂值得與不值得的問題，要怎樣犧牲對於一個共產黨員才是值得？又怎樣才是不值得呢？在這個問題上某些同志有不同的觀點；這種觀點是由於他們不同的非共產主義的人生觀而來的。他們具有舊社會的甚至剝削者的享樂的人生觀（如所謂『人生行樂耳』，『浮生若夢爲歡幾何？』等）認爲他們沒有享到快樂的生活就犧牲，是不值得的。認爲一生沒有大吃大喝過，沒有過過舒適的奢侈的生活，沒有嫖過女人，沒有出過風頭，沒有成風流潦潦幹過一下……而犧牲了，對於人生是不值得的，如果這些事都作過了或各門都經過許多，那末對於人生確是值得的。他們說：幹過這些事，那末死了都值得。這是中國目前社會上相當普遍的一種人生觀。這種人生觀也多少反映到我們一些落後黨員的思想意識中，如是在我們某些黨員中就發生享樂的觀念，對目前艱苦生活艱苦工作發生厭倦的心理，如他們就想要去貪污、腐化、動搖以至墮落而脫離黨與革命。他們想了：作一個地主、資本家、富人、剝削者，是很舒服、很值得的。他們沒有去經驗過，他們想要去經驗一下，如他們就從無產階級的隊伍中跑到剝削者的隊伍中去。剝削者的特務機關也就利用我們這些落後份子的這個弱點，從面威迫利誘，如某些人就這樣的墮落與反革命了。但是在富人剝削者那裏，那種腐敗、墮落、黑暗的生活與家庭，他們暗淡的前途，他們的生活也並不是舒適的，他們的苦悶、無出路、無生氣的，也是十分嚴重，比我們前進的革命黨人是更爲苦悶的，因爲他們是接近於死亡的階級，他們已爲自己掘下了墳墓，他們明知是很悲慘的不願意的，然而他們又無法不向自己掘好的墳墓中鑽進去並活埋自己。世界上最悲慘的事，莫過於此！然而，偏還有人說：他們是『最值得的』。這不奇怪嗎？剝削者不勞而食，倚靠別人的勞動而生活，養得像肥豬一樣，一點事不作，對世界

人類社會一點好處也沒有，沒要在世界上作威作福，危害無數千百萬勞動的人們，這是世界上最可惡的事情，從來一切正義的歷史家，就鄙視那些不勞而食的剝削者，就尊敬那些勞動的偉人們。正因為是這樣，所以剝削者中明白自己的前途與歷史進化的人，尤其是剝削者的青年子弟，他們不滿意自己家庭那種腐敗黑暗封建的生活，他們為了自己的將來，而丟棄了自己的家庭，跑到勞動者隊伍中，開槍或加入前進的革命政黨，已有了不少了。他們厭倦那種剝削者的豬一樣的生活，他們無所留戀的丟棄了這種生活，他們很對！然而，在我們前進的革命政黨中之某些落後份子，還有人想要去嘗一嘗這種生活的滋味，還以為這或許是很值得的。這對我們黨員來說，難道不奇怪嗎？很明白，這是一種倒退落伍的思想。這與共產黨員的黨籍是完全不能同時並存的。

那末，作一個人，特別作一個共產黨員，要怎樣才算值得呢？

我們說，一個人，特別一個黨員，為了社會進化與人類解放，為了無數千百萬勞動人類的共同長遠的利益，而犧牲奮鬥到底，以至終身，甚至犧牲自己的生命，是最值得，最引起人們的敬仰，最爲萬世子孫所懷念所歌頌的。這在我們黨內已有無數的先烈，他們就是最值得，最爲大衆所敬仰的人。如果是爲了剝削者的利益，爲了個人或少數人的優裕生活，爲了反對社會的進步與人類的解放，而犧牲奮鬥或若死埋井田間與高樓大廈，那是最不值得最不應該的，那是永遠要被大衆鄙視和唾罵的。從來的剝削者及爲剝削者少數人的福利而鬥爭的人，都引起人們的咒罵。我想，一個有爲的有出息的人，特別是一個共產黨員，是完全應該明瞭這一點的。

所以，在我們中，那些埋頭苦幹的黨員，那些艱苦工作，不怕困難，不怕危險的黨員，那些一心一意爲了黨與人類解放而堅決鬥爭的黨員，那些吃苦在前，享福在後的黨員，是我們的好黨員，雖然在某些個人享受上，他們暫時吃一點虧，然而他們是，或者最後是，爲我們大衆及黨衆所信任、所尊敬的。也就是說，他們是最值得的，相反，那些不願埋頭苦幹，好出風頭，怕困難，怕危險，不忠心爲黨爲人類、利益奮鬥的人，那些要求享福在前，吃苦在後的人，都不是好黨員，雖然他們在某些個人享受上或者暫時討了一點便宜，然而他們是，或者最後是，爲我們大衆及黨衆所不信任所反對的。也就是說，他們最可能弄一個不值得。

現在在最近有個別的黨員要求到政府機關去作行政工作。原因就是因為政府機關有幾塊錢薪水一月，他們想要多幾塊錢一月，他們就調皮，就要求調工作，要到行政機關去。同志們！這是什麼觀點？有人或者反對行政人員有薪水，如果他向政府提議取消或改正行政人員的薪水制度，那是對的，是一個黨員應有的態度。然而某些人的反對，不是真正反對行政人員有薪水，他不反對，而是希望他自己也能得到這點薪水，他口頭上的反對，只是藉口而已。同志們！這也不是好黨員所應有的。我們加入黨，艱苦工作，不是爲了幾塊錢，不是爲了別的，而是爲了民族的與社會的解放。所以我們自願不要錢，即使幾百元一月的事也不去作，而要來作這種無薪水的革命工作，比幾百元薪水一月更值得的革命工作。這應該是我們每一個黨員完全明白的問題，那些不明白的人，應立即改正。

此外，在我們黨員中常常有如下的現象：即在分配黨員工作的時候，他們要求到最安全，最有保障，工作最容易最簡單，而且是最富足，生活最好的地方去，而比較不安全，有危險，地方貧瘠，生活艱苦，工作困難，環境複雜的地方與工作，就大家也不願意去。即是這種工作對黨對革命是很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他們爲了痛快與好的生活而不願意去作。如果硬要他去，他會向你說，你強迫我去的，我的情緒不高。同志們！這不是好黨員所應有的。好的黨員他是不注意這些的。他只問這件工作對黨對革命是否重要，是否他能夠作。如果對黨重要的他能夠作的，他不計較困難與否，環境複雜與否，他也去作的；他願意擔負最艱苦困難危險的工作，他不把困難的事情給別人去作，自己作最容易最便宜的事情。這也是我們的黨員所應注意的。

第三、要作一個終身的好黨員。

作一個共產黨員是沒完的，但我們要作一個終身的好黨員，我們不應該作一個半途的黨員。共產黨員，是我們自己要作的，沒有任何人來強迫我們作黨員，但不只是我們要作一個黨員就是一個黨員，這還不夠，還要共產黨允許我作一個黨員，不關除我的黨籍，才是一個黨員。就是說要其他的黨員及黨的機關承認我是一個黨員，我才能是一個黨員，否則，只有我自己的願意，還不能是黨員。我們共產黨員相信唯物辯證法，認爲世界一切都是變動的，沒有不變的東西。所以我們的政變策略工作方法等也講究根據客觀情況的變化而變化。但是對於我們共產黨員來說，有一件事是終身不變

的。這一件事就是我們要為黨的利益，無產階級戰鬥的利益亦即是人類最後解放的利益而奮鬥到底。就是我們要作一個終身的黨員。這對於我們是終身不變的，變不得的，變了，就叫動搖、變節或叛變。這是黨員最大的恥辱和不幸。有了這一點不變，然後其他一切才可以根據情況的不同而千變萬化。不變是變動的標準和尺度，即靜止是運動的標準和尺度。我們的一切戰略策略的變動的標準和尺度，就是要看這種變動是否適合於無產階級全體的戰鬥利益？適合於這種利益就應變動，不適合於這種利益就不應變動。所以，是否適合於無產階級全體的戰鬥利益，是測量黨的及黨員個人的一切戰略策略與工作方式之變動是否正確的標準和尺度。自然，這種不變，一般來說，只是相對的。僅僅對於我們共產黨員來說，是絕對的。因為在幾百年前或幾百年後，世界還沒有無產階級或無產階級已不存在時，人們自然不會有為無產階級戰鬥利益而奮鬥的事。所以在人類社會歷史上來說，這也還是變動的。但對於我們黨員來說，這是絕對不能變的。只有他們在宏觀上終身絕對的忠實於黨與階級的戰鬥的利益，在宏觀上，在我們一切思想言論行動的實踐中認得是適合於黨與階級的戰鬥的利益，我們才是一個好黨員。

我們既要作一個終身的黨員，我們對黨就不要有什麼秘密，不要把某些不利於黨的思想言論行動對黨隱瞞起來，或者明知某些思想、言論、行動對黨是不利的，而暗中隱瞞的去作，以為這樣黨是不會知道的。其實，我們的黨員如果要作一個終身的黨員，那末他的思想、言論、行動，他是一個什麼人，他有什麼不正確的思想意識，他作過什麼不適合黨的利益的事，一年一年以至十年二十年直至他死，那裏不會被人知道的呢？最後總是會被人知道，被人了解的。結果，是隱瞞不了的。所以，我們黨員，不要有對黨隱瞞的不光明的事情，過去作過的，自己講出來好了，我們黨是注意將來，不大追求同志的既往過錯的。講出不要緊，不講就不好。我們黨員應該有『生平所作，無事不可對人言』的坦白。

自然，我們也不是要黨員逢人便說出自己的歷史與過去的一切，不保守自己的秘密，也並不是要黨員不為黨保守秘密，而是要我們黨員不要秘密的去作那些違反黨的利益的事，不要口是心非，不要作兩面派。

既要作一個終身的黨員，也就不怕有什麼事被人誤會，被人懷疑。因為誤會懷疑是暫時的，真象總是在最後要暴露出來。一年二年被人誤會，被人懷疑，十年二十年直至終身，你如果是一個好黨員，總是會被人明瞭的。暫時的誤會懷疑，對於個人常常不一定是有所損失的。因為誤會懷疑一旦被人明瞭之後，不獨能挽救你在誤會中的損失，而且增加對於你的新的安慰和鼓勵。

最後，我要說到，我們黨的前途是光明的偉大的，我們黨員的前途也是光明的偉大的，黨的勝利，即：我們一切黨員的勝利。黨員只有在黨的勝利中才會有自己的勝利。所以我們一定要建設一個好的黨，一定要使我們的黨繼續前進，這就一定要我們大多數黨員努力工作、努力學習、努力提高與增進自己的品質，努力前進，才能建設一個好的黨。我們的黨已經很好，但還有缺點，還在某些環節中有錯誤，還有不中用的渣滓，還要繼續改進、振奮提高、繼續布爾塞維克化。這是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建設新的民主共和國決定的因素。在中國沒有一個好的大的共產黨，沒有共產黨中央的正確的領導與全體黨員的正確的努力，要戰勝日本帝國主義是不可能的，要建設新的民主共和國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一定要作一個好的黨員！一定要建設一個好的黨！一定要戰勝日本帝國主義！一定要建設一個新的民主共和國！一定要最後實現共產主義！

這就是我在黨的十九週年紀念日所要講的話。就以此來回答抗敵報、前鋒報、邁進報的徵文要求

（一九四〇年七月一日）

組織上的和紀律上的修養

劉少奇

——這一章是根據劉少奇同志在華中黨校的報告記錄整理而成的，但並未經過他親自校閱，特此聲明。——

一 黨員與黨及其他黨員的關係

黨員在組織上的修養反映黨員個人與黨的關係及黨員個人與其他黨員的關係。黨員應該採取什麼立場、方式和態度，去對待黨和其他黨員，這就是黨員在組織上的修養。我們先來說明黨的組織結構。

一、黨是矛盾的結構

黨的組織結構是怎樣的呢？這同其它事物一樣，是矛盾的結構，是矛盾的統一體，即兩個相反的東西結合在一起，成爲一個新的東西而存在。自然科學告訴我們，世界上每一物體，都是這樣結合成的。世界上已經發現有九十四種原子，每種原子都是由陽電子和陰電子結合成功的。陽電子和陰電子是相對的東西，結合在一起，就變成了一種新的東西。例如：金子是一個陽電子七個陰電子結合成的，水銀是一個陽電子和八個陰電子結合成的。由於電子結合的數量的不同和運動的不同，就造成了世界上各種不同的事物。一定要兩個相反的、矛盾的東西結合起來，才能成爲一個新的東西。結合不等於混合，不是總合，也不是「+」號。相同的東西加起來只能有量的增加，不會有質的變化。例如一條牛加一條牛仍是牛，一升米加一升米仍是米，但是一條公牛加一條母牛就形成了新的關係，一個男人加一個女人便成了夫妻的關係。一切東西都必須是矛盾的統一體。

我們共產黨也是由各個不同的黨員結合而成的；它的基本結構是支部。比如我們黨員三人以上可成立一個支部或小組，但支部或小組不是僅僅一個黨員加二個黨員的關係。一個黨員加二個黨員等於

三個黨員，——這只是一個加號的關係，還不成爲黨的結構（組織）。怎樣才能成爲一個組織呢？就是說三個黨員中要有一個支部書記，二個支部成員，或是一個組長二個組員。支部書記和支部成員的結合，或是組長和組員的結合，都是矛盾的結合，即是領導者和被領導者的結合。領導者和被領導者結合起來就成爲一個統一的組織，有了這種統一的組織才有力量。這種統一的組織就是黨——這就是黨的基本組織結構。

整個黨的結合形式就是黨的各級領導機關和全體黨員的結合，就是由黨的中央和黨的各部份、各機關以及各個支部的結合，就是黨的領袖、黨的幹部和全體黨員大眾的結合，就是黨的上級組織和下級組織的結合。因此我們黨的結構不是混合物，不是幾十萬黨員的簡單的總合，不是沒有一定的結構的。而是幾十萬黨員按照一定的組織形式和一定的規則結合起來的；是一個矛盾的結合，有領導者和被領導者，有黨的領袖和黨員，有黨的上級組織和下級組織。黨的這種組織結構使黨具有強大的戰鬥力，否則就是「烏合之衆」了。

黨也不是聯合會，不是各個地方黨部的聯合組織，而是不同的黨員，不同的組織部門結合成的一個集體性的整體。這個集體組織和聯合組織是不同的。

黨的具體的結合形式就是民主集中制。黨的民主集中制反映出黨如何把廣大的黨員大眾同黨的領導者結合起來，如何把黨的各部門同黨的中央結合起來，如何把黨的上級組織同下級組織結合起來。這種結合形式的最具體的表現便是黨章上關於支部的規定。要怎樣才能達到黨的統一的目的，才能把幾十萬黨員結合成一個統一體呢？黨的統一內容與實質就是馬克思主義所造成的思想上的一致。這種思想上的一致是最基本的，沒有這種一致，黨的結合就不可能，黨的一致就要破裂。所以黨內如果有思想上、原則上的分歧，就必須發動鬭爭，重新取得一致。如果有少數黨員堅持自己錯誤的思想和原則而不放棄，那末最後就必須把他們開除出去（如托派和右派）。如果堅持這種錯誤思想和錯誤原則的是黨內大多數，那末最後不免要同他們分裂，另外成立一個組織（如列甯脫離社會民主黨而另外組織共產黨）。

由於黨員在思想上的一致，就造成了組織上，行動上和紀律上的一致。這就是黨的唯一的具體形

式。如果沒有組織上，紀律上和行動上的一致，思想上的一致便無法體現，無從寄托與鞏固。共產黨的統一便是由這種思想上的一致再加上組織上，紀律上和行動上的一致而得到的。

民主集中制是黨的結合的具體形態，反映着黨內的組織關係，確定黨內領導機關與被領導者，——小組長與組員、支部書記與支部中各成員、上級機關與下級機關、中央與全體黨員之間的關係的。所以，民主集中制的目的是為了保證黨思想上的一致，保證黨組織上的統一。先有思想上的一致才能保證組織上的統一；但是組織上的統一又能幫助和推動，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鞏固思想上的一致。所以民主集中制也就是保證黨在組織上思想上統一的具體形式。這是民主集中制的意義。

民主集中制的原則是：少數服從多數，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除了這些原則上的規定外還要加上紀律上的約束，就是說每個黨員都要依照組織原則做，違犯這些原則便要受紀律的制裁。紀律是帶有強迫性的，而所有紀律上的規定都是用來正確規定黨員與黨的關係以及黨員與黨員的關係的，用來保證與維持黨的統一的。只有認識了這些基本組織原則，才能進一步談黨員的組織修養。

二、黨員與黨的關係、黨員與其他黨員的關係應怎樣確定

我們黨有幾十萬黨員，每個黨員只是幾十萬個中的一個，要幾十萬黨員結合起來才成爲黨，所以黨員對黨的關係就是各個份子（個體）與整個的關係，好比就是細胞與人體的關係一樣的。黨員是各不相同的，有能力的不同，有男女性別的不同，有工作崗位的不同等等。因爲黨是由各種不同的黨員結合而成，就使黨有各種不同的組織部門。

我們拿細胞同人體的關係來說，細胞的健康和發展可以滲透入體的體態和發育，而人體的健康和發育使得細胞也強壯。一般的說，是整個決定了部份；死人身上是找不出活細胞來的。但是用人體來譬喻我們的黨，也有不大確切的地方。因爲第一，人的腦袋給人家割去了不會再長出第二個腦袋來的；但是假如黨的中央負責人都被敵人捉去了，並不能消滅我們的黨；一個中央委員會被破壞，又會產生出另一個中央委員會來。第二，單個細胞在人體中所起的作用不能超過於單個細胞的作用之上，但是一個積極努力的黨員就不只是做一個人的工作，他甚至於能推動整個黨向前進，推動許多黨員都前

，以達到黨內團結，增強黨的戰鬥力，推動黨前進，這種修養就是所謂黨員在組織上的修養。

一個黨員在黨內要起積極的推動的作用，而且這種好的作用要儘可能起得大些，但到底能起得多大呢？

一般的講是黨決定了黨員，但是如果黨員的能力強，在某一期，對某一事情，在一定條件下，在某種程度內，可能有決定的作用，可能對全黨或黨的某一部分、某一組織起決定的作用。中國從前有一『英雄造時勢』還是『時勢造英雄』的爭論。一般的說，英雄不能創造時勢，歷史行程有其自己的發展規律性，不能被個人所改變。但在某一個具體的革命鬥爭中，某一個具體事實上，某幾個領袖（英雄）却可能決定其勝利和失敗。例如蘇聯的十月革命，如果沒有列寧，也可能失敗的。有了這末一個列寧，有這末一個布爾塞維克黨，而且處在那樣的時期，和那樣的條件下，十月革命才得到了勝利。但是即便沒有列寧，無產階級革命却一定會爆發，而且一定要達到勝利的，雖然可能不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又如中國大革命時，有了一個列寧，大革命也許不會失敗的。現在的事情也一樣。當常一個黨員的好壞決定了那個地方工作的成敗。如皖南事變也是一樣。如果換了一個人去，也許不會遭受那麼大的損失。在這些地方，個人常常起有決定作用。這在我們部隊中也看得很清楚的，個把好黨員的領導常常把一個部隊弄得很好。個把在理論上、組織上、政治上有修養的黨員能把整個組織部門中其他黨員的水平都提高一步，把工作也向前推動許多。馬克思、恩格斯，這麼兩個人就創造了無產階級的黨。這個黨後來被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領袖們所弄壞；於是又出來一個列寧，他創造了俄國布爾塞維克黨，反對第二國際，領導十月革命達到了勝利。

當然，要起作用，必須要有相當的地位。一個普通黨員起的作用就小，一個領導者起的作用就大。但這是沒有多大關係的，只要他真有本領，真能起積極作用，則雖然今天沒有重要地位，到明天、後天仍會有重要地位給他的。黨會提拔他的，黨員不能因為要起大作用，就要求黨派一個決定的地位給他。

民主和集中——這是兩個矛盾的概念。但這個語句上、概念上的矛盾正是反映出客觀事物上的矛盾，反映黨的矛盾的結構。黨的民主集中制就是反映黨員與黨，下級對上級，上級對下級的矛盾的

關係的。「民主是手段，集中是目的」——這樣的說法是錯誤的。因為它不能說明民主與集中的關係，不能說明民主與集中的矛盾的結合。黨的目的是團結統一，加強戰鬥力。整個民主集中制就是達到統一這個目的的道路。只有民主或只有集中都不能達到統一團結。統一不只是集中，而是民主的集中。沒有民主就沒有集中。同時，沒有集中，也不能有真正的統一。假使以為僅僅集中就是統一；則民主就變為分裂了。中國的頑固份子就是這樣說的。只講集中就變成了專制政體，在黨內就變成了家長制。家長制不是黨的正統的結構，正統的結構是民主集中制。

黨員在黨內，不論做中央委員，做省委書記或支部書記，他必定與別的人發生關係。在這裏，就發生了上下級的關係。下級對上級要服從，但同時又要尊重他（每一個黨的領袖，黨的領導者都要受黨員的監督，同時任何黨員都有權監督別人）。如果上級弱，還要幫助他，這也是矛盾的。做上級的要指揮下級，要傾聽下級的意見，實行民主，有什麼事情就要和大家商量討論，下級錯了，還要糾正他。對自己左右平行的同級組織，就應互相尊重，互相幫助，互相攷察，互相譏笑。如同級犯了錯誤，就應向上級提出意見。總之，每個黨員，應該站在黨的立場上，利用現在的位置，來起積極的作用，來處理自己對其他黨員，對上下級的關係，應該採取適當的方式，去開展黨內鬥爭。這樣做才能達到黨的統一，以便和階級敵人進行鬥爭。用這樣態度去團結黨員，對待同志，才是黨的正派人。如果撇着個人的企圖，不擇手段，打擊別人，或甚至組織派別，這是不正派的人做的事情，是不能被允許的。

黨員相互間的監督和批評是爲了幫助別人，爲了黨的團結和統一。因此，方式應該懇懇、坦白、光明；分別具體對象，採取具體辦法；應該客觀的，就事論事的，而不是憑空猜想的。要達到誠懇和坦白，就要正面提出意見。我們有許多同志，由於怕得罪人，怕上級責罵，怕自己吃虧，不敢正面提出意見；這是軟弱的表現。也許你批評上級負責，他會發脾氣，打擊你，這樣的事情也有過的，例如張國燾就是這樣的。但是共產黨員要主持正義不要怕得罪人。共產黨員要維護真理，爲了維護真理即便暫時挨打擊，被冤枉，被冤枉，還是反對，吃些苦頭也不要緊的。共產黨員要維護真理，爲了維護真理即便暫時挨打擊，被冤枉，被冤枉，還是反對，吃些苦頭也不要緊的。共產黨員一方要自己不要背真理，不做不正派的事情，但是對別人的不正派的事情一定要講。當然，講的方式要

講究一下，但這祇是爲了聽的話能夠收到更大效力。我們不去打擊別人，但別人要打擊我時，我爲了維護真理是無所畏懼的。以上便是黨員組織上修養的基本出發點。

二 民主集中制之執行

一、集體領導和民主集中制

上面說過，黨的組織結構的具體形式是民主集中制。黨是有組織的，有組織系統的；黨內有領導者與被領導者，但是黨的領導是集體的領導，不是個人的領導。因此，必須要有民主，然後才能實現集體的領導。因爲所謂集體領導即是集全黨的經驗和智力，集全黨最好的意見和計劃成爲一個決議案，成爲一個方針。

任何一個共產黨員，不論其地位怎樣，只要他有相當的水準，他能認識革命的規律性，他就有機會提出他的意見。如果他的意見中有一部份好的，那末這一部份好的意見是會被採納，作爲黨的總的領導方針的一部份。就是說，他就參與了黨的集體領導。因此，也就是說，任何黨員都有機會參加黨的集體領導，參加對全黨，對革命的領導。

同時領導又是多方面的，是具體的，如領導戰爭，領導工農運動，領導政權，領導油印工作，領導醫務工作等。因此，黨的領導除了一般的戰略策略的確定外，其他一切領導都是具體的。而各部份具體工作的領導，又皆有其自己的規律性；因此，又需要各方面的、具體的領導者。就是說需要集體領導下的個人負責制。可是各方面的具體的領導也是有一般性的，因爲它是總的集體領導的一部份，如果每一部份具體的工作領導得很好，也就使普遍的工作都做得好。所以，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是統一的。

我們黨的戰略策略的方針是已經確定了的。這是全黨同志大家根據馬列主義的基本原則，研究了具體的中國社會所得出的共同結論。這是馬列主義的原理在中國的具體運用。（但是如果有人還有新的意見，仍舊可以提出來的。）這亦就是黨的集體領導的根據。

爲了達到思想意志的統一，也必須實行民主集中制。就是說，要大家來討論，發表意見，好的意

見要採納，不好的意見要加以說服。民主集中制的意義便是把大家的意見和力量集中起來，組織起來，成爲一個統一的意見，和統一的力量。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則是：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個人服從組織，全黨服從中央。問題未解決時，大家可以提出意見，既已通過就必須執行；即使你不贊成，也必須服從。民主集中制是統一的，沒有民主就沒有集中，同時，沒有集中，也就不能有民主。因爲如果沒有少數服從多數，那末，結果必然要使多數人的利益爲少數人所破壞，即是說，必然要弄到反而使多數人服從了少數，這就是不民主了。

二、黨內對民主集中制的錯誤認識

民主集中制的這些基本原則是容易懂得的，是容易爲人背誦的。但是祇有在實踐中真正依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去實行的，才能算是真正懂得這些原則，才能算是布爾塞維克。

根據中國黨的經驗教訓，證明實際上有很多人並不懂得民主集中制。因爲民主集中制的許多基本原則，是絕對的，無條件的；但是有很多人却認爲是相對的，有條件的。

據我所知，他們所提的條件，有以下幾種：

第一種人說，要我服從上級和多數是可以的，但上級和多數在原則上，在政治上先要正確，若在政治上錯了，我就不服從。這就是以多數的，或上級的，或中央的正確不正確爲服從的條件。這個條件提出是不對的，這就是破壞了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的原則規定，只要是大多數，是上級或中央通過和決定了的，就要服從，就是不對也要服從。恰恰在這時候，特別要遵守紀律，要服從多數，要服從上級或中央，不管多數和上級或中央對與不對。

爲什麼不對也要服從呢？這因爲：

第一、這只是你認爲上級、中央或多數錯了。到底錯了沒有，還不知道。如果你認爲錯了你就不服從，他認爲錯了，他就不服從，那就沒有黨，只有散夥了事。可是到底是誰對了却並未弄明白。過去黨內任何叛徒，如陳獨秀、羅章龍、張國燾等人，都是以「中央錯了，我對的」爲藉口，來反對中央，並另外成立中央，造成黨內分裂。可是以後事實證明，錯了的恰是他們，而不是中央。

第二、退一步講，即使大多數和上級或中央真錯了，你也還要服從，先照錯誤的去執行。如果不

這樣，就會引起組織上的分裂，行動上的不一致，削弱了黨的力量。在今天，關於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如像中國社會的性質，中國革命的性質，動力等等問題都是已經有了確定的結論的。所以你所不同意的意見，你所認為自己對的，上級或大多數的意見，大概不是關於革命基本問題的意見，而是關於個別的局部問題的意見。一般的說，一個共產黨員因局部的個別問題的意見不同，而引起黨的分裂是不對的。進一步說，即使你的意見是對的，但是爲了要實行你的對的意見，也只有服從上級，否則離開了大多數，離開了黨，你就就婚從去說服大多數和黨，你的意見也就無從實行。

一般的說，多數人的意見總是比較對的。然而，有時多數人的意見錯了，少數人的意見對了的也是有的。例如，當西安事變時，如果要在黨內展開討論，提付表決，那末多數的意見很可能錯了的。爲什麼多數人的意見錯了，而少數人的意見倒反對了呢？那是由於客觀事物的發展，歷史的進化還只有少數聰明、有天才、有遠見的人才看得到。在這種情形下，真理在少數人方面，而大多數人所主張的却是非真理。那怎麼辦呢？在這時候少數人還只有服從多數，服從非真理，取得組織上、行動上的一致，但在原則上仍舊保留並堅持自己的意見。並且告訴大家：雖然大多數錯了，我們仍舊服從你們，但是我要證明，照你們的辦法去做，是錯誤的，是要失敗的。這樣便是在組織上服從大多數，避至黨的分裂，但在原則上堅持自己的意見，在實際工作的每一步驟中，去說明大多數人的錯誤，去說服大多數。如果一年說服不了，就兩年，甚至五年或十年，只要你說服了大家，那就是一大功勞。但是，如果你一開始的時候，不耐心、不服從大多數，鬧黨發生了分裂，那就挽救不了黨。所以，即使真的大多數的意見錯了，上級錯了，甚至中央錯了，而你的意見是對的，那也要服從大多數，服從上級，服從中央，你不能單獨行動。你可以向上級控告，但是要按照一定的組織手續。要不然就要引起黨的分裂，就要失去了黨。

羅章龍、張國燾、陳獨秀等都以列甯不服從第二國際，組織第三國際爲藉口。來反對中央，破壞黨的統一。這是完全錯誤的。歷史從來不重複的，死搬硬套歷史上的前例做，是很危險的。列甯在那個時候，成立第三國際是對的；但任何一個共產黨員在今天這樣做都是不對的。因爲第一，那是列甯，這是你。第二，列甯所反對的是第二國際，你反對的是第三國際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第二國際內

部有派別小組，沒有馬克思主義的精神。那是不革命、不戰鬥的黨。而第三國際完全不同，它是按照列寧的原則建立起來的，它有它的綱領，它有它的戰略策略。你問這末一個黨分裂，就是同列寧主義分裂，同革命分裂。

總之，在第三國際成立以後，想以過去第二國際時代反對第二國際的辦法來反對第三國際，都是錯誤的。因此，有些同志以上級領導不正確為理由，不服從組織，那是不對的，是破壞了黨的民主集中制，是否認了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原則的絕對性，把它看成了相對的有條件的東西，這就不能保證黨的統一。不論對與不對都要服從，——看起來，這好像有些用強，但是要把握十萬黨員組織起來，而且維持黨的統一，不用些強有什麼辦法呢？

也有人引證列寧的話說：「黨內如果發生原則路線上、思想上的分歧，組織上的一致就不能保持！」他們把這句話作為藉口，來作脫離組織的自由活動。要知道列寧的話是對的，但你却引歪了。列寧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如有原則路線上、思想上的分歧，則組織上的一致不能保持；但不是說不應保持，或不需保持，反之，即使思想上不一致，也還應該服從，應該考慮到組織上的分裂對黨的損失就更大。保持黨的統一，是絕對的。在今天，對黨來說，最大的犯罪是分裂。分裂黨的組織的人，應該受最嚴厲的處罰。列寧與第二國際發生思想上原則上的分歧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但是並沒有馬上就和第二國際分裂。一直爭論了十多年之久，等到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爆發，第二國際背叛了無產階級，參加了遠戰爭，宣告了自己的破產之後，十多年的事實已經完全證實了列寧的話是正確的，於是，在十月革命成功之後，才正式成立第三國際。然而，今天有些人却完全不同，向組織上一有不同意見，而且即使你是對的，人家錯了，但是在組織上你還應該服從，仍須保持統一，不能自由行動。不對也要服從，這並非是叫同志們盲從，因為你具有不同的意見可以提出討論，或向上級報告的，這是黨所允許的。

第二種人提出另外的條件，他們說：他可以服從組織，服從上級，但一定要上級是能力強的，要上級有本領，會講話，文化程度高，這就是說，以工作能力強弱為服從的條件。

但是，首先所謂能力強弱，也是各人有各人的看法的。有人以為說話寫文章漂亮就是能力強，其實這是表面的看法，幹部的強弱應該在鬥爭中，尤其是在艱苦環境中來考驗，能在最艱苦的時候，仍能堅持鬥爭，那就是強的幹部。

其次，以能力強弱作為服從與否的條件，根本是不正確的。因為也可能有這樣情形，即是能力弱的在上面負責，而能力強的在他下面工作，要知道工作的分配是不可能完全很適當的。但是即使是領導者的能力比你弱，你也應該服從組織，因為他是代表組織。這是第一；第二，我們說的領導是集體領導，即使負責人弱些，仍舊應該幫助他。今天是你的意見好，就實行你的意見，這樣，也就是等於你參加了領導。你能力強就應該去幫助負責同志，而且要誠心誠意的去幫助負責同志，幫助領導機關。這是完全必要的，假使你不幫助他，同他調皮、為難他，不服從他，那就是他的能力強也領導不好的。一個負責人，如果能夠得到大家幫助，是能夠把工作做好的，黨員應該有互助精神。否則不但負責人領導不好，就是你的工作也做不好，整個革命事業都做不好的。你如有好的辦法，儘可向黨提出，如果你真能幹，黨一定會提拔你，決不會長久埋沒人材的。但是自以為能幹的人，在事實上是否真的能幹，是大成問題的。同樣，你以為領導者能力弱，在事實上，是否真的弱也是成問題的，至於你是否比他強些，更是成問題的。也許你去做領導工作，可能做得更不如他。人是各有所長的，也許你的話說得漂亮。文章寫得好；可是實際工作不行；也許仗打得好，但是掌握政策不行。有人黨性強，但能力差；有人能力強，但思想不好，各有一方面。

如果要別人能力強，我才佩服他，服從他，那便是個人英雄主義，黨內是不容許英雄主義存在的。今天我們不是服從個人，而是服從組織。黨內今天各個黨員的位置，不能如封神榜那樣，擺得都很稱職；然而在幹部缺乏的條件下，也沒有別的辦法，有些事明知叫某一領導幹部去擔任並不怎樣稱職；然而，沒有更強的幹部可派遣，事情是等落要做的，於是只好派他去了。但是我們也不能說，我們的幹部就全不稱職，一般說來，我們有許多工作做得並不如人家壞，而且還要好一些。事實上，任何一個機關，任何一個工作，要派一個主要負責者獨個兒來支撐是無論如何做不好的。我們要建立堅強的領導，我們應當互相幫助，不能要求領導者是萬能的，有一種事情做不好就不滿意。所以，以領導者

的能力量弱作爲服從的條件是完全要不得的。

第三種人是以負責人資格爲服從的條件。黨齡短、資格淺，在黨內沒有多大名聲，就不服從他；大學生不服從中學生，老黨員不服從新黨員。這也是服從個人而不是服從黨的組織。今天由於工作的發展，非用一些新幹部不可。如果有不服從新幹部的觀點，就是妨礙黨對新幹部的提拔。以資格來競爭是不對的，應當從工作上來競爭。黨員有時甚至要服從非黨幹部。如果負責幹部是非黨幹部，那麼黨員首先要服從他。只有這樣工作才做得好。

第四種人是以組織上負責人地位的高低爲服從的條件。上級黨部派出的同志，就不服從下級的負責人。當然，上級黨部派出的人，具有特殊的權力，可以指示，甚至改造下級黨部的工作，但是一般的黨部，上級黨負責人參加到下級黨部，就要服從下級黨部。否則就會造成黨內特殊人物，養成個人威權，而削弱組織威權。你是上級的領導者，應當成爲執行民主集中制的模範，縣委派到支部去的同志，在支部範圍內的事情，就應當服從支部的決定。如果上級派來的人，不服從下級的決定，那麼下級的負責人就不能進行工作。黨內民主集中制不是誰領導誰，而是集體領導，是你領導我，同時又是我領導你，任何黨的領袖必須在黨的組織內，在服從黨內大多數，服從民主集中制的條件下，來實行個人的領導。在我們黨內，個人的特權是沒有的，不以組織的名義去領導是不能允許的。毛澤東同志是全黨的領導者，然而他也服從黨的。

此外，還有一種人以領導人的態度好不好作爲服從的條件，以領導人態度是否好，是否是自己的好朋友，會否和自己發生過糾紛，是否合得來爲服從的條件。這都是不對的，都是破壞黨的領導的。我們決不能以態度和感情爲服從的條件。只要原則把握得好，事情辦得好，就不必怕他的態度不好。我們是服從黨，服從中央，服從真理，而非服從個人。任何那一個個人都不值得我們服從的。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的事情辦得好，他們代表真理，因此我們才服從他。以態度好不好作爲服從的條件乃是服從個人，另從個人利益和個人立場出發的，而不是從黨的立場出發的；這只能造成個人的結合，而不能鞏固黨的團結；這只會破壞黨的統一，在客觀上幫助了敵人。

總之，所有一切附有條件的服從都是不對的，應該是無條件的、絕對的服從。民主集中制的原則

要徹底執行。講的是這樣，而做的是那樣，這就是陽奉陰違的兩面派，有人說：「黨內鬭爭所注重的，是原則問題，是政治問題，如果原則上和政治上對了，組織方式是次要問題，可以不必計較的。」這種說法是錯誤的。組織方式恰是一個大問題，是一個重大的原則問題。如果組織方式錯了，可以破壞黨的團結和統一；要保證和鞏固黨的團結統一，首先要拿穩這個組織原則。

共產黨員還要有對事不對人，就事論事的精神。但是我們黨內往往還有這樣的事情，就是某人是我的好朋友，他做了錯事我就給他隱瞞一下，某人同我有私仇，於是遇到機會就給他一個報復，重重打擊他一下。這就是對人不對事，被感情掩蓋了真理，是要不得的。我們共產黨員是主張真理的，只要人家所主張的是真理，即使這個人同我私人感情不好，是應該維護他。如果人家主張的不是真理，那怕這個人是我的好朋友，也應該反對他。共產黨員更要服從組織，凡是組織的負責人，是領導者，即便我同他私人感情不好，也應該服從他。

總之，我們要反對不服從多數，不服從組織，不服從上級，不服從中央的自由主義。黨員如果有不同的意見，可以按一定的手續，向上級控告；但是在上級未核准你的控告之前，你仍舊應該服從原來的決定。

但是在另一方面，我們的各級黨部應提倡越級控告，並且幫助下級黨員向上級控告。尤其關於處罰黨員的問題，如果被處罰者不服，那一定讓他去控告。有些負責人怕黨員向上級去控告他們，因此反對越級控告，這是錯誤的。因為上級決不是那麼糊塗的人，決不至於隨便相信人家的誣告，更何況人家控告你，你也可以控告他的。如果有人誣告別人，查明了是要受處分，但是如對組織有意見而不向上級控告，只在底下亂擺那是不對的。

我們主張組織上的絕對服從，但允許控告，並且提倡原則上的爭論。不過控告要經過一定手續向一定組織提出；爭論也不能破壞組織原則。

三、兩種例外情形和靈活執行命令

至於組織上的絕對服從，遇到下面兩種情況之一，就應該作為例外處理：

一、發現上級負責人有反黨行為時。例如過去張國燾反對黨的中央、自己另外組織西北中央局。

那時黨員就應該起來反對張國燾，擁護中央。過去在張國燾領導下的四方面軍工作的同志，現在還有很多留在黨內工作，是很好的同志，但是他們都犯了一個錯誤，就是當張國燾組織自己的「中央局」時，大家沒有去反對他。

二、發現上級組織或負責人有意識或奸細行為時（必須有證據），應負責向中央控告，請候中央解決。同時自己要提高警惕性。

執行上級黨指示和方針，服從其領導應當是靈活的，不是機械的，應當根據具體情況來決定，如果情況改變，甚至就要改變方針。下級應有主動性、自動性、應當能靈活運用。靈活執行上級的指示，這恰是最好的服從。

例如遵照上級命令去打某處的敵人，而敵人已事先撤退了。這個仗當然就不打了，這決不能算是違反上級的命令。反之，如果敵人已走了，一定還要去打幾槍，那才是機械執行命令了。又如決定了明天要罷工。但是到了明天，發現資本家一切已佈置好，罷工一定要失敗，那就應該臨時取消罷工的決定。這不是原則問題或方針問題，這是具體的行動，要按照當時當地的情況來決定的。

民主集中制執行是帶有絕對性和無條件性的。然而絕對的無條件的服從不是不民主，相反這恰恰是民主。只有不服從的極端自由主義思想才是不民主，因為這是要使全黨去服從部份，要多數去服從少數。

三 黨的上級、黨的負責人如何執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

上面講的是民主集中制的一方面。就是說當你是處於普通黨員的地位，處於下級的地位，處於少數的地位，應該怎樣來執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

現在要講到另一方面，就是說，當你做了黨的負責人，代表黨的領導機關的時候，應該怎樣來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

這兩方面一定要配合起來才能有完整的民主集中制。這兩方面一定要配合起來才能有完整的民主集中制。對民主集中制之原則應注意那些地方，才能

更黨團結一致，努力工作呢？爲說明這個問題，先來講領導者的責任。

一、領導者的責任

不錯，黨的領導是集體的，但不能總統的說一句大家集體領導就完了。總還要有一個人或幾個人擔負直接的領導責任的。領導者的責任有如下幾條：

第一、應熟悉當地具體情況，或自己所負責的一部份工作的情況，以及這一部份工作與其它各部份工作的關係。

第二、熟悉黨在戰略策略上的任務、方針和路線。並且要在當地和自己所負責的工作部門中實行起來。

第三、適當的估計時間及情況，抓住中心一環，提出任務，定出計劃，而且指出前途，——如任務完成了，則前途如何，失敗了前途又如何。

第四、要能團結幹部，教育幹部，配備幹部——首先使幹部了解情況、工作方針及工作前途，就是說，首先要使幹部了解怎樣做，然後就要適當地配備幹部。這就是毛澤東同志所說的出主意用幹部。領袖的責任就是出主意用幹部。

第五、要檢查，督促，接受經驗，傾聽幹部及羣衆意見，改正缺點，修正計劃。

第六、抓住情況之變化，抓住工作之進度，及時的、恰當的轉變組織及鬥爭方式，重新訂立工作計劃，重新配備幹部。

情況的變更有好幾種來源，或者是當地的情況發生了變化，如果我們的工作不變更就要遭受損失。例如當我們在羅城的時候，我們的工作方式是大刀闊斧的，敵僑掃蕩以後，則進入掩護息鼓，埋頭苦幹的方式。同時口號也變了，由說租減息變爲打鬼子打漢奸。也有情況的變更是由於外面的全國性的變化，影響到了當地情況的變化。要抓住這個轉變並改變工作方式。

譬如說，國共合作發生了變化，全國的局勢就要發生大變化，這當然也就影響到我們根據地。因此我們就要適當的估計這種影響。又如德蘇戰爭發生了，對我們這裏多少有些影響的，不過不是那麼直接，不是那麼顯著而已。我們的工作人員對於這一切變化所可能發生的影響應該及時的估計到。

變化發生後應馬上適當的改變我們的工作計劃和鬥爭方式，我們不能過份的估計這些變化；但是也不能對這些變化估計不足。

此外，工作的進步或退步都應該使我們的鬥爭任務和工作方式發生變化。工作進展了，完成了第一步計劃，馬上就要計劃第二步怎樣走法。反之原來的計劃不能完成，那就不能馬上作退一步的佈置。

情況的變化有好轉和逆轉兩種可能。逆轉使工作更困難，事情更不好辦，領導者應適當的估計情況，而隨時改變自己的工作方式和口號。抓不住轉變關頭的領導者，不是好的領導者。

二、領導者應具備的條件

一般的領導者，不管是那一級的，要能達到上述這些要求，才能算是稱職。根據這標準來檢查我們的領導者，有不少是能夠達到的，而大多數是達不到的。爲了要能夠達到這標準，應具備以下幾個條件：

第一、必須有客觀的、深刻的調查研究，不調查，不研究就不能了解情況，就不能了解當地情況和做這一部份工作與其他部份工作之關係，以及他這部份工作在全部工作中所佔的地位。

第二、必須了解黨的戰略策略、黨的方針路線；並使之與當地情況聯繫起來。而這個聯繫是客觀的而非主觀的，就是說，要在自己一部份工作中執行黨的路線。

第三、必須具備關於社會發展和革命運動規律性的知識，這些知識主要是在實踐中去領略的，但基本的研究當然也是必要的，而且要具備正確的方法，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知識和方法——辯證法。

第四、自己必須完全站在黨的立場上，做一切幹部的模範，並在原則上設服幹部，團結幹部，認識幹部，使幹部從我這裏得到幫助和方針。如果你對下面幹部沒有幫助，那領導者的職務就沒有擔負起來。要認識幹部的思想、意識、能力、優缺點等，總之，要認識幹部之本質，只有認識了幹部，才能適當的配備幹部，要用人得當，就必須認識人。

第五、要具備不怕負責的精神，要不怕負責解決問題，擔任工作，不怕負責的提出任務，訂出計劃。工作要有阻力和魄力。季米特洛夫說：「怕負責任的幹部不是我們的幹部。」情況變了就須改變

口號提出新的任務和新的辦法。

「出主意用幹部」（毛澤東語）就包括了以上所說的一切。

三、如何團結幹部

黨的領導者如何團結幹部？——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不能團結幹部就不能鞏固黨的統一，就不能開展工作，不能勝利的完成任務。因此作爲一個領導者必須善於團結幹部。

中國歷史上會出現不少能幹的封建帝王，如劉邦、項羽、劉備、曹操、趙匡胤、朱洪武等人。這些人都是在打游擊中打出天下來的。在開始的時候，這種打游擊的英雄很多，要最後能夠統一天下的便稱爲「真命天子」。他們所以能得到成功，具備有兩個共同的條件：第一是具有比較適合羣衆要求的政策；第二是因爲他們能夠團結幹部，能夠以寬大政策對人。比如劉邦能夠用人，爭取了張良、韓信，結果得到成功；而項羽則勇無可謀，不知用人，終於事敗身死。曹操、劉備也是有手段，能團結人，故能成事。中國人民的民族性就喜歡寬大，而不喜歡對人刻薄。歷史上凡是不會團結人，不待人以寬大，那是不會成功的。

今天中國的情況已經大大的變化了。革命的、抗日的中國是歷史上從來不曾有過的。我們黨的團結幹部政策，當然與封建帝王的團結人籠絡人的辦法大不相同。但中國民族的傳統，中國歷史發展的的特殊性，我們都是不能不注意的。

黨的領導者不能對幹部兇惡、挖苦、刻薄，這都是不好的，都是破壞幹部團結的。應當對幹部寬大，幫助他，不去妨害他，對他的態度要好，要能容納各種各樣的人材。要有用各種各樣人材的辦法；不能拿一個框子去衡量各種幹部，不能用一個公式去要求所有的幹部。中國有句古話「普與人同」，就是說要善於用人家的長處，善於同人共事。領導者能團結幹部就能在黨內建立威信，就能完成工作任務。同時，黨的領導者不僅應團結黨內幹部，而且要團結黨外幹部。

黨的領導者應注意以下幾點：

（一）領導者自己在各方面做模範，成爲幹部的表率，——立場要正確，學習和工作要進步，行動要正確。

(二) 領導者在原則上思想上要與幹部取得一致，但在理論上，知識上，工作上要超過幹部，比他們能幹。

(三) 要給幹部以幫助，不要妨害他們的工作，不要包辦，要放手讓幹部去工作。

(四) 要愛護幹部，使用其長處，糾正其缺點（幫助他們改正錯誤），態度要誠懇坦白，要尊重他們。

如果能夠做到以上四點，那麼幹部一定能團結的好。幹部團結得好，就能團結全體黨員和全國人民，完成革命工作。

四、黨的領導者，黨的上級，爲了達到黨的團結和統一，應該特別注意

執行民主集中制的下列各原則：

第一、黨的領導者，或黨的上級，自己首先要服從大多數。——服從多數委員和多數黨員。

第二、領導機關應當合法產生，或者由民主選舉，經上級批准，或者直接由上級指定委任。領導機關應向所屬黨員作定期報告，並請求大家審查。

第三、要注意在黨內發展自我批評與討論，批評領導機關的工作。

第四、要尊重下級組織，尊重黨員個人的權利和職權，如果上級機關的領導者尊重他們，那就使他們容易建立威信，容易開展工作，如果上級領導者不尊重他們，那麼人家更不會尊重他們了，比如黨不尊重政府，則政府的威信不能建立，羣衆也不會尊重政府的，那等於自己削弱自己。任何黨員，

黨的負責者都應當重視與服從政府的一切法令和制度。

第五、原則上多做說服工作，對同志的態度和方式要好，要虛心傾聽同志們的意見，尊重同志們的意見。

總之，黨的領導機關與上級，應多實行民主，應多注意自己的態度、方式與生活問題；而被領導者，下級，則應服從其理與原則，要有原則精神而不應當只注意領導者的態度、方式和生活問題，只有這樣才能解決兩方面的矛盾，使工作的進行不受影響。每個黨員應當知道在對下級，對其他同志時，要注於自己的態度、方式；在上級或其他同志對我時，就不應當注意他們的態度方式等，而應當注

黨他們的原則是否正確。對自己的態度應當小心；如果別人的態度不好，則應該原諒。如果自己的態度不好，那就會引起無原則糾紛，妨礙黨內的團結。

領導者如果違反民主集中制，違反上述各種條件，那就是犯錯誤，犯黨的紀律（因為違反黨的民主集中制也是違反黨的紀律）。領導者應當給黨員以民主自由的權利。當決定問題時，黨員有發表意見，批評的權利。當問題經大多數討論決定後，負責人首先就應當執行這個決議，即便某一負責人已不同意，也要無條件的執行，只有自己先服從，才能要求別人服從。凡是遇到事情不開會討論，不給黨員以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只要是合法的經過組織來發表意見），不尊重人人的意見，那就是違反民主精神的。

五、負責入違反民主集中制原則的幾種表現

在黨內，各級領導者中，有不少人不能執行上述民主集中制的各項原則，而且相反的，執行錯誤了。歸納起來，大概有下列幾種錯誤的傾向：

第一種人以為服從決議服從多數，對於領導機關及黨的負責人是除外的。他們以為決議是我自己寫的，紀律條規是我自己訂的；因此我高於人一等，我可以不服從；應當執行和服從的是下級，是普通黨員，黨的領導機關、黨的負責人是可以除外的。這是特權階級的思想，是違反民主精神的。在我們黨內不論任何人，均不能要求特殊地位，黨的負責人與領導機關應當首先尊重和执行自己的決定，應當成為服從決議，服從多數的模範。

第二種人認為各個黨委的領導者（如書記），如果在某一個問題的討論中，不同意多數意見，就可以不服從這個黨委會的大多數，自己可以獨斷專行。這是錯誤的，是違反民主集中制原則的。

第三種人就是不聽下級黨員羣衆來討論領導機關的決議，不聽大家發言、提意見，不允許下級批評領導機關。如果下級或任何黨員能正面的、負責的，依合法手續來進行批評，那是很好的（除非不願領導機關威信的胡亂批評才應當禁止）。任何領導機關抑制下級的批評，不讓別人發表意見討論，那是不對的，中國古語有云：「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何況我們的幹部和我們的黨員羣衆，更不是愚者，故尤其應當聽取下級與黨員的意見，只有經過大家討論商量過的意見，

才能是比較充沛的、正確的意見。俗語所謂「三個臭皮匠合成諸葛亮」也就是此意。自以為是，粗枝大葉，主觀主義，那是黨性不強表現。在革命運動中有許多突如其來的問題，常常使能幹的領導者也覺得無辦法解決。而常常在這種情況中，能提出解決辦法的，倒是羣衆。採用羣衆大多數的意見，在實踐中經過羣衆來修改自己的意見，這是解決問題的最好辦法。所謂「集思廣益，造成大智」即是此意。比如蘇維埃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最好國家形式，但蘇維埃並不是列寧的腦子裏所想出來的，而是彼得堡的起義工人所創造出來的。朝鮮羣衆，不傾聽羣衆意見，不傾聽別人意見，自作聰明，自以為是，那是十足的愚人。假如黨員有什麼不同的意見，有什麼懷疑，可以儘量讓他提出來，不能加以抑制，否則會得到壞的結果，領導者只是由上向下的觀察問題，這是有限制性的，只有由下而上的羣衆觀察才能補救領導者之不足。

第四種人只要求下級來提議上級的威信，而上級自己却不去提高下級的威信，不靠重下級，在具體工作中，過份的去干涉下級，使下級不能建立自己的威信，無法進行工作。這也是錯誤的，不合乎民主集中制的原則的。

第五種人要求黨給他以負責的位置，給他以領導的權力，或者讓他去自稱領袖，這是完全錯誤的觀點。黨在各方面都有領袖，而且也須要很多的各方面的羣衆領袖；因為在羣衆中有威信的領袖對革命運動有一定程度的決定作用。但領袖不是黨委任的，不是自稱的，更不能向黨要求派他作領袖。革命隊伍中的領袖是在羣衆鬥爭中，革命運動中鍛鍊和創造出來的。這是黨他對黨的忠誠，勇敢的負責精神，靠他的陽列主義的修養，靠他的工作能力，來建立的。雖然黨的負責同志有時可以由上級委派（這看當時條件來決定）；但這決不是說他在法律上有了地位，他就可以自稱領袖。相反的，他正應該不靠黨的委託，去努力工作，去在羣衆中樹立威信，成爲真正羣衆擁戴的領袖。現在我們的許多領導者還不是法律上的領袖，還沒有成爲真正的羣衆領袖。

最後還有一些領導者態度不好，不耐心，不採取許多方式去對待各種不同的幹部，常引起幹部不滿。這在一方面，是由於幹部程度低不能在原則上提問題，而專門去注重領導者的態度；但在另一方面，我們的領導人的方式與態度也的確不好。有些同志把自己的個性脾氣不好，解釋爲天生的，不可

克服的，改不了的。其實人的個性脾氣由自然原因而來的影響是很少的；主要是由於他的階級性決定的，與他所出身的家庭環境、社會勢業……等各方面均有關係的。因之，人的個性、脾氣、態度是由社會決定的。比如馴馴就打人罵人——這種脾氣，是一個思想觀念的問題，是特權階級的思想的反映。有些同志平時脾氣還好，一做負責工作脾氣就不好。這樣態度顯然是由於思想上的不正確，凡是不按客觀規律去行動，憑着主觀任意性去處理事情都是不對的。這都是主觀主義、黨性不強的表現。凡是這樣的同志就要切實修養一下。古人有『文王一怒而安天下』的傳說，如是真的如此，那倒不妨發發脾氣。可惜我們的同志發脾氣非但不能解決問題，反而出亂子，影響到團結，妨礙了工作；不是一怒而安天下，而是一怒而亂天下。這就大大的要不得了。

領導者的私人生活、態度應受其他黨員同志的監督，聽取他們的意見。總之一句話，黨的領導人和上級機關應多注意民主；黨的被領導者和下級機關應當多服從。這樣就是正確的執行民主集中制，就是上級與下級的統一，領導者與被領導者的統一。這樣就能達到黨內的團結一致，齊相反的去執行，則就會加深黨內的矛盾，引起黨的分裂，對黨是十分不利的。

六、在下列的情況與條件下，最好看出黨員有無遵守紀律的精神

第一、當領導者在政治上、文化上、能力上、資格上都不如你的時候，你能服從他，並且幫助他。

第二、當領導者或多數黨委發生錯誤時，你也服從他，服從多數，並能保留自己的意見，向上級提議。

第三、當你和上級有原則上的分裂、意見上的爭論時，你仍能服從組織，尊重上級。黨內發生各種嚴重的思想鬥爭，有各種錯誤的思想來引誘你時，你能堅持正派不為同化。

第四、當你曾經反對過你個人，對你個人有私怨的同志相處時，能在困難和危險時，保護他，援助他，實行『以德報怨』。

第五、當你在最困難、最危險，甚至威脅到自己的生命時，也能嚴格遵守紀律，那就是好黨員；因為在這樣的情況下，最容易違犯紀律。

七、在下列的情況與條件下，最能證明你能實現正確的領導

第一、當大多數在政治原則上都弄錯了而你能堅持原則，並說服與領導大多數。

第二、當你到一個新的工作地區去，下級對於你無信仰，而你能在領導上，在工作中，在鬥爭中，建立自己的威信，取得他們的信仰。

第三、當下級和其他同志批評你，反對你時（不論他們是否正確），你能諒解他們，尊重他們。

第四、當你所在地的那部份黨的組織散漫、紀律廢弛時，你能去整理組織，建立紀律與秩序。

第五、當你領導下有最俏皮搗蛋的人，而你能指導他做工作，對某些不服從的人，你有辦法去領導他，你能說服教育他們。

第六、在你領導下的那部門工作沒有不安心工作的人。

如果能做到上述這些要求那就是好的領導者，那就是正確的領導。

八、實行領導的幾個模範例子

現在我來舉幾個實行領導的模範的例子。

第一個是馬克思的例子。大家知道，一八七一年巴黎無產階級起義的前夜，馬克思是不贊成法國無產階級在這時期舉行起義的；因為他根據客觀情況的分析，認為在這時舉行起義是喪失失敗的。可是當巴黎工人的起義發生以後，他非但不反對起義，而且他非常高興，給了巴黎工人不少寶貴的指示。這因為當資產階級已經起來以後，領導者的責任就不是去反對資產運動，而是去領導它，使它取得勝利，或使它在遭受失敗時，儘可能的減少損失。

第二個是列寧的例子。列寧是布爾什維克黨的創造者，但是列寧從來沒有不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列寧的意見在黨內經常得到大多數人的擁護，因此他經常站在黨內的多數地位，但有一次他却站在少數地位了。那是在簽訂布列斯特和約的時候。當時，革命剛勝利，無產階級政權還不完全鞏固，在國內，反革命蠢蠢欲動，在國外，德意志帝國主義的軍隊侵入國土，威脅蘇維埃國家的安全。那時，列寧主張同德意志帝國主義簽訂和約，以相當的讓步換得自己喘息的機會，以便鞏固革命政權，建立工廠紅軍，以便可以鎮壓國內的反革命，並且抵禦外來的武裝干涉。但是那時中央委員的大多數都不同意

列甯的主張。真理明明在列甯方面。而且列甯又是黨的創造者和領袖，又是政府的首腦。然而他並不會因此去獨斷獨行，自己去簽訂和約。相反，列甯還是對中央委員的大多數（非真理方面）屈服了。他繼續對大多數做說服教育的工作。一直到又經過了幾個月之後，德國的侵略軍隊更深入了，察維埃政權更危急了，這時，列甯又再次向黨提出了簽訂和約的問題。這時黨內大多數才相信列甯的主張是真理，於是贊成同德國簽訂和約。可是這時候，德帝國主義從蘇聯所佔的土地更大，它所提出的和約的條件也比幾個月前更苛刻，就是說革命所受損失更大了。但黨在列甯堅持之下，還是接受了這條件，後來證明列甯的這一政策是完全正確的。因為蘇維埃政權全蘇這和約才得到一個喘息的機會，能夠鞏固了起來。後來，德國革命的爆發根本推翻了這和約，使蘇聯又收復了和約上規定的割地。如果列甯在最初不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不服從中央委員的大多數而去獨斷獨行，就會失去了說服大多數的機會，引起黨的分裂，使革命受到不可補救的損失。

這樣的例子可以找出很多。我個人也會遇到過這樣情形。那是在中國黨成立初期，我受黨的委託在一個地方做工人運動。在那裏我吸收了許多新黨員，成立了一個工人支部，建立了工會組織。工人們的鬥爭情緒很高，大多數工人和這支部中的黨員都主張發動罷工。可是根據客觀情況的分析，在這時候發動罷工是一定要失敗的。因此我不主張立即罷工。但支部的同志和工人們都不同意我的意見，他們成立了罷工委員會，而且選我當罷工委員會主席，要我下令宣佈罷工。我怎樣辦呢？如果照大家的意思去做，那麼罷工一定要失敗的，失敗後，這裏的工人運動必然要遭受損失，但是如果照個人的意思去做，那麼我就違反了民主集中制，自己破壞了組織原則，而且造成自己的孤立，脫離了支部和工人大眾。因此我決定照大家的意見發動了罷工，而且積極地努力地領導了這罷工；不過在發動罷工之前，我就向大家聲明，這罷工是要遭受失敗的，不過你們大多數都主張要罷工，我就只好照你們意見去做。後來，罷工果然失敗了。但是，因為幸而在我領導下，我事先已有預防，所以損失不大。大多數同志在失敗後，想起了我早先的估計，因此對我更信任了，我事先已在這次罷工中做了一個服從組織的好榜樣給全體同志看，使他們知道，一個黨員應如何服從組織。

四 「願意」和「強迫」的統一

願意和強迫是矛盾的，而同時又是統一的；願意即是強迫，強迫即是願意。在我們黨內，因為對這問題弄不清，常常發生許多糾紛。例如有些同志在分配工作時，常常講價錢，例如說：「這工作我不願意去做，如果一定要我去，我的情緒是不會好的。」當然，這只是一部份現象，大部份同志的工作情緒很高，工作很努力，有創造性和積極性。但有些同志只想找一種適宜於他個性發展的工作去做，而不問革命的需要如何，這是不對的。在革命事業中，有各色各樣的工作，而黨員也各有其個性和特長——某種工作適宜於某些同志的發展。這種情形是有的。在分配同志工作時，黨的組織部門的領導者應當注意這些問題，應當分配適當工作給各種幹部，儘可能使辦工作是適於某些黨員的長處和其發展的。同時，被分配的黨員也可以，而且也需要向黨的領導機關提出自己的意見。

但是在革命鬥爭中，有主要的工作與次要的工作，有時黨就只能根據工作的主要方面和工作的需要來分配幹部的工作，所以黨在分配幹部工作時，不能完全根據幹部的願意與否，而主要是決定於當時工作的需要。這樣，分配給某些幹部的工作，有時，就可能是幹部自身所不願意做、而客觀上又非常需要的工作。

譬如黨需要加強武裝鬥爭，須要領導打仗，這就需要分配許多黨員去做軍事工作，去學習打仗。比如蘇聯新經濟政策時，需要大家去做生意，因此就號召許多黨員去學做生意。

在這種場合下，黨分配工作，往往就不能只顧黨員本人願意與否，而要多少帶些強迫性了。

其次，一切革命工作都是具體的，沒有抽象的革命工作。我們是革命的黨，是經常在實踐和行動中的。但是一切實踐工作都是具體的，切實的，而且都是很麻煩的。輕鬆的、如意的革命工作是没有的。有些同志，特別是技術工作的同志，因為同一工作做得太久了，要求改行。比如我們這裏，有供給工作，醫務工作，交通工作的同志，組織工作，參謀工作等，這些都是革命的實際工作。然而有些同志，都不願意做這些工作，覺得這些工作都不適合於他們，他們怕瑣碎，怕麻煩；他們想出風頭，想痛快一下。

爲什麼有些同志不安心做這些工作呢？分析起來，有三個原因：

第一、因爲不懂得一切革命工作都是具體的，而具體的工作都是瑣碎的和麻煩的。

第二、由於個人英雄主義作祟，不管這工作對黨、對革命是否需要，而只顧這工作對於他個人有沒有發展前途，能否出風頭。

第三、由於黨內、部隊內、機關內對於某些工作部門的認識不夠，不重視技術工作，因而而不重視做技術工作的人員，使得做技術工作的同志不安心。

在我們隊伍中要求調動工作的很多，而只有做首長的（如團長、政委、主任）才少有要求調動工作的。許多同志只想做首長而不願意當副的。例如不肯當族參謀長，而肯當團長，這是所謂『甯爲鷄口，毋爲牛後』的思想，也是等級思想，是個人英雄主義作怪。目的是想出風頭，達到自己的支配慾。應當知道，革命工作是多方面的，無論那種工作都是必需的。比如警務工作，供給工作，電台工作，機要工作等均是具體的工作，都是缺一不可的。如果大家都不願意做，那就不管願不願意，總要派一些人來擔任這些工作的。同時革命工作都是具體的，實際的，除了這些具體的實際的工作以外，就沒有什麼其它空洞的、抽象的工作了。

有些同志要求作領導工作，要當英雄，其實一切工作都有領導作用，因爲都是黨領導之下的工作，而黨的領導是集體的，如果你有創造性，能把這一項工作做得好，能發現這一項工作的規律性，或能推進技術的發明，甚至來一個技術革命，那對於黨，對於革命，是一個大幫助，豈不也是起了很大的領導作用嗎？技術工作也能出英雄的，比如斯達哈諾夫就是普通煤礦工人出身的，可是他在平凡的挖掘工作中，成了英雄。此外在歷史上如瓦特因沸水沖開密蓋而發明了蒸汽機，牛頓因蘋果落地而發現地心吸力，他們都成爲科學上的英雄。馬克思由最平凡的、普通的商品研究起，而發現了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法則。他們都是從平凡的大案不願碎的工作中，創造了奇蹟。

一切革命工作都有領導作用。斯大林同志所說的把組織領導提高到政治領導的水平也就是這個意義。也就是說，要把一切的具體的瑣碎的工作提高到政治任務水平。黨有一般的政治領導，如出主意，用幹部。但黨的政治路線、戰略策略的規定，是根據具體的意見，是大多數黨員的經驗教訓總合和

歸納起來的結果。任何人都能向黨提出這方面的意見。技術工作同志對黨的政治任務與方針也有權利提出各種意見。專門做一般的領導，只提方針任務而不做實際工作的人，是沒有的。而且一般的領導工作也是具體的麻煩的工作。譬如我就要做報告，要談話，要看電報，要解決問題。這也是麻煩的、實際的工作。每個同志的工作，在政治上都可以求發展的。每個同志應當切實負責擔任自己的那一份工作，並同時注意自己部份工作與全盤工作的配合。我希望每個同志應當如列甯所說的一樣，「做日常的、細小的、麻煩的工作，少說漂亮話。」

技術工作是最有前途的，將來把敵人消滅掉，不打仗了，就要以技術工作為中心，如蘇聯十月革命以後，就提出技術決定一切的口號。在蘇聯新經濟政策時，列甯且曾號召黨員去學做生意，當店員。我們將來建設新中國，要大家管理國家，那時技術工作就要佔首要地位，而今天的軍事指揮員到將來也要到工廠裏去做工，到那時技術工作就要決定一切，因此技術工作是最有前途的，任何輕視技術工作的觀點都是錯誤的。

現在我來講願意與強迫的統一。

人的一切行動都是有意識的行動，都是為思想所指導的，就是說，都是自由的；但是人的行動又常常是被動的。譬如農民在炎熱的日光下種田，汗流如雨，這不是出於他的自願，而是被迫的。假如讓他在家裏乘涼睡覺，那他是非常願意的，但為飢寒所迫，農民不能不終日辛苦勞作，同時這也是自願去做的，並沒有人強迫他。工人的做工也是一樣。

又舉一個例子：陝北開墾生產運動，延安許多學校機關的工作同志與學生也被動員了起來去挖地、開荒、搬東西。有些女同志把肩膀磨痛了，就用枕頭墊着去抬；但大家非常快活。來來去去唱着歌，笑哈哈的。為了增加生產去墾荒是被迫的；但大家反都是自願的，因此都能夠勝任愉快。

又譬如說，我們要革命，一般說，也是被迫的。我們並不願意發頭流血；但為了人民的解放，却被迫不能不革命。

又如打仗時衝鋒陷陣，流血犧牲，是被迫的，但革命戰士都自願的去這樣做。

所以，願意與強迫是矛盾的，同時又是統一的。農民種田，工人做工，是被迫的，同時又是自願

的。革命事業是被迫的，但同時又是自願的。我們打仗是被迫的，同時又是自願的。

先進的黨員在分配工作時無所謂願意不願意，高興不高興。工作應由客觀的需要來決定，不能由主觀的願望與興趣來決定。應當說：工作重要；不應該說：我願意不願意。凡是對革命必需的，重要的工作，只要我能夠去做，我就應當去做，而且努力去做。願意與強迫是相反相成的，是矛盾的統一。願意與強迫在自覺基礎上統一起來。人覺得天冷就要穿衣，肚飢就要吃飯。這都是強迫的，但是因為人都自覺的去便成爲自願的了。反之，如果你沒有這自覺心，就成爲強迫的了。

我們黨的律紀也是自覺的，因爲大家知道黨的紀律重要，對革命是必須的，如果不處罰違反紀律的人，就不能維持黨的團結統一。大家知道了這個道理，就都能自覺的去遵守黨的紀律。有覺悟心的黨員能夠首先自己遵守紀律，做遵守紀律的模範。對別的同志可以寬，對自己應當嚴。這就是古人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律己以嚴，對人以寬」。因此我們應當特別提高黨員的自覺性。黨員的自覺性高，工作情緒就好，強迫的成份就減少，工作就容易開展，容易做好。總之，黨的工作應當建立在廣大黨員的自覺性的基礎上。

五 自由與必然

有的人害怕黨的紀律，怕到黨內來不自由，因而不參加黨。有些已加入黨的同志，要求黨給他以自由，這都是小資產階級的主觀的愛好自由。這種自由實際上是不能實現的，客觀上是不能自由的。恩格斯說「自由就是對於必然性的認識」。這就是說，認識了必然性就有自由；否則就沒有自由。主觀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只有認識了必然性，把握了客觀的規律，依照一定的法則去行動，方才能得到自由；否則是不自由的。人的自由是有限度的，認識了事物發展的必然性，並且會依照這規律去行動就是自由的，超過了這個規律以外，就不能自由。農民有種麥的自由，是因爲農民知道種麥子的規律性，並合乎這規律去行動。比如麥子應當在何時下種，適宜什麼土壤，需要何種程度的水分和肥料，農民認識了這個規律性，故自由。人類認識了空氣的原理，能製造飛機；懂得了乘鈎蹄車的規律，才

能乘腳踏車；懂得了游水的規律，才有游水的自由。黃河由西向東流，但為高山所阻，不得不有九曲，因而又由北，向南，再由西，向東，黃河也沒有暢流的自由。比如中國革命經過民主革命，才能達到社會主義革命，再達到共產主義社會。這是中國革命發展的必然性，認識了這個必然性，我們就有進行革命的自由，托派不認識這個規律，要經過民主革命階段，因而托派就不能有自由。又如日本帝國主義想滅亡中國，而中國人民要反抗，要在敵後發動游擊戰爭，日本帝國主義也無法自由。

可見只有按照客觀規律行動，才有自由；否則是不自由。我們共產黨員應該比別人高明，因為我們把握了唯物辯證法，能認識必然性。我們能夠做的，就努力去幹，所以是自由的。我們認識了更多的必然性，就有更多的自由。我們認識了社會發展的規律性，即是認識了必然性，我們依照社會發展的這個規律性和必然性去幹革命，故是自由的；而資產階級的行動與歷史發展的必然性相反，所以他們總是不自由的。毛澤東同志的『論持久戰』把握了長期抗戰的必然性和它的規律，而我們懂得了這規律，而且按照這規律去做，所以是自由的。而速勝論者，亡國論者則弄錯了，因之沒有自由，不會把握客觀發展規律的主觀的自由要求總是要落空的。我們革命者對於必然能夠實現的可能性應當努力去實現，對於不能實現的可能性就不要去做。

革命運動是有必然性的，但不能否認主觀的能動性，主觀的能動性，雖然不能改變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性，但主觀的努力可以加速和提早革命成功，可以縮短革命的過程，減少革命鬥爭中的犧牲，所以主觀的能動性也是很需要的。

六 黨的幹部政策和幹部對黨的態度

陳雲同志有一次在延安做報告，講黨的幹部政策，講得很好，我在這裏不詳細講；但有些聽了這報告的同志在分配工作時，就俏皮，就藉口幹部政策，不服從組織分配。這完全是因為許多同志對幹部政策有錯誤的了解，把黨的幹部政策誤解為幹部對黨的政策。這完全是片面的機械的了解。

黨對幹部的政策，就是說，黨要本質的了解幹部，愛護幹部，適當的分配幹部，耐心的幫助幹部，對幹部要誠懇坦白，要經常傾聽幹部的意見。這是黨對幹部的政策，這是一面；而另一方面，黨員

幹部應當怎樣對待黨，對黨的前途應該怎樣，這也是很重要的一面。有些同志，在管理幹部時，在能做了領導者對待幹部時，就完全忘記了幹部政策；而在他對黨，對待上級時，則口口聲聲講幹部政策，把黨的幹部政策却為他對黨借皮要挾的藉口。這完全把幹部政策弄反了，這會引起不良結果。這是因為忘記了自己在黨內的地位，與上下級的關係。

當你是上級，是在管理幹部時，你就應當多徵求幹部的意見，多注意幹部政策的執行；當你是下級，是為黨所分派時，你就應當不講價，多服從，聽從分配。只有這樣，黨內上下級就會統一起來，幹部政策就會得到正確的執行。

七 工農幹部與知識份子幹部或者

老幹部與新幹部的關係問題

為了革命與黨的利益，要求工農幹部與知識份子幹部緊密團結起來。不互相磨擦，不互相扯皮，要新老幹部互相幫助，要使「工農幹部知識份子化，知識份子幹部工農羣衆化」，這是黨中央的口號，要堅決向這方面執行，工農幹部經過長期的革命鬥爭鍛鍊，有豐富的實際經驗；但文化水平低，看不見遠大的事情，容易發生狹隘的經驗論。知識份子，文化程度高，有熱情，生氣勃勃，能看遠大的事情；但缺少實際經驗，沒有經過嚴重的革命鬥爭的鍛鍊。因為他們大多數出身小資產階級，有主觀的誇大性，常常對實踐的寬泛估計不足。應使工農幹部與知識份子幹部統一起來，互相幫助。雙方的弱點應當互相諒解，互相糾正；長處應當互相學習。知識份子不幹都視工農幹部文化低，工農幹部不應當輕視知識份子無經驗，空話多。

比如知識份子無作戰經驗，首次上戰場有些害怕，這也是難得的；工農幹部不應當因此輕視知識份子。知識份子應當幫助工農幹部學習文化；工農幹部應當幫助知識份子幹部學習實際工作經驗。如果工農幹部文化水平提高，知識份子掌握了實際經驗，那對黨有極大的幫助，有極大的益處的。老幹部不應當固執狹隘的經驗，應當努力學習文化和理論，虛心待人，力求進步。知識份子應當取預主觀的自大性，和輕視實踐的觀點。知識份子常常關說高深的理論書籍，誇大書本上的知識。他了解一

般的知識、法則與規律是片面的，不完全的，應用到實際生活中去是非常不夠的。任何具體的事物都有自己的特殊性；一般的法則是不能概括的。大學畢業也不能有什麼豐富的知識。書本上的知識是別人的知識，光讀了書本還不合真正掌握這知識的。人類的知識有兩種：一是人與自然界作鬥爭的經驗，這叫自然科學；一是人與人的階級鬥爭的經驗，這是社會科學。工農有與自然界鬥爭與社會鬥爭的經驗，故工農有實踐知識；而知識份子有書本上所看到的未經實踐過的知識。看不起工農幹部，說工農幹部無知識，那是錯誤的。知識份子是個腦力勞動者，與體力勞動脫離，與生產脫離，而缺乏實踐的知識。工農幹部與知識份子幹部關係不好，由於雙方都有毛病，都有錯誤觀點。但知識份子的毛病更多。如果雙方有『衝突』則老幹部應當多負責，因為他們有經驗，受黨的教育更多。工農份子常說『你只會講漂亮話，打仗時就要出醜的』。知識份子又說『你沒有知識，我不佩服你』。這種隔閡都是不應有的。

知識份子常常看到遙遠的將來的，而看不到近的眼面前的。應當『登高自卑』，應當『由近到遠』。這與近應當統一起來，現在與將來應當統一起來。知識份子應當確定一個不輕視工農勞動者的觀點；應當相信工農中有許多聰明能幹的人，有無敵的天才，但他們為統治階級壓迫剝削不能有機會發揮自己的天才。在現在的羣眾，不知道產生了許多工農出身的科學家、教授與天才。我們的黨是革命的戰鬥的政黨，革命是血淋淋的，戴着白手套來作事，那是不可行的。知識份子應當有勞動精神，要以勞動者的粗重的臂膀來做事。

最後，我有幾句話告訴同志們。在黨內，凡是誠懇坦白的老實人；最後一定不會失敗的。共產黨員應當吃苦在前，享福在後。這也是魏芳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精神。有許多人信皮搨蛋，不老實，專門『鑽空子』，手膀很長，什麼東西都攪得到，到處仿面子，佔便宜。這樣的人，最後要被檢舉的，要吃虧的。至於那些埋頭苦幹的人，那些老實人，現在吃一點虧，最後會成功的。人家總會知道你是好同志。我們的黨員應當學好樣子，不應當學壞樣子。

每個黨員要照上面所講的去修養，去做一個正派人，在黨內起積極作用，這樣黨就會團結在一起，就能建設一個好黨，保障革命勝利。

論忠誠與老實

忠誠、老實——這是列甯、斯大林型的工作人員之確定不移的特點。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黨的與蘇維埃的幹部，要像列甯那樣忠誠與老實。布爾塞維克在其工作與生活中的每一舉措，均需培植與發展這種優良的品質。

要忠誠——這就是說「要像伊里奇經常作的那樣，像每一個布爾塞維克都應該作的那樣，將全部真情率直而老實地向黨坦白出來。」（斯大林）

黨對每個布爾塞維克所要求的忠誠與老實，是在實際工作中來區別檢驗的。一個共產黨員，不論其所處何種職位，他都應該有勇氣批判地估價自己的活動，說出自己活動的真情。在政治上的忠實，完全要由「言行一致」（列甯）來檢驗。由此就產生了一個最重要的布爾塞維克的原則——不是按照人們的言詞、謠言、報告來評判人，而是按照人們的行為來評判人。

布爾塞維克的話——是固定不移的話。領導者公務人員是不能隨便說話，話說出，那就要表現決心毅力，並執行自己的語言。如果你因為什麼原故，盤算錯了，力不能勝，——那你就老老實實說出這一點，否則你就是以噱舌者和騙子的可恥角色來說話。

列甯說，當一個人「言行不一致時，這就完全幫了，這會導向偽善。」

自然，當說到以忠誠的精神來教育幹部的時候，這就不僅是指這個字在普通意義上的忠實，而且也是指善於在每一件（即令是最小的）事情上，從整個國家的利益，從黨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地方的尤其不是從純粹私人的利益出發。

布爾塞維克黨——蘇維埃人民的先鋒隊，蘇維埃人民偉大創造性的勞動之領導者——是以國家的會員的利益之深刻意識的精神，來教育全體勞動者的，這尤其指的是負責領導的幹部。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與實際證明，我們的幹部，是如何深刻地了解整個國家的利益，他們如何不可調和地對待各種

反國家利益的现象。這在蘇維埃羣衆完成經濟的成于愛國事件的例子上就可以看出。

同時也有這樣的情形：有時某些工作人員將國家的利益置於腦後，爲了取得獎賞或隱瞞缺點，這樣的工作人員就粉飾真相，走上了欺騙國家、欺詐和捏造邪路，而故意地提出不合實情的關於執行國家計劃的報告。

由伊凡諾夫負責的某建設局的領導者們，在好幾年中提出的關於建設情形的報告，都是假的。按照這些報告，有一百三十件計劃「卓越地」和「很好的」建設好了。其實其中六十五件是不完全的和不適於經營的。爲了這些誇張的數字，建設局在兩年過程中，得到了兩百萬盧布的獎金，其中伊凡諾夫個人就得了十萬零三千盧布。奧木斯克州蘇委會和中央建設局的領導者們，沒有即時注意這些欺詐和捏造，而是很久以後才把它揭發出來。

雖然類似的情況爲數不多，黨的組織仍不能夠無視這些情況。事業的利榮和幹部的教育，要求黨的組織不能無視任何一件非法的事，而是有責任給他們以反擊，以忠誠的老實的對待國家利益的態度來教育工作人員。

無須證明，及時揭發的缺點，是較早消滅的。當人們不及時的講出真情，隱瞞缺點，而事後工作中中的失敗暴露出來的時候，——那時要糾正形勢就非常困難了。由此可見工作人員是應該有勇氣講出真情，不粉飾現實，指出事情的實際狀況，及時地揭露缺點，並指出其根源。黨的組織應該的工作人員不應該將地方的利益提得過高，而應該如實地反映本區的企业、集體農場的情況。我們每個工作人員的本分，不要將被曲解了的個人威信高於一切。

對國家的不忠實，常常表現在不願意肩負繁重的、但是完全可能完成的計劃，表現在企圖以各種藉口逃避計劃的執行，表現在極力想得到其實沒有也可以的國家的補充資材。真正的布爾塞維克的領導者，無須外界之督促，也無須訴苦，就盡力超過完成國家所給予的任務去尋求新的儲藏，俾使其培於總的國家洪爐中，一心爲國家、人民的利益服務。

來自上級的或詳細的計劃及正確的指示，是不能夠預先估計到當地所有的全部可能性的，如果在工作的過程中發了新的儲藏，布爾塞維克不能也不應該將它們隱瞞起來。他對隱瞞牠們呢？對自

己的政府嗎？對自己的黨嗎？隱微儲藏只能是這樣一些人的事：這些人將其衙門的錢櫃看得高過國家的、黨的利益。

這些允許自己對國家要狡猾的人們，是容易屈服於落後的傾向的。他們對橫在我們路上的困難，時刻準備加以誇大，又常常沒有表現勇氣與決心的魄力，希冀不負責任，把自己的「任誰給別人——這是對完成國家義務的不老實態度的表現之一。害怕負責並按照『可不要出了什麼岔子』的原則去作事的膽怯鬼，是沒有能力將事情推向前進改善它，並表現創造性與主動性的。

以忠誠與老實的精神教育幹部，這就是要以工作人員自己的錯誤與缺點來教育他們。這是斯大林對布爾塞維克幹部教育的珍言之一。

斯大林教導說：

「布爾塞維克的責任就是不掩蓋自己的錯誤，不逃避有關自己錯誤的問題（像我們常常發生的那樣），而是老實而公開地承認自己的錯誤，老實而公開地謀求糾正這些錯誤的方法，老實而公開地糾正自己的錯誤。」

有這樣的事實：某些工作人員逃避承認自己的錯誤，以為承認錯誤有傷工作人員的名譽，會有損其威信。這是對威信的不正確而虛偽的瞭解，實際上承認自己的錯誤，準備糾正錯誤，是不會損傷工作人員的威信，反而會提高其威信的。必須記住列寧的金玉之言：聰明的不是那些不犯錯誤的人，而是那些犯了錯誤而不很嚴重，並善於敏捷而迅速地糾正錯誤的人。

費力克斯·特捷仁斯基說：

「會失去聲望的只是那種隱蔽自己的缺點，不願意同醜惡鬥爭的人，也就是那種本願失去聲望的人。必須學會正確真理，並從羣衆及一切參加生產的人們那裏去把握真理。再沒有什麼比自欺自掩來自滿更壞的了，只有當你一步一步地搜索醜惡並征服它的時候，你才能夠前進。」

批評與自我批評，乃是在精神上教育幹部忠誠與老實的重要的方法。用平常的語言「家醜不可外揚」來進行領導，是不可能的。

在黨選擇幹部的原則遭受破壞的地方，是最容易發生這種類似非布爾塞維克的風習。誰接受了錯

誤的指揮幹部的方法，誰就替那些領導集團造成有利條件，便於他們以親密的小宗派、行幫（其成員盡力和平共居而不相互批評）來代替負責的工作人員。在這種土壤上，就繁殖着庸俗的劣模範，而有時就產生對國家利益的不現實態度。

批評與自我批評，可以使缺點適時的揭發出來。錯誤如不隨時予以糾正，即會滋生新的錯誤，並最後毀滅工作人員。下面就是一個可作教訓的例子：

安得列夫同志最近四年間在羅拉托夫城市蘇維埃執委會擔任第一副主席，還在他擔任這一工作的開始，他就犯了一系列嚴重的錯誤。蘇的市委會與州委會接到了很多對安得列夫同志行為的控訴，但是，他們並沒有及時向他指出錯誤。他自高自大而且自詡為沒有錯誤的。安得列夫濫用權權，蔑視蘇維埃其他委員的權力，擅自取消區蘇維埃的決定，並脫離羣衆。在一次州委會的集會上他聲明說：「我有很多比接見勞動者更嚴重的事情，我沒有時間傾聽控訴。」

雖然，這一切對於安得列夫都是可以避免的，但他終於被撤職了。如果人們及時的向安得列夫同志指出他的錯誤，而不是由於朋友的關係掩蓋了這些錯誤，那麼，可能還會作爲一個工作人員而被保留。

憐惜「幹部的自尊心」，認爲這對於他們或是做了有益的事，是不對的。沒有比這種觀點更錯誤的了！以掩蓋幹部的錯誤來憐惜和保存幹部，等於實質上在增豎滅這些幹部。勇敢的、澈底的和客觀的批評——這是教育幹部的基本方法。這種批評會幫助成全幹部，刺激前進，克服困難。

基洛夫說：

「我們的布爾塞維克的實踐，從來沒有過於平穩的關係。我們是會激怒人的，……我們中間，誰要是以這種或那種考慮。認爲算了吧！說了不好，我還是這好不說，不去批評，那誰說要成爲罪人。應該老老實實地，按照布爾塞維克的方法，直視同志的、共產黨員的眼睛，向他說：「你，親愛的人，你被幹到了，纏住了，假使你自己不能起來，我就來幫助你。如果拉着手，那不能拉起你，我就來拉你的頭髮，我要些一切可能糾正你。但如果你，親愛的人，不糾正過來，那麼你就真罵你自己吧，你得滾到旁邊去。」」

以忠誠的精神教育工作人員，沒有日常的嚴格監督，沒有執行的檢查，是不可能的。黨的組織同工作人員的關係，不能建立在盲目的信任上。黨的領導和監督之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認出工作中的缺點，很快地提出方法糾正它。沒有執行完善而熟練地加以組織的檢查，就不可能保證適時地彌補缺點，並以忠誠與老實的精神，以布爾塞維克對所負任務之責任心的精神教育工作人員。如果工作人員知道監督是實實在在的，誰也不能將破壞指示的事馬虎混過，而不為人所知——那麼這便足以使他緊張起來。

爲了勝利地完成戰後五年計劃的任務，黨的組織在工作上就更嚴格，就更更培養工作人員那種對國家對人民的崇高的責任感。對於一個布爾塞維克，國家的、全民的利益是高於一切的。布爾塞維克的天職，就是隨時隨地小心地保護自己的榮譽與美德，因爲這是列甯斯大林的偉大政黨的榮譽與美德，在全體蘇維埃人民的眼中，一個黨員應該在一切事情上是先進的人，其急性引起普遍的崇敬與敬愛之心的。

（齊生譯自四七年六月二十三日真理報）

論經濟工作者在工作中的黨性 左爾霄

布爾塞維克黨化費了許多精力，來教育蘇維埃經濟工作者幹部。他們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深遠思想和無限忠誠，便是這些幹部最寶貴和決定的品質。受過布爾塞維克教育的蘇維埃經濟工作者，把自己的全部工作，建築在全心全意為國家和人民利益服務的基礎上。生產任務的先期完成，對於工廠經理、技師、車間主任、技工說來，乃是他們高度精神上的滿足。先進的布爾塞維克經濟工作者，並不滿足於計劃之一般完成，他將自己的全部精力、自己的實際經驗和集體的努力，放在不傾完成而且超過國家的計劃、並減低生產費上。

經濟工作者之布爾塞維克黨性，就在於他絕不滿足於既得的成果，他經常在自己面前發現尚未解決的任務，不固步自封，而是向前發展。這一特點是我們人民所固有的。

蘇維埃人對獲取新成就之難於抑止的意志，反映在社會主義競賽的結果中。從莫斯科和莫斯科州的例子可以看出。州的企業超過了五月計劃，其產品較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二十三。在六月十五日，差不多有五百個企業先期完成了六月份任務。莫斯科州的礦工在五個月內超過計劃而多產了數萬噸。州的集體農民們超過了穀物播種計劃，完成了馬鈴薯和菜菜的種植。

蘇維埃經濟工作的特點，在於他不圖「安閑的生活」，相反的，他樂於沸騰的活動。他們的黨性在於他決不隨波逐流，而是頑強地邁着困難而前進，尋找和發現進步運動的活路。

克拉斯諾雅爾紡織製工廠領導者，確屬於這一類人物。這一工廠的工人聲明希察和華信先期完成一年的計劃。但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就必須實行許多噸重的措施：嚴格提高生產修養，改善技術過程，建立和安置生產中的新的聯合染洗機。設置準備產品時的機械化的轉運，組織有條不紊的運輸。複製工序和黨組織的領導者估計，這些措施的真正實現，不啻有了一般地超過計劃的可能，而且為在四年中完成五年計劃創造了實際的條件。新機械的裝置和工廠的擴充開始之後，結果，他們能夠每天交出產這樣多的紡織品，這個數將會經審判只有到一九五零年才能完成。

蘇維埃的經濟領導者不把自己與企業的管理分開，由此來達到我們工業上的成就。他們與技術們、先進的工人們商討，盡力支持和鼓勵有創造性的人們，總結與運用斯達漢諾夫者的豐富經驗。

「巴黎公社」工廠的裁切工人馬特洛索夫同志，他使自己的工作合理化，並取得高度的勞動生產率，大大超過了戰前的指數，但這一個人的成就沒有滿足他。他知道車間許多工人勞動生產率不大。馬特洛索夫同志提議製訂一個廣泛採用保證使每個工人生產率增高的進步勞動方法的計劃。馬特洛索夫同志建議的價值和特點，在於他不僅是從個人利益（他的勞動生產率保證他高度的工資）出發，而且願望取得這樣的條件，在這些條件下，落後的工人能夠趕上先進工人的水平。

「巴黎公社」工廠的經理立特曼同志和黨組織書記魯索夫同志，用黨的精力對待瓦西里，馬特洛索夫的建議。他們支持了馬特洛索夫的倡議，幫助他研究其建議，吸收工廠的全體人員來重視這個事情，並且在實現馬特洛索夫同志的倡議下，使許多落後工人的勞動生產率提高到先進工人的水平上。

「巴黎公社」工廠在黨的組織與刊物的幫助下，把馬特洛索夫的倡議當作我們全國的資產。

說到經濟工作者在工作上的创造性，我們所指的是工業上的領導幹部，不是一般地努力於超過計劃，而是為此而採用了新技術與最完善的工藝學的方法。

黨的組織負有使命，以深刻了解擺在經濟工作者面前的任務的精神，來經常地教育蘇維埃的經濟工作者。以布爾塞維克的精確來對待事情，對疲塌與保守的不可調和性，對爭取新而又新的技術高度的經常努力，產品出產的儘量增加，從蘇維埃工作者日常負責的國家工作中有機地流溢出來。

布爾塞維克——經濟領導者的出色品質之一，就是對自己企業中工人，技師，職員的需要之敏感

的關切。在很好關懷集體需要的企業中，我們經常可以看到工作上的成就。

然而，可惜，也還有這樣的領導者，他們脫離工人，不知道他們的需要，工人很難聽見這樣的領導者，並且從他那裏難以得到必要的幫助。而這種經濟工作者的工作，照例總是搞不好的。

戈爾察諾夫同志擔任經理的亞基工廠，經常的沒有完成生產計劃。這個工廠應當為莫斯科的軌道電車製造車廂。但，雖然政府所規定的期限早就過去了，地道電車連一個車廂都沒有接到。

在這個工廠裏，沒有布爾塞維克的制度，而主要的是對人沒有黨的態度，冬天工人們不得不不在冰

冷的車間裏工作，而工人回到公共宿舍時，也沒有起碼的休息條件。在公共宿舍裏又冷，又擠，又骯，經濟和黨的領導者既視工人的需要，不關心他們。

真正的布爾塞維克黨黨委托他關心工人階級的需要時，應認為是光榮的事。蘇維埃的經濟工作者應把技術，組織生產的問題與改善工人與職員的物質生活設施的日常鬥爭配合起來。

列爾——斯大林黨，以對國家的忠誠與老實的的精神，來教育蘇維埃經濟工作者的幹部。

我們的經濟工作者，把國家的利益提得高於一切。可惜，在經濟工作者中也有這樣的人員，他們力圖隱瞞企業的能力，把計劃定得都差些，他們有時走上欺騙的道路。他們僅僅是為了獲得獎金，而把未製成的產品寫到製成品中去等等。也有這樣的經濟工作者，他們不是節約地帶原料和資料，而是力圖預先領取超過真正需要範圍的原料和資料。他們為了個人的安逸，在倉庫裏保存着各種巨額的物資貴重品，他們在裝備等等上對計劃機關作了誇大的聲明。這些自私自利的經濟工作者，沒有蘇維埃國家利益的黨的認識。他們像縮手縮足的小商人一樣，看不到離鼻子稍遠的事情，並且只為狹隘的私利和個人利益而生活。雖然這種人不多，但要堅決揭露，批評和以國家利益的精神來教育他們。只有在自已行動上由國家利益出發的領導者，才能稱職。

蘇維埃的經濟工作者不能把自己閉塞在僅是生產利益的圈子裏。如果他的政治眼光愈遠大，愈能更好地分析國內與國際條件，那麼也在解決生產問題上愈更嚴肅、更覺悟、更深切。工廠經理負有使命日常教育其下屬的幹部，發展他們愛國義務感。經濟工作者只有在自已是一個有足夠政治教育的人，只有在這個條件下，才能完成這樣的使命。經常從事提高自己的思想理論水準，真正精通布爾塞維克主義——這是布爾塞維克經濟工作者的必須的責任。經理、車間主任，不論大小的生產領導者的崗位——試問也是黨的崗位。

經濟工作者在工作中的責任，是蘇維埃領導者所必須有的品質。它應當經常伴隨着經濟工作者的活動，它應當成爲解決大小任務的鑰匙。只有在這樣的條件下，在政治教育與馬列主義的銳利的條件下，蘇維埃的經濟工作者才會站穩自己的崗位。

(伊譯自一九四七年六月十八日的「真理報」)

斯大林論平均主義

……馬克思和列寧說：熟練勞動與不熟練勞動間的差別，甚至在社會主義之下，甚至在階級消滅以後，還將存在；只是在共產主義之下，這個差別才會消失。因此，甚至在社會主義之下，「工資」也應該按各人勞動而發給，而不應該按各人需要而發給。可是我們經濟工作人員和工會工作人員中的平均主義者，竟不同意這點，却以為在我們蘇維埃制度下，這個差別已經消失了。究竟是誰對呢？是馬克思和列寧對呢？抑是平均主義者對呢？應該認為，在這事馬克思和列寧是對吧。（「新環境和新經濟建設任務」）

我們再舉農業勞動組合和農業公社的問題來說。……事情本來是很清楚的，而且差不多是很初步的。

然而在一部分黨員中，對於這個問題却有一大堆糊塗觀念。他們認為：既宜佈勞動組合為集體農業運動的基本形式，那末，蘇聯離開了社會主義，就由公社，由集體農業運動底最高形式退回到低級的形式。試問為甚麼呢？原來是因為在勞動組合中沒有平等，因為在勞動組合裏，在各組員們底需要上和個人生活上保存着差別，而在公社中却有平等，因為在公社裏，各社員們底需要和生活狀況都是均等的。但是第一，在需要方面和個人生活方面實行均等、實行平均制的那種公社，在我們這兒已經不存在了。實踐已經證明：如果公社不放棄均等制，不在事實上轉變到勞動組合底狀況，那它就一定已經滅亡了。所以，根本就不許援引在世界已經不存在的東西。第二，任何一個列寧主義者——只要他是一個真正列寧主義者——都知道，在需要和個人生活方面的平均制度是反動的小資產階級的理論，這種理論是只適合於某種原始的禁慾主義教門，而不適合於按照馬克思主義組織起來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因為決不可要求所有一切人們都有彼此一樣的需要和口味，決不可要求所有一切人都過着一個模樣的個人日常生活。而最後，難道在工人中間不是也保留着一種在需要和個人日常工作中

蓋異的嗎？這是不是說工人是比農桑公社社員離社會主義離得遠些呢？

這些人顯然認為社會主義是要求把社會組成員們的個人需要和個人日常生活都平均起來，劃一起來，均等起來的。不待說，這種設想是與馬克思主義是與列寧主義毫不相干的。馬克思主義所瞭解的平等不是個人需要和日常生活方面的平均，而是階級的消滅。這就是說：第一，在推翻和剷奪資本家以後，一切勞動者都是平等地擺脫剝削而得到解放；第二，在生產資料轉歸全社會公有以後，對於一切人都是平等地廢除生產資料私有制；第三，一切人都有按其所能而勞動的平等義務，一切勞動者都有按其勞動而領取勞動報酬的平等權利（社會主義社會）；第四，一切人都有按其所能而勞動的平等義務，一切勞動者都有按其所需而領取勞動報酬的平等權利（共產主義社會）。在這裏，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是：各人胃口和需要，無論就質量或就數量來說，無論在社會主義時期或在共產主義時期，都不會而且不能是彼此一樣和彼此平等的。

你們看這就是馬克斯列寧主義的平等觀。

馬克思主義未曾承認而且現在也不承認其他任何平等。

如果由此做出結論，說社會主義要求把社會組成員們的需要都平均起來，劃一起來，均等起來，要求把他們的口味和個人日常生活都均等起來，說按馬克思主義者的計劃，一切人都應當穿一樣的衣服，吃一樣口味的飲食——那就是庸俗的說法和誹謗馬克思主義了。

馬克思主義是平均制度的敵人，瞭解這一點的時候，已經到了。馬克思和恩格斯還在「共產黨宣言」中就已經痛斥那種原始的空想社會主義，並因為它鼓吹「普遍禁慾主義和粗鄙平均思想」而稱它為反動的社會主義。恩格斯在其「反杜林論」一書中，曾闢出整整一章來痛斥的批評杜林所提出來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對立的那種「急進派的平均思想的社會主義」。

恩格斯會說：

「無產階級的平等要求底實在內容是歸結於要求消滅階級。任何超過這一範圍的平等要求都必然會得出荒謬的結論。」

列寧也這樣說：

「恩格斯寫得千真萬確：平等概念除消滅階級而外，就是最荒謬的一籃不瀆的偏見。資產階級的教授們會企圖藉口於平等概念來誣賴我們，硬說我們想把一切都弄得一模一樣，他們曾企圖拿他們自己製造的這個謬論來歸罪於社會主義者。可是，他們由於自己昏暗無知而不知道社會主義者——而且正是現代科學社會主義的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說過：平等二字若不瞭解為消滅階級，那就是一句空話。我們是想消滅階級的，而正是在這一方面我們主張平等的。可是，如果期望我們能把所有一切人都弄得彼此一模一樣，那就是最空洞的詞句，就是知識份子的拙劣的杜撰了。」（列甯：「論用自由平等口號來欺騙羣衆的把戲」，見「列甯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二九三——二九四頁）

這樣看來是明白了。

資產階級作家們喜歡把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描寫成爲一切都服從平均「原則」的舊時沙俄營房，可是馬克思主義者是不會對資產階級的作家們這種無知與愚鈍負責的。（「聯共中央在十七次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

論自我批評

毛澤東

中國共產黨應該不掩蓋自己工作中的錯誤與缺點。中國共產黨應該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經常檢討自己工作中的錯誤與缺點，來教育自己的黨員和幹部，並及時糾正自己的錯誤。中國共產黨反對那種自高自大、害怕承認自己錯誤、害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情緒。（中國共產黨章程總綱）

有無認真自我批評，也是我們和其他政黨相互區別的顯著標誌之一。我們曾經說過，房子是應該經常打掃的，不打扫就會積滿了灰塵。臉是應該經常洗的，不洗也會灰塵滿面。我們同志的思想，我們黨的工作，也會發生灰塵的，也應該打掃與洗滌。「流水不腐，戶樞不蠹」，是說它們在不停的運動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蝕。對於我們，經常地檢討工作，在檢討中推廣民主作風，不懼怕批評與自我批評，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這些中國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錯誤、缺點這類政治微生物侵蝕我們同志的思想與我們黨的肌體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以「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為宗旨的整風運動之所以發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為我們在這個運動中開展了正確的而不是歪曲的，認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以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最大利益為出發點的中國共產黨人，相信自己的事業是完全合乎正義的，不惜犧牲自己個人的一切，隨時準備拿自己的生命去殉我們的事業，難道我們還有什麼錯誤的不適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觀點、意見、辦法，捨不得丟掉的嗎？難道我們還歡迎任何政治的灰塵、政治的微生物來點污我們的清潔的面貌與侵蝕我們的健全的肌體嗎？無數革命先烈為了人民的利益犧牲了他們的生命，使我們每個活著的人想起他們就心裏難過，難道我們還有什麼個人利益或錯誤、缺點，不能犧牲嗎？（「論聯合政府」第五節）

我們工作作風中的一项超大的毛病，就是有些工作人員習慣於獨斷專行，而不善於啓發人們的批評討論，不善於運用民主作風。當然，這是拿我們解放區的這種作風與那種作風作比較，而不是拿我們解放區與國民黨區域作比較。我們解放區是民主的地方，國民黨那裏是封建的地方，這兩個地方是

原則上區別的。但是，我們隊伍中確有許多尚未學會運用民主作風，舊社會傳染來的官僚主義作風，依然存在，別人毋得不同的意見，提了就不高興。只愛聽恭維話，不要聽批評話。為怕碰釘子，受打擊，遭報復，人們不敢大坦提意見。這是一種很不好的作風，這種作風阻礙着我們事業的進步，也阻礙着工作人員的進步。我提請各地對此點進行教育，在黨內，在黨外，都大大地提倡民主作風。不論什麼人，只要不是敵對份子，不是惡意攻擊，允許大家講話，講錯了也不要緊。各級領導人員，有責任聽別人的話，實行兩條原則：（一）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二）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如果沒有「言者無罪」一條，並且是真的，不是假的，就不可能收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效果。自從整風以來，我們的工作風有了很大的進步，這是受到了一切善良人民的稱贊的，這是很光榮的。但是我們仍有嚴重缺點，我們許多人中仍然缺乏民主作風，我們一定要改正這個缺點，我們一切工作幹部，不論職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務員，我們所作的一切，都是為人民服務，我們有些什麼不好的東西捨不得丟掉呢？如果我們改正了這個缺點，那我們就能團結更廣大的人，我們的事業就能獲得更大的與更快的發展。（『一九四五年的任務』，選集卷三、第一三三頁——一三四頁）

我們的同志，絕大多數都是好同志。對於犯了毛病的，一經展開批評，揭發錯誤，也可以改正。但是必須開展自我批評，正視錯誤傾向，認真實行改正。如果在地方工作中不批評官僚主義傾向，在軍隊工作中不批評軍閥主義傾向，那就是願意保存國民黨作風，願意保存官僚主義與軍閥主義。在黨內自己純潔的臉上，那就不是「一個好黨員」。如果我們在地方工作中去掉官僚主義傾向，在軍隊工作中去掉軍閥主義傾向，那就一切工作都會順利地開展，對於發展生產運動也是這樣。

我們臉上有灰塵，就要天天洗臉，地上有灰塵，就要天天掃地。儘管我們在地方工作中的官僚主義傾向，在軍隊工作中的軍閥主義傾向，已經根本上克服了，但是這些惡劣傾向又可以生長起來的。我們是處在日本帝國主義與中國反動勢力的層層包圍中，我們是處在散漫的小資產階級的包圍之中，極端惡濁的官僚主義與軍閥主義與天都向我們的臉上大批的撲來。因此，我們決不能一見成績就自滿起來，我們應該抵制自滿，時時批評自己的缺點，好像我們為了清潔，為了去掉灰塵，天天要洗臉，天天要掃地一樣。（『組織起來』，選集卷五、一九五——一九六頁）

反對經驗主義

艾思奇

「中共中央」關於一九四八年土地改革和整黨工作的指示裏，指出要反對經驗主義的工作方法。中央宣傳部重印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前言，對召全黨幹部「迅速克服工作中的某些嚴重的無紀律狀態或無政府狀態，地方主義或經驗主義」，這四個文件把經驗主義作為目前我們幹部中一種主要的不正確的思想方法，指出這種思想方法在實際工作中曾經造成了許多嚴重的錯誤，並使中國人民在爭取全國民主革命勝利的事業中遭受了損失。因此，我們的幹部必須把反對經驗主義作為目前學習中的主要課題之一。

經驗主義是主觀主義的一種，它和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唯物論是完全背道而馳的。一個共產黨員的思想方法如果為主觀主義所支配，他就不可能保持堅強的党性，就不可能成為真正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者。為着反對主觀主義，一九四一年五月，毛澤東同志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的演說，一九四二年一月，又作了「整頓學風黨風文風」的演說，並即發動進行了整風運動。在「整頓學風黨風文風」的演說裏，毛澤東很強調地把「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作為整風運動的第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提了出來。毛澤東說：「我們黨中的主觀主義有兩種，一種是教條主義，一種是經驗主義。」「反對主觀主義，就是一方面要反對教條主義，而另一方面又要反對經驗主義，就是要正確地掌握馬克思主義。」「所謂正確地掌握馬克思主義，按照毛澤東同志的說法，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的結合」，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知識與實際經驗的結合。主觀主義卻沒有這樣的一種結合。主觀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的分裂，就是理論知識與實際經驗的分裂。教條主義的分裂，就在於它僅僅滿足於書本的理論知識，並使書本的理論知識絕對化，不同時間、地點、目的、對象以及其他具體條件如何，把單純的書本知識作為征服一切的法寶，盲目地搬

械地到處使用這一個法寶，去解決各種不同的具體問題，而完全割斷了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中的一切有價值的經驗和已由毛澤東同志從這種經驗所概括出來的理論，完全不懂得理論本身也就是實際經驗的總結，書本中所學得的一般理論知識只能作為幫助我們總結自己經驗的指針。經驗主義的分裂，則在於僅僅滿足於自己狹小工作範圍內的局部經驗，而不肯學習各方面的經驗，不會集中和堅持有普遍性的經驗，不會在一般的理論指導之下來總結這些經驗，因此，也就不能領會毛澤東同志從中國革命實際經驗中所概括出來的理論。不論教條主義或經驗主義，都只能具備片面的革命知識，不能掌握全面的馬克思主義知識；而如果不能掌握全面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知識。這種缺少馬克思主義知識的人，在主觀上往往還是很驕傲地自以為是完美的革命者，但在實際工作中却常常做出許多於敵人有利的而於人民有害的錯誤行為。

毛主席說：「我們反對主觀主義，必須使上述兩種人各自自己缺乏的方面發展，必須使兩種人互相結合。有書本知識的人向實際方面發展，然後才可以不停止在書本知識上，才可以不犯教條主義的錯誤。有工作經驗的人要向理論方面學習，認真讀書，然後才可以使經驗帶上條理性、綜合性，上升到理論，然後才可以不犯局部的經驗誤認為即是普遍的真理，才可以不犯經驗主義的錯誤。教條主義，經驗主義，兩者都是主觀主義，是不相同的兩種產生的東西。」（整頓學風黨員文獻）

一九四二年以後的整風運動，收到了很多的成效。在整風的號召之下，許多有書本知識的同志紛紛走到實際中去，或從事實際的研究工作，許多有實際經驗的幹部也開始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程度和理論知識。兩種人和兩種片面知識，開始由分裂轉向結合，許多幹部的思想水平因之提高了一步，在黨內產生了一批既有豐富的革命經驗，又能掌握理論指導的幹部和領導者，這就成為今天中國革命戰爭和各方面革命運動向全國勝利發展的主觀因素之一。對於這樣的事實，毛主席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領綱裏作了總結說：「整風運動，是一般地收到了成效，這種成效，主要地是在於我們的領導機關及許多幹部進一步地掌握了馬克思列斯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

具體實踐之統一這樣一個基本的方向。」

但是必須注意，毛主席在這裏只說暴風運動是「一般地收到了成效」，並不是說，經過了暴風運動，黨的幹部思想就已經完全沒有問題，或者說主觀主義已經完全磨滅了。不是的，事實並不是這樣的。主觀主義的毛病，還必須繼續努力，才能完全克服；教條主義的殘餘在某些幹部思想中還起消極作用；特別是經驗主義，還是今天很多實際工作同志的思想方法上所必須克服的主要危險。

一九四二年的整風運動，特別強調反對教條主義，因為那時在地位上成為黨內主要危險的東西，正是教條主義。在兩種主觀主義之中，教條主義是居於主要的地位。毛主席對當時的情形這樣說：「現在我們黨內主要的還是教條主義最為危險。因為教條主義最容易裝出馬恩列斯的面孔，裝工農幹部，把上包子俘虜起來，充作自己的用人，而工農幹部不易識破他們的面孔。也可以嚇唬天真爛漫的青年，把他們充當俘虜。因此，自整風運動以來，對於兩種主觀主義的鬥爭，着重點是反對教條主義，在這方面所收的成效也比較大。教條主義的反馬克思主義的面孔，在一般幹部中被認識得比較清楚，它已失去了當年的威風，不再有裝工農幹部的俘虜青年的力量了。自然，教條主義就在今天也沒有不少的殘餘，例如，許多幹部在執行黨的政策時，還不懂得使一般的號召和個別的解決相結合，還不注意去了解當時當地的具體環境和條件，不懂得依照各種不同的具體環境條件而採用不同的步驟來實現這些政策。不少幹部還不能脫離命令主義官僚主義的惡劣習慣，把一般的號召和一般的政策生硬的帶到各種工作環境裏去；他們常常採取強迫命令的方法要羣衆接受這些號召和政策，而不會逐步引導羣衆提高，悟程度來自願地加以接受。這些就是教條主義表現在目前實際工作中的一種具體形態。但是，從尊個說來，教條主義已經不像當年那樣的居於主要地位了。

經驗主義的慣例却有些不同。在整風運動中，經驗主義也受到批判，但因為當時的重點是反對教條主義，許多同志對於經驗主義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性質還沒有認識得很透澈，對於它所產生的危險性還沒有足夠的估計和重視。這是第一。其次，多年來的游擊戰爭與革命根據地被分割為許多獨立單位的分散環境，使很多同志的思想被局限於狹小的工作範圍，使他們習慣於從個別地方的條件和個別地方的經驗來考慮和解決問題，而不善於從革命全局的觀點上來考慮和解決問題，不善於把地方上的問

聯繫於黨的總的任務和政策。由於以上主觀的和客觀的兩個原因，就使經驗主義在目前還成爲我們很多幹部在工作中的一種重要的錯誤的思想方法。在目前的重反對了教條主義之後，反對經驗主義就成爲當前反對主觀主義思想方法之主要的方面了。在目前中國革命的發展形勢之下，努力克服經驗主義，已成爲我們迫切的課題。中央宣傳部電印「左派幼稚病」第二章的「前言」裏，關於目前的革命形勢這樣說：「由於人民解放軍的勝利，我們中國共產黨已在擁有一萬萬六千六萬人口並在某種程度上聯成一片的地區當政，沒有疑問，隨着革命的勝利，我們黨行將成爲統一的全國人民民主政權的領導政黨」。這種情勢所給我們黨的任務是：「全國的革命形勢，要求我們全黨全軍在一切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的政策完全統一，而行政制度與行政機構也要求逐漸實行必要的與可能的統一，要適當的縮小各個地方和各個兵團的自治權，要將全國一切可能統一與必須統一的權力統一於中央的領導之下，以便集中力量進行全國規模的解放戰爭和着手政治、經濟與文化的各種新建設。」很明顯的，這樣的形勢和任務，就需要我們各地和各工作部門的幹部，在思想上超越出狹小工作範圍或一定條件之下的各種重要問題上聯繫着目前中國革命的全局趨勢來加以考慮和解決，學習把一定範圍或一定條件之下的具體的個別問題和黨的總路線和政策聯繫起來。如果我們各地方和各部門的幹部，還保持舊經驗主義的思想方法，如果他們的思想還只停止在個別的地方條件和局部經驗的圈子裏，而忘記了黨的總路線和政策，那末，這種思想方法無疑地就要與黨在目前形勢下的統一領導的要求發生矛盾，就要發生地方主義和無紀律的傾向，就要阻礙正確的路線和政策的實現。

三

中央宣傳部的「前言」這樣說：「過去由於長期游擊戰爭與革命根據地被分割爲許多獨立單位分散環境，在各個單位中，又有各種不同的敵情、地形和政治經濟條件的差異，因此我們就不能不高度的發展地方性，不能不高度的發展各個單位的地方自治權，因而也就高度的發展了各個單位的地方積極性與創造性，克服了當時的極爲複雜的困難，把中國革命推向了全國規模的勝利。這在當時是完完全全必要的和正確的方針。但是，正由於這樣，也就在我們不少的同志中造成了一種分散主義或地方主

義的習慣，造成了黨內的某些嚴重的無紀律狀態或無政府狀態，這些，則是錯誤與有害的。必須注意一定地方一定部門的特點，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有許多同志在工作中常常過分地強調一定地方一定部門的一特殊；或者看見巴拿馬的思想，不加分析的認為一黨要怎麼辦或怎麼辦一，並以這些為藉口，違反馬列主義的原則，拒絕執行上級的指示，拒絕黨的總路線和政策的實施。黨就破壞了黨的領導和紀律，這就對於黨的統一領導之要求形成了思想的障礙，這就表示，經驗主義已成為地方主義或分散主義，無紀律狀態或無政府狀態之思想基礎。而某些地方主義或分散主義、某些無紀律狀態或無政府狀態之成為習慣，又成了經驗主義頑固地存在的條件。因此，在克服地方主義或分散主義、無紀律狀態或無政府狀態的鬥爭中，必須同時在思想上與組織主義作鬥爭。

反對經驗主義，當然決不是在任何理論上承認或回到教條主義，也決不是否定一切實際革命工作經驗的價值。相反地，馬克思主義者十分重要一切有益的革命經驗，而馬克思主義者的各方面的理論，正是革命的各方面經驗之總結，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決不是什麼神秘的、天才獨佔的偶然發現，而是無產階級及一切人民羣衆的鬥爭經驗之集中化、條理化。因此，問題並不在於經驗本身，而是在於是否會分析經驗，總結經驗，從經驗中找出關於事物的發展和問題的解決的規律知識。而經驗主義的毛病，正是在於停止在分散、零碎的經驗圈子裏，而不肯把經驗提高到理論，來指導我們的革命鬥爭。有經驗主義毛病的人，常常是眼光短促，看不到全面，看不清事變發展的過去，現在和將來，因此也就不可能作有理論指導性的、有預見和有組織計劃的工作。

經驗主義的思想方法與工作方法，在我們不少的幹部中是表現得相當普遍的，例如：第一，僅僅滿足於狹小工作範圍內的局部經驗，而不肯虛心學習各方面的新經驗。其要害是不能夠在時間、地點、條件變化了的情形之下靈活地改變工作方法，硬把不適合的或舊的經驗搬來應用。如把農村中反對建門爭的方法搬到城市裏去，把長期游擊戰爭時期分散獨立工作的經驗硬搬到目前解放區左右搖擺、地聯成一片的局面裏去。第二，眼睛裏充滿了各種各樣分散零碎的經驗，跟蹤不同的經驗左右搖擺，而不能保持思想上和工作上的主動性，不能用科學頭腦對紛紜繁瑣的經驗加以分析和總結。如羣衆運動中的尾巴主義，強調一切要聽羣衆意見，而放棄了無產階級政黨對於羣衆所必需的領導和教育。以

如一九四八年土改和整黨工作的指示裏指出的一經驗主義的閉會方法：「事前毫無準備，不提出問題，不分析問題，不向幹部作精心準備好了的內容文字都有照本的報告，而聽取到舍人員無目的的輕飄無實的議論，致使會議時間延長，得不到周密結論。」此外，在我們今天的新聞通訊工作中流行片面性、獨立性的報導，也是這種經驗主義的反映之一；這種報導把一時一地一人一事的個別細節充塞了我們的報紙。當然，毫無疑問，在這些細節報導中，是有許多極有價值的和必須發表的東西，但是不能告訴我們關於任何廣大範圍內任何重要問題的全面動向，動態，運動的進展，運動中的矛盾（一方面是成績和正確的東西，另一方面是困難和錯誤的東西），產生這些矛盾的總結和解決它們的總路。所有這類方法之所以叫做經驗主義的，也正是在於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只見個別，不見一般，任隨分散零碎的經驗之支配，而不能予以概括，使之上昇到理論。這種思想方法上的經驗主義，表現在工作方法上就成為事務主義，第三，有些同志採取一種更低級的完全無原則的立場，他們似乎自是經驗的百寶箱，在英國監獄中各種不同的甚至於互相矛盾的經驗，而對於這些經驗的正確與錯誤，並不加以分辨，只看你要什麼，就拿出什麼來。這種經驗主義，常常是教條主義官僚主義的領導之一種補充。教條主義者和官僚主義者有了這種經驗主義者的幫忙，就可以高高在上，而為自己的任何主張和任何「指示」找到一經驗」的證明。經驗主義之所以成為教條主義的俘虜，正是由於它有着這樣一種盲目性的緣故。

四

反對經驗主義，就是要學習總結經驗，把分散零碎的感性知識，提高到有綜合性、條理性的理論知識。

要能總結經驗，首先自然要學習各方面的經驗，而不要僅只滿足於渺小的局部經驗。傾聽各種羣衆的意見，可以幫助我們學到各方面的經驗，因此，向羣衆學習，是很重要的。但是，總結經驗，並不等於各種經驗的簡單積累，而須經過一番分析、研究。分析、研究，又需要有一正確的方法指導，因此，必須首先學會總結經驗的方法，分析研究各種現象的方法，即是要學習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唯物

論，及其關於社會發展和階級分析的理論。而經驗主義，就是缺少這項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的分析研究。我們的經驗，一般來說，不外就是無階級政策領導人民大眾反封建反封建反官債資本的鬥爭經驗。人民大眾中包含着許多階級——工人、農民、知識份子、中小資產階級、開明士紳等等，中國共產黨是通過自己的各種正確的政策去團結這些階級，去反對代表帝國主義及封建勢力的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我們分析經驗，就是要從許多經驗中，認清革命鬥爭中各階級的目標，他們的各階級和官債資產階級。我們分析經驗，就是要從許多經驗中，認清革命鬥爭中各階級的目標，他們的各階級和官債資產階級，趨向，以及我們的政策是否能引導他們對革命運動發揮積極的作用。要進行這樣的分析研究，沒有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的指導，是不可能的。同一個階級在鬥爭中可以有各方面的要求，這些要求對於革命起不同的甚至相反的作用。例如農民要求平分土地反封建地租，進而封建地主階級，這種要求是有革命的進步作用的，是我們應該贊成的，但農民中間，又有一種絕對平均主義的分配思想；這種絕對平均主義，不但要破壞封建的土地和財產關係，而且要用平均主義的方法破壞中農、新式富農的土地和財產關係。並要用平均主義的方法破壞地租資本主義的工商業，這就是一種農業社會主義的思想，是一種落後的反動的思想，是我們所必須反對的，分析經驗，就是要分清這些階級的不同要求及其不同的作用，以及如何確定適當的政策，以便引導羣衆發揮他們的進步的革命的的要求和作用，防止和糾正他們的錯誤的要求和作用。沒有階級分析方法作為指導，要作到這樣的研究，是不可能的。經驗主義者，把馬克思主義代替了有領導的羣衆路線，認為羣衆的意見一切都是對的，這種錯誤的來源之一，就是沒有階級分析的方法。

要學會總結經驗，還要能夠分析各種經驗所依據的條件。如果經驗告訴我們，某一政策在一定的地方和一定的時間實施起來有很大成效，而在另外的地方和另外的時間卻沒有很大成效甚至發生了許多惡果，那麼，就要了解這些不同的結果所以產生的原因，就要分析當時的各種主觀和客觀的條件。經過了這樣的分析，我們就可能得出結論，確定某一種政策必須要在什麼樣的條件之下才能實施。「關於一九四八年土地改革和整黨工作的指示」裏，確定土地改革必須是三種條件完全具備的地方（環境安定，基本羣衆大多數已有土地改革要求，幹部在數量和质量上強能掌握土改工作）才能實行，而在這些條件不完全具備的地方，即不應列入土改工作範圍，這樣的決定，就是分析了土改工作各

方面經驗的結果。

自從一九四一年七月黨中央發佈調查研究決定以來，黨的許多組織一般都已認識調查研究總結經驗的重要，並且在這方面也做了許多工作，積累了許多材料。但是許多同志還不懂得怎樣去正確地調查研究和總結經驗。我們的許多同志，還缺乏分析的方法，因此常常積累了大批材料，還是不能提出問題，解決問題，甚至把原因歸之於材料還不夠。毛主席曾經用過殺豬的比喻，反問這些同志道：「殺豬的人難道是要把世界上的各種豬都殺過，把一切大豬、小豬、公豬、母豬、黑豬、白豬、花豬、中國豬、外國豬都殺過，然後才能總結殺豬的經驗嗎？不是的，一隻通常的豬，就可以代表一切通常的豬。豬的年齡、性別、毛色、國籍，對與殺豬的方法是無意義的。同樣，撇開一切無意義的表面現象不論，一個真正典型的事物，也可以代表一般同類的事物。如果對這個典型的事物，加以真正科學的分析，那麼就完全可以發現必要的問題，並且提出正確的解決的方法。當然，社會性的事物彼此之間的差異，是要比豬與豬之間的差異複雜些，這也就發生了選擇典型的任務，就發生了選擇幾種典型以代表幾種情況的任務，就發生了判斷某些事物是否具有普遍性和本質性的任務，而所有這一切，就叫做分析，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是經驗主義方法的表現；但是爲了見森林，而去砍一棵一棵的樹木；仍然是經驗主義方法的表現，仍然達不到見森林的目的。爲了了解森林，需要觀察森林的全貌並研究它的一種或幾種典型。如此，就使得我們有可能提出一般解決問題的指示，而不需要等候全部經驗都收集齊備，要一等候幾個月，或半年，甚至更長時間，下面才向上面作總結性的報告，上面才向下面作一般性的指示。」像今天在黨的許多組織內所行的辦法那樣，這種辦法，也是一種錯誤的、必需改正的經驗主義的辦法。此外，由於缺乏分析的方法，在我們同志總結經驗的時候，還常常如同毛主席在「反對黨八股」的演講中所說，「不去思考問題的本質，而滿足於甲乙丙丁的現象羅列」，「不提出問題，不分析問題，不解決問題，不表示贊成什麼，反對什麼，」來說去，這是一箇中藥舖，沒有什麼真切的內容。這樣，即使作出了總結性的報告和一般性的指示，對於工作也還是沒有幫助，問題還是不能解決。由此可見，雖然作了調查研究總結經驗的功夫，但如果不經過經驗主義的幫助，不學會分析的方法，那麼我們就仍然不能提高我們的工作，仍然不能及時地掌握動能，解決問題，

記了總的路線和政策。這樣就使得許多同志在執行政策的時候，不斷發生左右搖擺。所謂認真研究，自然不是說要一字不漏地死背文件，或是不管具體情況如何，一字不改地死搬硬套。應當指出：與教條主義者和經驗主義者的方法相反，中央的指示文件總是謹慎地區別不同的情況而指出不同的工作任務和工作方法，並且反復地教育幹部按照具體情況來執行的。中央規定：各地黨的組織發現這些文件，如有不適合當地情況的部分，可以和應當提出修改的意見，但必須取得中央同意，方能實行修改。今天的嚴重情形，主要地並不在於死背或死搬中央的文件（這無疑是錯誤的），而在於許多幹部根本不認真研究和嚴格執行中央的文件，反而任意藉口情況特殊，擅自修改中央的或上級的政策，執行自以為是錯誤的政策，事前既不請示，事後也不報告，這就形成某些嚴重的無紀律狀態或無政府狀態。因此，反對忽視中央的指示文件，要求幹部對於中央文件實行認真的詳細的研究，以便透澈了解中央的路線、政策、深刻領會中央的思想方法，乃是克服經驗主義的必要條件。

第三、除了以上兩個辦法以外爲了克服經驗主義，還要提倡全黨幹部在自己的工作中學習正確地調查研究，分析情況，分析經驗，隨時對地養成具體地分析具體問題的習慣。馬克斯列寧的著作也好，毛澤東同志的著作也好，中央的指示文件也好，究竟不可能把我們每天工作中所遇到的每個問題都給以其確切的解答。相反地，所有這些著作和文件，都是堅決要求我們多多獨立地思想，而堅決反對那些一切包圍現成的思想上的前漢的。毛主席說：「有些人雖然有聯系羣衆的長處，但是不善於思索，不願用腦筋多想苦想，結果仍然做不成事業。列寧經常勸人要善於思索，我們也要這樣勸人——如前所說，現在黨內調查研究經驗的一般習慣是有了，所缺乏的乃是分析的方法；而提倡學習馬克斯列寧主義的著作，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和中央的指示文件，其主要目的之一，也就是要學習這個分析的方法。這個學習，一方面需要認真讀書，一方面尤其需要實際應用。具體地分析具體問題，這是馬克斯列寧主義的靈魂，這是正確執行中央路線政策的關鍵，這是我們全黨幹部在每天工作中不可以片刻離開的武器。我們學習了使用這個武器，就會使我們既能解脫教條主義，也能解脫經驗主義。」

中共中央關於領導方法的決定

(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中央政治局通過)

(一) 無論進行何項工作，有兩個方法是必須採用的，一是一般的與個別相結合，二是領導與羣衆相結合。

(二) 任何工作任務，如果沒有一般的普遍的號召，就不能動員廣大羣衆行動起來。但如果只限於一般號召，而領導人員沒有具體地直接地從若干單位將所號召者深入實施，突破一點，取得經驗，然後利用此種經驗去指導其他單位，則無法考驗自己提出的一般號召是否正確，也無法充實一般號召的內容，易於使一般號召陷於空虛的危險。例如一九四二年的各地整風，凡有成積者，都是採用了一般號召與個別指導相結合的方法。凡無成績者，都是沒有採用此種方法。一九四三年的整風，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區黨委及地委，除提出一般號召（全年整風計劃）外，必須在自己機關中及附近機關、學校、部隊中，選擇二、三單位（不要很多），深入研究，詳細了解整風學習在這些單位的發展過程，詳細了解這些單位中若干個（也不要很多）典型的具體幹部之歷史經歷、思想特點、學習動機與工作優劣，並親自指導這些單位的負責人具體的解決各該單位實際問題，藉以取得經驗。一機關、一學校、一部隊內部亦有若干單位，該機關學校該部隊的領導人員亦須這樣去做。這又是領導人員指導與學習相結合的方法。任何領導人員，凡不向下教具體單位的具體人員、具體事件學習者，必不能向一切單位作普遍的指導。這一方法必須普遍地提倡，使各級領導幹部都能學會使用。

(三) 一九四二年的整風經驗又證明：每一具體單位的整風，必須在整風過程中形成一個以該單位行政首長為核心的少數領袖份子的領導骨幹，並使這一領導骨幹與參加學習的廣大羣衆密切結合，才能更廣泛地或更王秀，只有少數骨幹的領導，而無廣大羣衆的廣泛運用者，則將變為少數人的空

忙。但如果只有廣大羣衆的積極性，而無有力的領導骨幹去恰當的組織羣衆的積極性，則羣衆積極性既不可能持久，又不可能走向正確的方向與達到高漲的程度。任何有羣衆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較積極的、中間狀態的與比較落後的三部分人，而這三部分人的比例，又大致都是兩頭小、中間大。故領導者必需善於團結少數積極份子作爲領導的骨幹，並藉藉這批骨幹去震盪中間份子，爭取落後份子。凡屬真正團結一致、聯系羣衆的領導骨幹，必須是從羣衆鬥爭中（例如羣衆學習）逐漸形成，而不是脫離羣衆鬥爭所能形成的。任何一個偉大的鬥爭過程，其開始階段、中間階段與最後階段的領導骨幹，不應該也是不可能是完全同一的，必須不斷的提拔在鬥爭中產生的積極份子（英雄）來替換原有骨幹中相形見绌的份子，或腐化了的份子。許多地方及許多機關工作推不動的一個基本原因，就是缺乏這樣一個團結一致、聯系羣衆的經常健全的領導骨幹。一個百人的學校，如果沒有一個從教員中、職員中、學生中自然形成的（不是勉強凑集的）比較的最積極最正派最機敏的幾個人至十幾個人的領導骨幹，這個學校就一定辦不好。斯大林論黨的布爾塞維克化的第九條中所設的獨立領導核心問題，我們應該應用到一切大小機關學校部隊中去。這種領導骨幹的標準，應是季米特洛夫論幹部政策中所舉的四個幹部標準（無限忠心，聯系羣衆，有獨立工作能力，遵守紀律）。無論是執行戰鬥、生產、教育（包括黨風）等中心任務，無論是執行學習、檢查工作、審查幹部或其他任何工作，除採取一般號召與個別指導相結合的方法以外，均須採取領導骨幹與廣大羣衆相結合的方法。

(四) 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羣衆中來，到羣衆中去。這就是說，將羣衆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爲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向羣衆中去宣傳解釋，化爲羣衆的意見，並使羣衆堅持下去，見之於行動，並在羣衆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後再從羣衆中集中起來，再向羣衆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列主義的認識論，或方法論。

(五) 領導骨幹與廣大羣衆有組織地在鬥爭行動中發生正確關係的思想，正確的領導意見只能從羣衆中集中起來又向羣衆中堅持下去的思想，在領導意見之實行時，要將一般號召與個別指導互相結合的思想，均必須在此次整風中普遍的加以宣傳，藉以糾正幹部中在此問題上存在着的錯誤觀點。

許多同志不注意與不善於團結積極份子組成領導核心，不注意與不善於促進這種領導核心與廣大羣衆密切地結合起來。因而使自己的領導變成脫離羣衆的官僚主義的領導。許多同志不注意與不善於總結羣衆鬥爭的經驗，而歡喜主觀主義的自作聰明的發表許多意見，因而使自己的意見變成不切實際的談論。許多同志滿足於工作任務的一般號召，不注意與不善於在作了一般號召之後，緊緊的接着從事於個別具體的指導。因而使自己的號召停止在嘴上、紙上、或會議上，而變爲官僚主義的領導。此文整風，必須修正這些缺點，在整風學習、檢查工作、審查幹部中學會領導與羣衆相結合、一般與個別相結合的方法，並在以後應用此種方法於一切工作。

(六) 正確的領導意見是從羣衆中集中起來的，又向羣衆中堅持下去的意見，這是基本的方法論，在集中與堅持過程中，必須採取一般與個別相結合的方法，這是前一個方法所組成部分。從許多個別指導中形成一般意見（一般號召），又拿這一般意見到許多個別單位中去考驗（不但自己這樣做，而且叫別人也是這樣做），然後集中新的經驗（總結經驗），作成新的指示去貫徹的指導羣衆。同志們在這次整風中應該這樣去做，在任何工作中也應該這樣去做，比較好的領導，就是從比較善於這樣去做而得到的。

(七) 任何工作（戰爭、生產、教育、或整風學習、檢查工作、審查幹部、或宣傳工作、組織工作、防奸工作等等）上級領導機關都應通過有關這項工作的下級機關的主要負責人，使他們負起責任來，達到分工而又統一的目的（一元化）。不應只是由上級的個別部門去找下級的個別部門（例如上級組織部只找下級的組織部，上級宣傳部只找下級的宣傳部，上級總務部只找下級的總務部），而使下級機關的總負責人（例如書記、主席、主任、校長等）不知道，或不負責，應該使總負責人與分負責人那知道、都負責。這樣分工而又統一的一元化的方法，一件工作可經過總負責人推動很多幹部、有時甚至全體人員去作，可以解決各單個部門幹部不足的缺點，而使許多人都變爲自己工作的幹部。這也是領導與羣衆相結合的一種形式，例如審查幹部，如果你僅由組織部這個領導機關的少數人孤立地去做，是不可能做好，如果通過某一機關或某一學校的行政首長，推動該機關學校的許多人員、許多學生，有時甚至是全體人員、全體學生都參加審查，而上級組織部的領導人員則正確地指導這種審查

，實行領導與羣衆相結合的原則，審查幹部的目的就一定能夠達到。

(八)在任何一個地區、一個機關、一個學校、或一個部隊，不能同時有許多中心工作，在一個一定時間內只能有一個最中心的工作，轉以別的第二位、第三位工作。就在該地區、該機關、該學校、該部隊的總負責人，必須考慮到該處的鬥爭歷史與鬥爭環境，將各項工作擺在適當的地位，而不能自己全盤計劃，只按上級來指示一件做一件，形成很多的「中心工作」及凌亂無秩序的狀態。上級機關亦不要不分輕重緩急的沒有中心的同時指定下級機關做很多項工作，以致引起下級在工作步驟上的凌亂，而得不到確定的結果。領導人員依照每一具體地區的歷史條件與環境條件，統籌全局，正確的決定每一時期的工作重心與工作秩序，並把這一秩序堅持地貫徹下去，而務必得到一定的結果，這是一種領導藝術，這也是運用領導與羣衆相結合、一般與個別相結合這些原則時，必須注意解決的領導方法問題。

(九)領導方法問題上的各個組織問題，這裏不予一一說到，由各地同志根據基本決定所設的原則方針自己去用心思索，發揮自己的創造力。鬥爭愈是艱苦，就愈是需要共產黨人的領導與廣大羣衆的要求密切相結合，愈是需要共產黨人的一般與個別指導密切地相結合，而徹底粉碎主觀主義的與官僚主義的領導方法。我黨一切領導同志必須隨時會科學的領導方法去和主觀主義的與官僚主義的領導方法相對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後者。主觀主義者與官僚主義者不知道領導與羣衆相結合、一般與個別相結合的原則，極大地妨礙黨的工作的發展，故爲了反對主觀主義與官僚主義的領導方法，必須廣泛地深入地提倡科學的領導方法。

中央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

〔一九四一年八月一日〕

二十年來，我黨對於中國歷史中國社會與國際情況的研究，雖然是逐漸進步的，逐漸增加其知識的，但仍然是非常不足；粗枝大葉，不求甚解，自以為是，主觀主義形式主義的作風，仍然在黨內嚴重的存在着，抗戰以來，我黨在了解日本，了解國民黨，了解社會情況諸方面，是大進一步了，主觀主義形式主義作風也減少了。但所了解者，仍然多屬粗枝大葉的，漫畫式的，缺乏系統的周密的了解。主觀主義與形式主義作風，並未徹底消滅。對於二十年來由於主觀主義與形式主義，由於幼稚無知的同志，使黨的工作遭受損失的嚴重性，尚未被全黨領導機關及一切同志所徹底認識。劉延安來報告工作的同志，其中的多數，對於他們自己從事工作區域的內外環境，不論在社會階級關係方面，在敵偽方面，在友黨友軍方面，在自己工作方面，均缺乏系統的周密的了解。黨內許多同志，還不了解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一真理。還不了解系統的周密的社會調查是決定政策的基礎。還不知，領導機關的基本任務就在於了解情況與掌握政策。而情況如不了解，則政策勢必錯誤。還不知道不但日本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調查研究是如何的無微不至，就是國民黨對於國內外情況，亦比我黨所了解的豐富得多，還不知道粗枝大葉自以為事的主觀主義作風，就是黨性不純的第一個表現。而實事求是，理論與實際密切聯繫，則是一個黨性堅強的黨員的起碼態度。我黨現在已是一個擔負着偉大革命任務的大政黨，必須力戒空疏，力戒膚淺，掃除主觀主義的作風，採取具體辦法，加重對於歷史，對於環境，對於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具體情況的調查與研究，方能有效的組織革命力量，指揮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統治。為此目的，特決定辦法如下：

(一) 中央設置調查研究機關，收集國內外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及社會階級關係各方面材料

加以研究，以為中央工作的直接助手。

(二)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獨立區域的區黨委或省委，八路軍新四軍之高級機關，各根據地高級政府，均須設置調查研究機關，收集有關該地敵友我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及社會階級關係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為各該地工作的直接助手。同時供給中央以材料。

(三)關於收集材料的方法，舉例如下：第一，收集敵友我三方關於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及社會階級關係的各種報紙、刊物、書籍，加以採錄、編輯與研究。第二，搜集有經驗的人開調查會，每次三五人至七八人，調查一鄉一區一縣一廠一商店一學校一問題（例如：土地問題、勞動問題、游民問題、倉門問題）的典型，從研究典型著手，是較切實的辦法。由一典型再及另一典型。第三，在農村中，應着重對於地主、富農、商人、中農、貧農、佃農、手工工人、游民各階層生活情況及其相互關係的詳細調查，在城市中，應着重對於買辦大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貧民羣衆、游民等羣衆及無產階級的生活情況及其相互關係的詳細調查。第四，利用各種幹部會、代表會、倉門首領、收束材料。第五，寫名人列傳。凡地主資本家財產五萬元以上者，敵軍偽軍友軍團長以上的軍官，敵區友區縣長以上的官長，敵黨偽黨友黨縣以上的負責人，名流學者文化人新聞記者在一縣內外聞名者，倉門首領、敵派首領、流氓頭、土匪頭、名匪、名娼以及在華外人活動份子，替他們每人寫一數百字到數千字的傳記。此種傳記，要寫成地委及縣委同志分負責任。傳記內容須切合本人實際，同時注意收集各種人員的照片。第六，個別口頭詢問，或派人去問，或屬人來問，問幹部、問工人、問農民、問文化人、問商人、問官吏、問流氓、問俘虜、問同情者，均屬之。第七，收集縣誌、府誌、省誌、家誌，加以研究。

(四)除中央及各地的調查研究機關外，必須動員全黨全軍及政府之各級機關及全體同志，着實對於敵友我各方情況的調查研究，並供給上級調查研究機關以材料。

(五)向各級在職幹部與訓練幹部的學校，進行關於了解客觀情況（敵友我三方）的教育。鼓勵那些了解客觀情況較好的同志，批評那些向空談不實際的同志。鼓勵那些既了解情況又注意政策的同志，批評那些既不了解情況又不注意政策的同志。使這種了解情況注意政策的風氣與學習馬列主義

護理論的風氣密切聯系起來，在學習中，反對不管實際只記條文的風氣。反對將學習馬列主義原理原則與了解中國社會情況解決中國革命問題互相脫節的惡劣現象。要提倡幹部與學生看報，指導看報方法，指導他們分時局的每一變動。要供給幹部與學生關於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各種情況的實際材料，把講授與研究這些材料及其結論當作正式課程，給予必要時間，並實行考績。

(六) 達成各級黨部將本決定與中央七月一日所發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聯系起來，向黨的委員會及幹部會議作報告，並討論實施辦法。

斯大林論領導與檢查

列甯曾教訓我們，不僅要教育羣衆，而且要向羣衆學習。這是甚麼意思呢？

這就是說，我們，領導者，不應當驕傲，而應當了解，我們雖然是中央委員或人民委員，但這還不是說，我們已具有爲實行正確領導所必要的一切知識。職位本身並不能給予知識和經驗，經驗就更要不必說了。

這就是說，只靠我們自己的經驗，只靠領導者的經驗，還不足以實行正確的領導。因此，還必須用羣衆的經驗，用黨員羣衆的經驗，用工人階級的經驗，用人民的經驗，來補充自己的經驗，領導者的經驗。

這就是說，一刻也不可減弱我們與羣衆的聯系，更不必說隔斷我們與羣衆的聯系了。

最後，這就是說，必須仔細傾聽羣衆的意見，必須仔細傾聽平常黨員的意見，必須仔細傾聽所謂「小人物」的意見，必須仔細傾聽人民的意見。

甚麼叫做正確的領導呢？

這絕對不是設坐在辦公室裏發號施令。

正確領導，——這就是說：

第一，必須正確決定問題。而爲要正確決定問題，就非估計到羣衆所有的經驗不可，羣衆是親身經受到我們的領導的結果的。

第二，必須組織正確決定的執行。而爲要組織這種執行，也是非有羣衆的直接幫助不可。

第三，必須組織對於這種決定的執行情形之審查。而爲要組織這個審查，也是非有羣衆的直接幫

助不可。

我們，領導者，只是從一方面，我可以說，只是從上面看見事物，事變，人；因此我們的視野，是有多少是受限制的。反之，羣衆却是從另一方面，我可以說，是從下面看見事物，事變，人；因此他們的視野，也是在一定程度上有限制的。爲要得到問題的正確解決，就必須把這兩方面的經驗結合起來。只有這種情形下領導才會是正確的。

……在甚麼時候才能做到這一步呢？

只有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才能做到這一步，就是要領導者與羣衆有極密切的聯繫，要領導者與黨員羣衆、與工人階級、與農民、與勞動知識份子有極密切的聯繫。

與羣衆發生聯繫，鞏固這種聯繫，隨時都決意傾聽羣衆的意見，——這就是布爾什維克領導的力點所在及其必勝不敗的原因。

只要布爾什維克保存着他們與廣大羣衆的聯繫，那他們將一定是必勝不敗的。——這可以說是一個定律。反之，布爾什維克只要一脫離羣衆，一喪失自己與羣衆的聯繫，一染上官僚主義的毛病，那他們就會喪失任何的力量，而變成空架子。（『論黨工作的缺點和消滅兩面份子的對法』）

中央委員會在進行組織工作的時候，是以列甯天才的思想爲領導的：即在組織工作中主要的是挑選人員和審查執行情形。

關於挑選人員和調換那些不勝任的人員這一部份事情，我要說幾句話。

除了撤銷不可救藥的官僚主義者和文牘主義者，對於這件事情我們沒有任何分校的意見之外，我們還有兩類工作人員，這兩類工作人員阻礙我們的工作，妨礙我們的工作，不讓我們前進。第一類工作人員，這種人過去有相當的功績，這種人已成爲功臣，他們以爲黨和蘇維埃的法律並不是爲他們而寫的，而是爲那些傻子們而寫的。這就是這樣的一種人，這種人並不認爲執行黨和政府決議是他們自己的責任，這樣，他們就破壞黨和國家的紀律基礎。他們敢於破壞了黨和蘇維埃的法律，他們所指望的是甚麼呢？他們希望着，以爲蘇維埃政權，因他們過去的功績而不敢去驚動他們。這些自負的功臣們，認爲他們是無人可以替代的，他們是可以不受處分地破壞領導機關的決定。對於這

種工作人員怎樣辦呢？應當毫不猶豫地從領導位置撤掉他們，不顧他們過去的功績。（喊聲：「對呀！」）應當調動他們，降低他們的職位，並把這件事情在報紙上公佈。（喊聲：「對呀！」）這件事情之所以必要，爲的是要打這些自負的功臣官做底做學習氣，並把他們安頓在應得的位置上。這件事情之所以必要，爲的是要在我們的整個工作中鞏固黨和蘇維埃的紀律。（喊聲：「對呀！」鼓掌）

現在講到第二類工作人員。我所指的是一種說空話的人，我可以說，這些是誠懇的說空話的人。（笑聲）是誠懇的，是忠於蘇維埃政權的人，但是沒有能力來領導，沒有能力來組織甚麼事情。去年我會經和這樣一個同志談過話，這個同志是很可尊敬的，但是他是一個同志，但是他是一個不可救藥的說空話的人，他能夠把任何一件生動活潑的事情淹沒在空談中去。請看這篇談話：

我問：你們那裏的播種事情，辦得怎樣呢？

他答：關於播種的事情麼？斯大林同志，我們已經黨員起來了。（笑聲）

我問：那末，又怎樣辦呢？

他答：我們曾經直截了當的提出了問題。（笑聲）

我問：那末後來又怎樣辦呢？

他答：我們的工作有轉變，斯大林同志，很快就會有轉變。（笑聲）

我問：究竟怎樣呢？

他答：在我們那裏有前進步。（笑聲）

我問：可是，究竟你們那裏的播種事情辦得怎樣？

他答：我們那裏的播種事情，暫時毫無頭緒哩，斯大林同志。（全場大笑）

這就是說空話的人底面目。他們黨員起來了，直截了當的提出了問題，他們既有轉變又有進步，而事情終究還是停頓着。

不久以前，一個烏克蘭的工人所說的那個組織底狀況，也與上面的情形一樣一樣。有人問這個工人在這個組織中是否有路線，他回答說：「怎麼，路線……路線當然是有的，只是工作看不見。」（全場大笑）很明顯的，這個組織也有自己誠懇的說空話的人。

當撤換這種說空話人底職位，派他們繼續指揮工作的時候，他們便擺開兩手而帶着驚奇的空氣說：「爲甚麼撤銷我們？難道我們沒有做了對於事情所必須的一切事情，難道我們沒有召集突擊隊員底集會，難道我們在突擊隊員底代表會議上沒有宣佈黨和政府底口號，難道我們沒有選舉中央政治局全體委員爲名譽主席團，（全場大笑）難道我們沒有給斯大林同志發祝詞，——你們還要我們做甚麼事情呢？」（全場大笑）

怎樣對付這些不可救藥的說空話的人呢？如果把他们留在指揮工作上面，他們能夠把任何一件生動活潑的事情沉沒在滔滔不絕的說語底洪水裏面。很明顯的，應當把他們從領導的地位上撤銷，叫他們去做其他的工作，說空話的人是沒有做指揮工作的資格的。（破聲：「對呀！」鼓掌）

……說到加強審查執行情形方面的工作，那末，關於這一點我要說幾句話。

正確組織執行情形底審查這件事，在與官僚主義及文牘主義作鬥爭的事業上，具有決定的意義。領導機關底決議是否執行，或者被官僚主義者和文牘主義者置諸高閣？這些決議是否正確執行或者被人曲解？機關是否誠懇地並用布爾諾維克的精神來工作，或者是在說空話？——關於這一切，只有好好地審查了執行情形以後，才能及時知道。好好地審查執行情形！——這是這樣的一塊照燈。它幫助我們隨時查明機器工作底狀況並揭發官僚主義者和文牘主義者底原形。可以確信地說：十分之九的失敗和破綻，是由於沒有正確組織執行情形底審查工作。無疑義的，如果有了這樣一種執行情形底審查，那末失敗和破綻就一定事先被防止了。

但是，要使執行情形底審查達到目的，至少必須兩個條件：第一，要使執行情形的審查是有系統的，而不是偶然的；第二，要使黨的、蘇維埃的和經濟的各組織的一切環節中領導審查執行情形的人，不是次要的人物，而是十分有威信的人，——本組織裏的領導者自己。（在一點共十七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審查工作人員，審查工作指示之執行情形，——這是甚麼意思呢？
審查工作人員，這就是說，不是以工作人員的允諾和宣言爲標準，而是以他們的工作結果爲標準來審查他們。

審查工作指示之執行情形，這就是說，不僅是在辦公室，不僅是按形式上的工作報告來審查，而首先是到在工作地方，按執行的實際結果來審查。

一般地，是否需要這樣的審查呢？無條件地，是需要的。其所以需要，第一，就是因為只有這樣的審查，才可以透澈無遺地認識工作人員，查明他們的真正品質。其所以需要，第二，就是因為只有這樣的審查，才可以查明執行機關的優點和缺點。其所以需要，第三，就是因為只有這樣的審查，才可以查明該工作指示本身的優點和缺點。

有些同志認為，對於工作人員的審查，只可以從上面下來實行，就是領導者根據被領導者的工作結果來審查被領導者，這是不對的。從上面下來審查，當然是需要的，因為這是審查工作人員及審查工作指示之執行情形之有效辦法之一。可是，從上面下來的審查，遠遠不能包括整個審查工作。還有另外一種審查方法，即從下面上的審查，就是說，由羣衆，由被領導者來審查領導者，指出他們的錯誤，並指明改正這些錯誤的辦法。這種審查，乃是審查人員的最有效辦法之一。

黨員羣衆，在初級份子會上，在代表會議上，在代表大會上，審查自己的領導者，其方法就是聽他們的工作報告，批評他們的缺點，然後，選舉或不選舉這個或那個領導同志為領導機關的人員。我們黨章所要求的民主集中制之在黨內確切執行；為機關之無條件地以選舉手續產生；提出候選人以及取消候選人資格之權利；不公開的投票法；批評和自我批評之自由，——所有這些以及諸如此類的辦法，必須確切實行，其目的之一也即是使黨員羣衆易於審查和監督被領導者。

非黨員的羣衆，在非黨員的初級份子會上，在各種各樣的羣衆會議上，審查自己的經濟工作的，職工會的以及其他的領導者，這些羣衆，在這些會議上說自己的這些領導者之工作報告，批評缺點，並指出改正這些缺點之辦法。

最後，人民，在選舉蘇聯的政權機關的時候，用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不公開的選舉辦法，來審查自己的國家領導者。

任務就在於把從上面下的審查和從下面上的審查結合起來。（「論黨的工作的缺點和消滅兩面份子的辦法」）



關於黨的羣衆路線問題

劉少奇

在黨章的總綱上和條文上，都特別強調了並貫串着黨的羣衆路線。這也是這次修改黨章的一個特點；因為取羣衆路線，是我們黨的根本的政治路線，也是我們黨的最大的組織路線。毛澤東同志歷次指示我們：在一切工作中要採取羣衆路線。他在向這次大會的報告中，又以極密切的詞句指示我們，要根據羣衆路線去進行工作。他說：我們共產黨人與最廣大的人民羣衆取得最密切的關係，是我們區別於任何其他政黨的一個顯著的標幟。他要我們：「全心全意爲中國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羣衆；一切從人民利益出發，而不是從自己小集團或自己個人利益出發」。他要我們同志明確：「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以是否合乎最廣大人民羣衆的最大利益，是否爲最廣大人民羣衆所擁護爲最高標準」。要我們同志明確：「只要我們依靠人民，堅決地相信人民羣衆的創造力是無窮無盡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我們就是不可戰勝的。他說：「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義是錯誤的，因為它超過羣衆的覺悟程度，違反了羣衆的自願原則，害了急性病」。又說：「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義也是錯誤的，因為它落後於羣衆的覺悟程度，違反了領導羣衆前進一步的原則，害了慢性病」。所有毛澤東同志的這些指示，都是極端重要的，每個同志都必須細心領會和切實執行。

我們的這種羣衆路線，是只有無階級的政黨才能具有的。我們的羣衆路線，也就是階級路線，就是無產階級的羣衆路線。我們對人民羣衆的這種觀點，我們與人民羣衆的這種關係，是和一切剝削階級對待人民羣衆的觀點，根本不相同的。

我們完全懂得：人民羣衆的先鋒隊在人民羣衆解放鬥爭的全部過程中所起的決定的作用。人民羣

衆必須有自己的先鋒隊，而且必須有如我們這種性質的先鋒隊，人民羣衆的徹底解放，才是可能的。人民羣衆如果沒有自己的這種性質的先鋒隊，就將使人民羣衆沒有革命的領導，即如果沒有這種領導，就將使人民羣衆的革命事業遭受失敗。中國人民只有有我們黨的堅強而正確的領導之下，只有依照我們黨所指出的政治方向奮鬥，才能獲得自己的徹底解放。

這是一方面。

在另一方面，人民羣衆的先鋒隊必須與人民羣衆建立正確的關係，它必須在各方面，首先在政治上代表人民羣衆的利益，必須用正確的態度去對待人民羣衆，必須用正確的方法去領導人民羣衆，然後先鋒隊才能密切聯繫於人民羣衆。否則，先鋒隊是完全可能脫離人民羣衆的。而先鋒隊如果脫離人民羣衆，就不能成其爲人民的先鋒隊，就不獨不能實現它解放人民羣衆的任務，而且直接被敵人消滅的危險。這就是說，人民羣衆的先鋒隊在一切工作中必須有澈底的明確的羣衆路線。

在一些什麼重要情形下，先鋒隊就要脫離人民羣衆呢？首先，就是先鋒隊如果不能履行自己當作人民先鋒隊的應有職責，不能在一切時期和一切情況下代表最廣大人民羣衆的最大利益，不能及時提出正確的任務、政策及工作作風，不能堅持真理，不能在錯誤時及時修正錯誤，那就要脫離人民羣衆。這就是說，尾巴主義、自私自利，是要脫離人民羣衆的。

在我們黨內，公開的自發論，公開主張退縮的尾巴主義「理論」，公開主張不要無產階級政黨領導的「理論」，是還沒有的。但是大革命後期的陳獨秀主義和抗戰初期的投降主義，就是一種尾巴主義，它們這些落在當時人民羣衆革命運動的後面，不能提出代表人民羣衆並鼓勵人民羣衆前進的正確的任務、政策及工作作風，因而脫離人民羣衆，使革命受到損失或失敗。此外，還有些同志在各種工作中有尾巴主義這類性質的錯誤。比如，有些同志在實際工作中，不把羣衆看作是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而把羣衆看作是軍隊的、政府黨團的或職工會的附屬品。另有些同志在工作中疲弱，老一套，安於現狀，任其自然，喪失上進之心，而不根據當時當地羣衆的情況，提出正確的任務、政策與工作作風，率領羣衆力求前進，違反領導羣衆前進一步的原則，選拔羣衆中落後的意見，把自己降

到普通工人、農民甚至落後份子的水平，失去先鋒隊的作用，有時又遷就羣衆中錯誤的意見，而跟隨在羣衆自發運動的尾巴後面跑，不能對羣衆實行正確的有遠見的領導。這種傾向，是要使我們脫離廣大人民羣衆的，因為人民羣衆並不需要這樣的人來領導自己。

其次，就是先鋒隊如果不用正確的態度真正正確的方法去領導人民羣衆，不設法使羣衆在自己的親身經驗中來體會黨的口號的正確，因而在黨的口號之下行動起來，或者提出了過高的口號、過左的政綱，或者提出了當時情況所不能允許的羣衆所不能接受的過火的鬥爭形式，組織形式，那就要脫離人民羣衆，這就是說，命令主義、冒險主義與門戶主義，是要脫離人民羣衆的。

在我們黨內，有些同志是犯過命令主義、冒險主義與門戶主義的錯誤的。比如，有些同志在自己的工作中不對人民羣衆負責，不相信羣衆是自己解放自己，而站在人民羣衆之上，去代替羣衆鬥爭，恩賜羣衆解放，命令羣衆行動。他們犯了急性病，表面上積極，然而他們不知道怎樣才能把黨的口號變爲羣衆自己的口號，怎樣才能把黨所提出的任務變爲羣衆自己的任務。他們不知道如何才能去啓發羣衆的覺悟並適當的啓發羣衆的覺悟，不知道採取許多步驟去使羣衆自然而然的革命化，而企圖用簡單的、生硬的、命令的辦法強制羣衆接受黨的口號和任務，並強制羣衆起來行動。他們違反了羣衆自願原則。特別在提出了過高的口號與過左的政策，引起羣衆的懷疑與不滿之時，他們更用強迫命令甚至懲罰主義的辦法，去推動其工作。其中最惡劣的作法，就是他們每到一地，就去找那裏的錯誤、缺點和壞典型，加以批評、鬥爭和處罰，以此去嚇唬人民和幹部，去推進工作；而不去找那裏的優點和好典型，加以研究、補充和系統化，獎勵那裏的英雄和模範工作者，傳佈好的經驗，以鼓勵黨員和人民前進，同時即可以克服那裏的錯誤、缺點。他們到處打羣人，用命令簡單解決一下，不向人民羣衆學習，不吸收羣衆中的新發明與新創造，而強迫別人依照他們的辦法行動。這種傾向，是更嚴重地脫離人民羣衆的，並要引起羣衆對於他們，以至對於黨發生怨恨。

除開上述兩種傾向外，官僚主義與軍閥主義的傾向也在我們黨內有些同志中發生了。這也是嚴重脫離人民羣衆的傾向。

官僚主義的傾向，表現在有些同志沒有爲人民服務的觀點以及對黨對人民不負責任的觀點。其典

型的表現就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只知道發號施令，而自己則既不調查，又不研究，也不向羣衆學習，拒絕羣衆的批評，抹煞人民的權利，甚至要求人民爲他們服務，爲了自己的享受，而不惜犧牲羣衆的利益，勞民傷財，貪污腐化，在羣衆面前稱王稱霸等。

軍閥主義傾向，表現在有些同志不了解：我們的軍隊，乃是人民的軍隊，人民的武力，乃是人民用以戰勝敵人解放自己的一個最重要的工具，而把軍隊看成是超出人民之外、或是站在人民之上的一種特殊勢力，甚至把軍隊看成是可以造成少數個人勢力、個人地位的工具，因而他們就把官僚主義、命令主義的作風用在人民的軍隊工作中。其特點：首先表現在官兵關係、上下級關係上，用命令主義與懲辦主義的辦法來統率自己的士兵與部下，而不依靠士兵與部下的自覺與自動。其次，表現在軍民關係上，不注意嚴整部队的羣衆紀律，不熱愛人民，強迫、打罵人民羣衆，使軍隊脫離人民羣衆。再其次，表現在單純軍事觀點，表現在革命軍隊與革命政府的關係上，企圖照軍閥那樣把軍隊放在政府的上面，企圖以軍治政。復明白，這種傾向，與人民軍隊是根本不相容的。

上述這些脫離羣衆的錯誤傾向之所以在我們黨內產生，是由於勞動人民的文化程度不夠和舊社會剝削階級的影響，我們黨內的小資產階級成分以及脫離社會生產甚久的成份，常常容易接受這種影響而成爲各種脫離羣衆的傾向。這些傾向的產生，有深刻的社會根源，以至在我們黨章的總綱上也提到了它們。將來革命愈發展，工作愈繁重，我們內部的這些傾向也愈有可能生長。因此，我們應經常和這些傾向作鬥爭，才能經常保持和鞏固我們與廣大人民羣衆的聯繫。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應該經常掃地和洗臉，以免這些政治的灰塵、政治的微生物來蒙蔽與侵蝕我們同志的思想和我們黨的肌體。

◎人民羣衆必須有自己堅強的先鋒隊，人民的先鋒隊必須密切聯繫於最廣大的人羣羣衆。只有這樣，人民羣衆的解放，才是可能的。因此，我們黨——中國人民的先鋒隊，必須經常清除上述各種脫離人民羣衆的傾向，而實行密切聯繫人民羣衆的路線。所謂密切聯繫人民羣衆的路線，就是黨的羣衆路線，毛澤東同志的羣衆路線，就是要使我們黨與人民羣衆建立正確關係的路線，就是要使我們黨用正確的態度與正確的方法去領導人民羣衆的路線，就是要使我們黨的領導機關和領導人與被領導的羣衆建立正確關係的路線。

毛澤東同志說：我們黨的政策和工作方法應該是從羣衆中來，又到羣衆中去。這就是說，不但我們黨的政治路線，而且我們黨的組織路線，都應該是正確的從羣衆中來，又正確的到羣衆中去的。我們黨的政治路線，是與正確的政治路線，是與正確的政治路線分不開的。雖然政治路線與組織路線之間，可能發生部份的暫時的不調和的現象，但不能設想，政治路線是正確的，組織路線卻是不正確；反之，組織路線正確了，政治路線卻是不正確；要把二者互相孤立起來是不可能的。所謂正確的政治路線，就是激進的羣衆路線，就是我們黨的領導骨幹和羣內黨外廣大羣衆密切結合的具體路線，就是從羣衆中來，又到羣衆中去的路線，就是指導方法上的一般號召與個別指揮相結合的路線。

爲了貫徹我們黨和毛澤東同志的羣衆路線，在黨章的總綱上和條文上都強調地指出了以下幾句羣衆路線，這幾個觀點，必須在每一個黨員的思想中牢固地建設起來。

第一，就是一切爲了人民羣衆的觀點，全心全意爲人民羣衆服務的觀點。我們黨從最初起，就是爲了服務於人民而建立的，我們一切黨員的一切懷性、努力和鬥爭，都是爲了人民羣衆的利益和解放，而不是爲了別的。這就是我們共產黨人最大的光榮和最值得驕傲的地方。因此，凡是爲了個人利益或小集團利益而損害人民利益的觀點，是錯誤的。我們的一切黨員，以及參加我們隊伍中的一切人員，只要忠於黨，並多少著有成效的，也都是在爲人民服務的，都是人民的勤務員，不管他們意識到了這一點與否，也不管他們擔負的是重要的領導職務，或是普通的戰鬥員與伏馬伏等職務，他們都是在不同的崗位上，直接或間接爲人民服務的；因此，他們都是平等的、光榮的。我們要在一切黨員和一切人員中，提高自覺性，使我們一切黨員和一切人員都在高度自覺的基礎上爲人民服務，對人民負責。

第二，就是一切向人民羣衆負責的觀點，我們爲人民服務，就要對人民負責，就要在客觀上使人因爲我們的服務而獲得益處，獲得解放；就要力求不犯或少犯錯誤，免得害了人民，引起人民的損失。凡屬是我們提出的任務、政策與工作作風，都應該是正確的，才於人民有利，如不正確，即要損害人民的利益，即要誠懇地進行自我批評，迅速求得改正。就是說，我們要善於爲人民服務，要服務得很好，而不要服務得很壞。因此，我們在人民面前，一切都不應採取輕率態度，都應有嚴肅的負責

的態度。

這必須了解：向人民負責與向自己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即是說，我們黨員受了黨的領導機關與領導人的命令去進行工作，他們在工作中是要對黨的領導機關與領導人負責的；但如果把這種對領導機關負責與對人民負責分開來看，那是錯誤的。必須對人民羣衆負責，才算是盡了最後與最大之責。要理解黨的利益與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凡對人民有利的事業，即是對黨有利的事業，每個黨員都必須盡力去作。凡對人民不利的事業，即是對黨不利，每個黨員都必須反對，必須避免。人民的利益，即是黨的利益，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黨再無自己的特殊利益。最廣大人民的最大利益，即是黨的利益，即是黨的最高標準，即是我們一切行動的最高標準。每個黨員對人民負責，即是對黨負責，對人民不負責，即是對黨不負責。要理解對黨負責與對人民負責的一致性，要使二者統一起來，不要使二者割裂開來，對立起來。如果發現自己領導機關與領導人所指示的任務、政策和工作中有缺點、錯誤時，即應以對人民負責的精神向領導機關與領導人建議改正，要弄清是非，不應馬虎敷衍。否則，就是對人民沒有負起責任，也就是對黨沒有負起責任。黨的紀律是必須遵守的，黨的統一必須保持的，因為保持我們黨的統一與紀律，即是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不能藉口對人民負責而破壞黨的紀律與統一；但領導機關與領導人的任何缺點、錯誤，都必須糾正，每一個黨員都有責任，也是權利，去幫助領導機關與領導人糾正任何缺點與錯誤。因為任何缺點與錯誤，都是對人民不利的，因此也就對黨不利。我們黨員忠誠的自我批評精神，對自己及對領導機關的錯誤所採取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態度，以及遵守黨的紀律的精神，都是對人民負責的精神。

第三、就是相信羣衆自己解放自己的觀點。毛澤東同志經常說：人民羣衆是真正偉大的，羣衆的創造力，是無窮無盡的，我們只有依靠了人民羣衆，才是不可戰勝的，只有人民羣衆，才是歷史的真正創造者，真正的歷史是人民羣衆的歷史。馬克思早就說過：勞動者是自己解放自己。不是皇帝，不是神仙，也不是英雄豪傑，而全羣衆自己救自己。這就是說，人民羣衆自己的解放，只有人民羣衆自己能起來鬥爭，自己起來爭取，才能獲得，才能保持與鞏固；而不是任何羣衆之外的人所能恩賜，所能給予的，也不是任何羣衆之外的人能夠代替羣衆去爭取的。所以恩賜的觀點，代替羣衆鬥爭的觀點

是錯誤的。

人民羣衆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人民羣衆的解放，必須由羣衆的自覺與自願，並且舉出自己的先鋒隊，在先鋒隊的指導下，自己組織起來，自己去鬥爭，自己去爭取，然後羣衆才能自覺的去獲得鬥爭的果實，並保持與羣衆這種果實。人民羣衆的敵人，只有人民羣衆自己起來才能打倒，否則，人民的敵人是不能被打倒的。沒有人民羣衆的真正自覺與真正發動，僅有先鋒隊的奮鬥，人民的解放是不可能的，歷史是不會前進的，任何事業都是不能成功的。甚至就是如減租減息、鑿工隊、合作社這樣有關人民直接的利益，沒有羣衆的自覺與自願，即有什麼人「恩賜」了減租減息、鑿工隊、合作社這樣、合作社組織起來，羣衆還是一明滅暗不滅，鑿工隊、合作社也只能是形式的空洞的東西。

我們共產黨人的一切事業，都是人民羣衆的事業，我們的一切綱領與政策，不論是怎樣正確，如果沒有廣大羣衆的直接的擁護和堅持到底的鬥爭，都是無法實現的，所以我們的一切，都依靠於、決定於人民羣衆的自覺與自願，不依靠於羣衆的自覺與自願，我們將一事無成，我力不討好。但只要我們依靠於羣衆的自覺與自願，只要羣衆有了真正的自覺與真正的發動，又有我們黨的正確領導，我們黨的一切偉大事業，都一定要獲得最後的勝利與成功。因此我們共產黨人——人民羣衆的先鋒隊，不論去進行任何工作，當羣衆還沒有自覺時，我們的責任，就是用一切有效的方法去啓發羣衆的自覺，不論如何艱苦，需要如何長久的時間，這首先的第一步的工作，是必須作好的；因為只有作好了這第一步，才能進入第二步，即是當羣衆已經有了某種必要的自覺以後，我們再從羣衆的指導羣衆的行動，指導羣衆組織起來，鬥爭起來；在羣衆組織起來，鬥爭起來以後，我們再從羣衆的行動中去啓發羣衆的自覺。這樣，一步一步的引導羣衆去爲羣衆提出的人民羣衆的公共口號而鬥爭。我們共產黨人，以及一切任何羣衆中的先進份子和偉大人物，在一切人民羣衆事業中所起的全部作用，就只有這些。除開這些以外，不能再多一點。如果有人企圖在這裏再多起一點作用，一切錯誤都可以由此產生。英雄主義、命令主義、包辦代替、恩賜假點等，都可能產生。

共產黨人在人民羣衆的解放事業中，應該到處是，也只能是人民羣衆的引導者和領導，而不應該是，也不可能代替人民羣衆去打天下的「英雄好漢」。人民羣衆在革命鬥爭中迫切需要有意見的堅

強的引導者與嚮導，因為這樣的引導者和嚮導，是人民羣衆爭取勝利的必要條件；但是人民羣衆並不需要代替他們去打天下的「英雄好漢」，因為這種脫離羣衆的「英雄好漢」不能成就任何人民羣衆的解放事業。

第四、就是向人民羣衆學習的觀點。我們要很好地爲羣衆服務，要去啓發羣衆的自覺，要去指導羣衆的行動，那我們共產黨人必須首先具備一定的條件，必須有預見，對於各種問題必須有預先的計算。就是說，必須是先覺者。只有先覺者，才能覺後覺。我們同志除開完全忠實於人民解放事業，具有充分的熱情和犧牲精神之外，還必須有足夠的知識，還必須是十分有經驗和十分機智，才能很好地啓發羣衆自覺和指導羣衆行動，這必須是預見。爲了要使我們有知識和有經驗，爲了預見，我們就必須學習，學習馬列主義的理論，學習歷史，學習外國人民鬥爭的經驗，可以增加我們的知識，向敵人學習，也可以增加知識，而最重要的，就是向人民羣衆學習。因爲羣衆的知識，羣衆的經驗，是最豐富最實際的，羣衆的創造能力，是就偉大的，所以毛澤東同志常常教導我們：必須首先向羣衆學習，然後教育羣衆。只有我們同志虛心地向人民羣衆學習，把羣衆的智慧和經驗集中起來，化爲系統的更高的知識，才能夠具體地去啓發羣衆的自覺，指導羣衆的行動。如果不向羣衆學習，而自作聰明地從腦子中想出一套東西，或生硬地從歷史經驗與外國經驗中搬運一套東西，來啓發羣衆與指導羣衆，那是一定無用的。爲了能夠不斷地向羣衆學習，所以我們一刻也不要脫離羣衆。如果我們從羣衆中孤立起來，那我們的知識就要受到極大的限制，我們就決不能是聰明的，決不能是有知識有本事的，我們就決不能領導羣衆。

「平常的人，常常比我們某些高級機關原來更接近於真理得多。」

「爲要領導我們的事業，光靠我們的經驗，光靠領導者之經驗，還是遠不夠的。爲要實行正確的領導，除有領導者之經驗而外，還須用黨員羣衆之經驗、工人階級之經驗、勞動者之經驗，所謂「無間重要的人」之經驗以補不及。」

爲要做到這一步，「一定要領導者是與羣衆有密切的聯系，一定要領導者是與黨員羣衆、與工人階級、與農民、與勞動知識份子有極密切的聯系。」

「與羣衆聯系，鞏固這種聯系，隨時都決意傾聽羣衆之意見，一一這就是布爾塞維克領導之力量所在及其必勝不敗之原因。」（斯大林選集第五册三二二頁）

這是斯大林會談蘇聯共產黨人的話，這是一條普遍真理。

領導者與領導機關的職責，就是要實行正確的領導，就是要正確地了解情況，正確地抓住中心，提出任務，決定問題，正確地動員與組織羣衆來實行自己的決定，正確地組織羣衆來審察自己已決定之實行的情形。即爲要使這些事情都做得好，就必須向羣衆學習，必須實行從羣衆中來，又到羣衆中去的路線。否則，任何一件領導工作都是做不好的。

這就是向羣衆學習的觀點。

一切爲了人民羣衆的觀點，一切向人民羣衆負責的觀點，相信羣衆自己解放自己的觀點，向人民羣衆學習的觀點，這一切，就是我們的羣衆觀點，就是人民羣衆的先進部隊對人民羣衆的觀點，我們同志有了這些觀點，有了堅固的明確的這些羣衆觀點，才能有明確的工作中的羣衆路線，才能實行正確的領導。

有些同志只把工會、農會等羣衆團體的工作，看成是羣衆工作，但不把其他工作也看成是羣衆工作，這是錯誤的。我們黨的及我們黨所領導的各種工作、各種事業，凡是人民羣衆的事業，並都是（無一例外）經過人民羣衆去進行的工作，都應該有羣衆觀點、走羣衆路線去進行。一切工作都要走羣衆路線，都是有羣衆觀點。

我們黨內的工作，也是羣衆工作，也要走羣衆路線；因爲黨的本身，就是人民羣衆的一部份，黨又只是爲人民羣衆服務的。

我們在軍隊中的工作，也是羣衆工作，也要走羣衆路線；因爲軍隊本身，也是人民羣衆的一部份，軍隊又只是爲人民羣衆服務的。

自然，各種工作，各有其特殊的工作方式，不可混同，如工會、農會的工作方式，和黨的、軍隊的工作方式，應該有所區別。但各種工作，都是羣衆工作。

自然，人民羣衆不是劃一的，各種工作是複雜的。我們同志應從各種工作的崗位上，直接地去爲

部份的、具體的人民服務（如爲一個工廠的工人、一個農村的農民、一個機關的職員、一個部隊的士兵服務、以至只爲幾個人服務等），而適合於爲全中國人民服務的一個共同目標上。因此，我們同志必須正確理解部份與全體的關係，直接進行部份工作與爲部份人民服務，間接推進與加強整個革命工作與爲全體人民服務，我們同志必須同時具有部份觀點與全局觀點，只照顧部份不照顧全體，是不對的，只照顧全體不照顧部份，也是不對的。應使部份與全體統一起來。在人民羣衆部份的暫時的利益與全體長遠的利益發生衝突時，應使部份的暫時的利益服從全體的長遠的利益。這就是說，小道理應服從大道理，小原則應服從大原則。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然而，只有當我們同志善於思想，等於在一切具體情況下，正確地區別與配合人民羣衆的部份利益與根本利益時，才能有澈底的羣衆路線；否則，就可能自覺與不自覺地只站在部份人民的暫時的利益上，反對多數人民的長遠的利益，而從多數人民的長遠的利益上把自己孤立起來。

在一切羣衆運動中，在最初時期，通常都有比較積極的部份及中間狀態與落後狀態的部份，而積極份子總是比較佔少數，中間與落後狀態的人總是組成爲龐大的羣衆，按照羣衆路線，必須照顧多數，即是必須照顧中間狀態與落後狀態的羣衆，否則先進部份就會孤立起來，什麼事情也辦不好。我們在羣衆中提出行動口號以及鬥爭形式、組織形式等，都必須是中間狀態與落後狀態的羣衆能夠接受的，所謂啓發羣衆的自覺與自動，主要地就是要去注意啓發這些中間與落後狀態的羣衆的自覺與自動。只有中間狀態與落後狀態的羣衆有了覺悟，有了熱情，起來行動的時候，才能有羣衆運動。我們必須特別注意啓發、團結與組織積極份子，使積極份子成爲羣衆中的領導核心。但是我們絕對不是爲了組織積極份子而去組織積極份子的，絕對不能使積極份子從中間與落後狀態的羣衆中孤立起來，而僅僅是爲了要組織積極份子才能去吸引與推動中間狀態與落後狀態的羣衆，即是爲了發動大羣衆而去組織羣衆中的積極份子。如果中間與落後狀態的羣衆還未自覺，我們就要善於去啓發他們，並要善於等待他們；如果我們不願意等待，而盲目失失地領導少數積極份子前進，我們就會犯錯誤，我們就要失敗。

中國的農民佔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就全國範圍來說，所謂照顧人民政權的多數，主要地就是

照顧農民。我們的黨要觀點與農村觀點，是密切聯系着的。中國的工人階級在目前情況下，如果看不見中國的農民，如果不着眼於中國農村的解放，是一定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務的。中國農民羣衆的文化水平很低，其他羣衆的文化水平（除知識份子外）也很低，因此，在我們的工作中採取一般號召與個別指導相結合的方法，採取突破一點，推動全局的方法，就更有必要。指導文化水平低的羣衆，使用一般號召，是決定地不能成功的。因為羣衆，特別是農民羣衆，總是從親自看到的、親自體驗到的事情上去理解問題，而不是從我們一般的宣傳和口號上去理解問題。我們必須在工作中突破一點，做出模範，讓羣衆親自看到、體驗到，給羣衆以典型示範，才能鼓舞羣衆——特別是中間狀態與落後狀態的羣衆以理解問題的可能與方便，使羣衆以信心和勇氣在我們黨的口號之下行動起來，成爲羣衆的熱潮。近來各地部隊英雄，勞動英雄與模範工作者之所以發生很大的作用，成爲羣衆中最好的宣傳者與組織者，就是因為他們是以羣衆所熟悉具體的人物、範例和經驗，使羣衆理解了問題，提高了羣衆的自覺與自信，也是這樣。至於領導方面在突破一點的過程中取得具體經驗，以加強自己的一般號召，也是這個道理。因爲對於羣衆，如果沒有羣衆所熟悉的具體經驗來做一般號召的內容，羣衆是很難理解的。

我們要照顧全體，照顧多數，不要關門主義與宗派主義。我們要密切聯系羣衆，不要官僚主義與軍閥主義。

我們要領導羣衆前進，但是不要命令主義。我們要密切聯系羣衆，但是不要尾巴主義。我們應從羣衆原來的水準出發，去提高羣衆的覺悟，率領羣衆前進。我們要在自己的工作，把最高的原則性和與羣衆最大限度的聯系相配合。這就是我們的羣衆路線。這當然是不容易作到的，但只有如此，才能夠得上一個好的馬克思主義，才能配稱爲好的共產黨員。

關於總綱的解釋，就是這樣。（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

有事和羣衆商量

陳伯達

一、毛澤東同志的主要思想方法

「必須明白，羣衆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是往往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正確的知識。」

「和全體同志們共同一起向羣衆學習，擬定當一個小學生，這就是我的志願。」

上面這些話是毛澤東同志在『農村調查序言』所寫的。

「我還是一個小學生，羣衆的小學生，……：羣衆的意見與經驗一定要作爲我們政策的基礎，因爲人民能教給我們許多事情。我們任務就是聽從他們，學習與了解他們的經驗、願望、批評，確定他們所需要的東西的總和，再作爲政策交還給他們。」

上面這些話是毛澤東同志對一個外國記者所談的。

大家看！一個中國有歷史以來的最傑出、最偉大的人民領袖，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導師，他對自己的看法，不過是羣衆的小學生。但：我們必須知道：這就是毛澤東同志的所以偉大。毛澤東同志的所以能夠最正確的指導中國人民事業前進，指導中國共產黨前進，就是因爲他能夠甘當羣衆的小學生，能夠集中羣衆的意見變成指導的智慧。許多人那想學習毛澤東同志的思想方法，但是往往把它變成奧妙的，似乎不能爲常人所理解的『天書』，忘記了或者不願意學習毛澤東同志這種向羣衆學習的主要思想方法，而就恰成爲許多同志犯錯誤的根源。事實上，毛澤東同志這種主要思想方法，是人人都是可以學到的，但是，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如果『沒有斑駁的熱忱，沒有眼睛向下的決心，沒有求知渴的渴望，沒有放下臭架子與甘當小學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給羣衆當學生，『是必須恭謹勤勞與採取同志態度的，否則他們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盡』。學習毛澤東同

志這個主要思想方法，對於任何一個共產黨員所遇到的困難，不是個人沒有能力的問題，而是肯不肯下決心的問題。這是換腦筋，這是思想的革命。

二、兩條不同的工作路線

做任何事情，歸根到底，有兩條不同的路線：一條是官僚主義的路線，特長就是命令主義，只是向羣衆強迫，只是向單地向羣衆要東西，只是閉門造「計劃」、「造」公式，千篇一律硬套在羣衆上面；又一條是羣衆路線，乃是向羣衆學習，聽取羣衆意見，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力量給羣衆東西，隨後才用百分之十或百分之幾的力量向羣衆要東西，至於所要的東西又是爲的用在羣衆的事業上面，個個不管在任何場合，決不是從空中、超時間的「公式」出發，而是從當地當時羣衆的具體情況出發，前一條路線是反毛主席的路線，後一條路線就是毛主席的路線，按照前一條路線做事情，就必然把事情辦壞，就必然引起羣衆不滿；而凡是把事情做得好，能受羣衆充分擁護的，總是按照後一條路線去做的。

按照官僚主義路線辦事的同志，或者覺得他們那樣做也能夠「完成任務」，而且還可以「做得好」，省得「麻煩」。實際上，這類同志完全不了解：我們的任務沒有別的，我們的任何任務都只是一個：爲人民服務，爲人民的利益。一切任務都必須首先和人民羣衆商量，在羣衆面前弄清楚，在羣衆中充分討論，爲羣衆所同意，並由羣衆自己動起手來。這是羣衆路線，又正是對人民負責。劉少奇同志在修改黨章報告上說得好：「我們黨員受了黨的領導或與領導人的命令去進行工作，他們在工作中是要對黨的領導機關與領導人負責的；但如果把這種對領導機關負責與對人民負責分開來看，那是錯誤的，必須對人民負責，才算是盡了最後與最大之責。……每個黨員對人民負責，即是對羣衆負責；對人民負責，即是對羣衆負責。要理解對羣衆負責與對人民負責的一致性，要使二者統一起來，不要使二者割裂回來，對立起來。如果發現自己領導機關與領導人所指示的任務、政策和工作風氣有缺點、錯誤時，即應以對人民負責的精神向領導機關與領導人建議改正，要弄清是非，不應馬虎敷衍。否則，就是對人民沒有負起責任，也就是對羣衆沒有負起責任。」一切事情起過羣衆路線來考慮，

來進行，就是對人民負起責任，而官僚主義路線的態度恰不是對人民負起責任的態度；整頓在他們腦中的，對上對下，都是「命令」的簡單兩個字，見之於他們行動的，對上對下，也都是「命令」的簡單兩個字；他們對對人民負責與對上對幾個人負責的聯繫，他們既不考慮「任務」與人民「益」的聯繫，而且往往把原來正確提出的任務，用簡單的方法，由幾個幹部決定「佈置」下來，強迫羣衆去執行，不和羣衆商量，不聽羣衆自由發表意見與決定問題，或找出解決問題的道路，甚至對於羣衆提出意見或問題，預先即已在幹部中佈置了「答覆」，他們完全不待羣衆的思想成熟與行動成熟，自己就想就幹，結果即使任為的提出是正確的，任務也似乎「完成」了，但也會引起羣衆的懷疑與不滿。並且即使給羣衆東西，但那並沒有和羣衆仔細商量，沒有通過羣衆自己的思想和力量。第一，就不會給好，不會給得安當；第二，羣衆對於所給和所得的東西，會抱着懷疑和懷疑的態度，或者不樂意接受；第三，結果所給的東西是不鞏固的，還是可能喪失。所以，那個企圖避免「麻煩」，結果就會造成更大的麻煩。爲人民立功，這是好事，這是我們共產黨員要做的，但要指出：有些同志不肯在任何場合，對任何事情，乃是爲着自己標功，從自己「標功」、「爭功」出發，他們追求的是簡單的數字（天曉得，那種數字還是可以靠自己任意編造的），是能夠填出表格爲滿足；他們只希望上級機關獎勵自己的「功勞」，而沒有想到：一切功勞，是必須經過羣衆批准才行的。作這種想法的同志，他們辦事便是以官僚主義路線的方法來代替羣衆路線的方法，而事實上，他們所立的「功」就是很可疑的。

有事和羣衆商量，這是毛主席羣衆路線的主要精神。毛主席對一個外國記者還說過：「在我們工作中決定的因素，是我們總是去發現那些政策是人民大眾接受的，而那些政策老百姓是有意見或提出反對的。只有證明了爲大眾所擁護的政策，才能成爲我們的政策。」但是，怎樣能夠證明什麼是大眾所擁護的政策呢？顯然，如果不從羣衆中來，就不能決定，也無從證明。就是說：「必須要和羣衆商量，聽取羣衆的意見，向他們學習。在決定我們黨的政策的時候，在執行我們黨的政策的時候，在檢查我們黨的政策是否正確的時候，都離不開羣衆的意見，都必須以羣衆的意見爲準繩。毛

澤東同志說：「這是最基本的關鍵。如果一個政黨的領導人，是在真正的為人民大眾的利益而工作的，如果在這奮鬥中他們是忠誠的，他們將有無限的傾聽人民意見的機會。」（前引毛主席對外國記者談話，均見新華書店出版的『毛澤東印象記』）大家聽吧！毛主席同志的話反觀的來談，那才是能夠無限的傾聽人民意見的，那才是真正的為人民大眾的利益而工作著的，那才是在為人民事業的奮鬥中是忠誠的。那末，任何一個好的共產黨員，任何一個毛主席的學生，就必須在此受得起考驗。

三、羣衆有無限的思想創造力

顯然的，在共產黨內，也有某些黨員，瞧不起羣衆的意見的，認為羣衆是「無知」，而自己總是「聰明絕頂」的，因此，有事也就不願意和羣衆商量，自己武斷，一意孤行，必須容讓這種共產黨員：不管其自然要不自覺，他們這樣是把自己的觀點塞到黨員黨的領導裏面去了。這種觀點是和毛主席的思想，和共產黨的思想，不能相容的。「家人是聖人」，這是民間的一句老話。大眾的智慧是無限的，只有羣衆才具有最大的創造力。只有集中大眾的智慧，才是最大的智慧。事實上，任何困難的問題，自己在腦中想不通的東西，一旦和羣衆商量，便能迎刃而解，豁然貫通。還是許多在革命上有經驗的同志所熟知的，特別是毛主席經常用這種經驗告訴了同志們。不幸的，就是：我們有些同志時常對於羣衆的創造，熟視無睹，他們認為那不過是「小小」的一句話或一件事，用不著去驚奇的。

就在土地改革問題上，到處都有羣衆的創造。舉例來說，根據一位同志的反映：一九四三年開減租時，高樂土堡村有一個地主想逃避減租，使用詭計裏手段：環賣地，給幾個富農和富裕中農蓋好了租，價錢也定了，正要寫契，可是許多貧苦農民就利用了民主政府法令的保佃權，沒有讓牠賣成。四四年開清算時，那個地主退出了二百畝地、三座院子。原來這二百畝地是由三家富裕中農包租下來，先自己把好好地種上，再把剩下的壞地租給二十五戶中貧農，地租攤款好好地種地一樣，因為這裏沒有剝削，村裏人就叫那三家為「二地主」，這時地主退出，那三家企圖墾闢好地，對羣衆說：「以前誰種的均現在退給誰。」羣衆們說：「這地租了三輩子，坪地、坡地、好地、壞地、顧地，誰也種過，你們給

我們那一件子？你們現在全種的是好地，你們要把好地全分了，剩下壞地給我們，我們不要。」那三家說：「要提批以前來鬧不清。」但羣衆就主張和那三家算賬退租，那三家又不想退租，又不開議羣衆好地，村裏吵成一團鬧不清，一位幹部當時沒有把握，有一天遇到三個老漢，他們就提出了意見：「把村裏有地的人攔開，從壞地的人一塊栽一塊栽的分。」這意見就啓發了幹部們的思想，開了羣衆會，羣衆把那三家駁倒了。分地時，幹部說：「怎麼分？」「從根子上分，地少的先分，地多的後分，人多得多分，人少的少分。」結果組織了「土地分配代表委員會」，按照羣衆的原則，從村裏最窮的起，按人口把土地分罷了。在破租清算時代，這可說是羣衆一種很大的創造。這個創造，第一，阻止了地主把土地轉化爲白淨，躲避土地改革的企圖；第二，說明地主階級子的剝削，好地壞地，誰種誰過，改變了當時許多地區「誰窮誰種」的不公平分配方法；第三，按照人口實行公平合理的，平均的土地分配方法。當然，我們接觸的這個材料，還不很完全，而當時這種創造，無疑的也是初步的，不完全的，粗糙的，但是，這個例子，就充分說明了羣衆的創造力。按照一位幹部的回憶所說：「七八日我們幹部總的鬧不開的事情，經過羣衆，聽了羣衆的話，一夜就甚麼也解決了。」

再舉例來說：最近臨縣某家坡的土地分配，「羣衆會有新的創造，即不依將土地評出產量，定出一種產量標準，按人口和貧苦程度平均分配（如每人分一石五斗產量地），而且是將無地少地農民的貧苦程度再分爲三等，定出三種產量標準，按等級平均分配，實行這種辦法的結果是無地貧民和赤貧農爲第一等，每人（外地復員軍人和單身漢）十二人計）分兩石五斗的地，缺地很多的貧農爲第二等，每人分一石七斗產量的地，缺地不多須補地的次，農爲第三等，每人分一石五斗產量的地，找羣衆意見，這種辦法最公平（按產量）、最合理（分等級），因爲按一種產量標準平分，無地的和赤貧比次會農還是吃虧。」這個創造的內容，就是解決了按貧苦程度分配的原則。

此外，根據各地土地改革的工作團的報告，各地羣衆在土地改革運動中的創造，簡直是很多很多的，羣衆的創造，總是生動活潑的，他們沒有死板的公式，沒有死板的表格，他們是按照具體的情形，加以揣摩，而各地以至各個鄉村具體的情形，時常是有自己的特點，或者有差別的，因此，創造的東西，就有極豐富的、複雜的多樣性。

這種根據自己鄉村具體情況的羣衆自我創造，適合了羣衆的要求，因此，成爲羣衆所擁護，就有最大的生命力。只要我們能夠真誠的，謙遜地和羣衆商量，採取羣衆的意見，並發於啓發，那末，羣衆的創造力就會不斷地、無限地湧出來。相反，如果我們的態度是做優和武斷，對於羣衆的意見，不是傾聽，而是不理，不是啓發，而是壓制，那末，就一定損害羣衆的思想創造力。

可以說毫無例外，各個工作團到各地方，凡是工作有較多創造而做得好或較好的，一定是因爲和羣衆商量得最多；凡是工作缺乏創造而做得較差或最差的，一定是因爲和羣衆商量較少或者是沒有和羣衆商量。多數事情做得好，而有一件兩件做得不好的，大概也總是因爲這一件兩件沒有先和羣衆商量。不和羣衆商量，就不能知道羣衆的需要，就不能有深入的調查研究，就不能確定爲當地當時羣衆所確實（是說確實的，不是說表面的，形式的）能夠擁護的工作步驟與鬥爭方針，就不能按照當地當時的具體情況，逐步提高羣衆的覺悟（由個別利者的覺悟提高到一般羣衆利者的覺悟，由經濟的覺悟提高到政治的覺悟），就不能使羣衆的思想和行動成熟起來。自然而然的走向革命化，就不能使羣衆自己決定並自己動起手來。按照毛主席所提出的自願的原則，處理自己的問題，就不能把問題解決得讓羣衆真正滿意；因此，在工作上也就一定不能夠有什麼真正的創造來。

四、羣衆思想方法的特點之一

這裏不準備講羣衆思想方法一切的特點，這裏只說羣衆思想方法一個最大的特點。

羣衆（說真正羣衆的）處理問題的所以容易妥當，容易公平與合理，就是很善於對各種事情，不斷反覆地加以各種比較，比如前面引的帶樂坊塔村羣衆對於土地分配的看法，便是做了各種比較；不只是比較現在，而且還比較過去（如說：「這地租了三輩子，坪地、坡地，好地、賴地，誰也種過」）。他們又比較地少的與地多的，比較人多的與人少的。柳家坡羣衆把糧食的貧苦程度分爲三等，也就是一種比較，就是從反覆比較中得出的結論。羣衆們在發覺問題時，從反覆比較中找出差別，發現矛盾，因而又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他們比較當地當時具體的、真實的東西，訂出處理問題的一般辦法，隨又在處理問題時，大家更具體地一件一件地比較，一家一家地比較，比如：在真正實行羣衆

路線去分配土地的地方，羣衆就是對於每個具體環境，每塊具體土地，實行了這種反覆地比較，做口地搗按按照人口需要與貧苦程度，比來比去，拉上拉下，因此，就能夠處理得比較妥當，就得到了公平，得到了合理。完全可以說：如果沒有這種羣衆的搗按，單憑工作團與少數人處理，就一定不能有公平，不能有合理。這種公平與合理，完全是由羣衆的比來比去而得的結果。在各地方發生的幹部問題同樣。幹部問題基本上是農民階級內部的問題，是農民內部的幹部與羣衆之間關係的問題。那一個幹部是好的，那一個幹部是壞的，那一個幹部犯了錯誤但是可以教育的，那點有功，那點有過，那一個幹部是缺點，那點是缺點，通常在羣衆心目中都是有一個比較的。把幹部問題交給羣衆去批評，去教育，去處理，讓羣衆們在聚體的場合再加一番認真的感情的比較，那麼，就一定不能發生個人的包庇、阿好、袒護，也一定不會有埋沒、揄句話，就一定能夠處理得妥當，能夠公平，能夠合理。這樣，就一定使幹部經過羣衆教育的大力量，獲得了真正的改造。而且羣衆也教育了，改造了自己。這樣，就一定能夠把幹部與羣衆間的相互關係弄清楚，而達到了幹部與羣衆的真正團結。

當然羣衆並不是清一色的。羣衆包含着各種不同的階層，以至不同的階級。不但如此，在羣衆中，覺悟程度也時常不一樣的，有先進的，有中間的，有落後的。因此，就會有各種不同的意見。但是在羣衆場合，他們也就會把各種不同的意見，加以比較，而比來比去，就會肯定出一種爲大家所共同承認的，或多數所承認的意見。經過羣衆把各種不同的意見反覆討論（爭論）、反覆比較之後，最後大家認的，或多數所肯定的意見，往往是最妥當或比較妥當，而錯誤性是較少或較少的。在羣衆的反覆討論（爭論）、反覆比較之後，正確的意思才會突出出來，而正確意見的被肯定，又往往是在討論中和比較中更加充實起來，並吸收了各種意見中那些可能比較妥當的部份，集中爲完整的或比較完整的正確意見，而那些不正確的意思就在這爭論和集中的過程中淘汰了去。這種經過羣衆討論與比較之後所集中起來的意見乃是當地當時羣衆覺悟程度發展的尺度。我們辦事，是如要根據這個尺度辦的。離開了這尺度，如果「不及」，就是右的機會主義，如果「太過」，就是「左」的機會主義，或叫作「冒險主義、關門主義」。一方面，我們不能「就落後份子」而忽視羣衆正當的利益（例如雇農的利益）；但另一方面，先進階級或先進份子的意見需要取得羣衆多數的同意與擁護（例如雇農主動爭取中農

同黨)，否則，就是陷於孤立。

和或衆商量，是在各種場合中進行的。個別的談話，集體的談話；小座談，大座談；不同階層或不同階級的談話，……等等。只要我們用心，不論在任何場合，都可以啓發自己，思想，比如：前述鄧樂吃菜村關於分配土地的方法，就是一個幹部偶然從三個老漢口中的話得到啓發，而後再在羣衆會上展開起來，爲羣衆所明確地肯定。當然，對於羣衆意見，採取自誇主義的態度也是不對的。領導的人，同樣地需要把羣衆那比較揣摩的方法，化爲自己領導的方法，就是把各種不同的意見，也加以比較揣摩，看出它們的不同階級內容，看出它們的差別與矛盾，看出它們的合理或不合理，而再加以選擇，融合，肯定與否定，聯合或鬥爭，因而確定問題，確定政策，通過羣衆自己，以步步提高羣衆的覺悟，而這正是毛主席所說的「集中起來，堅持下去」。

反現比較揣摩的方法，這是羣衆的眞正科學分析的方法，這方法無誤地是需要爲我們一切工作者所學習的。有了這樣的分析方法，就能夠避免個人的衝動與武斷，而在任何場合都可以容易避免錯誤。

五、放手走羣衆的路

「孟子」書上有一段話：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這段話很好。按照我們的情況來說，就是這樣：根據幹部說的話還不行，根據羣衆說的話也還不行，根據羣衆說的話就行了。有事只和幹部商量是不夠的，只和積極份子商量仍是不夠的，必須進一步和羣衆商量。這對於我們幹部是極重大、極嚴重的問題。過去有許多工作沒有做好，就是因爲沒有認真實行毛主席這種態度，這種方法。我們黨的政策原來是從羣衆中來的，但是，如我們各級幹部沒有執行政策的羣衆路線，有了好政策也是枉然。我們幹部必須解決、澈底的現實官僚主義的老

一套。概括前面所說，可以歸納到下面幾條：

一、大家都齊下決心，真正學習毛主席，當羣衆的一個小學生，有事和羣衆商量。

二、信任羣衆的正確。非羣衆決定不能解決問題，所以要放手把問題交給羣衆去討論和處理；凡是我們犯的錯誤，都在羣衆面前公開承認錯誤；羣衆所認為不適當的決定，論證羣衆推翻，由羣衆重新來新的決定；要根據羣衆的意見來改造我們的各種幹部與組織。

三、不是硬套公式，而是從當地當時的羣衆具體情況出發，「根據羣衆的覺悟程度，去啓發與提高羣衆的覺悟，在羣衆出於內心自願的原則之下，幫助羣衆逐步組織起來，逐步地展開為當時當地內

外環境所許可的一切必要的鬥爭」。（見「論聯合政府」）

四、我們不是主張尾巴主義或自流主義，而是要善於把羣衆的意見集中起來，轉化為指導羣衆進

步前進的指南針，把羣衆考察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方法轉化為我們指導羣衆的方法。

五、這樣，就能夠走到領導方針及領導骨幹與羣衆的一致，能夠使我們這個偉大的、為人民服務

的黨的一每一步驟和每一行動自然而然地走向使羣衆革命化，並將黨同羣衆由鬥爭中得來的一切

果實。

最近有一個工作團從鄉下回來，帶來了那裏一個農民所說的幾句話：「政治要放在民間，過去做

事情，是上頭往下滾，現在做事情，是要從下往上滾」。這幾句話說得好。我們現在做事情，要和羣

衆商量，就是要「從下往上滾」。這就是前面所說的一切。

